

布尔什维克 与 民族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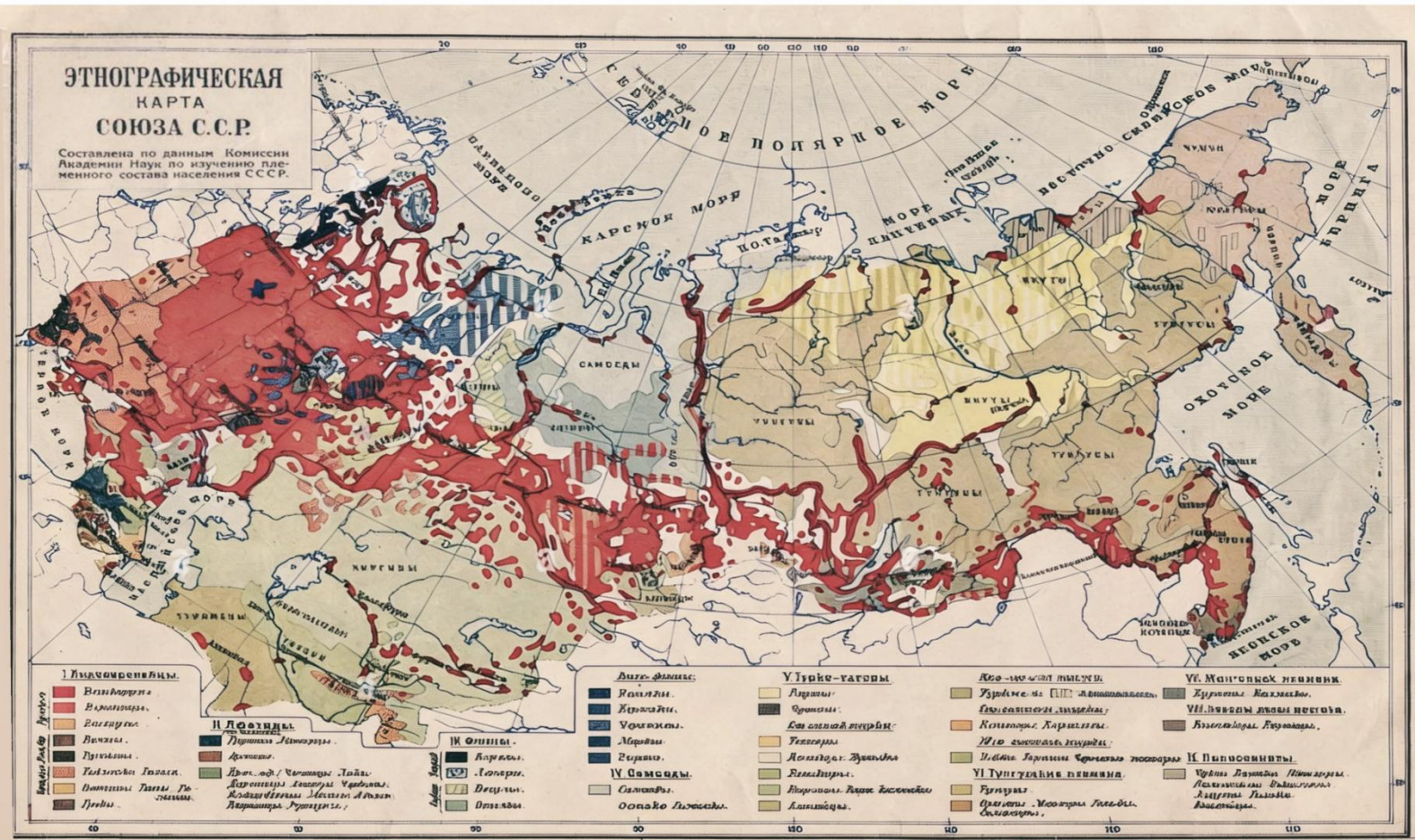
1917~1923

Jeremy Smith

The Bolshevik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1917-23

〔英〕杰里米·史密斯 著

红楔社 译



红楔社

布尔什维克与民族问题

1917—1923

杰里米·史密斯 著

红楔社 译

目录

1	引言	4
2	马克思主义者、布尔什维克与民族问题	11
	从马克思到列宁	12
	1917 年前的布尔什维克	21
	1917 年后的布尔什维克	29
3	民族自治的实例——原因与过程	44
	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	46
	红军中的民族单位	51
	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民族的人民委员部与局	59
	穆斯林人民委员部	61
	民族领土自治	64
	突厥斯坦苏维埃自治共和国	67
	巴什基尔与鞑靼自治	70
	自治共和国与州的传播	75
	外高加索的自治	82
4	构建民族身份——边界与国家结构	99
	外高加索的内部边界	103
	白俄罗斯的边界	105
	中亚的内部边界	117

目录

	移民与重新安置	127
	自治的困难	138
	巴什基尔危机 1919—1920	139
	突厥斯坦的冲突 1921	146
	人民苏维埃共和国	150
	独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153
	经济发展	154
5	“本土化”——民族共产主义领导层	159
	犹太社会主义政党	161
	乌克兰斗争派	170
	穆斯林民族共产主义者	184
	共产主义学校和大学	199
6	“文化自治”——教育、语言和文化	210
	少数民族教育	212
	语言计划	235
	民族文化	244
	宗教	246
7	格鲁吉亚危机与苏联的形成	249
	苏维埃共和国间关系的组织的竞争方案	251
	“联邦制”、“邦联制”还是“自治”？	254
	斯大林的“自治化”方案	261

目录

	格鲁吉亚事件	273
8	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与苏丹-加利耶夫事件	308
	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	308
	苏丹-加利耶夫事件	330
9	结论	344

译者注：本书略过了原书的插图目录、前言与致谢、缩写词、俄语术语与组织机构表、参考文献、索引等部分，读者可自行下载 *The Bolshevik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1917-23*。文中斜体、粗体（对应单词非语法性大写）等格式如无说明则为原文如此，其中斜体、粗体表示强调，“[]”表示作者所加，即等同于“[—作者]”。本次封面为我社自行参考设计，不同于原书封面。

第 1 章 引言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最初扎根的这片土地，此前曾是一个多民族帝国的中心，帝国疆域横跨近半个世界，西起波兰，东至白令海峡。在这片广袤土地上，俄罗斯族仅占人口的半数略多。自 16 世纪起，俄国的历代皇帝即沙皇从古老的莫斯科公国向外扩张：进入伏尔加地区，那里居住着文化发展水平各异的穆斯林民族和芬兰语族民族；向东扩张至西伯利亚，那里分布着众多人口稀少且与世隔绝的民族；向西扩张至东欧，那里有着波兰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和犹太人等难以厘清的民族构成；向北扩张至卡累利阿，最终将芬兰纳入版图，芬兰民众在近代从未享有过独立，却早已习惯在一套特定的自治机构下生活；向南扩张至高加索，因数百年的内讧而动荡不安，还扩张至中亚的平原与山谷地带，那里居住着众多游牧和定居部落，学者们将其大致归为突厥语族或伊朗语族，但这些部落自身并不如此界定。

这个帝国对其统治者既是巨大财富与权力的源泉，同时也是虚弱的根源。乌克兰肥沃的田野和广阔的煤层、波兰的工业、中亚的丝绸与棉花生产和西伯利亚的矿藏，若能充分开发其潜力，都可为国家和个体企业家带来财富。但掌控这些资源需付出高昂代价：维系帝国统一所需的军事人力、对如此广袤疆域保持有效控制所需的官僚干预程度以及随着少数民族精英发现自身的晋升之路因民族身份而受阻、并

效仿欧洲其他地区蓬勃发展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运动由此兴起。帝国的需求催生了一个专制、官僚化而且充满敌意的国家，不仅脱离本国人民需求，也与欧洲其他地区的现代化进程脱节。结果是，尽管工商业确实有所发展，政权无法容忍能使其充分享受帝国主义和工业化带来的经济益处的企业活力水平。¹

俄国沙皇虽给予波罗的海的德国贵族特权地位，允许中亚的穆斯林保留其宗教信仰，也让芬兰拥有自己的议会，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认为其他文化都低于俄罗斯文化，非但不承认各民族平等，反而采取旨在征服并强制消除一切民族特色的措施。1881年以后的“俄罗斯化”时期尤其如此，即便某些群体所享有的有限权利也遭到了侵犯。列宁将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帝国称为“各民族的监狱”，而这座监狱里的囚徒正准备从内部打开牢门。镇压引发了民族主义反对派的壮大：19世纪波兰爆发了一系列起义，北高加索山区的弱小民族则持续武装抵抗沙皇统治。这一时期，在少数民族中兴起了更具群众基础的政党——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亚美尼亚达什纳克党、阿塞拜疆穆萨瓦特党、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哈萨克阿拉什运动、犹太崩得、克里米亚鞑靼民族党和伏尔加鞑靼人贾迪德运动。

1905—1907年革命见证了第一次席卷整个帝国的民族起义爆发。革命既是俄罗斯工人和农民的起义，同样也是各民族的起义。革命后对少数民族做出的有限让步既不充分，也未得到始终如一的推行，无法确保民族和谐。结果，1914年后俄国的战争努力因帝国的各种诉

¹ 杰弗里·霍斯金，《俄罗斯：民族与帝国》（伦敦，1996年），各处。

求而受到严重阻碍，最终在 1915 年引发了中亚起义，这是对政府试图征召穆斯林到俄罗斯中部从事与战争相关工作的回应。

然而，1917 年之前，除波兰外，没有任何民族主义政党或社会主义政党寻求彻底独立。它们的诉求是结束对非俄罗斯公民及语言的歧视并希望与俄罗斯建立某种形式的联邦制或自治的关系。1917 年的两次革命及军事失利造成了巨大动荡，中央权威瓦解，几乎在不经意间，各民族政府发现自己掌控了特定的领土。最初，只有在与俄罗斯其他地区隔绝的突厥斯坦以及在巴库的短暂时间里，红色政权才得以在俄罗斯中部以外地区站稳脚跟。其他地区由民族主义政府控制，这些政府为回应十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迅速将诉求转变为彻底独立——乌克兰中央拉达、白俄罗斯国民会议、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中亚的浩罕政府等等。在事态推动下，掌控这些新民族政府的政党，其中许多此前信奉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原则，日益诉诸强硬的民族主义和反布尔什维克主义。不过，在俄国内战期间，民族运动被迫做出选择，要么支持布尔什维克，至少承诺给予民族权利和一定程度的自治，要么支持白军，其指挥官公开宣称要恢复形式的俄罗斯帝国。随后的分裂和不断变化的联盟削弱了民族主义者的力量，使布尔什维克受益。

新成立的苏俄政府方面，于 1918 年 1 月承认芬兰独立，以此表明其实施民族自决原则的意图。布尔什维克希望满足芬兰的民族诉求会巩固芬兰的社会革命，而芬兰胜利的红色政府会重新与红色俄罗斯建立联系。然而，经过残酷而激烈的内战，红色力量被击败，一个持

敌对态度的白色政府在芬兰掌权。本着自决精神，布尔什维克向芬兰的同志们提供了武器和物资援助，但没有俄罗斯军队越过边境。

这个策略的失败导致布尔什维克对旧帝国中已脱离俄罗斯本土的其他地区采取了不同政策。随着革命蔓延到非俄罗斯地区，俄罗斯红军被派往这些地方，为当地起义者增添一支有组织的大规模战斗力量。乌克兰成为布尔什维克与民族主义势力的首个战场；在苏俄与乌克兰中央拉达进行了两个月毫无结果的谈判后，1917年12月30日，布尔什维克宣布成立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并在哈尔科夫组建政府，与基辅的拉达对抗。拉达于1918年1月22日回应，宣布独立，为苏维埃军队进军基辅提供了借口，他们于2月8日进入基辅。次年，基辅又被军队占领了三次：1918年3月被德国人占领；12月被民族主义负责人的军队占领；1919年2月6日红军再次占领，成立了第二个苏维埃政府。以在大多数边境地区为主要力量的工人及大部分俄罗斯人口为基础，宣布成立苏维埃政府，进而能够呼吁俄罗斯红军的兄弟般援助，这就是将苏维埃政权扩展到旧俄罗斯帝国大部分地区所采用的方法：通过这种方式，到1920年底苏维埃政权扩展到了乌克兰、白俄罗斯、中亚和外高加索。然而，它未能在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的波罗的海国家站稳脚跟，它们保持独立到20世纪30年代末斯大林以武力强加苏维埃政权。在其他地区，此时已建立名义上独立的苏维埃政权，但处于俄罗斯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之下。

这些胜利让红军勇气倍增，加之波兰对乌克兰和俄罗斯发动的进攻未能得逞，1920年秋，红军挺进波兰，他们相信波兰工人会响应

这次进军，起来反抗毕苏斯基政权并张开双臂欢迎红军。然而，预期中的起义并未发生，红军在华沙城门被击退，这使得仅凭军事力量向西扩张苏维埃政权的尝试就此终结。

然而，在另一个案例中，布尔什维克确实通过武力成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是在格鲁吉亚，那里的独立孟什维克政府未受反动白军的侵扰，得以巩固自身地位，而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力微乎其微。1920年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苏维埃化后，入侵格鲁吉亚的压力不断增大，由高加索特立独行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第七章有他的更详细内容）精心策划。不过，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并未轻易做出这一决定，1920年至少三次阻止奥尔忠尼启则发起进攻，命令他“不得自行决定格鲁吉亚”。²最终，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让步了，蓄意制造了与孟什维克政府的裂痕并于1918年2月15日授权红军第十一军越过边境，借口是支持在博尔恰洛地区策划的一场起义。当时的军事人民委员列夫·托洛茨基曾反对奥尔忠尼启则的行动，后来为入侵辩解，称独立的格鲁吉亚对苏维埃安全构成威胁，因为它可能成为英国或其他外国势力开展反对苏维埃俄罗斯行动的基地。其他人认为对格鲁吉亚的入侵预示了二战结束时红军在东欧的行动，但在当时，这种行动只是普遍规则的一个例外。

俄罗斯边境地区苏维埃化的细节及其最终并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过程不是本书的主题。本书的目标为探讨布尔什维克是

²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17，目录号3，卷宗号74，第3页；全宗号17，目录号3，卷宗号122，第2页；全宗号17，目录号2，卷宗号46，第3页；全宗号17，目录号2，卷宗号55，第5页。

如何应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多民族特征的事实的，以及他们在确保政治控制苏维埃共和国的同时，必须如何处理非俄罗斯民族的需求与愿望。少数民族并非仅限于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苏维埃俄罗斯本土就居住着众多大小不一的民族和族群，他们的存在给布尔什维克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这个挑战将通过在语言、文化、共产主义干部招募和国家结构等领域实施一系列多为临时制定的政策来应对。由于在民族主义和少数民族问题上缺乏统一的主流态度，这项任务受到了严重阻碍。除了出于本能或意识形态倾向而同情民族诉求的布尔什维克，还有一些俄罗斯人和非俄罗斯人认为民族特殊性的一切表现都是反动的，而且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存在根本冲突。在非俄罗斯地区，这些共产主义者与继续表现出沙皇官僚或俄罗斯农民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人结成了不正当联盟，而另一方面，他们又与绝对的民族主义者结盟。

结果，民族问题上形成了明显的分歧：一方希望给予民族更多特殊权利，另一方反对。很难用布尔什维克运动中的“右”和“左”来划分这两种立场。在关于民族问题的辩论中，支持少数民族逐渐被视为“右派”立场，反对对民族主义者做出让步被视为“左派”立场。但这些标签与党在更广泛意义上的左右派划分并不相符。通常可以说，被称为“工人反对派”的左翼派别在民族问题上采取了“左派”立场，但被认为是较为温和的左派领导人托洛茨基在民族问题上却被视为“右派”。布哈林在革命前曾从左派立场反对列宁的民族政策，但早在他被视为党的右派前（例如在 1923 年的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

就在民族问题上转向了右派。另一位左派主要成员克里斯蒂安·拉柯夫斯基在乌克兰任职期间，在民族问题上也经历了类似的从左派到右派的转变。1917年的右派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在1923年的民族问题上显然属于左派，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左和右的标签不如区分中央与地方有用。在斯大林的领导和列宁的指导下，俄罗斯共产党领导机构制定的民族政策总体上是支持少数民族的。负责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或Наркомнац的许多领导和官员自己就有民族主义背景，他们采取了更明确支持少数民族的立场。但在地方上由俄罗斯人主导的苏维埃中，大俄罗斯主义态度占据上风，他们经常与当地民众的代表发生冲突。尽管后者即所谓的“民族共产主义者”在地方冲突中往往能得到中央支持，但内战期间，中央集权的缺失意味着中央的政策经过了一段时间才得以推行。

因此，本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讲述的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斗争，或许令人惊讶的是，中央支持地方自治。布尔什维克党内缺乏团结，再加上俄罗斯自身民族状况的特殊性，解释了布尔什维克在着手解决民族问题时采用的临时应变、富有想象力而且常常前后不一的方式。这是关于如何制定和实施这些政策的故事。它也是阐明布尔什维克的总体运作方式的故事，希望它能为当今世界依然存在的民族相关问题和冲突提供一些借鉴。

第2章 马克思主义者、布尔什维克与民族问题

民族问题的复杂性使其成为世纪之交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争议最激烈的政治问题之一。马克思之后，关于民族问题出现了四种主要立场。民族自决权，与列宁的关联最明确的位置；罗莎·卢森堡的“民族虚无主义”，也得到一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支持；跨地域民族自治，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崩得提出的方案；四是国家联邦制，俄罗斯帝国内一些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政党的政策。欧洲和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论战性质的辩论使这四种立场形成对立，但实际上，除了前两种外，其他立场从理论角度而言并非相互排斥，而且每一种立场都能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找到一定的支持依据。尽管布尔什维克党与民族自决政策的关联最为密切，但上述每一种立场在党内都有其拥护者，而且每种立场中的要素在1917年后在党民族政策的发展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已频繁讨论过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但在此仍有必要简要概述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思想。

从马克思到列宁

到世纪之交，欧洲革命运动的重心已很大程度上从西欧转向中东欧，那里的民族问题远比法国等国家复杂，在法国，通过重新划定边界或族群同化，国家边界已日益呈现出与民族边界相吻合的趋势。这在马克思主义左派阵营中引发了一场常常充满激情的辩论，因为社会主义者们试图解决从未以完全相同的形式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面前的问题。1859年，恩格斯曾预言过一种趋势。

这就是应当愈来愈多地使那些大的、有生命力的欧洲民族具有由语言和共同感情来确定的、**真正自然的疆界**；同时……那些残余的民族，仍然应当留在比较大的民族里面，或者溶化到他们中间，或者没有任何政治意义地作为民族志学的纪念品。¹

作为对欧洲历史上一种普遍趋势的阐述，这个分析在理论层面从未受到后来马克思主义者的严肃质疑，事实上，它构成了列宁与布尔什维克左派反对派两种对立立场的基础，不过，如我们将见，这个分析很难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卡尔·伦纳和奥托·鲍威尔的立场相调和。然而，这并不是说马克思、恩格斯，或者他们的大多数继承者，完全忽视了种族竞争或民族压迫问题。

¹ 引自理查德·派普斯，《苏联的形成：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 1917—1923》（马萨诸塞州剑桥，1954年），第21页（译者注：粗体为恩格斯原文，本书未标粗体，后续本书所有引用都是如此，不再单独说明。见《波河与莱茵河》，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13卷（北京，2016年），第298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民族主义视为资本主义发展和不同民族国家资产阶级之间竞争的产物。民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武器，会将工人与他们本国统治阶级的虚幻共同利益捆绑在一起。工人“没有祖国”，而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将终结所有民族差异；“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而消灭。”

民族内部的阶级对抗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²尽管如此，民族国家的存在和民族压迫的事实产生了两个重要后果。第一，“既然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主导阶级，确立为民族，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不过这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个意思。”³这仅仅意味着，阶级斗争是在国家边界内（这在西欧也意味着民族边界内）进行的，每个国家的工人都面临着推翻本国资产阶级的任务。

其次，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承认民族间的对抗与征服是工人阶级国际团结的障碍。对此，一种可能反应是将所有民族主义视为破坏团结的干扰因素和威胁，1848年，恩格斯正是基于这种思路否定了除波兰人之外的所有斯拉夫民族。⁴帝国主义国家甚至可能在加速殖民地的经济发展方面起到进步作用比如印度，尽管英国的占领

² 引自 E.H.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 1917—1923》（三卷本，鹈鹕版，1986年），第1卷，第415页（译者注：此处去除了原文的分段，后续本书所有引用都是如此，不再单独说明。见《共产党宣言》，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卷（北京，1958年），第488页）。

³ 同上，第415页（译者注：同上，第487页）。

⁴ 奈杰尔·哈里斯，《民族解放》（伦敦，1990年），第47页（译者注：见《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6卷（北京，1958年），第322—342页）。

带来了种种恐怖。⁵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中，对民族解放斗争的支持是有条件的，取决于这些斗争在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基于此，他们支持资产阶级波兰反对反动的俄罗斯帝国、争取独立的权利，却反对石勒苏益格的丹麦人和爱尔兰人各自对抗普鲁士和英国的诉求。⁶不过，在波兰问题上，马克思提出了一个关键观点，民族主义运动即便由波兰贵族领导且首要服务于贵族的利益，也需要获得农民群众的支持才有成功的可能，因此必然有民主性质并意味着废除封建权利。⁷这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辩论定下了基调。一方面，有人认为某些民族运动有分裂性，会损害较先进民族的发展而有利于较落后民族；另一方面，也有人指出所有民族解放运动本质上都是革命性和民主性的，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得到支持。

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同时存在这两种论点，那么在他们的后期的作品中显然是倾向于支持第二种论点，支持民族运动。马克思对爱尔兰问题态度的转变便体现了这一点。1848年，马克思将英国工人的沙文主义归咎于爱尔兰人民自身并认为英国的宪章运动是唯一有能力解放爱尔兰的力量。但19世纪60年代芬尼亚运动的兴起迫使马克思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主张英国工人应支持爱尔兰人并认识到爱尔兰的革命甚至可能先于英国本土的革命发生，而且会推动英国

⁵ 同上，第42页（译者注：见《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9卷（北京，2016年），第143—150页；《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同上，第246—252页）。

⁶ 卡尔，第1卷，第419页。

⁷ 哈里斯，第43页（译者注：见《论波兰问题》，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卷（北京，1958年），第534—541页）。

本土革命的发展。大约在这个时期，1865年，民族自决的一般权利首次被纳入第一国际的纲领中。⁸从爱尔兰问题中，马克思还得出另一个重要结论，英国对爱尔兰的压迫不仅影响爱尔兰人民，还在英国工人阶级中滋生了沙文主义，这是阻碍英国革命运动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在英国国内倡导支持爱尔兰事业尤为重要。后来，列宁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谴责与这个观点遥相呼应。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民族运动的态度往往基于战术考量，它取决于相关民族的经济水平，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不同派别试图构建一种可全面适用的民族问题通用理论，相关辩论愈发激烈。有三个方面的发展使辩论有必要得到澄清。第一，革命运动的重心已从法国和英国转移到中东欧以及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匈帝国三个帝国。这里的民族问题远比英国等国家复杂，在英国只有爱尔兰这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其民族边界清晰明确。第二，资本主义在欧洲的传播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均衡意味着人们不再可能以相对进步民族与落后民族的框架论述，这也就消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俄罗斯作为对东欧进步的唯一最重要威胁的特别关注。第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开始，欧洲东方殖民地中重要民族运动的发展日益对布尔什维克及其他派别产生影响。

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都认同这样一个基本前提，民族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民族差异和对抗会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消失或者至少能

⁸ 同上，第45页；卡尔，第1卷，第421页（译者注：见《机密通知》，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16卷（北京，2016年），第473—475页）。

轻易得到解决。因此，对他们而言，争论焦点在于民族运动在短期内会帮助或阻碍革命运动。19世纪90年代末，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内部出现了一种不同的思路。这种思路承认存在一些民族群体，他们并不局限于某一特定领土，因此不能从脱离奥匈帝国并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的角度来探讨他们的问题。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暗示民族差异和独特的文化认同是永恒的，在社会主义下也会持续存在。1897年维也纳党代表大会决定将党重组为六个民族—领土政党组成的联邦，但在1899年的布吕恩代表大会上，南斯拉夫代表团首次提出了所谓的个人性或跨地域民族自治。这个理念，政治集权国家可以通过允许少数民族拥有自己的自治机构来管理本民族的文化和语言事务以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成为了跨地域民族—文化自治理论的基石。

1901年4月，犹太崩得第四次代表大会采取了类似的立场：

代表大会认识到，像俄罗斯这样一个由许多不同民族组成的国家未来必须发展成为一个民族联邦，其中每个民族无论其占据的领土如何，都应享有充分的民族自治权。⁹

⁹ 乔纳森·弗兰克尔，《预言与政治：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与俄国犹太人 1862—1917》（剑桥，1984年），第220页。

事实上，可以说民族—文化自治原则并非源自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源自流亡的崩得分子约翰·穆勒。¹⁰

然而，正是奥地利人奥托·鲍威尔和卡尔·伦纳对这个思路进行了最全面的阐述。鲍威尔反对马克思主义正统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教育和通讯的普及已在将农民和工人与他们的民族文化联系在一起，而社会主义将使这个进程走向终结并且“将通过民族教育和文明的多样性使各个民族彼此区分开来”。¹¹社会主义非但不会终结民族差异，反而会充分实现民族原则，在社会主义下，社会全体成员而不仅仅是统治者都能感受到自己是民族的一部分。世界经济的合理组织将促使国际分工完全实现，这样一来，即便是最小的地区也能通过专注于特定经济活动领域而独立生存。因此，鲍威尔准备承认甚至鼓励所有民族的愿望，无论这些民族多么弱小，他认为这些民族在社会主义下将会蓬勃发展。¹²卡尔·伦纳同样支持弱小民族的愿望，特别是遭受过民族压迫的民族，这些民族因此将压迫民族而非资本主义视为自身苦难的根源。¹³列宁对被压迫民族也有类似看法，但鲍威尔和伦纳得出的结论比列宁的结论范围更广，因为与列宁不同，他们认为民族是某种永恒且积极的事物。鲍威尔主张，尽管不同民族可以在一个超国家的国家之下组成联邦，但它们仍将自行管理本民族的文化和

¹⁰ 同上，第 215—219 页。

¹¹ 奥托·鲍威尔，《“民族的概念”》，载于蒂姆·博托莫尔、帕特里克·古德编，《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牛津，1978 年，第 107 页。

¹² 奥托·鲍威尔，《社会主义与民族性原则》，载于博托莫尔、古德（编），《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牛津，1978 年），第 114 页。

¹³ 卡尔·伦纳，《民族观念的发展》，载于博托莫尔、古德，第 120 页。

语言事务。这种民族自治将超越特定民族专门占据的领土范围，涵盖民族的所有成员，无论他们居住在何处。因此，可能会存在一些孤立的社群，它们“在民族领土机构方面效忠于本民族，而在其他方面效忠于外民族社群”。其结果将是“一幅由人们的民族联合组织和领土机构构成的斑驳图景”。¹⁴

基于这些前提，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为奥地利构建了一个详尽的蓝图，奥地利将被划分为八个多民族经济区，同时设立八个独立的民族委员会负责管理文化事务，所有这些都统一在王室之下。这个方案的基础是经济、权力与文化事务的彻底分离，这种分离后来在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中显现出来，同时也为社会主义者的辩论引入了一些重要理念；首先，民族差异会超越资本主义而持续存在，各个民族，即便是最小的民族，都渴望维护自身独特的文化和语言。其次，个人文化自治方案是社会主义者首次认真尝试解决居住在本民族领土外或没有民族领土的民族群体的问题。

鲍威尔认为经济的进步已经消除了地方特殊性，使民众能认同整个民族，而波兰社会主义者罗莎·卢森堡认为帝国主义统治和经济体系国际化强化了跨越民族界限的阶级忠诚，因此，欧洲的民族问题往好里说是无关紧要的，往坏里说是危险的干扰因素：“[宣扬]民族利益只能成为欺骗手段，将广大劳动群众出卖给他们的死敌，帝国主义。”¹⁵就波兰问题而言，她主张情况自马克思时代以来已经发生了变化，

¹⁴ 鲍威尔，《社会主义与民族性原则》，载于博托莫尔、古德，第117页。

¹⁵ 引自哈里斯，第57页。

波兰民族主义贵族已成过往，波兰社会如今被一个主要由外来者组成的资产阶级主导，因此，除了一小部分知识分子外，现在没有任何社会阶级有兴趣为波兰独立而斗争。此外，俄罗斯帝国已不再是马克思时代的反动势力堡垒，波兰经济若不保持与俄罗斯的联系，就无法繁荣发展。这个分析可以扩展到欧洲其他地区（但不适用于远东殖民地），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级分化意味着“在阶级社会里，作为社会—政治上和谐一致整体的‘民族’并不存在，在每个民族中却存在着利益和‘权利’冲突的阶级。”¹⁶无论如何，只要资本主义存在，民族自决就是空想的诉求，它无法维护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因此，有使命感的社会民主党所要实现的不是民族自决权，而仅是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阶级的自决权，即无产阶级的自决权。”¹⁷

罗莎·卢森堡确实承认民族特殊性拥有某些权利，允许在特定情况下实行有限的民族自治。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卡尔·考茨基主张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立法机构，与一个高度分权的行政机构相分离，卢森堡认为，无论是作为一项基本民主原则还是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地方生活的某些领域”都应专门由地方层面立法和管理。¹⁸文化与教育就包含在这些领域中，而且由于历史决定了文化应采取民族形式，由此可以得出，在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领土将享有自治权；

¹⁶ 罗莎·卢森堡，《民族问题与自治》，载于霍勒斯·B·戴维斯（编），《民族问题：罗莎·卢森堡文选》（纽约，1976年），第135页（译者注：中译本里头一个“民族”未加引号。见《民族问题与自治（摘录）》，载于《卢森堡文选》，下卷（北京，1990年），第180页）。

¹⁷ 同上，第140页（译者注：同上，第184—185页）。

¹⁸ 同上，第249页。

在一个现代国家内部，当存在界限分明的民族聚居区而这些聚居区同时又是具有某些经济和社会差异的地域时，资产阶级经济的相同要求使得在最高的、全国性的层面上实行自治变得必不可少。在这个层面上，由于民族—文化独特性这一新因素，地方自治也转变为一种仅适用于特定条件的特殊民主制度。¹⁹

这种民族自治是某些领域对地方自治需求的必然延伸，在卢森堡看来，也足以防止民族压迫的发生，列宁坚持认为，只有赋予民族脱离权才能确保避免民族压迫。对卢森堡而言，民族自治足以解决波兰人的问题，波兰人在一个界限分明的地区构成人口的绝大多数，但这不适用于犹太人，他们没有明确的领土，而且无论如何都在文化上被波兰和俄罗斯文化同化，也不适用于立陶宛和高加索地区，这些地区的族群构成极为复杂，不允许任何一个民族群体占主导地位。卢森堡反对将非领土民族自治作为阻碍不同民族团结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她为维护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所提出的唯一建议是所有族群在广泛的地方自治中开展合作，再加上“一项单独的、适用于整个帝国的语言法来维护少数群体的利益，[它]可以确立一项规范，依据这一规范，达到一定人数下限的少数民族可据此强制要求创办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学校”，以及关于在行政机构等场所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相关规定。

¹⁹ 同上，第 256 页。

²⁰罗莎·卢森堡提出的这些积极条款构成了一套有限的民族—领土自治制度，同时为非领土民族群体提供教育和语言方面的保障。与卢森堡反对民族自决权的观点相比，这个制度受到的关注较少，但它与列宁和斯大林的思想更接近，而非与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民族虚无主义者”的思想相近，这些人在民族问题上常被描述为“卢森堡主义者”，但他们往往忽视了卢森堡这方面的主张。

与列宁及大多数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一样，罗莎·卢森堡认为存在民族差异消亡的趋势。这使她低估了民族成分混杂地区带来的问题，在她看来，这些地区仅存在教育和语言方面的纯粹行政难题。这种思维方式，特别是当它被新苏维埃政权中可以说敏感度较低的地方和国家层面的管理者采纳时，不可避免地引发了紧张局势并导致了严重错误，即低估了非俄罗斯民族中民族情感的力量。

1917 年前的布尔什维克

1903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中包含以下关于民族问题的条款（编号与原文一致）：

- (3) 广泛实行地方自治；在生活条件和居民成分特殊的地区内实行区域自治。

²⁰ 同上，第 279 页。

- (7) 废除等级制，全体公民不分性别、宗教信仰、种族和民族一律平等。
- (8) 居民有权受到用本民族语言进行的教育，国家和各级自治机关应拨款创办这种学校，以保证这种权利的实现；每个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在各种会上发言的权利；在一切地方的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中，本民族语言同国语平等使用。
- (9) 国内各民族都有自决权。²¹

这些条款既未提及民族—文化自治也未提及联邦制，但为党的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两翼接受，却遭到革命运动其他所有派别包括民族政党从不同角度的反对。犹太崩得采纳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民族—文化自治提案，而多个民族主义政党，包括亚美尼亚达什纳克楚琼党、格鲁吉亚社会主义联邦主义者、白俄罗斯兄弟会、犹太团体镰刀社、波兰社会党的一部分，以及俄罗斯社会革命党，都要求将俄罗斯帝国改组为独立国家的联邦。到1912年，孟什维克派已很大程度上转向民族—文化自治的立场，部分原因是为了迁就崩得。不久后，由布哈林、皮达可夫和叶夫根尼娅·博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左翼将罗莎·卢森堡的论点用于反对党纲的第九条。从1912年起，列宁被迫针对党内党外所有这些对立观点展开一连串论战。

²¹ R.H.麦克尼尔（编），《苏联共产党决定与决议》（多伦多，1974年），第1卷，第42页（译者注：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载于《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北京，1964年），第38页）。

列宁认同罗莎·卢森堡和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民族主义是资本主义和国家间竞争的产物，它起着将工人阶级与本国统治阶级捆绑在一起并按民族界限分裂国际无产阶级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民族主义都是反动且分裂的。但与卢森堡或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不同，列宁坚持对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如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俄罗斯帝国内被压迫的非俄罗斯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进行关键区分。前者促使压迫民族的工人和农民相信自身具有天然的优越性并依附于本国的统治者，而非与其他民族的被压迫者团结起来，后者促使人们对沙皇帝国进行革命反抗，同时也造成了对压迫民族所有成员的一种可以理解的不信任。这不是一个真正、潜在的力量在起作用的问题，所有工人都受资本主义压迫而非受某个民族群体压迫，而且俄罗斯工人从沙皇对非俄罗斯民族的压迫中没有实际所得；但正如列宁在给斯捷潘·邵武勉的一封信中所坚持，这关乎对局势心理层面的理解：

您怎么就不想弄明白在民族问题上特别重要的那种**心理因素**呢？？只要搞一点强迫，这种心理因素就会破坏和损害中央集权、大国家和统一语言的无可争辩的进步作用，使之化为乌有。

22

²² V.I.列宁，《列宁全集》（第五版；莫斯科，1964年），第48卷，第234页（译者注：见《致斯·格·邵武勉（1913年12月6日）》，载于《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增订版（北京，2017年），第46卷，第386—387页）。

承认民族自决权至关重要，原因有二：消除被压迫民族的工人对压迫民族工人的不信任，以及反对压迫民族的工人遭受本国统治者的压迫。脱离权的存在应当会促使民族不渴望脱离，因为这项权利本身就是对民族压迫的一种保障。它保证“俄国在它仍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时，有最大的民族和睦的可能”。²³列宁希望，大国的经济优势与脱离权结合意味着民族实际上不会走上脱离的道路。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解决方案不同，后者将民族视为永恒的实体并通过设立民族议会来鼓励民族特殊性，民族自决权的目的是克服并加速民族分裂的终结。

那么，民族自决的口号是克服民族不信任的手段，而非为多民族国家未来组织形式制定的纲领。列宁明确认为大国优于小国，并将国际团结视为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

[无产阶级]承认各民族平等，承认各民族都有成立民族国家的平等权利，同时又把各民族无产者之间的联合看得高于一切，提得高于一切，从工人的阶级斗争着眼来估计一切民族要求，一切民族的分离。²⁴

²³ 列宁，第25卷，第277页（译者注：见《论民族自决权》，载于《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增订版（北京，2017年），第25卷，第245页）。

²⁴ 同上，第274—275页（译者注：同上，第242页）。

他希望实现一个统一的国家，同时强烈反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和崩得主张的民族—文化自治制度，以及社会革命党人、达什纳克党人等提出的联邦制。

就本次讨论来说，列宁与卢森堡之间的重要分歧不仅仅在于自决权原则本身。卢森堡认为“作为同质社会政治实体的‘民族’并不存在”，列宁将民族视为一个可界定的群体，可以被赋予有别于构成民族的各个阶级的权利。这个分歧影响了布尔什维克主义两翼对1917年后民族政策实际任务的态度。

列宁与卢森堡一样，在主张民族自决权的同时也支持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和文化的权利。这里的关键是语言问题上绝不应使用强制手段，也就是说，不应存在强制性的国家语言。这正是他在上述给邵武勉的信中所表达的观点，他在1914年的文章《需要强制性国语吗？》中对此作了详细阐述。他支持一种通用语言：

所有居住在俄国的被压迫阶级，不分民族，都应当尽可能地建立更密切的联系，达到兄弟般的统一，我们对这一点的希望比你们更迫切。我们当然赞成每个俄国居民都有机会学习伟大的俄罗斯语言。²⁵

²⁵ 列宁，第24卷，第294—295页（译者注：见《需要强制性国语吗？》，载于《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增订版（北京，2017年），第24卷，第310页）。

亚美尼亚的学校就是一个例子，在那里俄语是自愿学习的。²⁶但自愿学习一门共同语言的动力是资本主义的自然产物，绝不应该涉及强制。

这种区分是列宁关于民族问题诸多思想的关键所在。民族差异的消失既是可取的，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国际工人阶级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就目前而言，民族是一个既成事实，任何试图绕过民族自然消亡过程的尝试都只会起到强化民族主义态度的作用。这使列宁高度关注民族之间关系的纯形式问题，并且几乎在他临终之际，仍在与他所目睹的、在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中出现的大俄罗斯民族对少数民族的虐待进行斗争。

1913年列宁要求斯大林撰写一部著作驳斥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品，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他自己着手撰写《论民族自决权》，批判罗莎·卢森堡的论点。就他自己的党来说，卢森堡的立场构成了更严重的威胁。卢森堡在布尔什维克派中一直得到波兰人卡尔·拉狄克和尤里·皮达可夫的支持，1915—1916年间，尼古拉·布哈林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反对对民族运动给予任何支持。布哈林对帝国主义和战争的分析使他认为小型独立国家已不再具有生存能力，因此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已成过去式。自决权的口号“首先是空想的（它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是不可能实现的）和有害的口号，这是

²⁶ 列宁，第23卷，第423页（译者注：见《自由派和民主派对语言问题的态度》，载于《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增订版（北京，2017年），第23卷，第447页）。

一个散布幻想的口号”。²⁷这本质上是在重复卢森堡的论点，即对民族利益的维护是欺骗。

列宁与这一小批左派布尔什维克之间的争论首次在 1915 年初因拉狄克发表在《共产党人》报纸上的一篇文章而白热化，到 1916 年仍在持续，当时布哈林和皮达可夫要求删除党纲第九条。党纲虽未做修改，但皮达可夫和布哈林的论点获得广泛支持，这展示了许多布尔什维克认为民族诉求完全可以被当作无关紧要的事情而不予理会。不应将这种态度误认为是对小民族的直接蔑视，因为它源于罗莎·卢森堡为构建适用于 20 世纪初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通用理论所做的严肃尝试。但列宁的担忧是正确的，即这种立场会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偏见相契合而且肯定会被小民族如此看待。1917 年后苏维埃国家的许多官员对少数民族产生蔑视态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那些严肃的理论信念不容忽视。

1917 年前后，布尔什维克在民族事务上的主要发言人是 I.V.斯大林。他 1913 年发表的文章《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的重要性更多在于揭示了斯大林本人的观点，而非当时产生的影响。斯大林支持列宁在民族问题上的总体立场，列宁无疑也鼓励他写文章抨击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论点。²⁸但有证据表明列宁强烈不认同斯大林文章中的

²⁷ 斯蒂芬·F·科恩，《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政治传记 1888—1938》（牛津，1980 年），第 35—37 页（译者注：见《关于自决权的提纲和十五点政纲》，载于《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 布哈林言论》（北京，1976 年），第 4 页，译自甘钦和费舍，《布尔什维克与世界大战》（伦敦，1940 年），第 219—233 页）。

²⁸ 关于列宁本人是否写了这篇文章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学界存在推测，埃里克·范·里，《斯大林与民族问题》，载于《革命俄国》，第 7 卷，第 2 期（1994 年 12 月），第 214—238 页，探讨了这个问题。

某些内容，²⁹而且斯大林论点中的若干观点显然是他独有的，与列宁的看法相抵触。首先，斯大林给民族下了一个定义，称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³⁰这个表述主要源自鲍威尔，在斯大林 1917 年后的著作中时常以不同变体反复出现³¹并被纳入党和国家的决议中。任何此类定义都意味着存在涵盖整个民族、跨越阶级划分的文化认同，而列宁极为反感这个观点。³²

此外，通过对民族下一个相对局限的定义，这个表述可被用于否认某些少数群体（最明显的是犹太人）的任何民族地位，理由是他们不符合民族的界定标准。由于坚持共同地域是民族定义的必要条件，斯大林在这个阶段暗示，对特定地区不占多数的少数民族无需采取特殊措施——他们的诉求会通过实行充分的民主自动得到满足，而充分的民主将保障他们的语言、教育和宗教权利。³³对于占据特定地域的民族，斯大林有第二项创见——“区域自治”制度，将其作为“打破民族壁垒”的手段。³⁴与联邦制相比，区域自治的优势在于“不是把人们按民族划分的，不是巩固民族壁垒的，相反地，是打破这种壁垒，

²⁹ 哈里斯，第 71—72 页；派普斯，第 40—41 页。

³⁰ I.V.斯大林，《斯大林全集》（莫斯科，1946 年及以后），第 2 卷，第 296 页（译者注：见《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载于《斯大林全集》（北京，1953 年），第 2 卷，第 294 页）。

³¹ 例如，斯大林，第 4 卷，第 355 页。

³² 范·里，第 223 页。

³³ 斯大林，第 2 卷，第 362—363 页（译者注：见《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载于《斯大林全集》（北京，1953 年），第 2 卷，第 353—354 页）。

³⁴ 同上，第 362 页（译者注：同上，第 353 页）。

把居民统一起来，以便为实现另一种划分即按阶级划分开辟道路的”。

³⁵另一方面，联邦制会导致“统一的工人政党的瓦解，工会按民族的分裂，民族纠纷的尖锐化，民族的工贼行为，社会民主党内的精神涣散”。³⁶需要指出的是，斯大林在这里谈论的是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组织联邦制，而非国家联邦制。但这是他唯一一次尝试阐明区域自治与联邦制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体现在哪里呢？自治会打破民族壁垒、团结工人，而联邦制会分裂他们！尽管列宁同样谴责国家联邦制具有分裂性，但他准备出于策略考虑在特定情况下接受其存在，而非出于原则；同时，他对联邦制的反对也同样可适用于任何自治制度。³⁷这里的要点在于，首先，联邦制与区域自治之间的精确区别并不明确，这一点后来变得重要起来；其次，斯大林将地区自治作为一项原则提出是对布尔什维克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1917 年后的布尔什维克

列宁的论战式政治风格意味着他关于民族问题的大部分著述都是针对罗莎·卢森堡的观点的。因此，这场辩论具体围绕波兰的命运展开。更广泛地说，对布尔什维克来说，民族问题的讨论聚焦于波兰、乌克兰、波罗的海国家和芬兰，对外高加索的关注程度较低。然而，一旦

³⁵ 同上，第 362 页（译者注：同上，第 353 页）。

³⁶ 同上，第 364 页（译者注：同上，第 355 页）。

³⁷ 列宁，第 27 卷，第 255—256 页（译者注：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载于《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增订版（北京，2017 年），第 27 卷，第 257—258 页）。

掌权，布尔什维克面临的现实不仅包括中亚和高加索这些主要的非俄罗斯地区，还包括伏尔加地区、西伯利亚和其他地方的小型民族群体。民族自决的口号成功争取到了非俄罗斯民族对红军的支持以对抗公开主张俄罗斯化的白军，而另一方面像皮达可夫这样的“卢森堡主义”布尔什维克认为，列宁的这个口号是导致俄罗斯帝国解体的主要原因。³⁸无论其影响如何，在内战期间，自决权终究不过是一个口号。一旦苏维埃政权在非俄罗斯地区得到巩固，这个口号对于布尔什维克在构建多民族国家过程中所面临的任務失去了指导意义。

因而矛盾的是，布尔什维克党内至少到 1921 年的主要争论仍完全聚焦于民族自决权。1917 年 4 月的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皮达可夫等人试图推翻党纲中的这一点但未成功，³⁹大会通过的决议对旧党纲几乎没有补充。⁴⁰1919 年 3 月的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新的俄罗斯共产党纲领的辩论同样围绕这一论点展开。此时，皮达可夫根据前两年的经验主张

我们党长期以来坚持的“民族自决权”口号，在涉及社会主义革命问题时，在实践中已表明它是所有反革命力量的集结点。⁴¹

³⁸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莫斯科，1959 年），第 78 页。

³⁹ 《俄社民工党第七次（四月）全俄代表会议》（莫斯科，1958 年），第 208—227 页。

⁴⁰ 麦克尼尔，同上，第 225—226 页。

⁴¹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第 78 页。

布哈林提出了一个新论点，大意是民族自决权的口号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已经不合时宜，现在应当由“劳动群众”的自决权所取代。⁴²

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中对自决权增加了一项新的限定条件。第九部分中涉及民族问题的第4条内容如下：

对于谁是民族分离意志的代表者这一问题，俄国共产党抱着历史观点和阶级观点，考虑到该民族处于历史发展的哪一阶段：是从中世纪制度进到资产阶级民主制，还是从资产阶级民主制进到苏维埃的或无产阶级的民主制等等。⁴³

这常被曲解的段落显然是列宁与布哈林立场之间的妥协。列宁在向大会所作的关于党纲的报告中强烈反对皮达可夫和布哈林的立场，在反驳布哈林时，他提出的论据之一是非俄罗斯民族中的阶级发展和分化程度尚不足以谈论劳动群众的自决权。在这方面，他不仅谈到了巴什基尔人、吉尔吉斯人、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和土库曼人，还提到了芬兰。⁴⁴然而，从辩论中可以清楚看出，纲领中的这一新段落意

⁴² 同上，第107—110页。

⁴³ 《苏共决议汇编》（莫斯科，1963年），第45页（译者注：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载于《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北京，1964年），第535—536页）。

⁴⁴ 列宁，第38卷，第157—158页（译者注：见《俄共（布）纲领草案》，载于《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增订版（北京，2017年），第36卷，第142—147页）。

意味着，对某些欠发达民族，原先简单直接的民族自决政策仍然适用，而对更先进的民族，将适用劳动群众自决的原则。在民族文化和经济欠发达的情况下无法区分人口中的不同阶级。但在无产阶级发展到足以夺取政权的地方，只有工人才能通过苏维埃做出这样的决定。这在实践中意味着，某些情况下，问题应由全国范围的公民投票决定，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关于一个民族未来的决定可由苏维埃代表大会做出。这个段落并未包含在列宁最初的草案中，而是他在大会期间接受的。⁴⁵这个修正的作用是为苏维埃共和国缺乏民族公民投票的做法提供了正当理由，在这些共和国，民族命运由苏维埃代表大会决定。但这也显然代表了列宁与布哈林立场之间的妥协，如辩论所表明，列宁曾不愿接受这个妥协。这里的要点是列宁认为有必要接受这样的妥协。这个立场比布哈林的胜利要好，最重要的是，它确保了民族虚无主义者皮达可夫的失败。但对于伟大的策略家列宁来说，接受妥协意味着他担心失败。这个辩论及其他辩论的过程说明列宁于民族问题上的立场在党领导层中从未稳固过，而苏维埃政权最初几年的事件说明这一问题上他在俄罗斯党间普通党员中获得的支持甚至更少。大多数地方共产主义行政官员对民族问题持虚无主义态度，比布哈林、皮达可夫当然还有罗莎·卢森堡的态度更极端。这些态度后来在巴什基尔、突厥斯坦和其他地区引发了严重的冲突。

关于自决权的争论显示俄罗斯共产党内对民族问题存在广泛深刻的分歧。但在斯大林负责民族政策后，这个原则本身在革命后不久

⁴⁵ 同上，第 111—112 页（译者注：同上，第 94—98 页）。

就失去了直接相关性。早在 1918 年，斯大林就公开宣称自决权的口号已经过时，“应当服从社会主义的原则”。⁴⁶到 1920 年 10 月

要求把边疆地区同俄国分离……应当摒弃，因为它不仅同中部和边疆地区之间建立联盟这一问题的提法本身是抵触的，而且首先因为它同中部和边疆地区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根本抵触的。⁴⁷

自决权日益被视为一个反革命口号。

尽管自决权原则在芬兰独立后未以列宁设想的形式得到直接应用，但其拥护者仍在众多重要争议中提及这个原则。在随后围绕民族自治单位的组建和民族领土边界的讨论中，“自决精神”常被援引，而且我们将会看到，往往是当地民众的意愿，通过苏维埃代表大会体现出来，在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民族自决权问题在党代表大会上占用了大量时间，原因为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反映了更广泛的方法差异，而这种差异将会影响民族政策的日常实施。

尽管列宁本人继续在党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上就民族问题的辩论发挥积极作用，但他主要关注的是党的民族政策在国际上的影响，

⁴⁶ 斯大林，第 4 卷，第 158 页（译者注：见《在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载于《斯大林全集》（北京，1956 年），第 4 卷，第 29 页）。

⁴⁷ 同上，第 352 页（译者注：见《苏维埃政权对俄国民族问题的政策》，载于《斯大林全集》（北京，1956 年），第 4 卷，第 313 页）。

⁴⁸并且他自己在 1922 年底也承认他忽视了民族问题的实际层面。⁴⁹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人民委员会（Совнарком）对西部边疆地区给予了极大关注，党代表大会也确定了民族政策的大致框架，在俄国，民族政策的日常执行主要由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Наркомнац）及其人民委员斯大林负责。

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员选拔目标为反映俄国的民族构成。因此，党内和非党工作人员来自截然不同的背景。一方面，有犹太处负责人 S.季曼施泰因，一度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实际负责人，作为一名老布尔什维克，他对犹太民族主义无论是犹太复国主义形式的还是体现在建立传统犹太文化和推广希伯来语的尝试中的，都不屑一顾。我们将会看到这反映了他对民族问题的总体态度。另一方面，有由穆拉·努尔·瓦希托夫和米尔赛义德·苏丹-加利耶夫领导的穆斯林处成员，信奉绝对的民族主义、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想。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最初负责创建自治共和国的可能既有穆斯林处成员也有斯大林。介于两者之间的是其他社会主义或民族主义政党的前支持者，他们带来了文化自治和联邦制的思想。这类“民族共产主义者”的影响将在下文第五章中讨论。

从这种人员构成的混合中，一种处理民族问题的新方法即将应运而生。在人民委员部官方报纸《民族生活》早期的一系列文章中，简

⁴⁸ 例如，见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报告，第 41 卷，第 161—168 页（译者注：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文件》，载于《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增订版（北京，2017 年），第 39 卷，第 160—169 页）。

⁴⁹ 列宁，第 45 卷，第 356 页（译者注：见《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载于《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增订版（北京，2017 年），第 43 卷，第 353—355 页）。

要介绍了少数民族的历史并描述了他们的现状。这些文章的部分目的纯粹是为了传播关于这些较小民族的知识，许多俄罗斯人实际上可能根本不知道这些民族的存在。但它们也着手阐述了党和国家在这些民族问题上的紧迫任务。所有这些文章都提到了这些民族在文化、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低发展水平。于是土库曼人和吉尔吉斯人是“无家可归、没有土地、没有马匹的穷人”，前途渺茫而且深受清真寺的影响；⁵⁰卡尔梅克人是“愚昧、受压迫的民众”⁵¹；楚瓦什人目不识丁，生活在悲惨的经济条件下，受俄罗斯人和鞑靼人的支配，后者控制着地区的所有工商业。⁵²由于这种“落后性”，这些民族对革命缺乏热情、不信任俄罗斯人而且深受宗教影响。那么，苏维埃政权的紧迫任务就是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提供教育设施，尽可能吸引当地知识分子，并以当地语言进行社会主义宣传。

无论是受到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官员影响还是遵循自己独立的思路，斯大林在其著作和演讲中都表现出了类似态度。在1918年4月9日发表于《真理报》的文章《当前任务之一》中，斯大林强调了非俄罗斯民族文化水平低下所带来的问题：

但是在那些居民文化落后的边疆地区，苏维埃政权还没有能够成

⁵⁰ 《民族生活》，第3期，1918年11月24日，第2页。

⁵¹ 《民族生活》，第3期，1918年11月24日，第3页。

⁵² 《民族生活》，第4期，1918年12月1日，第7页。

为这样的人民政权。在中部开始的革命扩展到边疆地区特别是东部边疆地区是比较晚了一些。由于这些边疆地区的生活条件和语言条件，再加上经济落后，使那里的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工作有些复杂了。为了使那里的政权成为人民的政权，使劳动群众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群众，还必须采取特别的办法把这些边疆地区的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吸引到革命发展的过程中来。必须把群众的觉悟提高到苏维埃政权的水平，使他们的优秀的代表和苏维埃政权融合起来。

最重要的“专门方法”是民族—领土自治：

但是，如果这些边疆地区不实行自治，也就是说，不建立地方学校、地方法院、地方行政机关、地方政权机关、地方社会政治机关和教育机关，不保证在社会政治工作的各方面有使用地方的、为边区劳动群众所熟悉的语言的充分权利，那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⁵³

斯大林在1920年11月达吉斯坦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达吉斯坦自治时的讲话中详细阐述了他所理解的自治的含义：

⁵³ 斯大林，第4卷，第75页（译者注：见《当前任务之一》，载于《斯大林全集》（北京，1956年），第4卷，第69—70页）。

苏维埃俄国认为有必要向你们宣布：达吉斯坦应该实行自治，达吉斯坦将享有内部自治权，同时和俄国各民族保持兄弟关系。

达吉斯坦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根据自己的生活和习惯来管理自己。⁵⁴

所以自治不仅目标为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免受侵犯，还力求维护各民族的民族特性。这甚至包括保留有宗教性质的传统，就达吉斯坦而言，穆斯林沙里亚法（伊斯兰法律体系）：

苏维埃政府认为沙里亚法和居住在俄国的其他民族所有的习惯法一样，是一种有权能的习惯法。

如果达吉斯坦人民愿意保存自己的法律和习惯，那末这些法律和习惯就应该被保存下来。

斯大林接着概述了达吉斯坦自治的主要特征：

⁵⁴ 同上，第 395 页（译者注：此处去除了原文的分段。见《达格斯坦各族人民代表大会》，载于《斯大林全集》（北京，1956 年），第 4 卷，第 348 页）。

俄国和达吉斯坦应该保持相互的联系，因为只有这样达吉斯坦才能保持自己的自由。苏维埃政府让达吉斯坦实行自治是有一定目的的，就是从当地工作人员中选拔出热爱本民族的忠诚老实的人，把达吉斯坦的一切管理机关，不论是经济方面的或是行政方面的，都托付给他们。只有这样，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使达吉斯坦的苏维埃政权和人民接近起来。除了用吸引当地工作人员参加管理的方法来把达吉斯坦提到高度的文化水平以外，苏维埃政权没有任何别的目的。

苏维埃政权知道，愚昧无知是人民的第一个敌人。因此必须建立更多的使用当地语言的学校，建立使用当地语言的管理机关。⁵⁵

结语中，“达吉斯坦的自治将成为达吉斯坦共和国生活的牢固的不可摧毁的基础”。⁵⁶

那么，解决文化和经济落后问题的办法就是通过地区自治弘扬民族特性。即便是在达吉斯坦情况也是如此。达吉斯坦在苏维埃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州中是独特的，它包含了官方认可的、复杂多样的民族、宗教和语言元素。尽管如此，人们仍希望通过推广各种民族语言、创办学校、保留传统机构并将管理权委托给“热爱本民族人民”的人，

⁵⁵ 斯大林，第4卷，第395—396页（译者注：此处去除了原文的分段。同上，第349页）。

⁵⁶ 同上，第398页（译者注：此处去除了原文的分段。同上，第351页）。

使达吉斯坦民众会将达吉斯坦共和国视为他们生活的“稳固且不可摧毁的基础”，并通过这个共和国被提升到“更高的文化水平”。

1921年3月，在俄罗斯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再次谈及落后问题。此次大会是首次对民族问题的讨论超越了自决权口号并深入探讨政策具体实施的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决议承认：

党的任务是帮助非大俄罗斯各族劳动群众赶上走在前面的俄国中部，帮助他们：

- （一）在他们那里发展和巩固适合他们民族生活条件的形式的苏维埃国家制度；
- （二）在他们那里发展和巩固使用本族语言的、由熟悉当地居民生活习惯和心理的本地人组成的法院、行政、经济和政权机关；
- （三）在他们那里发展使用本族语言的报刊、学校、剧院、文艺事业以及一般文化教育机关；
- （四）广泛地建立和发展使用本族语言的普通教育性质的和职业技术性质的训练班网和学校网……⁵⁷

⁵⁷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 1921年3月速记报告》（莫斯科，1963年），第252页（译者注：此处分段为本书所加，原文中此处为一整段。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北京，1964年），第101页）。

在他的开场白中，斯大林指出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民族问题的实质就是要消灭过去遗留下来的某些民族的事实上的落后性（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使各落后民族有可能在政治、文化和经济方面赶上俄国中部。⁵⁸

在其结论部分，他重申了这一观点：

由于文化较发达的民族和文化不大发达的民族之间还存在着旧的资产阶级制度遗留下来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民族问题就具有一种形式，这种形式要求规定一些措施来帮助各落后民族和部族的劳动群众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繁荣起来，使他们有可能赶上走在前面的无产阶级的俄国中部。由此就产生了一些实际建议，这些建议构成了我所提出的关于民族问题提纲中第三部分的内容[即自治]。⁵⁹

⁵⁸ 斯大林，第5卷，第39页（译者注：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载于《斯大林全集》（北京，1956年），第5卷，第31页）。

⁵⁹ 同上，第44页（译者注：同上，第35页）。

所以民族问题中的主要任务是消除落后，这可以通过民族—领土自治实现。布尔什维克敏锐意识到他们在一个以农民为主的国家领导了社会主义革命。在缺乏西欧工业国家成功革命所带来援助的情况下，采取短期措施以促进俄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至关重要，包括对农民做出广泛让步。其结果之一便是在同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推行的新经济政策。对非俄罗斯人来说，他们中的农民比例甚至比俄罗斯人更高，其发展在形式上必须具有民族性。如果非俄罗斯农民尚未准备好认同社会主义和苏维埃政权，他们或许会通过民族认同来认同国家，而苏维埃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州正是建立在民族认同之上。在1921年底写的一篇文章中，斯大林将党的民族政策列为三个主要因素之一，称其起到了“使幅员广阔的俄国的二十多个民族的农民集合在俄国无产阶级红旗周围”的作用。⁶⁰显然，他希望通过促进民族国家体制、文化和语言的发展，能使农民更接近社会主义。

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一个小插曲进一步揭示了此时布尔什维克的想法。在斯大林致闭幕词时，有人递给他一张字条，指责共产党人在人为培育白俄罗斯民族性。斯大林称“这是不对的，因为白俄罗斯民族存在着，它有和俄罗斯语言不同的语言，因此，只有使用白俄罗斯本族的语言，才能提高白俄罗斯人民的文化”。⁶¹语言足以定

⁶⁰ 同上，第113页（译者注：见《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民族政策》，载于《斯大林全集》（北京，1956年），第5卷，第91页）。

⁶¹ 同上，第48页（译者注：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载于《斯大林全集》（北京，1956年），第5卷，第38—39页）。

义一个民族，尽管当时白俄罗斯的民族认同感较弱，但基于此，布尔什维克仍要推动白俄罗斯民族的发展。

尽管不是所有布尔什维克都认同斯大林的观点，但在这个时期，这些观点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以及民族共和国与州的党和行政机构的许多领导人中颇为普遍。因此，这些观点在影响有关少数民族政策方向的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对所有布尔什维克来说，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最初几年是他们首次与实践层面处理民族问题的经历，而他们对此缺乏充分准备。民族自决权原则虽未从脱离并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的字面意义上得到应用，但它起到了总体指导作用；对于它的支持者，这意味着在特定范围内必须尊重少数民族在自身宪法地位、语言和文化方面的意愿。但除此外，随着事态发展制定政策是一个需要大量临时应对且充满矛盾的问题。

1917年前，马克思主义运动间关于民族问题的争论主要围绕反对压迫和促进国际团结的必要性展开。如今，讨论的出发点不再是帝国主义，而是普遍的落后。在这个背景下，有人提出民族性可以成为一种更具积极意义的事物，作为促进非俄罗斯人文化、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手段。民族认同不再是一个问题，而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布尔什

维克将自治作为其民族政策的核心支柱，这不仅借鉴了罗莎·卢森堡和斯大林纲领中的元素，还吸收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方法。1921年，崩得和乌克兰斗争派被吸纳进共产主义运动，这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这一点。这个观点的一个理论前提是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民族是短暂现象且会迅速消失的假设，至少在当时被搁置了。大约在此时，列宁在给鞑靼共产党人 S.赛德-加利耶夫的书面回复中承认民族差异及由此产生的民族自治单位将会存在一段时间。⁶²1923 年的俄罗斯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也确认了这个观点。⁶³民族不是在未来几年内就会消失的事物。相反，布尔什维克当时的政策是通过领土自治、民族整合、教育、语言和文化发展以及吸纳民族共产主义者等方式，将民族作为一个核心，推动非俄罗斯人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全面发展。对这些原则的实施构成了接下来四章的重点，而最后两章则探讨列宁生命活跃的最后几个月和苏联成立过程中伴随的民族政策危机。

⁶² B.F.苏丹别科夫(编)，《俄共中央民族政策的秘密——俄共中央第四次秘密会议速记记录 1923 年》(莫斯科，1992 年)，第 31 页。

⁶³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1923 年 4 月 17—25 日 速记记录》(莫斯科，1968 年)，第 654 页。

第3章 民族自治的实例——原因与过程

1917年3月临时政府保障了俄罗斯所有民族和宗教的公民在居住、财产、就业、商业、军事与国家服务、教育及语言方面的平等权利。¹然而，除了确认这些一般性权利外，临时政府并未提出任何具体的领土权利，仅设立了一些通常用于执行有限地方治理的委员会，也没有创建任何专门致力于满足少数民族需求的机构。当然，这类事务有可能在未来的制宪会议上讨论。十月革命后，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在其《权利宣言》中确认了这些一般权利，同时邀请“每个民族在其全权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自主决定是否以及基于何种基础参与联邦政府和其他联邦苏维埃机构”。²1918年7月10日第五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在其第11条中，一定程度阐明了这种关系的基础：

具有特殊生活方式和民族构成的地区的苏维埃可以联合组成自治地区联盟，其领导机构是……区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其执行机关。这些自治地区联盟以联邦制为基础加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³

¹ 《临时政府法令与决议汇编 第1辑》（彼得格勒，1917年），第46页。

² 《伟大的十月》（莫斯科，1987年），第123页。

³ 《伟大的十月》，第138页。

几位历史学家强调 1918 年宪法未能阐明联邦国家与这些民族“联盟”之间的确切关系。卡尔和派普斯都错误地声称“联邦”一词未出现在宪法中。⁴但如果以诸如《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视角来看待这部宪法，是会产生误导的，因为《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目标是界定政府部门的确切职能和特权。相比之下，第一部苏维埃宪法在谈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等特定权力机关时使用了“总体指导”、“引导”、“保障国家生活正确快速运转所需的一切措施”等模糊术语。⁵这部宪法更像是一份一般性权利法案，而非政府体制的蓝图，它在苏俄国家结构方面的模糊性不能被单独视为一个特别受忽视的方面。

当人们意识到宪法在通过之际就已无法反映俄罗斯联邦政府与边疆地区之间关系的实际发展时，将其视为一份严肃的建国文件就更不合适了。这可能仅仅是因为文件起草与正式批准之间存在时间差，其间几乎没有机会更新或修正，从而产生的低效副产品。无论如何，到宪法正式通过时，从自治地区和自治共和国的实际发展以及布尔什维克主要领导人（最引人注目的是斯大林）关于这一主题的公开声明中可以清楚看出，民族原则是新兴自治制度的核心，对特定民族权利和权力的需求决定了建立这个制度的必要性。

⁴ 派普斯，第 247 页。

⁵ 《伟大的十月》，第 139 页。

当时的宪法不可能精确、正确规定民族区域的地位，这一点比规定国家结构的其他部分更加困难；这个结构是在多种力量影响下临时形成、不断演变的，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共产党领导层的理念，也包括现实中的各种因素。在那些远离中央、布尔什维克影响薄弱的边疆地区，情况尤其如此，在那里，以深刻的文化—宗教差异与历史上的民族对立为表现形式的民族因素，对布尔什维克政策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套自治区域体制在此后至少在理论上以同一形式存续了 70 年，而它很大程度上是临时决策与偶然发展的产物。

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

尽管区域自治原则在形式上仍是布尔什维克党纲的一部分⁶，但在革命初期，党的主要机关和国家机关几乎未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当时民族问题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与乌克兰的关系上。在处理少数民族的权利及不满方面，布尔什维克更倾向于通过中央政府的一个专门部门，由斯大林领导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Наркомнац），为少数民族提供代表权和一定的决策权，而非组建自治区域。⁷与其他人民委员部不同，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下辖若干个单独的人民委员部，每个主要的非俄罗斯民族各有一个对应的人民委员部。规模较小的民族没有单独的人民委员部，而是一个局（отдел）或者一个少数民族局的部分。

⁶ 麦克尼尔，同上，第 1 卷，第 226 页。

⁷ 对于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历史与活动的更多细节，尽管受限于无法查阅档案，见斯蒂芬·布兰克，《巫师当学徒：斯大林作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 1917—1924》（韦斯特波特，1994 年）。

（实践中，人民委员部与局之间没有多少实际区别，因此我将二者统称为“局”。）斯蒂芬·布兰克认为人民委员部的角色是“招募、动员少数民族精英并使其社会化，进而通过这些精英影响其民众的工具”，⁸而且其职能仅限于通过这些精英执行苏维埃政府的决定，充当中间媒介，次要职能是收集信息。⁹但显然，至少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成员自己看来，他们的作用不止于此，他们是少数民族在中央政府的直接代表并以这个身份参与立法过程。在斯大林出席的部务委员会首次全体会议上，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赋予自身及其下属人民委员部审查中央政府所有法令的权利，同时赋予各民族人民委员在人民委员会讨论涉及本民族问题的会议时出席的权利。¹⁰

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关于在人民委员会中增加代表名额的请求从未得到人民委员会的同意，人民委员会希望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与其他人民委员部一样开展工作，这导致两个机构之间以及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内部产生了冲突。其他人民委员部的部务委员会均由人民委员会直接任命，而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部务委员会除了人民委员及其副手外，还包括各民族局负责人。由于这些负责人的遴选标准通常是其本人属于相关民族，因此有人反对说，一个承担总体政治指导和政策执行职责的部务委员会，其成员构成依据的竟是纯粹的民族原则，而非政治适宜性。这个异常情况促使人民委员会于 1918

⁸ 斯蒂芬·布兰克，《未知的人民委员部：苏维埃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 1917—1924》（未发表博士论文，芝加哥，1979 年），第 32 页。

⁹ 同上，第 108 页。

¹⁰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 1318，目录号 1，卷宗号 1，第 1 页。

年7月23日下令重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将其成员人数从16人减至9人，以与其他人民委员部保持一致。随后，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内部就重组展开的辩论暴露出部门在双重角色上的混乱——一方面是中央政府的执行机构，另一方面是少数民族的代表。尽管会议一致接受部务委员会的组成应基于政治原则而非民族原则的提议，但多数成员仍主张吸纳某些民族的代表，这显然让会议主席佩斯特科夫斯基感到沮丧。辩论陷入了荒谬的境地，有人提出实际上这两项原则是可以同时满足的，因为纯粹基于政治原则提出的成员名单中包含了所有主要民族群体的成员，包括作为格鲁吉亚代表的斯大林，而斯大林已多年未在格鲁吉亚，而且格鲁吉亚无论如何都不属于苏俄。¹¹

从辩论中可以清楚看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大多数积极分子将自己视为本民族在政府中的代表，认为自己在监督涉及非俄罗斯民族的事务方面拥有独特的能力。这一点体现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表现得如同一系列代表特定民族诉求的利益集团，而非在地区执行政府政策的工具，这也使得人民委员部容易受到民族主义的指责。后来将民族主义者吸纳进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做法只会进一步加剧这种指责。

在试图增加自身在人民委员会中的代表名额的同时，1918年期间，人民委员部还争取接管苏维埃国家面临的两个主要问题的职责——难民问题和少数民族教育。由于进入俄罗斯的大量难民主要是来自

¹¹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1318，目录号1，卷宗号1，第52—56页。

白俄罗斯和亚美尼亚战乱地区的逃亡者，1918年4月，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向内务人民委员部（НКВД）提议由其独自负责这个问题。¹²该提议遭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拒绝，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于是向人民委员会申诉，人民委员会最终通过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下设一个专门的战俘与难民事务中央委员会来解决这个争端。¹³同样，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关于成立自己的文化教育委员会的提议也未获通过，最终决定在教育人民委员部下设一个委员会，包含部分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代表。¹⁴

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因无法在政府中确立自身明确的职能而感到沮丧，这促使其部务委员会于1919年7月提议撤销该机构，并通过了如下动议：

考虑到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一直没有明确界定的职能，却涉及其他部门的职能，且人员流动意味着近来多项紧急事务无法解决，部务委员会决定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及其机构并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个部门。部门认为，为卓有成效地完成工作，民族事务局应由一名对其工作负责的全俄中执委委员领导……¹⁵

¹²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 1318，目录号 1，卷宗号 1，第 8 页。

¹³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 1318，目录号 1，卷宗号 1，第 10、15、25 页。

¹⁴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 1318，目录号 1，卷宗号 1，第 29 页。见下文第六章。

¹⁵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 1318，目录号 1，卷宗号 2，第 104 页。

除了人民委员部未能在政府最高层面为自身明确职能以及斯大林和其他被征调去为战争服务的关键成员常年不在岗外，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在地方层面也遭遇了挫折，与苏维埃机关发生了一系列纠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1919 年 2 月在库尔斯克，省执行委员会单方面关闭了当地的民族局。¹⁶随着西部边疆地区独立苏维埃共和国的正式成立，从逻辑上讲，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对这些民族的管辖权就此终结，并导致其负责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乌克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事务的人民委员部及部门于 3 月关闭，这进一步削弱了人民委员部的权威。¹⁷从那时起直至决定自行解散，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仅召开过一次会议，而其随后做出的这一决定，无论是出于绝望的呼喊，还是真心认为将其改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个部门最能维护少数民族的利益，显然反映出其因无法作为政府主要机关发挥作用而产生的深切沮丧。无论如何，人民委员会否决了这个决定并命令重组后的部务委员会在 N.纳里曼诺夫和 S.季曼施泰因的领导下继续工作。¹⁸

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未能在最高层面获得其寻求的教育和难民事务管辖权，而且其地方机构常处于从属地位，这使评论家们将人民委员部视为一个近乎无能的机构，认为其在 1920 年后斯大林开始将

¹⁶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 1318，目录号 1，卷宗号 1，第 102 页。

¹⁷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 1318，目录号 1，卷宗号 2，第 94 页。

¹⁸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 1318，目录号 1，卷宗号 2，第 113 页。

其打造为个人权力基础前几乎没有发挥有效作用。¹⁹但实际情况有所不同。由于政权当时专注于经济改革和内战，加之帝国各地革命发展进程不均衡，布尔什维克在少数民族中的影响力相对较弱，这使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各个局得以在地方层面组织非俄罗斯民族，甚至发起一些影响特定民族的重大项目，而这些项目最终影响了苏维埃国家的整个宪法结构和民族政策。1918年至1919年间，民族人民委员部和局积极组织实地军事、政治和文化工作并争取莫斯科对区域自治原则的支持。随后，人民委员部在1923年前苏俄建立的17个自治州和共和国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

红军中的民族单位

1918年期间，民族局的大量精力都投入到了军事事务中。捷克斯洛伐克起义爆发后不久，军事人民委员部邀请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着手招募和组建特殊的民族旅。²⁰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积极投身这项工作，起初从难民和战俘中招募人员，随后通过其地方部门将活动扩展到非俄罗斯地区，大规模印刷宣传材料（至少一次是从飞机上散发传单）并派遣骨干人员去鼓动组建军事单位（最重要的穆斯林共产党人之一瓦希托夫就是在执行这种任务时在喀山被捕并遭枪杀的）。到年底时，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宣称取得了如下成果，在波兰人、穆斯林、爱沙

¹⁹ 派普斯，第113页；布兰克，同上，第137—145页。

²⁰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1318，目录号1，卷宗号1，第15页。

尼亚人、立陶宛人、马里人、楚瓦什人、沃提克人和吉尔吉斯人当中组建了民族旅或支队，并在北高加索组建了民族红军部队。²¹

革命前，除哥萨克部队外，帝国军队中还存在由克里米亚鞑靼人、达吉斯坦人、奥塞梯人和土库曼人组成的小型志愿部队，而负责保卫大公国的小型芬兰军队于 1899 年被解散。但总体而言俄国军队完全反对组建民族军事单位的想法。恰恰相反，军队规定，有部队中至少四分之三的人员必须是俄罗斯人（包括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其余四分之一不得全部来自同一个民族，而且非俄罗斯族新兵必须在远离其家乡的地区服役。1905 年后，芬兰参议院试图改革其民族营，很快就被俄国政府阻止。²²此类规定背后的理由显而易见；单独的民族部队会成为民族主义情绪和团结的温床，还可能成为支持任何民族起义的现成力量，如 19 世纪波兰发生的那样。此外，将本地新兵编入由俄罗斯人主导的部队并以俄语作为唯一指挥语言的政策，进一步推进了政权的俄罗斯化政策。

相比之下，将自己定位为受压迫民族捍卫者的布尔什维克对单独的民族部队持欢迎态度。军事人民委员托洛茨基起初将这些部队视为把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结合起来的一种手段。²³1918 年 4 月 30 日，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与军事人民委员部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开始组建

²¹ 《民族生活》第 1 期，1918 年 11 月 9 日，第 1—2 页。

²² 佩尔蒂·伦蒂宁，《关于俄国战争计划的法国情报 1880—1914》（赫尔辛基，1984 年），第 22—23、64、105、178 页。

²³ 斯蒂芬·布兰克，《1917 年布尔什维克党与民族问题》，《汇编》第 9 期，1983 年 1 月，第 13 页。

民族军事旅。²⁴组建民族部队是在非俄罗斯地区招募兵力的一种权宜之计。但这些部队按民族构成命名、最初被部署在本民族地区执行任务、拥有专门的指挥机构、设有单独的宣传部门，以及针对穆斯林民众设有单独的军事委员会，这些都表明布尔什维克准备将民族原则置于当时革命最重要的工具的基础上，红军。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清楚认识到，这类部队更多是因共同的民族身份而非捍卫革命的共同愿望凝聚在一起，存在受到反苏维埃民族主义者影响的危险，因此坚持要求人民委员部的特工和“民族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政党”对这些部队进行严密的政治监督。²⁵

在这个附带条件下，人民委员部在1918年至1919年期间继续负责监督民族部队的组建，动员了芬兰人、北高加索人，特别是中亚穆斯林，西部边疆地区的民族部队最终由军事人民委员部负责。在中亚，动员通常由当地苏维埃或更广泛的工人会议发起，这些组织在谴责白军将领和外国军事干涉后号召志愿者参军。专门的鼓动人员会开展招募并在新兵中组织定期会议，同时辅以一系列针对特定民族红军战士的多语言出版物。²⁶1919年8月，喀山专门开设了一所学校为红军培养穆斯林军官，这似乎确保了民族原则在红军中的长期存在。²⁷在一些情况下，这个政策赢得了非布尔什维克民族政党的支持，例如在科

²⁴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1318，目录号1，卷宗号1，第15页。

²⁵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1318，目录号1，卷宗号1，第17页。

²⁶ 《民族生活》第21期，1919年4月13日，第3页；第26期，1919年5月18日，第4页。

²⁷ 《民族生活》第41期，1919年8月3日，第4页。

尔尼洛夫构成最大威胁时，区域崩得组织显然主动组建了犹太部队，²⁸1919年初，整个巴什基尔民族军队投靠布尔什维克并成为新的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的基础，这个事件使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维度。

在红军中鼓励民族认同不可避免引发了指挥链方面的问题，而军事领域自治程度引发的冲突最早于1918年在乌克兰达到顶点。当时，乌克兰共产主义运动在策略上存在严重分歧，入侵红军的存在让本就动荡的局势更加复杂。军队自身的角色成为当地指挥官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与最高总司令瓦采季斯之间争论的焦点；同时，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还卷入了托洛茨基和与斯大林有关联的“察里津集团”之间的冲突。1918年，乌克兰左派和右派的政治策略存在分歧，左派支持以农民为基础立即开展针对斯科罗帕茨基的游击战，右派倾向于采取观望策略；尽管左派对红军的入侵表示欢迎，但双方后来都向莫斯科大量投诉入侵部队对当地民众的处置方式和军事领导层对乌克兰共产党人的意见置之不理。²⁹1919年1月16日，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支持了乌克兰方面的投诉，决定以有利于乌克兰人的方式解决军事指挥问题，要求解除伏罗希洛夫和鲁希莫维奇的军事职务，并且如果乌克兰人有此意愿，允许替换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本人。³⁰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留任了下来，最终在与莫斯科就军事事务发生冲突时站到了乌克兰多数派一边。

²⁸ 《民族生活》第25期，1919年5月11日，第4页。见下文第五章。

²⁹ 阿瑟·E·亚当斯，《乌克兰的布尔什维克 第二次战役 1918—1919》（纽黑文与伦敦，1963年），第25—61页。

³⁰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17，目录号2，卷宗号1，第1页。

随着红军在乌克兰建立苏维埃政权，红军陷入了一种难以忍受的境地，即同时受苏俄总司令和乌克兰军事人民委员的双重指挥。这两方在不同时期发布的命令完全矛盾，反映出各自不同的优先事项；俄罗斯指挥员主要关注将乌克兰作为通往中欧的桥头堡，而且要在短期内建立一条军事支援线以支持库恩·贝拉在匈牙利的革命，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和乌克兰共产党人更关注当地的任务。尤里·鲍里斯认为，乌克兰方面态度的主要问题是“他们以略带爱国的视角看待乌克兰的革命局势”，意味着他们希望将乌克兰部队的行动限制在纯粹的乌克兰事务范围内。³¹这种态度有着切实的依据，因为乌克兰部队的主体是纪律涣散的农民部队，他们在政治上效忠于乌克兰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而非布尔什维克，而且他们对乌克兰的苏维埃政权几乎不感兴趣，更不用说对中欧的苏维埃政权了。³²

正是这些纪律涣散的队伍加剧了与莫斯科的争端并促使托洛茨基重新思考他对民族部队效能的评价：“革命从临时组建的起义部队中获取了它所能获取的一切；再往前走，这些部队不仅会变得危险，而且对革命事业来说简直是毁灭性的……”他提出了严厉的纪律措施，最后表示“鉴于这项工作……对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的命运具有决定性意义，我认为乌克兰党应将主要精力集中在乌克兰军队的重组和训练领域”。³³

³¹ 尤里·鲍里斯，《乌克兰的苏维埃化 1917—1923》（埃德蒙顿，1980年），第235—236页。

³² 同上，第238页。

³³ 《斯克利扬斯基同志档案》（托洛茨基档案），引自鲍里斯，第239页。

大约在同一时期，托洛茨基卷入了一场关于派驻里加湾防御的水兵控制权的海军争端，争端的另一方是拉脱维亚军事人民委员彼得森，彼得森已将这些部队交由自己任命的泽宁来指挥。1919年4月13日，托洛茨基给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去电报，坚称：

有必要果断终止这些地方主义倾向……所有任命命令都应当通过西方战线发出。我们不能容忍有关双重隶属关系的言论……我请求党中央委员会立即发出必要的训诫，向拉脱维亚的同志们表明今后应避免采取类似的草率举措。³⁴

中央委员会最近已向乌克兰党发出指示，要求将所有与粮食供应相关的问题交由苏俄的相应机构处理，³⁵而对于当前与拉脱维亚和乌克兰的争端，中央委员会的回应只是将这一指示扩展到涵盖所有共和国的军事事务。³⁶

5月4日，中央委员会在《对友好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指示》中明确了所有军事事务均隶属于苏俄，将每个共和国的领土视为俄罗斯革命军事委员会（MRC）的一个军区（округ），乌克兰除外，它将被划分为数量未明确的军区。指示规定，补充部队（医疗等）的

³⁴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 17，目录号 2，卷宗号 16，第 14 页。

³⁵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 17，目录号 2，卷宗号 15，第 2 页。

³⁶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 17，目录号 2，卷宗号 16，第 14 页。

动员和调配隶属于革命军事委员会，新部队的组建要经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革命军事委员会还掌控所有补给问题并规定所有军事单位直接隶属于俄罗斯相关机构的指挥。³⁷在这个决议中，中央特别批评了民族共和国倾向于将民族军事部队主要用于其境内的作战任务而非将其投入到整个革命事业中。当月月底，俄罗斯共产党政治局启动了规范共和国军事关系的进程，指示全俄中执委和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着手将两个共和国的军事人民委员部和军事指挥系统完全统一起来，将乌克兰军事人民委员部降为俄罗斯相关机构的一个地区全权代表。³⁸6月1日，一个委员会成立，负责拟定一份涵盖所有苏维埃共和国的此类协议文本。³⁹然而，此事并未完全解决，托洛茨基不得不再次向中央委员会投诉乌克兰政府干涉军事事务，⁴⁰而苏维埃俄罗斯与乌克兰关于军事和经济联盟的正式协议直到1920年年底才签署。⁴¹但早在1919年春天，民族苏维埃共和国领导层在军事领域的独立行动权就已被实际剥夺，而此后军事机构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未来联邦国家总体关系的范例。⁴²

托洛茨基的反对的是民族部队纪律涣散、带有党派性质的特点以及民族政府对指挥体系的干涉，而非反对民族军事部队本身的存在。

³⁷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17，目录号2，卷宗号17，第9—10页。

³⁸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17，目录号3，卷宗号9，第1页。

³⁹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17，目录号3，卷宗号10，第1页。

⁴⁰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17，目录号2，卷宗号23，第1页。

⁴¹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17，目录号2，卷宗号48，第1页。

⁴² 伯特伦·D·沃尔夫，《早期军事决策对苏维埃联盟国家结构的影响》，《美国斯拉夫与东欧研究评论》，第9卷，1950年，第169—170页。

尽管有乌克兰的经历，布尔什维克仍继续支持组建民族部队，特别是通过穆斯林军事委员会和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局进行，但采取了更谨慎的方式。1920年1月，在批准斯米尔加组建高加索一库班劳动军的计划三天后，⁴³政治局否决了在喀山省以宗教为基础组建独立的穆斯林部队（名为真主战士）的提议。⁴⁴1921年4月，政治局允许组建一个乌克兰团，但明确规定这只是一次试验，由M.伏龙芝承担直接政治责任，伏龙芝需每月向中央委员会汇报情况。⁴⁵

从军事角度来看，内战一开始就拥有一支指挥体系统一的军队显然是合理的。但边疆地区革命的性质，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相结合和布尔什维克处理民族问题的方式，使他们最初依赖非正规的民族部队，在乌克兰尤其如此。到1919年中期，这些部队已被纳入中央集权的红军，由此产生了布尔什维克为何仍继续鼓励按民族界限组建和部署部队的问题，通过允许少数民族组建自己的军事部队，尽管对其活动几乎没有控制权，布尔什维克是在鼓励保留或发展民族认同，这也与他们让民族情感在苏维埃国家找到归属感的整体方针相符。1923年，俄罗斯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明确认识到民族军事部队作为国家主权象征的重要性，当时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都表示，希望未来几年内苏联的联邦民族共和国都能依靠自己的力量防御。⁴⁶

⁴³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17，目录号3，卷宗号57，第1页。

⁴⁴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17，目录号3，卷宗号58，第3页。

⁴⁵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17，目录号3，卷宗号155，第6页。

⁴⁶ 见下文第八章。

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民族的人民委员部与局

除军事事务外，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局还在少数民族中开展了广泛的文化和政治活动；1918年底某一周的事务，正如人民委员部报纸《民族生活》最早几期描述的那样，让人对其工作范围有了一个大致了解：亚美尼亚人民委员部正准备广泛散发一份关于当前局势的宣言并印刷了拉狄克《德国的共产党》的译本；白俄罗斯人民委员部组织了一场庆祝十月革命周年的音乐会集会，还为难民儿童开办学校；沃提克人民委员部正在出版两份报纸《心之声》和《乌德穆尔特》，以及一份农业杂志《乌德穆尔特青年》；犹太人民委员部关闭了“犹太战士联盟”，正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切尔尼戈夫省，在莫斯科开办了一所犹太神学院，用意第绪语出版儿童书籍，参与组织对坦波夫难民的援助，并阻止了锡安工人党接管莫斯科犹太社区事务的举动；拉脱维亚人民委员部在莫斯科组织了一个工人剧院；高加索山地人局正在对山地人进行人口普查并计划建造一座棉纺厂；吉尔吉斯局正派遣携带宣传材料的鼓动人员前往被捷克斯洛伐克人占领的吉尔吉斯地区；马里局的招募进展顺利；波兰人民委员部已撤销了除彼得格勒和斯摩棱斯克外的所有省分支机构；楚瓦什局正着手创办一份社会主义日报；爱沙尼亚局增加了在爱沙尼亚的团的数量，组织了一个爱沙尼亚合唱团并在彼得格勒召开了爱沙尼亚教师代表大会。⁴⁷

⁴⁷ 《民族生活》第2期，1918年11月17日，第7页。

民族局的任务，以为高加索山地人局为例，为：（1）向苏维埃政权反映高加索的需求；（2）向山地人宣传苏维埃政权的政策；（3）通过苏维埃权力机关满足山地人的需求；（4）宣传和鼓动苏维埃政权的思想；（5）依据苏维埃宪法的原则，落实北高加索和达吉斯坦的民族行政领土自治原则与规定。局要设立自己的委员会，其决策权需经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批准，委员会由不同山地部落的代表组成。除上述任务外，局还负责教育改革，以确保用母语教学的可行性，翻译和传播社会主义文献，并借助当地经济外部的资源实施共产主义经济重组。⁴⁸

除了全面负责特定民族事务的局外，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在省为民族事务组织了隶属于市苏维埃和区苏维埃的本地局，它将监督地区有代表性的每个民族的单独部门。地区局的任务为用民族母语提供有关苏维埃政权措施的材料、执行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决议、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与阶级觉悟以及“同具有民族表现形式的反革命势力作斗争”。这些局同时隶属于地方执行委员会和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⁴⁹

⁴⁸ 《民族生活》第3期，1918年11月24日，第8页。

⁴⁹ 《民族生活》第6期，1918年12月15日，第7页。

所以尽管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民族和地区局很大程度上参与的是宣传和监督文化和教育事务，但它们也负责对民族群体的特定经济改革——在一个将大多数少数民族视为“落后”而且需要提升至社会主义所需经济水平的国家里，这绝非一项小任务。在自治单位建立前，这些局还充当民族的政治代表。正因如此，它们经常与由俄罗斯人主导的苏维埃机关发生冲突，机关对当地民众的民族诉求几乎毫无兴趣，于是局逐渐成为了民族诉求乃至民族主义诉求的捍卫者。⁵⁰这些局的组织方式相当临时，苏维埃政权的上级机关很大程度上让它们自行其是，它们仅处于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的松散监督之下，而且其工作人员中常常有那些很晚才投靠布尔什维克的民族主义者，因此这些局在民族政策的演变过程中有很大空间来发挥重要作用。它们将逐渐成为苏维埃很大一部分人口的政治领导层并带头推动民族自治。

穆斯林人民委员部

局里面思想最独立而且态度最强硬的是穆斯林人民委员部（Мусликом）。人民委员部成立于1918年初，在瓦希托夫的积极领导下，于俄罗斯各地建立了一个由穆斯林局和省穆斯林人民委员部组成的网络，它们鼓动穆斯林运动的政治领导权和应征加入红军。⁵¹1918年7月，人民

⁵⁰ 布兰克，同上，第177—185页。

⁵¹ 布兰克，同上，第57—70页。

委员会直接向穆斯林人民委员部拨款，就此而言，人民委员部能够独立于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工作。⁵² 尽管瓦希托夫去世而且穆斯林人民委员部网络覆盖的大部分地区被捷克斯洛伐克人占领，但在鞑靼人米尔赛义德·苏丹-加利耶夫的带领下，穆斯林人民委员部仍继续坚持自身。

被奉行的独立路线惹恼了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其他官员。1918年8月，当穆斯林人民委员部越过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直接向人民委员会提交修改关于政教分离法令的请求时，遭到了部务委员会的严厉斥责。⁵³ 然而，人民委员会却经常支持穆斯林人民委员部，1918年8月30日，受挫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被迫承认穆斯林人民委员部可以独立活动⁵⁴并在次月与穆斯林人民委员部领导人开启了谈判。⁵⁵

同年10月，穆斯林人民委员部进一步与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对立，要求修改后者给地方局的指令，加入一项关于穆斯林民众文化自决权的承诺。⁵⁶ 这个争端在之后召开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会议上引发了一场不愉快的冲突，主席卡尔克林不得不介入苏丹-加利耶夫与委员会委员索瓦-斯捷普尼亚克之间的个人谩骂争执。⁵⁷ 民

⁵²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 1318，目录号 1，卷宗号 1，第 48 页。

⁵³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 1318，目录号 1，卷宗号 1，第 58 页。

⁵⁴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 1318，目录号 1，卷宗号 1，第 68 页。

⁵⁵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 1318，目录号 1，卷宗号 1，第 71 页。

⁵⁶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 1318，目录号 1，卷宗号 1，第 79 页。

⁵⁷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 1318，目录号 1，卷宗号 1，第 78 页。

族事务人民委员部与穆斯林人民委员部之间的关系已然恶化到了这样一种程度，11月，委员会试图撤销穆斯林人民委员部，用一个鞑靼—巴什基尔事务人民委员部取而代之，⁵⁸这一举措在1919年1月被人民委员会推翻。⁵⁹随后，斗争转移到了穆斯林军事委员会，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以其职能与其他政府部门重叠为由，试图废除委员会。⁶⁰苏丹—加利耶夫再次成功向人民委员会申诉，这引发了他被逐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的威胁。⁶¹

1919年春，随着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以及一些穆斯林共产党组织和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机构的成立，穆斯林人民委员部的重要性逐渐减弱，但在其存在期间，它已成为一个重要中心，在相当一部分民众中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由于布尔什维克在穆斯林群体中力量薄弱，领导层不得不或多或少让穆斯林人民委员部自行其是，试图以此削弱教坊、舒拉和泛伊斯兰组织的影响力并将穆斯林知识分子吸纳进共产党，但这是以赋予苏丹—加利耶夫等人类似的相当大的权力为代价的，他们关于“无产阶级民族”和泛伊斯兰统一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问题的方法直接相悖。即便在穆斯林人民委员部被撤销后，这些人仍给政权制造了麻烦，这一点将在下文论述。⁶²

⁵⁸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1318，目录号1，卷宗号1，第86页。

⁵⁹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1318，目录号1，卷宗号1，第93页；《民族生活》第10期，1919年1月19日，第7页。

⁶⁰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1318，目录号1，卷宗号1，第95页。

⁶¹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1318，目录号1，卷宗号2，第94—95页。

⁶² 第五章与第八章。

尽管充满热情，但穆斯林人民委员部及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其他局绝无可能为俄罗斯的民族问题提供一个恰当解决方案。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曾被描述为“民族议会”，⁶³这个描述更符合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而非布尔什维克对民族问题的解决方式。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总部设在莫斯科，远离它本应代表和捍卫其利益的民众，既缺乏充足的资源，权力界定又不清晰，在其早期，领导人不断与地区权力机构发生冲突，后者往往由敌视少数民族权利的俄罗斯人所主导。尽管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确实成功引入了重大变革，并且是少数民族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力量，但它缺乏实权。因此，需要一种更彻底的民族问题解决方案。

民族领土自治

斯大林、穆斯林人民委员部和一些温和的民族主义运动所倾向的解决方案是民族自治。尽管自 1913 年起，领土自治原则就在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观点中占明显地位，并且在布尔什维克党纲和《权利宣言》中均得到认可，但革命后并未就这个问题作出任何具体决定。1918

⁶³ 埃莱娜·卡雷尔·德恩科斯，《大挑战：民族问题与布尔什维克国家 1917—1930》（纽约，1992 年），第 101 页。

年1月，第三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将民族苏维埃共和国与联邦政府之间的关系留给了“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这些共和国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确定”，⁶⁴而且无论如何决议仅涉及在西部边疆已宣告成立的独立共和国。1918年3月15日，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CC)讨论克里米亚的地位问题时甚至未曾提及自治的选项，中央反而决定暂时让其完全独立。⁶⁵

朝着实施这个解决方案迈出的第一个实际步骤是1918年3月22日《关于鞑靼—巴什基尔苏维埃共和国的提议》的发表。这个提议的内容如下：

依据第三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确认的劳动群众民族自决原则，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与俄罗斯中部穆斯林事务人民委员部协商后，就鞑靼—巴什基尔共和国问题制定如下主张：

- (1) 南乌拉尔和中伏尔加的领土被划定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内的鞑靼—巴什基尔苏维埃共和国。
- (2) 在边界划定方面，以巴什基尔和鞑靼革命组织制定的方案为基础（整个乌法省、奥伦堡省的巴什基尔部分、喀山省

⁶⁴ 斯大林，第4卷，第32—33页。（译者注：见《在全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载于《斯大林全集》（北京，1953年），第4卷，第30页）

⁶⁵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17，目录号2，卷宗号1，第2页。

不含楚瓦什一切列米斯人居住的部分，以及彼尔姆省、维亚特卡省、辛比尔斯克省和萨马拉省的穆斯林居住部分）。共和国边界的最终建立交由这个共和国的苏维埃成立代表大会处理。

- (3) 共和国西部部分与巴什基尔斯坦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由鞑靼—巴什基尔共和国苏维埃成立代表大会拟定。
- (4) 召集苏维埃成立代表大会的委员会的组织交由俄罗斯中部穆斯林事务人民委员部负责。

签名：斯大林、瓦希托夫、马纳托夫、伊布拉吉莫夫⁶⁶

鞑靼—巴什基尔共和国的提议因此首次尝试以具体形式践行民族自治原则。提议的确切作者尚不明确。尽管穆斯林人民委员部宣称对此负责而且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发布了这个宣言，但有理由推测斯大林本人参与了某些部分，他与民族领土自治概念的关联最密切而且全面负责民族事务。然而，从斯大林早期著作及后来的决策中可以明确看出，他更偏向将自治赋予界限清晰的民族群体，而非提议涵盖的广阔且民族混杂的地区。相反，这个提议中明显体现出穆斯林人民委员部的影响，其中许多主要人物基于其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信念，公开主张成立一个庞大的伏尔加—乌拉尔伊斯兰共和国。

⁶⁶ 《民族生活》第 62 期，1920 年 2 月 8 日，第 2 页。

无论出处如何，鞑靼—巴什基尔共和国的提议一经拟定，便立即被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和斯大林热切采纳，斯大林还在 1918 年 3 月 23 日《真理报》的一篇文章中宣告这是苏俄民族结构方面的突破。⁶⁷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最初关于成立共和国的法令将其最终形式交由共和国的苏维埃制宪代表大会决定，⁶⁸但到了 4 月，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决定召开一次会议，参会者为“所有关切鞑靼—巴什基尔自治的机关、省及市苏维埃，以及位于鞑靼—巴什基尔共和国境内和与其相邻地区的相关穆斯林机关的代表，还有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代表”。⁶⁹人民委员部收集了喀山和乌拉尔苏维埃代表以及小民族代表的报告，并请求人民委员会采取措施，确保在 1918 年 5 月宣告成立鞑靼—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的胜利会议召开之前获得地方苏维埃的支持。⁷⁰因此，苏维埃自治的最初几步，很大程度上是由穆斯林人民委员部倡议并在地方代表机关的密切参与下筹备完成的。

突厥斯坦苏维埃自治共和国

内战局势暂时阻碍了关于鞑靼—巴什基尔共和国的决议执行。但这些原则很快就被应用到了突厥斯坦。如亚历山大·帕克所言：

⁶⁷ 斯大林，第 4 卷，第 49—50 页。（译者注：见《关于鞑靼—巴什基里亚苏维埃共和国》，载于《斯大林全集》（北京，1953 年），第 4 卷，第 45 页）

⁶⁸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 1318，目录号 1，卷宗号 1，第 11 页。

⁶⁹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 1318，目录号 1，卷宗号 1，第 11 页。

⁷⁰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 1318，目录号 1，卷宗号 1，第 17 页。

对穆斯林民众来说，突厥斯坦的未来地位是俄国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自君主制垮台后，当地领导人便积极寻求建立某种形式的穆斯林自治政府和地方独立政权。⁷¹

1917年11月，突厥斯坦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组建了一个苏维埃政府与它自己的人民委员会，并已向列宁告知其执行苏维埃俄罗斯国家所有法令的意图。⁷²对共产党和苏维埃的俄罗斯控制意味着穆斯林被排除在权力机关外，促使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大力干预以解决这个问题。⁷³1918年3月中旬塔什干苏维埃收到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电报，内容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正在为……俄罗斯的其他民族制定[与鞑靼—巴什基尔提议]类似的方案”。⁷⁴3月25日，改组过的塔什干苏维埃批准了《关于鞑靼—巴什基尔共和国的提议》，同时请求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为穆斯林事务派遣“人民委员之一”。作为回应，拉普科夫被派往塔什干，作为苏维埃政府特别委员和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下达了一项指令，“包含关于在苏维埃自治基础上进行民族边疆地区国家建设以及让当地民族参与苏维埃国家建设的具体指示”，还另派了两名全权代表，伊布拉吉莫

⁷¹ 亚历山大·G·帕克，《突厥斯坦的布尔什维克主义 1917—1927》（纽约，1957年），第64页。

⁷² A.阿米诺夫和A.巴巴霍德扎耶夫，《中亚并入俄国的经济与政治后果》（塔什干，1966年），第128页。

⁷³ Sh.B.巴季罗夫等，《中亚与哈萨克斯坦苏维埃政权的胜利》（塔什干，1967年），第612—613页。

⁷⁴ 同上，第614页。

夫和克列夫列耶夫。⁷⁵1918年4月20日，突厥斯坦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任务是建立一个自治共和国。4月22日，大会收到了由列宁和斯大林联名发出的俄罗斯人民委员会的电报，明确了对大会的期望：

同志们，你们可以放心人民委员会将支持你们地区在苏维埃基础上自治……我们请你们把你们承诺组建的、负责召集苏维埃制宪代表大会的委员会派到莫斯科来，以便共同解决确定你们地区全权机关与人民委员会之间关系的问题……⁷⁶

4月27日，大会中的布尔什维克派通过了一项决议，含蓄批评突厥斯坦苏维埃在对待穆斯林民众方面未能践行十月革命的原则并勾勒了未来共和国的职责。4月30日，代表大会批准成立突厥斯坦苏维埃自治共和国，这个决议在五一节正式庆祝并很快得到撒马尔罕、吉扎克、霍真特、查尔朱、安集延和奥列阿塔等地苏维埃的确认。7月，应要求组建的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与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举行会谈，10月，突厥斯坦第六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突厥斯坦社会主义苏维埃自治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⁷⁷

⁷⁵ 同上，第614—615页。

⁷⁶ 同上，第617页。

⁷⁷ 同上，第617页。

与拟议中的鞑靼—巴什基尔共和国不同，突厥斯坦的自治很大程度上是莫斯科强行推行的。复杂的民族局势和布尔什维克力量的薄弱使得中央必须大力介入支持穆斯林民众，以确保他们参与行政管理并保障他们的文化与经济发展。在此基础上按照民族—领土原则建立自治共和国的目标是，确保当地民众在政治上对俄罗斯移民和行政官员占优势地位。

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成立后，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承诺的给予俄国其他民族的自治在 1918 年剩余时间里没有实现。只有伏尔加河沿岸的德意志人聚居区依据人民委员会 10 月 19 日的法令获得了有限自治。这个法令最明显的一点是赋予德意志人在冲突时直接向俄罗斯人民委员会申诉的权利，以维护其民族权利免受俄罗斯当局的侵犯。⁷⁸

巴什基尔与鞑靼自治

1919 年初巴什基尔自治问题以一种与一年前截然不同的形式出现。由泽基·瓦利多夫领导的巴什基尔民族会议在遭到地区内俄罗斯布尔什维克的镇压尝试后，最初在内战中与白军结盟，同时还有效忠于他

⁷⁸ 巴塞尔，第 165—166 页。

们的精锐巴什基尔军事部队。然而，面对海军上将高尔察克毫不妥协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大量巴什基尔士兵开始叛逃，瓦利多夫也开始考虑整体倒向布尔什维克一方。⁷⁹1919年2月，他与红军开启谈判，要求给予巴什基尔广泛的自治，2月22日，巴什基尔部队成立了以瓦利多夫为首的巴什基尔革命军事委员会（Бащревком），⁸⁰高尔察克的西方集团军调出7个团（约6500名有作战技能的士兵），在前线撕开了一个150公里宽的缺口。⁸¹3月16日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指示斯大林与巴什基尔人谈判，让他们作为苏俄的一个地区单位运作，在全俄中执委拥有代表权，以此换取苏俄在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代表权。⁸²一周后，巴什基尔人得到的远不止这些——一个苏维埃自治共和国，依据苏维埃宪法在地区拥有全部权力，不包括主要经济设施（铁路、工厂、矿山），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并且对巴什基尔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实行无条件大赦。⁸³

巴什基尔自治是一个独特的案例，因为它是在关键战区出于军事权宜之计而被授予的，并且出于同样的原因，自治共和国将由一个完全由本民族成员组成的政府管理，这些成员对共产主义事业并无真正的认同，而且拥有比苏维埃原本可能授予的更大的独立权力。之后将

⁷⁹ 乔纳森·D·斯梅尔，《西伯利亚内战——高尔察克海军上将的反布尔什维克政府 1918—1920》（剑桥，1997年），第289—301页。

⁸⁰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1318，目录号3，卷宗号1，第1页。

⁸¹ 斯梅尔，第300—301页。

⁸²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17，目录号2，卷宗号10，第3页。

⁸³ 《民族生活》第18期，1919年3月23日，第1页。

发生的巴什基尔革命军事委员会与苏维埃机关之间关系的惨痛经历意味着未来需要更加谨慎，但这并未抹杀自治的理念；1920年4月，在与巴什基尔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冲突尘埃落定后，政治局认为有必要向党员阐明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不是一个偶然的、暂时的现象……而是苏俄有机的、自治的组成部分”。⁸⁴无论巴什基尔自治的起源如何，它都将持续存在，而且自治原则已牢固确立。

尽管巴什基尔共和国已经成立，但1918年3月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关于建立鞑靼—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的法令仍未废除，在1919年底前一直被作为长期目标加以推行。1919年12月，全俄东部各民族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出现了反对声音，特别是巴什基尔共产党代表的反对，导致政治局放弃了这个想法。大会投票支持建立单独的鞑靼共和国，当这个决议得到共产党穆斯林部门的压倒性支持且瓦利多夫保证巴什基尔人对此没有异议后，1920年1月，斯大林接到指示着手推进相关事宜。⁸⁵新共和国的名称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内部引发了一些分歧。1920年2月1日，《民族生活》发表了题为《关于鞑靼—

⁸⁴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17，目录号3，卷宗号68，第4页。

* 译者注：应指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见弗·伊·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于《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增订版（北京，2017年），第37卷，第319—330页。

⁸⁵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17，目录号3，卷宗号58，第5页。

巴什基尔共和国的提议》的文章，鞑靼人 S.赛德-加利耶夫在文中主张 1918 年的立场仍然有效，不同之处在于巴什基尔共和国的领土如今将被排除在外。鞑靼人和巴什基尔共和国之外的巴什基尔人都要求建立一个鞑靼—巴什基尔共和国，这将提供一个“所有最优秀的穆斯林革命力量合作”的基地。⁸⁶苏丹-加利耶夫还暗示共和国将在鞑靼人领导下与突厥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相联系。

然而，在《民族生活》的下一期，赛德-加利耶夫被迫收回了这个立场。此时，他仅提及在鞑靼人自决的基础上建立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⁸⁷与赛德-加利耶夫的文章一同刊登的还有巴什基尔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鞑靼共和国的声明和卡尔·格拉斯的解释文章。根据巴什基尔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声明，“鞑靼—巴什基尔共和国”这个名称的选择完全是“出于谨慎考虑，以免被排除在苏维埃巴什基尔领土外、即将纳入鞑靼共和国的巴什基尔人会反对仅以鞑靼民族的名义成立共和国”。如今，作为巴什基尔人民代表的巴什基尔革命军事委员会断言这种担忧是毫无根据的。相反，这个名称引发了一种错误的猜疑，即鞑靼人会试图吞并现有的巴什基尔共和国并同化巴什基尔人。巴什基尔革命军事委员会完全支持成立鞑靼共和国，但反对使用“鞑靼—巴什基尔语言”、“鞑靼—巴什基尔文学”、“鞑靼—巴什基尔军队”等术语。⁸⁸格拉斯的文章解释说鞑靼—巴什基尔共和国的构想

⁸⁶ 《民族生活》第 61 期，1920 年 2 月 1 日，第 2 页。

⁸⁷ 《民族生活》第 62 期，1920 年 2 月 8 日，第 2 页。

⁸⁸ 同上。

符合 1918 年的国际形势。如今，首要任务是通过“在前俄罗斯帝国的领土上建立若干共和国”，在实践中证明自决原则。⁸⁹

巴什基尔革命军事委员会很可能既在意巴什基尔的民族认同也在意自身作为自治共和国统治者的地位。不过，尽管看似是他们的反对导致建立鞑靼—巴什基尔共和国的想法被放弃，但巴什基尔人得到了政治局的支持，而且这背后可能涉及更深层次的原则问题。穆斯林人民委员部和俄罗斯领导层都支持民族自治。然而，赛德-加利耶夫绝非穆斯林人民委员部中最激进的穆斯林民族主义者，他将自治视为实现俄罗斯穆斯林政治统一的一个步骤，而斯大林及政治局其他成员则试图强化民族认同，以此作为吸引非俄罗斯民族倒向苏维埃政权的手段。这意味着要按照狭隘的民族标准来划分自治领土，而非穆斯林人民委员部提议的更宽泛的范围。这恰好与巴什基尔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意愿不谋而合，他们迫切希望确立有别于鞑靼人的民族认同并维护自身的权力基础。

又经过三个月的筹备，直至巴什基尔共和国改组后，全俄中执委和人民委员会才宣告成立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⁹⁰鞑靼共和国的成立受到莫斯科的密切监督，它与苏俄之间的关系由一个国家委员会负责监管。⁹¹

⁸⁹ 同上。

⁹⁰ 巴塞尔，第 143 页。

⁹¹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 1318，目录号 1，卷宗号 4，第 43 页。

自治共和国与州的传播

按民族界限划分苏俄的原则至此牢固确立，1920年6月至1921年1月间，为卡累利阿人、楚瓦什人、吉尔吉斯人、沃提克人、卡尔梅克人、马里人和北高加索各民族设立了自治单位。巴什基尔人的军事力量对苏维埃举足轻重，鞑靼人因其政治积极性和文化传统而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与此不同的是，这些民族中许多都规模小、实力弱，用布尔什维克的术语来说，属于“文化和经济落后”的民族。⁹²1920年1月，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官员埃尔梅茨在《民族生活》上就楚瓦什人问题撰文，有力阐述了小民族应享有自治的理由；楚瓦什人被迫耕种伏尔加最贫瘠的土地，饱受贫困与疾病的折磨，并缺乏文化传统和政治领导层。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楚瓦什局和俄罗斯共产党楚瓦什部门取得的进展正受到两方面因素的阻碍，它们在地方苏维埃权力机关中毫无职权和苏维埃官员持敌对态度，他们“奉行在学校及其他机构使用俄语可对抗民族主义的原则”。除非将楚瓦什人联合起来并划归为直接隶属于苏俄中央机关的特殊行政单位，否则他们无望摆脱落后也无法分享革命成果。这个解决方案理应获得批准，因为，第一，这是公平之举，第二，它能集中力量开展楚瓦什人的教育、苏维埃化和经济改善。⁹³撰写此文五个月后，埃尔梅茨的请求得到了批准，1920年6月24日，楚瓦什自治州宣告成立。

⁹² 《民族生活》第3期，1918年11月24日，第3页。

⁹³ 《民族生活》第59期，1920年1月11日，第1页。

当地俄罗斯人——包括苏维埃官员和共产党人——对当地民众需求的漠视，特别是语言领域，也是1921年为满足当地有影响力的穆斯林民众需求而成立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的主要理由。克里米亚的地位存在争议，也是《民族生活》广泛讨论的话题。⁹⁴从地理上看，克里米亚仅与乌克兰接壤，但人口由穆斯林鞑靼人和俄罗斯人混合构成。革命和内战期间，这里是俄罗斯领土上发生最严重种族冲突的地区之一。在听取了苏丹-加利耶夫关于克里米亚民族状况的悲观报告后，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于4月25日决定授予克里米亚在苏俄内的自治。⁹⁵4月30日，政治局确认克里米亚将成为一个自治州。⁹⁶但5月18日中央委员会修改了这个决议，将克里米亚的地位从州提升为自治共和国。⁹⁷克里米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于1921年10月18日正式成立。

在克里米亚的例子中，将其地位从州提升为共和国很大程度上具有象征意义，反映出地区的民族紧张局势受到的重视。对于哪些民族应被授予自治地位以及在授予自治地位的地方应是自治州还是自治共和国，没有硬性规定。明确的领土范围显然是一项要求，而且作为一般准则，人口越多、土地面积越大，获得共和国地位的可能性就越大。但也存在明显的例外情况——巴什基尔人的数量相对较少，而克

⁹⁴ 《民族生活》第113期，1921年7月30日，第1页。

⁹⁵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1318，目录号1，卷宗号5，第61—62页。

⁹⁶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17，目录号3，卷宗号157，第1页。

⁹⁷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17，目录号2，卷宗号65，第1页。

里米亚和鞑靼自治共和国的面积明显小于科米自治州。最值得注意的是，在 1922 年底已存在的 8 个自治共和国中，除雅库特自治共和国外，其余所有共和国的非俄罗斯人口都以穆斯林为主。

这表明要么布尔什维克对穆斯林的诉求尤为敏感，要么他们至少一定程度上关注自己民族政策对东方日益壮大的反殖民运动产生的国际影响。正如本研究其余部分所揭示，这两个因素无疑都很重要，但无论哪种情况都意味着地位的选择很大程度具有象征意义。然而，这两种自治类型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根据俄罗斯全俄中执委 1920 年 5 月重新界定的内容，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政府将由 10 个人民委员部组成，其中 4 个（粮食、财政、经济、工农检察）以及邮电人民委员部直接隶属于苏俄相应的人民委员部。其余 6 个人民委员部（内务、司法、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农业）能独立运作，但需对俄罗斯全俄中执委负责。⁹⁸这个法令成为了其他自治共和国的范本，契卡也直接隶属于中央，而所有人民委员的任命也须经苏俄相应人民委员部批准。军事、外交和贸易事务仍由苏俄全权负责。⁹⁹

相比之下，在自治州，苏俄机关的所有决议都必须得到执行。伏尔加德意志苏维埃代表大会要“监督苏维埃政权的决议和命令的正确执行”，¹⁰⁰卡尔梅克苏维埃全体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甚至也直

⁹⁸ 巴塞尔，第 142 页。

⁹⁹ 同上，第 144—148 页。

¹⁰⁰ 同上，第 165 页。

接隶属于全俄中执委和[苏俄]人民委员会。¹⁰¹这使自治州在宪法上并不比俄罗斯的其他任何地区拥有更多权利。1923—1924年，苏联成立以及民族院设立后，这种宪法上的差异进一步凸显，而民族院中的代表权取决于地位。

在下一章会阐述的自治共和国与州的官方机关同地方苏维埃当局之间的频繁斗争中，中央当局的态度远比宪法细节更重要。在实践中，正是干部、教育和语言政策的实施彰显了自治单位的特殊地位。如我们将见，共和国与州之间的真正差异在于非俄罗斯人在权力职位中占主导的程度不同，而且事实是自治州学校中的双语现象远比自治共和国更普遍，在自治共和国，当地语言占主导。

哪些民族有资格获得自治以及在何时获得自治的决定过程似乎颇为随意。在1920年中央主导的一系列自治安排热潮过后，布里亚特人、卡拉恰伊人和科米人（基连人）三个民族通过自行申请获得了自治。1920年，布里亚特人可能因分散居住在被贝加尔湖一分为二的广阔区域而被忽略，但在向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提出申诉后，这个问题最终通过设立两个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州解决——一个西伯利亚和一个远东州。¹⁰²基连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个略显牵强的理由，称自治州将成为“抵御来自北方敌人（？北极）*”的有用缓冲区，但他

¹⁰¹ 同上，第172页。

¹⁰²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1318，目录号1，卷宗号5，第112页；同上，卷宗号7，第75页。

* 译者注：应是由于苏俄内战初期外国干涉军登陆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教训而考虑科米北方的被登陆可能性。

们的自治申请之所以能够成功，似乎是因为一项民族学论证确立了科米民族的存在。¹⁰³

种族上看，北高加索是苏俄的地区中最复杂的，其历史上不仅存在当地民族与俄罗斯人、哥萨克人之间的暴力冲突，还存在小型山地民族之间的暴力冲突。北高加索民族问题的初步解决方案是将所有山地民族纳入 1921 年 1 月 20 日成立的单一的山区（Gori）共和国。共和国内计划让每个民族都拥有自己的民族苏维埃以“按照本民族的生活习惯和特点来管理本民族事务”。¹⁰⁴这种明显带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色彩的解决方案的吸引力可能主要体现在实用性上。众多民族中每个民族的规模都很小，而且划定边界存在困难，这是不进一步分割这些民族的主要原因。但也有观点认为，将不同民族联合在一个单一的自治行政单位内将有助于缓解它们之间的民族紧张关系。

这个政策没过多久就被推翻了。卡巴尔达人代表大会率先行动，于 1921 年 7 月投票支持成立单独的州。¹⁰⁵斯大林对这个请求表示认可，有关卡巴尔达人的情况经过调查后被提交给高加索局审议。高加索局的报告得出结论，由于土壤条件和历史发展的原因，卡巴尔达人的经济比其他高加索山地民族更发达，将其纳入山区共和国阻碍了他们的发展。¹⁰⁶类似考量也适用于规模较小的巴尔卡尔民族，他们在地

¹⁰³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 1318，目录号 1，卷宗号 5，第 63 页。

¹⁰⁴ 斯大林，第 4 卷，第 401 页。（见《捷列克区域各族人民代表大会》，载于《斯大林全集》（北京，1953 年），第 4 卷，第 354 页）

¹⁰⁵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 64，目录号 1，卷宗号 72，第 10 页。

¹⁰⁶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 64，目录号 1，卷宗号 72，第 6—9 页。

理上难以与卡巴尔达人分开。因此，1921年9月1日，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州宣告成立。¹⁰⁷

接下来是卡拉恰伊—切尔克斯人，他们在1921年9月和12月于埃尔堡召开的两次代表大会上要求自治，并于1月12日获得了自治。¹⁰⁸最后，车臣自治州于1922年11月30日成立。但根据当时担任高加索局高级成员的A.I.米高扬后来的回忆录所述，给予车臣人自治是为了增强当地民众的权能并为深受匪患困扰的地区恢复秩序。¹⁰⁹

尽管各地自治的授予出于种种不同原因，但1923年4月，格鲁吉亚人布杜·姆季瓦尼声称斯大林与高加索局明确支持拆分山地民族，将其作为解决民族矛盾的一种手段。¹¹⁰

虽然有时看起来只要是一个民族群体就有资格获得自治，但总得在某个地方划一条界线。1921年下半年，政治局阻止了喀什噶尔人和准噶尔人争取自治的行动，¹¹¹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拒绝了阿尔泰人¹¹²和卡拉伊姆人¹¹³的请求，尽管明确承认他们是民族群体。

¹⁰⁷ 《民族生活》第115期，1921年9月3日，第1页。

¹⁰⁸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1318，目录号1，卷宗号7，第101页；同上，卷宗号8，第104页，1922年。

¹⁰⁹ A.I. 米高扬，《在二十年代之初……》（莫斯科，1975年），第220—221页。

¹¹⁰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500页。

¹¹¹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17，目录号3，卷宗号174，第4页。

¹¹²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1318，目录号1，卷宗号8，第27页。

¹¹³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1318，目录号1，卷宗号8，第119页。

自治领土的建立通常伴随着对相关民族地位的深入研究和广泛讨论。这对于那些知名度较低、作为独特民族群体的定义尚未完全确立的族群尤其如此，如雅库特人。¹¹⁴但这并不意味着自治单位的组建总是科学或一致的。卡累利阿劳动公社的成立过程就显得颇为随意。共产国际特工 Yu.西罗尔后来回忆了列宁与芬兰人 E.A.久林之间的关键会面：

那一年[1920年]春天，久林同志从斯德哥尔摩而来，希望成立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我们当时在列宁那里，列宁详细询问我们对卡累利阿的了解和我们打算在那里做些什么。“你们认为这能行得通吗？”我承认自己心存疑虑：那里的工人很少，实际上根本没有民族的无产阶级。党的工作人员也寥寥无几。但久林同志信念坚定，准备着手处理这件事。他坚信，自治将推动卡累利阿的工人和农民，促使他们加强为文化而斗争的力度，并巩固苏维埃政权。列宁同志认真倾听着。他看到的是一个怀有积极想法且准备为实现这个想法而努力奋斗的人。必须给这样的同志证明自己的机会。几天后，经过从各个角度对这件事的调查，久林同志手中拿到了全俄中执委关于成立卡累利阿劳动公社的决议。¹¹⁵

¹¹⁴ 《民族生活》第 116 期，1921 年 9 月 16 日，第 1 页。

¹¹⁵ A.I.阿法纳西耶娃，《卡累利阿史文献与资料——苏维埃时期》（彼得罗扎沃茨克，1992 年），第 55 页。

因此卡累利阿劳动公社的成立源于列宁对一个人信念的信任以及他认为应当给予这类人证明自身能力的机会。

外高加索的自治

我们已经看到支持建立自治领土的理由之一是需要遏制族际暴力。然而，除了一段时期内针对犹太人的频繁大屠杀之外，这个问题在俄罗斯本土及西部边境远不如在高加索严重。在外高加索，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和后来被称为阿塞拜疆人的穆斯林这三大民族群体在许多地区相互杂居，这些群体之间的暴力冲突在俄罗斯帝国下就屡见不鲜，而在外高加索独立时期尤为激烈。此外还存在几个较小的民族，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格鲁吉亚境内的阿布哈兹人、阿扎尔人和奥塞梯人。但后几个群体居住在相对界限分明的地区，待遇与俄罗斯的少数民族大致相同。阿布哈兹人曾被误导，以为自己能够成立一个单独的苏维埃共和国。但1921年3月，在格鲁吉亚苏维埃化后不久，阿布哈兹被授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地位，根据两个共和国之间的一项特别协议，阿布哈兹将并入苏维埃格鲁吉亚。¹¹⁶这种阿布哈兹特有的地位属于第四种类型的民族领土，介于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与自治共和国之间。1921年7月，阿扎尔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成立（部分源于与土耳其的协议），1922年4月，奥塞梯人居住地中属于格

¹¹⁶ 《伟大的十月》，第205页。

鲁吉亚的部分被划分为南奥塞梯自治州，这两个地区均属于格鲁吉亚，模式与俄罗斯境内的自治共和国大致相同。

对于阿塞拜疆人、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混居地区的解决方案，事实证明更难实现。1920年3月，外高加索的布什维克特工B.沙赫塔赫京斯基致信列宁，详细说明了当时外高加索三国政府之间存在争议的九个地区。¹¹⁷其中，格鲁吉亚当时占据着锡格纳赫斯克县、卡拉亚兹草原、博尔恰拉和阿克哈尔齐赫斯克县，同时还对目前由阿塞拜疆管辖的扎卡塔尔斯克区提出了领土主张。沙赫塔赫京斯基毫不掩饰他偏袒阿塞拜疆的倾向，据他称，格鲁吉亚对这些领土的主张完全基于历史依据，而这些地区的人口则以阿塞拜疆人或亚美尼亚人为主。外高加索苏维埃化后，一系列委员会对这些争议地区的边界进行了仔细划定，其决策主要依据民族志原则，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之间存在争议的哈萨克斯克县的边界划定也是如此。¹¹⁸

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之间存在争议的另外三个地区：卡拉巴赫、纳希切万和赞格祖尔，问题更为棘手。位于两个共和国之间的赞格祖尔居住着阿塞拜疆人和亚美尼亚人，杂居情况与位于亚美尼亚南部的纳希切万相同。沙赫塔赫京斯基称战争期间纳希切万的亚美尼亚人已被彻底驱逐，这个说法不准确。卡拉巴赫在俄罗斯帝国下是一个单一的行政单位，但可划分为下卡拉巴赫和纳戈尔内（山区）卡拉巴赫。下卡拉巴赫居住着41.5万穆斯林和17万亚美尼亚人。纳戈尔诺—卡

¹¹⁷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5，目录号1，卷宗号2796，第4页。

¹¹⁸ 见第四章讨论。

拉巴赫的定居人口以亚美尼亚人为主，地区的主要城镇舒什在 19 世纪成为亚美尼亚文化的主要中心之一。¹¹⁹然而，居住在卡拉巴赫低坡地带的半游牧阿塞拜疆人传统上会赶着羊群前往亚美尼亚人居住的山地夏季牧场放牧。基于此，沙赫塔赫京斯基反对分割卡拉巴赫，因为这会直接影响游牧民族的生计。更复杂的是，分隔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与亚美尼亚的拉钦走廊，居民主要是库尔德人。

俄罗斯帝国崩溃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成为阿塞拜疆人与亚美尼亚人之间长期且常伴流血冲突的场所。¹²⁰1919 年 8 月 22 日，第七次卡拉巴赫亚美尼亚人代表大会与阿塞拜疆独立的穆萨瓦特政府达成协议，根据一系列旨在保障亚美尼亚人地位的复杂条款，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将继续作为阿塞拜疆的一部分。¹²¹协议长达 26 条，将复杂的权力分享制度与由亚美尼亚民族苏维埃行使的“文化自决”相结合。然而，这个协议带来的和平是短暂的。1920 年 2 月，阿塞拜疆驻卡拉巴赫总督霍斯罗夫·贝克·苏丹诺夫派兵包围地区，要求亚美尼亚人接受完全并入阿塞拜疆。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最终在舒什引发了大规模屠杀。

此时，布尔什维克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态度存在分歧。沙赫塔赫京斯基及阿塞拜疆的许多布尔什维克反对分割卡拉巴赫，俄罗斯

¹¹⁹ 克里斯托弗·J·沃克（编），《亚美尼亚与卡拉巴赫——为统一而斗争》（伦敦，1991 年），第 83 页。

¹²⁰ 同上，第 88—99 页。

¹²¹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 5，目录号 1，卷宗号 2797；热拉尔·J·利巴里迪安（编），《卡拉巴赫档案——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的事实与文献 1918—1988》（巴黎，1988 年），第 20—22 页。

共产党高加索局（Кавбюро）和外交人民委员部（Наркоминдел）似乎基于民族自决原则倾向支持亚美尼亚的主张。1919年6月3日，当时隶属于第十一方面军军事苏维埃的S.M.基洛夫致信列宁和斯大林：“卡拉巴赫和赞格祖尔不承认阿塞拜疆政府。达什纳克党人[亚美尼亚政府]希望将卡拉巴赫并入亚美尼亚。”¹²²

但局势在1920年4月27日发生了变化。红军进入巴库，次日，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宣告成立。苏维埃国家交由阿塞拜疆共产党掌管，不久前由“胡迈特”社会主义穆斯林党的左派在N.纳里曼诺夫领导下组建而成的。新政府拒绝了亚美尼亚的所有主张，既出于阿塞拜疆的民族利益，也因为亚美尼亚当时尚未苏维埃化。纳里曼诺夫确信“世界上没有人能够阻止我们利用自己对特定地区民众的影响力，宣布支持与阿塞拜疆联合”。¹²³此时，斯大林似乎站在了纳里曼诺夫一边，部分原因是与土耳其的外交局势，土耳其希望通过纳希切万、赞格祖尔和卡拉巴赫保持自身与穆斯林占多数的阿塞拜疆之间的联系。斯大林在给高加索局负责人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的信中写道：“我的意见是我们需要果断支持其中一方——在这种情况下是阿塞拜疆和土耳其。”¹²⁴据后来一个支持亚美尼亚主张的亚美尼亚苏

¹²² S.M.基洛夫，《文章、演说、文件——第1卷》（莫斯科，1936年），第144页。

¹²³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历史参考手册》（苏维埃亚美尼亚科学院，埃里温，1988年），第24页。

¹²⁴ 同上，第23页。

维埃来源称，一些亚美尼亚布尔什维克也支持阿塞拜疆对这些争议地区的控制，将其作为亚美尼亚苏维埃化之前的一项临时措施。¹²⁵

阿塞拜疆苏维埃政府上台后不久，在亚美尼亚苏维埃化之前，就向亚美尼亚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从卡拉巴赫和赞格祖尔撤军。这导致亚美尼亚的五一劳动节工人示威者呼吁苏维埃俄罗斯制定一个公正的解决方案。¹²⁶俄罗斯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倾向于采取不偏不倚的解决办法。至少在当时，赞格祖尔、纳希切万和卡拉巴赫不应属于亚美尼亚或阿塞拜疆任何一方，但应加强当地苏维埃，在永久性解决方案制定出来之前，这些地区应由俄罗斯军队占领。¹²⁷1920年6月，契切林提议赞格祖尔和纳希切万应归属亚美尼亚，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地位则应由全民公决决定。¹²⁸5月至6月期间，契切林关于俄罗斯占领争议地区的提议由第十一方面军执行。

然而，这个解决方案并未得到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的一致认可。6月18日，纳里曼诺夫在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领袖姆季瓦尼和亚美尼亚人米高扬的支持下致信契切林，对亚美尼亚入侵他们所认为的阿塞拜疆领土提出抗议：

¹²⁵ 同上，第24页。

¹²⁶ 《卡拉巴赫档案》，第28页。

¹²⁷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64，目录号1，卷宗号17，第18页。

¹²⁸ 沃克，《亚美尼亚与卡拉巴赫》，第100页。

在[亚美尼亚将军]德罗撤军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和赞格祖尔的亚美尼亚居民在共产主义者安巴尔普米扬医生的领导下宣告了苏维埃政权的成立……我们郑重声明，这两个地区今后理应纳入阿塞拜疆版图，这一点毋庸置疑……朱尔芬区和纳希切万区应由我方部队占领并划归阿塞拜疆，此举既是出于军事目的，也是为了实现与土耳其的直接联合。¹²⁹

1920年8月13日，沙赫塔赫京斯基致信列宁建议将纳希切万从亚美尼亚分离出去，因为对关键铁路连接线的控制会增强达什纳克党政府的实力，并切断苏维埃与革命土耳其之间的联系。¹³⁰

卡拉巴赫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阿萨德·卡拉耶夫表现出了更强硬的态度。此人解决卡拉巴赫和赞格祖尔问题的办法充满暴力且带有明显的种族主义色彩。他致信盖鲁辛革命委员会：

任何了解亚美尼亚人心理的人……[都知道]没有一个亚美尼亚人不会为了金钱而出卖一切……你们用军队占领卡拉巴赫和赞格祖尔的旧政策是大错特错的。我们知道我们的部队已被击溃并撤退了，但如今，取代军队的是我们的金钱在创造奇迹。我一再

¹²⁹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 64，目录号 1，卷宗号 17，第 106 页。

¹³⁰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 5，目录号 1，卷宗号 2796，第 1—2 页。

重申我的建议——不吝惜任何款项，提高薪水，给予他们奖和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政府已决定，为将卡拉巴赫和赞格祖尔并入阿塞拜疆，将拨款 2 亿卢布。¹³¹

并致信山区革命委员会：

赞格祖尔 90%的村庄尚未解除武装。这令人遗憾，但更令人遗憾的是赞格祖尔的亚美尼亚人尚未被“斩首”。其知识分子和军事首领仍在村庄中……必须分秒必争。你们必须夜以继日地工作。务必将所有重要的亚美尼亚人物逮捕起来。驱逐和劫掠无关紧要。时间会流逝，局势会改变，他们终将回到自己的国家。抛开所有人道考量吧。靠这种情感是无法建立国家、征服他国或安身立命的……如果你们兵力不足，就用钱来代替。你们为何要因为提及某个阿兹达帕夏的存在而拖延对这个叛乱地区的归附？采用那些行之有效的方法！有哪个亚美尼亚人在得到 300 万卢布的报酬后不会把这个人的头颅带给我们呢？……附言：要在游击队活跃的地方削弱亚美尼亚人的力量，你们只需杀掉一名俄罗斯士兵，然后指控是亚美尼亚人犯下的罪行。你们非常清楚俄罗斯人会怎么做。要让赞格祖尔没有一个诚实的人留存，也不要留下一

¹³¹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 64，目录号 1，卷宗号 19，第 9 页。

分钱，这样这个遭诅咒的民族就永远无法东山再起。¹³²

面对这种反对，俄罗斯共产党政治局支持契切林并在 1920 年 7 月 7 日的指令中试图恢复平静：

向被俄国军队占领的争议地区民众阐明，我方军队暂时占领这些地区的目的是制止民族间的屠杀，这些地区的地位问题将由一个有俄国代表参加的联合委员会决定，委员会将以人口的民族构成及其意愿为指导。¹³³

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希望在外高加索应用指导俄罗斯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民族同质性和自决。但在阿塞拜疆，政治局对这个新成立的共产党的控制力并不像在俄罗斯通过坚持党的纪律所拥有的那样强，更不用说对卡拉耶夫这类地方领导人的控制了。结果，他们无法将自己的意志付诸实施。1920 年 8 月，基洛夫致信契切林

我已尽全力执行您的指示。遗憾的是结果令人失望，事情毫无进展。最近，随着赞格祖尔和纳希切万事态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关

¹³²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第 24—25 页；沃克，《亚美尼亚与卡拉巴赫》，第 101—102 页。

¹³³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第 27 页。

于亚美尼亚问题的意见。长期以来，阿塞拜疆外交人民委员古谢诺夫与几名党务工作者一直在此地。我与他及此地的亚美尼亚代表举行了一系列会谈。我还组织了联合会议。经过这一切，从阿塞拜疆人那里只争取到一点——他们愿意将沙鲁罗—达拉拉盖斯基县让给亚美尼亚；至于其余地区，即纳希切万、奥尔杜巴特、朱尔法、赞格祖尔和卡拉巴赫，阿塞拜疆人认为这些地区无条件归他们所有。亚美尼亚代表断然要求获得这些地区。阿塞拜疆人的主要论点是这些地区在穆萨瓦特政府时期就属于阿塞拜疆，他们认为现在让出这些地区不仅会使阿塞拜疆的苏维埃政权失信，还会使波斯和土耳其的苏维埃政权失信……我已经向您建议，摆脱当前局面的唯一办法是采取坚定态度并在莫斯科解决这个问题，只有莫斯科的权威才能解决此事。¹³⁴

基洛夫认为，由于种族屠杀持续发生，迟迟未能解决这些争端正使俄罗斯的政策失信。俄罗斯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高加索局和俄罗斯共产党政治局正试图按照在俄罗斯推行的民族政策方针来解决这些争议地区的问题，但在基洛夫看来，这主要受到了阿塞拜疆共产党人的阻碍。因此，在亚美尼亚苏维埃化之前，这个问题始终未能解决。

1920年11月29日，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宣告成立。情况很快变得明朗，那些曾反对将领土交给达什纳克党统治的亚美尼

¹³⁴ 基洛夫，第231—232页。

亚的人，如斯大林，非常乐意满足这个新苏维埃国家的要求。此时，阿塞拜疆领导层也被迫同意。12月1日，在巴库苏维埃召开会议后，阿塞拜疆革命委员会宣布：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边界问题宣告解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赞格祖尔和纳希切万被视为亚美尼亚共和国的一部分。¹³⁵

三天后，斯大林在《真理报》的一篇文章中对这个举措表示赞扬，并得出结论“亚美尼亚和它周围的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宿仇，由于在亚美尼亚、土耳其、阿塞拜疆的劳动人民之间建立了兄弟般的团结而一举消释了。”¹³⁶将争议地区划归亚美尼亚的决定受到了奥尔忠尼启则、亚美尼亚革命委员会和12月12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会见列宁的亚美尼亚代表团的热烈欢迎。¹³⁷

然而，阿塞拜疆对移交的接受并未持续太久。12月1日声明发布后不久，沙赫塔赫京斯基抵达纳希切万开始煽动反对声明，声称“阿塞拜疆革命委员会宣布将纳希切万移交给亚美尼亚是背叛了纳希切万的利益”。¹³⁸据一份苏维埃资料记载，1921年初在纳希切万举行的

¹³⁵ 《卡拉巴赫档案》，第31页。

¹³⁶ 斯大林，第4卷，第414页（译者注：引用译文时已将地名旧翻译更新为新翻译，此后不再单独说明。见《苏维埃阿尔明尼亚万岁！》，载于《斯大林全集》（北京，1953年），第4卷，第365页）。

¹³⁷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第207页。

¹³⁸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第35页。

一次全民公决显示九比一的投票结果支持在苏维埃阿塞拜疆内自治。

¹³⁹土耳其也对纳希切万表示关注，出于对穆斯林人口的尊重以及与土耳其保持良好关系的考虑，布尔什维克在1921年3月16日签署的《莫斯科条约》中同意纳希切万成为受阿塞拜疆保护的自治州。¹⁴⁰

几乎在同一时间，纳里曼诺夫开始鼓动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归还阿塞拜疆，并威胁称否则他无法阻止阿塞拜疆境内反苏维埃团体死灰复燃。¹⁴¹尽管如此，高加索局仍在1921年6月3日确认了卡拉巴赫作为亚美尼亚一部分的地位，¹⁴²亚美尼亚政府也在6月12日和19日的声明中对此予以确认。¹⁴³高加索局不得不持续与阿塞拜疆政府斗争。6月26日，奥尔忠尼启则和基洛夫在给纳里曼诺夫的电报中对民族原则作出了迄今为止最激进的阐释：“任何一个亚美尼亚村庄都不应并入阿塞拜疆，同样，任何一个穆斯林村庄也不能并入亚美尼亚。”¹⁴⁴然而，就在第二天，阿塞拜疆共产党政治局无视这个原则，宣布不会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归还给亚美尼亚，理由是该地区与阿塞拜疆在经济上有联系。¹⁴⁵

¹³⁹ A.Sh.米尔曼，《苏维埃阿塞拜疆——苏联主权国家》（巴库，1971年），第234页。

¹⁴⁰ 沃克，《亚美尼亚与卡拉巴赫》，第106页。

¹⁴¹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第31页。

¹⁴² 沃克，《亚美尼亚与卡拉巴赫》，第107页。

¹⁴³ 《卡拉巴赫档案》，第23页。

¹⁴⁴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第32页。

¹⁴⁵ 沃克，《亚美尼亚与卡拉巴赫》，第107页。

1921年7月3日，高加索局召开会议解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地位问题。在第一次会议上，高加索局不顾纳里曼诺夫的反对，确认了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划归亚美尼亚的决定。然而，两天后，同一机关作出决议：

鉴于有必要在穆斯林与亚美尼亚人之间实现民族和平，并考虑到上卡拉巴赫与下卡拉巴赫之间的经济联系及其与阿塞拜疆的永久联系，决定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留在苏维埃阿塞拜疆内，赋予其广泛的地区自治，行政中心设在舒什，构成一个自治州。¹⁴⁶

实施自治的决定并未立即得到执行，这很可能是因为需要维持土耳其的善意；但到1923年7月与凯末尔的关系已经降温，卡拉巴赫自治州随之成立，成为阿塞拜疆的一部分。¹⁴⁷

这个突然的转变从未得到充分解释。根据两份亲亚美尼亚的二手资料，改变是在斯大林介入后作出的，但第三份资料显示斯大林本人出席了第一次会议。¹⁴⁸有可能是第三方进行了干预（例如契切林或俄罗斯共产党政治局），但同样也有可能是高加索局成员和斯大林被纳

¹⁴⁶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第33页。

¹⁴⁷ 《卡拉巴赫档案》，第34页。

¹⁴⁸ 赫兰特·阿夫迪西安，引自《卡拉巴赫档案》，第34页。另外两处来源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第33页；沃克，《亚美尼亚与卡拉巴赫》，第108页。

里曼诺夫关于局势将陷入混乱的威胁或其他因素说服，从而改变了主意。

在没有任何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这种突然的态度转变只能是推测的对象。考虑到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人口以亚美尼亚人为主，有关地区的决定出现反转，违背了布尔什维克根据领土的整体民族构成而非经济因素来整合领土的总体政策。自治州的设立更符合在其他地方没有自己领土的弱势民族的情况。有几个因素可能起到了作用。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十分重视与凯末尔主义土耳其的关系，他们认为后者具有革命性，而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划入穆斯林占多数的阿塞拜疆可能是为了释放一种积极的姿态。另一个更普遍的因素是阿塞拜疆方面对地区主张的力度。卡拉巴赫亚美尼亚人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为阿塞拜疆的立场提供了合法性。还有一个问题是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与亚美尼亚之间存在一片穆斯林聚居区，如果要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与亚美尼亚合并，就必须在这片区域开辟某种通道。更重要的是，对布尔什维克来说，定居人口中多数为亚美尼亚人的事实未必具有决定性意义。在关于吉尔吉斯边界的讨论中，布尔什维克明确认为穆斯林农民游牧民族季节性使用的土地归他们所有，而新近到来的俄罗斯定居者对此没有任何权利主张。¹⁴⁹因此，赶着羊群进入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游牧民族完全可以被认为与亚美尼亚人一样，对地区拥有正当的权利主张，而且如果他们在迁徙过程中被迫穿越国家边界，其生活方式肯定会受到影响。

¹⁴⁹ 见下文第四章。

诸如阿塞拜疆人所提出的那些经济论点，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或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看来，与民族志方面的考量相比，分量很轻。然而，在外高加索，共产主义组织并非由俄罗斯中央委员会直接控制，而是通过高加索局。尽管奥尔忠尼启则和高加索局最初同情亚美尼亚的立场，但在 1921 年与格鲁吉亚苏维埃政府的一系列争端中，他们已经表现出更偏向响应经济集中化的要求，而非顾及民族情感。¹⁵⁰1923 年 8 月，奥尔忠尼启则甚至试图将纳希切万完全并入阿塞拜疆，不给予其任何自治地位，但在契切林提出这个举措将违反 1921 年与土耳其签订的条约后，俄罗斯政治局纠正了他。¹⁵¹高加索局或许还受到了纳里曼诺夫如下论点的影响，把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割让给亚美尼亚只会延长民族冲突。1921 年 8 月，奥尔忠尼启则声称苏维埃对卡拉巴赫、赞格祖尔及其他问题的正确解决确保了外高加索的民族和平。¹⁵²

或许此事中最重要的潜在因素是布尔什维克对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各自的态度。阿塞拜疆在布尔什维克心中占据特殊地位。他们曾希望，给予中亚和伏尔加地区的穆斯林民族自治权能起到灯塔般的作用，将穆斯林世界引向共产主义。但与这些地区不同，阿塞拜疆是一个由阿塞拜疆人领导的独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而且与具有潜在关键意义的土耳其和波斯地区联系紧密。因此，阿塞拜疆有望得到

¹⁵⁰ 下文第七章讨论。

¹⁵¹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 17，目录号 3，卷宗号 375，第 2、12 页。

¹⁵² G.K.奥尔忠尼启则，《文章与演说》（莫斯科，1956 年），第 1 卷，第 201 页。

一定程度的偏袒。此外，阿塞拜疆的共产党人大多曾是能量*的成员，不受严格纪律的约束。莫斯科不会希望被看起来像侵犯了他们的主权和他们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诉求。

相比之下，亚美尼亚在国际舞台上无足轻重，还受到许多布尔什维克的轻视。1923年，在俄罗斯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亚美尼亚人民委员会主席 S.L.卢卡申认为，外高加索的民族问题不像其他地区那样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统治的问题，而是源于“亚美尼亚商业资产阶级”的兴起。¹⁵³在同一次会议上，卡尔·拉狄克声称亚美尼亚人仍有压迫阿塞拜疆穆斯林的倾向。¹⁵⁴尽管斯大林驳斥了拉狄克的说法，但这些言论清楚地表明至少有一部分布尔什维克将亚美尼亚人视为外高加索的强权民族。这种反亚美尼亚情绪体现在对亚美尼亚民族主义政党达什纳克党的态度上。1921年7月，布尔什维克与其他民族主义政党结盟之际，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收到高加索局关于达什纳克党在外高加索声名狼藉的意见后，拒绝与它达成协议。¹⁵⁵

如果说在外高加索，亚美尼亚人扮演了俄罗斯内大俄罗斯人的角色，那么在布尔什维克看来，他们就无权对被压迫民族主张任何民族权利。亚美尼亚人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占多数的事实本身，意味着除非穆斯林少数群体的地位得到阿塞拜疆的保障，否则他们将面临民

* 译者注：“能量”（Гу́ммет）是20世纪初巴库地区由布尔什维克组建的社会民主组织之一。

¹⁵³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599页。

¹⁵⁴ 同上，第618—619页。

¹⁵⁵ 见下文第五章。

族压迫。总体而言，在此期间，布尔什维克对阿塞拜疆的态度往往比对亚美尼亚或格鲁吉亚更友善。这很可能是他们背离常规原则、拒绝划定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纳入亚美尼亚版图的最合理的总体解释。鉴于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由此成为苏维埃阿塞拜疆内一个聚居的少数群体，领土自治原则现在便可以适用于他们了。

随着内战最艰难的时期结束，重新焕发生机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从1920年初开始参与基于民族的自治领土组织，但方式杂乱无章、前后不一而且原因各异。事实很快表明，十月革命并未一举解决少数民族与俄罗斯人之间的地方冲突问题，它们此前被归咎于沙皇政权的帝国主义政策。在苏维埃权力机关外平行设立民族局和部门的解决方案反而引发了更多难以解决的争端，这些争端在1920年1月阿斯特拉罕当局与卡尔梅克组织的冲突中达到了顶点。¹⁵⁶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未为少数民族提供充分保护促使采纳了一项领土政策，斯大林和一些民族主义组织特别是中亚的此前就已倡导过这个政策。设立专门的民族领土背后还有一些普遍的实际考量，最明显的是语言的多样性。然而，一旦开始推行这个政策，其发展态势就使那些具有民族凝聚力和自我意识的单位的存在本身就被视为具有价值。1920年10月10日，

¹⁵⁶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1318，目录号1，卷宗号4，第1页。

斯大林在《真理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苏维埃自治不是别的，正是所有这些具有乌克兰、突厥斯坦、吉尔吉斯等等民族形式的机关[学校、法院、行政机关和政权机关]的总和。”¹⁵⁷——苏联其他地方存在的机构将变成民族机构，它们可以为少数民族提供一个凝聚点，而且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苏维埃迫切希望这些自治单位尽可能在民族构成上保持单一。解决持续的种族间暴力是实施民族自治的一个主要短期考量。从长远来看，通过为少数民族提供民族发展和身份认同的基础，布尔什维克为他们提供了社会主义所需的文化和经济发展手段，以及一个可以借此表达对苏维埃国家忠诚的媒介。

¹⁵⁷ 斯大林，第4卷，第359页。（见《苏维埃政权对俄国民族问题的政策》，载于《斯大林全集》（北京，1953年），第4卷，第318页）

第4章 构建民族身份——边界与国家结构

无论在界定苏维埃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州的宪法权力时多么用心，权力的范围往往都只能通过痛苦的实践来确立。国家构建过程不仅涉及确定这些权力范围，还包括划定被视为民族身份核心要素的领土边界。布尔什维克原本希望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尽可能创建以单一民族为主体的领土，使主体民族能够在其中发展壮大。但这个任务难以完成，因为在大多数地区，俄罗斯人口早已渗透并占据了特权性的主导地位，而且即便是长期定居于此的本地民族也很难彼此区分开来。沙皇时期行政单位的边界几乎毫无用处，因为它们无视了民族边界。内战期间，随着敌对民族的军队、游击队甚至村庄争夺邻近土地，边界不断变更。正如全俄中执委在1921年被迫宣布的那样，“绝不能根据当前的土地使用情况来确定边界，因为这种情况是入侵自治共和国边界的结果”。¹划定对所有相关方都公平、具有经济合理性而且同时尽可能符合“民族原则”的边界，是一个漫长而常常充满争议的过程。

卡拉伊兹地区的阿塞拜疆—格鲁吉亚边界问题很好地说明了布尔什维克在采取沿民族—领土线划分前帝国疆域的原则后所面临的困难。1921年7月5日，专门的外高加索内部边界调整代表会议决

¹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1318，目录号3，卷宗号34。

定，阿塞拜疆共和国与格鲁吉亚共和国在卡拉伊兹草原的精确边界应由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划定，它“必须充分考虑哈萨克县农民的意愿”。²据此，7月26日晚上9点，由两名阿塞拜疆人、两名格鲁吉亚人和担任主席的第三名阿塞拜疆人易卜拉欣诺夫组成的委员会在偏远的阿克斯塔法火车站碰头并开始工作。易卜拉欣诺夫与格鲁吉亚代表因戈罗夫卡立即就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产生了争议；格鲁吉亚人坚持认为，代表会议的决议意味着委员会必须详细研究整个草原地区的土地所有权问题，而阿塞拜疆人则认为无需进行如此繁琐的工作就能确定边界。³由于这个问题未能得到解决，委员会休会并于次日上午10点再次召开会议。阿洪多夫（阿塞拜疆人）立即提议委员会直接前往草原，着手开展任务。因戈罗夫卡回应说委员会无法推进工作，因为，第一，两个代表团对代表会议决议的解读无法达成一致，需要向中央（即高加索局）寻求指导；第二，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且本应征求其意见的阿塞拜疆民众目前正在夏季牧场，要到8月底才会返回卡拉伊兹草原；第三，委员会没有任何用于在实地或地图上标注拟议的边界的技术工具或专业知识；第四，从事畜牧业的游牧民也不在营地；最后，代表们没有时间收集足够的用于做出任何决定的预备材料。因此，格鲁吉亚代表团提议解散委员会，待游牧民返回草原的9月1日再行

²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64，目录号1，卷宗号61，第7页。

³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64，目录号1，卷宗号61，第2页。

召开会议，并利用这段时间收集材料。阿塞拜疆方面同意了这个提议，两个代表团于是都各自离去。⁴

按照这个决议，1921年9月1日，格鲁吉亚代表团抵达伊丽莎白波尔。格鲁吉亚人在那里花了五天时间寻找阿塞拜疆代表团，但未能找到对方，放弃了任务并返回了格鲁吉亚。⁵

与此同时，有关希赫利地区农民在当地苏维埃当局领导下越界进入阿塞拜疆一侧边境的投诉不断出现，而格鲁吉亚农民偷牛的反指控也随之而来。⁶在两个共和国的外交人民委员部与高加索局之间进行了一番紧急通信之后，阿塞拜疆与格鲁吉亚于11月15日在第比利斯签署了一个协议。尽管先前的委员会未能达成共识，但边界的复杂性展现了它的重要性：

从红桥向北至托尔帕克-塔佩，沿直线穿过库拉河，经过科兹卢克森林，到达卡拉亚兹灌溉系统第十七号沟渠的南端，沿着同一沟渠的西侧向北，涵盖希赫利居民耕种的所有土地，继续向北，包括巴尤克-基亚克索埃的地产，穿过贾达尔湖，将湖的东半部划归阿塞拜疆苏维埃，西半部划归格鲁吉亚苏维埃……

⁴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 64，目录号 1，卷宗号 61，第 1 页。

⁵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 64，目录号 1，卷宗号 52，第 249 页。

⁶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 64，目录号 1，卷宗号 75，第 100 页。

等等等等。⁷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因为双方的越界行为仍在继续，而且卡拉万塞拉伊县（亚美尼亚）的农民与哈萨克县（阿塞拜疆）的农民之间关于土地使用的争端，又将亚美尼亚共和国卷入了边界纠纷之中，这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军事、工程和铁路建设单位对卡拉伊兹森林的肆意破坏威胁到了当地穆斯林农民的生计，使问题更为紧迫。在阿塞拜疆举行了更高层级的会议以制定当地当局可据以确定双方确切权利的原则。⁸正是通过这个曲折无序的过程，当今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边界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尽管在卡拉伊兹地区划定边界的尝试混乱不堪，甚至近乎闹剧，但这是由于对细节的关注以及相关各方相互冲突的主张所导致的。

1917年4月的第七次党代表会议曾决议

[应当]根据当地居民自己对经济和生活条件、居民民族成分等等的估计，确定地方自治地区和区域自治地区的边界。⁹

1918年4月的一次采访中，斯大林显然并未预料到这种自决会出现任何重大问题，他提出乌克兰、克里米亚、波兰、外高加索、突

⁷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64，目录号1，卷宗号61，第5页。

⁸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64，目录号1，卷宗号61，第13页。

⁹ 麦克尼尔，同上，第1卷，第226页（译者注：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四月）全国代表会议》，载于《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北京，1964年），第447页）。

厥斯坦、中伏尔加和吉尔吉斯领土全部为“完整的经济地域，其居民具有一定的生活习惯和民族成分”。¹⁰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各个民族群体很少居住在界限分明的区域内，而是在城市和同一地区的不同村庄中相互杂居。同一民族群体的聚居地可能出现在不相邻的区域。游牧族群常常随着季节变化穿越不同定居群体居住的领土；中亚的情况尤为突出，那里不同民族的界定既依据语言或历史—民族原则，也同样依据其农业生产方式。“经济完整性”的缺失为变更民族边界提供了更多理由；只要共和国和自治单位对其领土内的经济有切实控制权，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将某些企业、工业区或特定农业用途的土地纳入最能成功利用其产出的地区在经济上是合理的。实际上，当时已有提案考虑以纯粹的经济而非民族因素为基础构建苏维埃国家的行政组织。¹¹因此，除了不同民族之间围绕边界产生的争端外，“经济原则”与“民族—领土原则”之间也存在竞争，两个原则在共产党不同层级上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认可。

外高加索的内部边界

前文所述的卡拉伊兹委员会是解决外高加索三个共和国之间争议边界问题的典型做法。1921年5月设立了由S.M.基洛夫领导的特别委

¹⁰ 斯大林，第4卷，第67页（译者注：见《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组织》，载于《斯大林全集》（北京，1953年），第4卷，第64页）。

¹¹ 见下文，第七章。

员会之后，7月5日召开了外高加索内部边界调整代表会议。¹²该委员会受命于6月1日前完成工作，但相互冲突的主张错综复杂，无法按时完成，于是召开了7月代表会议并设立了众多委员会。

在九个主要的争议领土中，¹³卡拉巴赫和纳希切万已讨论过。赞格祖尔地区在1921年初发生了长期的反布尔什维克抵抗运动，或许是考虑到当地亚美尼亚民族主义的力量，它随后成为亚美尼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¹⁴而阿克哈尔齐赫地区的大部分则被割让给土耳其。

其他地区由特别委员会和外交官进行了详细讨论。扎卡特勒的格鲁吉亚—阿塞拜疆边界问题在1920年5月7日苏维埃俄罗斯与孟什维克格鲁吉亚举行的和平谈判中被提及，当时格鲁吉亚同意将最终决定提交给一个由俄罗斯人担任中立主席的格鲁吉亚—阿塞拜疆联合委员会，¹⁵但不清楚这个委员会是否曾召开会议。在1921年7月的边界代表会议上，格鲁吉亚放弃了对该地区的所有主张，¹⁶但阿塞拜疆人与格鲁吉亚人之间的暴力跨境冲突持续到1921年，这也影响到了已划给格鲁吉亚的西格纳赫地区。¹⁷哈萨克县在7月代表会议上被划入阿塞拜疆，但到1921年12月仍在调查中。¹⁸在博尔查洛县划定了

¹²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64，目录号1，卷宗号52，第135页。

¹³ 见上文，第三章。

¹⁴ 沃克，《亚美尼亚与卡拉巴赫》，第106页。

¹⁵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64，目录号1，卷宗号17，第13页。

¹⁶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64，目录号1，卷宗号61，第7页。

¹⁷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69，目录号1，卷宗号75，第100页。

¹⁸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64，目录号1，卷宗号6，第13页。

一条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村庄之间蜿蜒的边界线，双方政府各自的首脑米亚斯尼科夫和姆季瓦尼于1921年11月6日在第比利斯就此签署了协议。¹⁹

其他众多委员会详细研讨了三个共和国边界的细节，主要遵循的原则是每个民族的社区不应与其民族共和国分离，并且像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情况一样对阿塞拜疆游牧族群给予了一些优惠待遇。但这些决议尽管得到了三国政府的认可，却常常遭到地方当局的质疑。除了必须穿越国家边界的游牧族群外，来自一个共和国的农民常常依赖于现在边界对面的森林获取木材。小规模跨境牲畜劫掠持续到1922年。²⁰这些冲突一直持续，令高加索局以及第比利斯、埃里温与巴库的当局颇为恼怒，而持续的跨境争端也是1922年提出建立外高加索联邦的主要理由之一。

白俄罗斯的边界

划定新国家边界所应依据的原则在新成立的白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问题上得到了最广泛的讨论。确定白俄罗斯的民族身份的标准存在诸多困难，这意味着共和国边界的划定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1921年《里加条约》确立的与波兰的西部边界可以视为纯粹军事行动的结果，与乌克兰苏维埃的南部边界以及与俄罗斯苏维埃的东

¹⁹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64，目录号1，卷宗号61，第4页。

²⁰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64，目录号1，卷宗号52，第249页。

部边界直到 1926 年才由苏维埃政权最终确定。在 1917—1926 年的整个时期，白俄罗斯边界问题在国际谈判中和苏维埃与共产党机关内部都引发了激烈争议。

尼古拉斯·瓦卡尔对该地区各种相互竞争的语言、人种学和政治主张进行了最有用的总结。²¹遗憾的是，瓦卡尔得出的结论是

讨论东欧的统计数据是没用的。事实是，所涉地区在波兰人看来始终是波兰的，在立陶宛人看来是立陶宛的，在白俄罗斯人看来是白俄罗斯的，无论实际人口如何分布。²²

由于不存在历史上的白俄罗斯民族，最广泛的白俄罗斯主张是基于讲白俄罗斯语的本地人的分布。以此标准，世纪之交的人种学家之间可以说存在某种共识。1875 年，A.里季赫绘制了人种学分布原型地图，得到了 1897 年俄罗斯人口普查结果的普遍支持。尽管其他语言学家在更遥远的地方发现了白俄罗斯语的一些特征，但均基于一套不同语言标准的 1903 年卡尔斯基和杜尔诺沃的地图以及 1915 年莫斯科方言学委员会的地图，与里季赫的地图并无太大差异。1943 年德国占领者发现里季赫的人种学地图仍然是最可靠的，而 1956 年著书的瓦卡尔本人也得出结论，认为这张地图“在波兰、俄罗斯和当代白

²¹ 尼古拉斯·P·瓦卡尔，《白俄罗斯 民族的形成》（马萨诸塞州剑桥，1956 年），第 5—16 页。

²² 同上，第 11 页。

俄罗斯的主张之间取得了总体上公平的平衡”。²³在里季赫划定的边界之外还需加上普里皮亚季河沿岸的波列西耶地区，它的居民所说的方言更接近乌克兰语，但其文化被认为与白俄罗斯相关，以及布列斯特地区。在此基础上，白俄罗斯语言/人种学上可能达到的最广边界包括西部的布列斯特、比亚韦斯托克和格罗德诺、西北部的维尔诺、北部的德文斯克、波洛茨克与维捷布斯克、东部的斯摩棱斯克、东南部的戈梅利、以及南部的平斯克与图罗夫。这张地图也大致对应沙皇的莫吉廖夫省、维捷布斯克省、明斯克省、维尔纳省和格罗德诺省，1897年人口普查显示它们的人口均以白俄罗斯人为主，再加上斯摩棱斯克省的西部。然而，在所有这些地区都有相当数量的犹太人、波兰人、立陶宛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尤其是在城市中。

不过，在苏维埃下白俄罗斯边界的划定时，里季赫的研究不太可能是最具影响力的。学者 E.F.卡尔斯基的语言研究为 1903 年莫斯科方言学会采用的白俄罗斯领土权威地图做出了贡献，于 1905 年被任命为华沙大学校长，革命前还获得了多项学术奖项，声望在苏维埃下进一步提升。他是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成员、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馆长，1931 年去世前还获得了众多其他任命和荣誉。²⁴在苏维埃早期，他的大部分工作都致力于白俄罗斯人种学和语言的研究。1924 年，卡尔斯基在莫斯科出版了《俄罗斯方言学》一书，其中详细概述了白

²³ 同上，第 5—8 页。

²⁴ E.F.卡尔斯基，《白俄罗斯人——白俄罗斯民族的语言》（莫斯科，1955 年），第 1 卷，第 447—448 页。

俄罗斯语的分布边界并阐述了白俄罗斯民族身份的性质。²⁵正是卡尔斯基以及其他像他这样的学者在白俄罗斯边界的划定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1918年12月20日，在斯摩棱斯克举行的俄罗斯共产党第六次西北区域会议上，“白俄罗斯独立社会主义共和国”宣告成立，²⁶1919年1月1日，白俄罗斯工农政府在明斯克成立。根据宣言，新共和国的边界将由地区和城市苏维埃基于自决原则决定，并由定于2月初召开的白俄罗斯苏维埃代表大会确认。共和国的支持者显然更倾向于围绕包含所有人种学意义上的白俄罗斯区域划定边界。12月在斯摩棱斯克举行的将自己更名为白俄罗斯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会议，想要建立一个以明斯克、斯摩棱斯克、莫吉廖夫、维捷布斯克和格罗德诺省为基础的共和国；还要包括北部的考纳斯和维尔纳省各两个县，以及东南部切尔尼戈夫省的四个县。斯摩棱斯克省东部的四个县和维捷布斯克省的三个县被排除在外。维捷布斯克和维尔纳省的人口混杂地区将由相关共和国的特别联合委员会决定。²⁷

这一计划的全面落实因其他政治和军事考量而推迟，而且无论如何也不能自动保证获得地方苏维埃的批准。1月16日，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托阿道夫·越飞执行一个对白俄罗斯的特别任务，指示他

²⁵ E.F.卡尔斯基，《俄语方言学》（莫斯科，1924年），第79—82页。

²⁶ 《民族生活》第10期，1919年1月19日，第1页。

²⁷ 《白俄罗斯共产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决议与决定 第一卷 1918—1927》（明斯克，1973年），第19—20页。

通过地方苏维埃，进而通过白俄罗斯苏维埃代表大会，划定白俄罗斯共和国与维捷布斯克、斯摩棱斯克、明斯克，最后，如有可能，划定与莫吉廖夫省的边界。²⁸

这四个省，再加上维尔纳和格罗德诺省，（在沙俄省的行政区划框架内尽可能接近地）对应包含波列西耶的白俄罗斯人种学/语言学地图。当时，格罗德诺是瓦林卡领导的白俄罗斯民族共和国残余政府的所在地，省的大部分地区仍被奥匈帝国和德国军队占领，而维尔纳则是1918年12月29日宣告成立的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中心。因此，中央委员会的计划是，在一定的政治和军事限制范围内，尽可能把所有讲白俄罗斯语的人统一到一个共和国中，也就是说，按照人种学原则创建一个白俄罗斯共和国。

一个月后，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宣布

关于白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成员，应包括以下省份：格罗德诺、明斯克、莫吉廖夫、斯摩棱斯克、维捷布斯克和维尔纳的几个县。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决议不是最终的。边界划分、权力构建以及与邻国共和国关系的细节问题完全由第一次全白俄罗斯苏维

²⁸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17，目录号2，卷宗号8，第1页。

埃代表大会负责。²⁹

这个计划与中央委员会的计划相同，只是增加了格罗德诺和一部分维尔纳。

中央委员会给越飞的指示中要求他仅在“可能的情况下”争取莫吉廖夫省加入新共和国，再加上白俄罗斯政治局关于这些边界不是最终的说明，清楚表明，第一，共产党无法完全控制地区苏维埃，第二，白俄罗斯的民族情感没有强烈到保证所有地区都支持共和国。在白俄罗斯，布尔什维克面临着一个他们在其他地方也会遇到的问题：他们在革命中的支持主要来自工业工人阶级，到1919年，民族自决权实际上已被修改为无产阶级自决权，即通过苏维埃的自决。然而，与中亚和外高加索一样，白俄罗斯的本地人口以农民为主。因此，在争取此类决定时，布尔什维克不得不依赖农民苏维埃以及由俄罗斯人主导的工人苏维埃中的党纪。

事实证明，争取对白俄罗斯共和国的支持比中央委员会预期的还要困难。1919年2月2日全白俄罗斯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明斯克召开时，来自斯摩棱斯克和维捷布斯克省的与来自莫吉廖夫的代表一起宣布他们更愿意留在苏俄并退出了大会。实际上，第一个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发现自己的范围仅限于明斯克省的六个县。³⁰白俄

²⁹ 《民族生活》第12期，1919年2月2日，第4页。

³⁰ 瓦卡尔，第109页。

罗斯的民族理念不够强大，布尔什维克也没有足够控制力来确保人种学的白俄罗斯的统一。

然而，二月代表大会还是在扩大新国家边界方面取得了成果，投票决定与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合并，并于3月12日成立了“立陶宛白俄罗斯”共和国。这个联合共和国的构想起源不明，二手资料对此语焉不详，³¹尽管所有人都在推测布尔什维克认为其有利可图的真正原因。越飞的部分任务是促使代表大会启动“与近期建立的苏维埃共和国（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等）”的联合谈判，³²但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莫斯科提出了成立一个专门的立陶宛白俄罗斯共和国的倡议。1月初发表的《白俄罗斯临时革命工农苏维埃政府宣言》称，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是“与俄罗斯、立陶宛、乌克兰和拉脱维亚的劳动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³³但此处措辞表达的是联合行动而非统一国家。但刊登宣言的同一期《民族生活》（1919年1月5日）还报道多个决议被通过了，与明斯克省农民代表会议的决议类似，后者呼吁

在与我们的立陶宛工农兄弟联合的基础上组织地区苏维埃政权……并迅速召开白俄罗斯和立陶宛苏维埃代表大会，由它决定

³¹ 派普斯，第152—153页；卡雷尔·德恩科斯，第86页；瓦卡尔，第109页；扬·扎普鲁德尼克，《白俄罗斯历史的十字路口》（博尔德与牛津，1993年），第70页。

³²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17，目录号2，卷宗号8，第1页。

³³ 《民族生活》第9期，1919年1月5日，第1页。

苏维埃白俄罗斯和立陶宛国家秩序的所有问题。³⁴

这些决议得到了杂志编辑部的支持。在德国军队撤离明斯克后不到两周，布尔什维克要策划出一系列这样的决议并非易事。同样，如果没有布尔什维克的支持，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代表大会不太可能同时采取这个步骤，而《民族生活》也不会对党反对的情况下表态支持。显然，至少在白俄罗斯，这个构想已得到广泛讨论，而给越飞的指示和白俄罗斯共产党人中央政治局的声明都对与邻国共和国的关系问题持开放态度，表明布尔什维克乐于让代表大会自行决定这个问题。

那么，为何代表大会选择与立陶宛合并，而不是与俄罗斯、乌克兰和拉脱维亚合并，而与这三者最多只提出了建立联邦联盟的提议呢？³⁵关于这种联合的好处已有多种解释。理查德·派普斯认为，立陶宛白俄罗斯不过是布尔什维克向德军撤离后的领土“进行苏维埃扩张的工具”。³⁶瓦卡尔指出，“通过[创建立陶宛白俄罗斯]这种方式，似乎所有人都得到了满足：分离主义者、立陶宛白俄罗斯国家推动者和联邦主义者”。³⁷埃莱娜·卡雷尔·德恩科斯指出此举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因为它“把有独立倾向的立陶宛纳入了一个人口主体支持俄罗斯的国家”，同时削弱了亲波兰势力，并将立陶宛从英国在波罗的

³⁴ 《民族生活》第9期，1919年1月5日，第3页。

³⁵ 同上。

³⁶ 派普斯，第153页。

³⁷ 瓦卡尔，第109页。

海的势力范围中移除。³⁸扬·扎普鲁德尼克认为“这一策略的实施是考虑到波兰为争夺白俄罗斯和立陶宛领土而爆发的战争”。³⁹一个典型的后期苏维埃资料将这个决定归因于“需要保卫苏维埃政权免受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威胁，同时也考虑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族群在历史上形成的经济和政治共同体”。⁴⁰

这些解释都未能令人信服地说明立陶宛白俄罗斯的成因。如果让白俄罗斯和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作为独立国家存在，并与俄罗斯和乌克兰保持联邦或其他形式的联系，上述每种动机都能轻易得到满足。与这些解释不同，白俄罗斯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宣言将与立陶宛合并的唯一依据归结为两个共和国“经济利益的历史一致性”。⁴¹立陶宛人和白俄罗斯人彼此之间而非与其他苏维埃族群之间的共同点是维尔纳地区的共同领土，以及基于立陶宛大公国 500 年历史的历史文化遗产。尽管后来的苏维埃历史学家将大公国时期描述为立陶宛人对白俄罗斯人的统治和压迫时期，使白俄罗斯人因此与俄罗斯的同胞隔绝，但扎普鲁德尼克认为这个时期更可能是两个民族相互交融的和平共处时期，白俄罗斯语言和文化不仅在大公国得到蓬勃发展，甚至占主导地位。⁴²无论如何，立陶宛大公国留下了足够美好的记忆，以至于 1915 年德国占领期间白俄罗斯民族主义者重新提出了建立立

³⁸ 卡雷尔·德恩科斯，第 87 页。

³⁹ 扎普鲁德尼克，第 70 页。

⁴⁰ T.S.戈尔布诺夫等，《白俄罗斯苏维埃史》（明斯克，1961 年），第 2 卷，第 126 页。

⁴¹ 《民族生活》第 13 期，1919 年 2 月 16 日，第 2 页。

⁴² 扎普鲁德尼克，第 19 页。

陶宛白俄罗斯邦联的构想。⁴³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的历史统一性或许既对民族主义者有吸引力，也契合布尔什维克试图在一个民族意识淡薄的国家唤醒民族认同的努力，尤其是在人种学的白俄罗斯大部分地区被排除在新共和国之外后。甚至可能支持创建立陶宛白俄罗斯的那些共产党人也暗中着眼于波兰，希望用一个苏维埃版的立陶宛大公国与波兰王国的邦联来吸引波兰人。同时，合并也为坚持人种领土原则的人解决了一个问题，即人种构成复杂的维尔纳地区不必在两个民族之间划分。然而，立陶宛白俄罗斯仍然是一个谜。

维捷布斯克、斯摩棱斯克和莫吉廖夫的苏维埃拒绝加入共和国引发了一次关于自决范围和“人种学原则”的争议。2月16日，《民族生活》略显不满地报道：

在进行州自决的同时，省自决也在积极推进。因此，维捷布斯克省第四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将省从白俄罗斯的组成中分离出来。而当时，白俄罗斯政府正需要尽可能多的白俄罗斯地区革命力量来抵制波兰资产阶级的侵略政策，

因为波兰政府正要求吞并格罗德诺、维尔纳和明斯克省。⁴⁴同样，在2月27日维尔纳举行的立陶宛白俄罗斯联合会议上，白俄罗斯和立

⁴³ 瓦卡尔，第93—94页。

⁴⁴ 《民族生活》第13期，1919年2月16日，第3页。

陶宛中央执行委员会不情愿地接受了维捷布斯克、莫吉廖夫和斯摩棱斯克苏维埃的决定，同时抱怨如今加入白俄罗斯共和国的领土还不到人种学的白俄罗斯领土的一半；维捷布斯克省北部三个县（德文斯克、列日茨克、柳钦斯克）以拉脱维亚人口为主，其分离“基于人种学原则，值得欢迎”，但其他分离与此原则相悖。戈梅利地区苏维埃通过决议表示它希望并入乌克兰的切尔尼戈夫省，因为这最符合当地利益。从经济上看，切尔尼戈夫的四个北部县、明斯克的两个西南县和莫吉廖夫省的南部都围绕着戈梅利这一经济中心联合在一起。在拉达下，该地区曾被合并为一个专门的戈梅利省。《民族生活》认为，创建戈梅利省是正确的，“考虑到其经济完整性……但它纯粹的白俄罗斯人种学性质意味着它应该并入白俄罗斯……”或者，奇怪地说，可以并入俄罗斯。⁴⁵随着波兰军队攻入白俄罗斯，经济和军事原则暂时压倒了人种学原则，戈梅利省得以重建并隶属于苏俄。⁴⁶

波苏战争结束及立陶宛独立得到承认后，立陶宛白俄罗斯联盟被废除，1921年3月18日的《里加条约》进一步缩小了白俄罗斯的领土，将明斯克省西部、格罗德诺省以及维尔纳省的白俄罗斯部分割让给波兰。在苏联成立、国际局势稳定后，人种学原则再次被提及。1923年3月，白俄罗斯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将白俄罗斯苏维埃的东部边界扩展至所有白俄罗斯人占多数的地区；⁴⁷1923年11月，苏联

⁴⁵ 《民族生活》第16期，1919年3月9日，第3页。戈梅利可能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这与评论的其余基调相矛盾，但未给出解释。

⁴⁶ 《民族生活》第24期，1919年5月4日，第3页。

⁴⁷ 同上（第27条），第95页。

共产党组织局的一个委员会提议“将相邻省中在生活方式、人种学和经济方面与其相关的县并入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些是，斯摩棱斯克省的两个县、除已划给拉脱维亚的三个县外的维捷布斯克省所有县、以及戈梅利省的八个县（戈梅利剩余的五个县将划归俄罗斯的布良斯克省）。⁴⁸这原本将包含波兰以东除了斯摩棱斯克和切尔尼戈夫地区以外的所有人种学的白俄罗斯地区，但一个由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戈梅利的代表组成的另一个国家委员会“遵循人种学原则”，缩小了并入白俄罗斯的戈梅利地区范围，包括戈梅利市，但驳回了维捷布斯克省执委的反对意见，将大部分维捷布斯克划入白俄罗斯。⁴⁹1924年3月3日领土扩张完成，有争议的戈梅利领土随后于1926年被并入。尽管斯摩棱斯克市仍属于俄罗斯，但白俄罗斯共和国的领土从1921年的20000平方英里扩大到1926年的48500平方英里，人口从150万增至近500万，其中80%以上是白俄罗斯人。⁵⁰除割让给波兰的西部领土外，这些边界几乎与世纪之交卡尔斯基和里季赫等人种学家及语言学家绘制的地图完全一致。

白俄罗斯边界的演变展现了布尔什维克在努力创建一个界限分明的民族领土。短暂存在的立陶宛白俄罗斯共和国或许说明了通过历史参照强化民族认同的重要性。为了平息包括许多白俄罗斯精英的否认存在一个独特的白俄罗斯民族的批评者，就需要严格遵循人种学、

⁴⁸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 17，目录号 3，卷宗号 397，第 10 页。

⁴⁹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 17，目录号 3，卷宗号 406，第 2 页。

⁵⁰ 扎普鲁德尼克，第 78 页。

语言学和历史学指标。人种学原则是划界的核心，但它偶尔会被经济原则修正，而且受到地方苏维埃的抵制和波兰军事胜利的阻碍。前者到 1926 年被克服，后者在 1939 年才得到解决，这使得一个更大的人种学的白俄罗斯的创建推迟到了那个时候。

中亚的内部边界

在中亚，民族意识即便存在，也甚至比白俄罗斯还要薄弱。当地人口大多讲几种突厥语系的相互可理解的方言，信仰伊斯兰教，人种上源自伊朗人或突厥-蒙古人，或两者的混合。⁵¹领土自治最初以沙皇时期的突厥斯坦总督区为基础，但布尔什维克很早就认识到突厥-蒙古的吉尔吉斯人和哈萨克人（革命前的文献中，吉尔吉斯人和哈萨克人统称为吉尔吉斯人，或分为卡拉-吉尔吉斯人和吉尔吉斯-哈萨克人）、伊朗的塔吉克人、突厥的乌兹别克人之间存在明显的民族差异以及游牧族群与定居族群之间的区别。1918 年 4 月，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成立了吉尔吉斯部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最早设立的部门之一，给予了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单独的承认。⁵²在此之前，1917 年 12 月奥伦堡举行的第二次全吉尔吉斯代表大会上就已提出了吉尔吉斯人的领土自治问题。在此，民族主义的阿拉什奥尔达领导层提议所有吉尔吉斯人居住的地区都应实现自治，即：整个乌拉尔斯克、图尔盖、

⁵¹ 爱德华·丹尼斯·索科尔，《1916 年俄罗斯中亚的起义》（巴尔的摩，1954 年），第 15—17 页。

⁵²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 1318，目录号 1，卷宗号 1，第 13 页。

阿克莫林斯克和塞米巴拉金斯克州；锡尔河和里海沿岸州的北部；以及阿斯特拉罕省原布克伊汗国的领土。⁵³1917年12月，西西伯利亚苏维埃代表大会讨论了吉尔吉斯自治的想法，会议决议“在下次代表大会上审议民族自治问题，届时将有吉尔吉斯最贫困阶层的组织代表参加”。⁵⁴

1918年4月，阿拉什奥尔达领导层开始向苏维埃示好，但这些接触遭到了拒绝。然而，布尔什维克很快就采纳了吉尔吉斯自治的主张。1918年5月20日，吉尔吉斯草原特派委员A.贾恩吉林金向费尔干纳、锡尔河和七河州（卡拉-吉尔吉斯人聚居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询问：

吉尔吉斯县是否最终应并入自治的突厥斯坦，或者执行委员会是否认为整个吉尔吉斯地区的居民联合起来更为可取。在后者中——需要以何种形式，以及需要采取哪些初步措施来划分吉尔吉斯土地与其他不倾向于加入吉尔吉斯地区的族群的土地？你们是否认为有必要召开吉尔吉斯地区执行委员会代表代表大会，若有必要，何时何地召开？

⁵³ 《俄罗斯联邦的边界》（我仅能获得初步影印本，莫斯科，1995年），第59页。另见迪娜·阿曼卓洛娃，《哈萨克自治与俄罗斯》（莫斯科，1994年）。

⁵⁴ 巴蒂罗夫，第623页。

贾恩吉林金此处指的是一个包含吉尔吉斯人和哈萨克人的地区，但显然这三个州的回应是否定的，因为两周后，贾恩吉林金仅向塞米巴拉金斯克、图尔盖、阿克莫林斯克州和布克伊省（即吉尔吉斯-哈萨克地区）的苏维埃发出了召开吉尔吉斯代表大会的指令。⁵⁵

吉尔吉斯代表大会的准备因内战而中断，但1919年红军重新占领该地区后，吉尔吉斯自治问题再次被提上议程。1919年7月成立了吉尔吉斯革命委员会（Кирревком），负责临时管理乌拉尔斯克、图尔盖、阿克莫林斯克和塞米巴拉金斯克州以及一部分阿斯特拉罕省，⁵⁶而吉尔吉斯的南部边界则需与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谈判确定。与巴什基尔军事革命委员会不同，吉尔吉斯革命委员会由莫斯科任命的共产党人组成，负责人是斯大林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前副手，波兰人佩斯特科夫斯基。但吉尔吉斯族人代表不足的问题显然引起了政治局的关注，政治局在10月下令吉尔吉斯革命委员会用一位吉尔吉斯人替换俄罗斯人通加钦。⁵⁷吉尔吉斯革命委员会通常被视为莫斯科的附庸工具，⁵⁸尽管其起源如此且组成中没有吉尔吉斯族，但在后来关于自治吉尔吉斯共和国的宪法和地理管辖权的争端中，吉尔吉斯革命委员会成员却坚定地站在吉尔吉斯民族立场上。

⁵⁵ 同上，第624页。

⁵⁶ 《全俄中执委消息报》，1919年7月17日，第2页。

⁵⁷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17，目录号3，卷宗号34，第1页。

⁵⁸ 派普斯，第173页。

布尔什维克在试图将民族—领土原则应用于一个本质上是游牧族群的群体时面临着一系列特殊问题。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的忠诚即便存在也更多是部落性的，而非民族性的或宗教性的。伊斯兰教是俄罗斯征服者最近强加于该地区的信仰，在中亚定居人口中远不如在游牧人口中影响力强大；在 1917 年之前，试图在民族基础上联合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的努力仅限于少数知识分子。因此，尽管 1916 年在七河的吉尔吉斯地区爆发了针对俄罗斯人的最激烈起义，但这些事件是局部的，主要是反对俄罗斯殖民政策而不基于任何特定的民族诉求。⁵⁹与拥有繁荣的棉花出口经济和多个重要城市工业及贸易中心的突厥斯坦中部不同，草原游牧族群几乎没有可证明其拥有一个完整的自治经济领土的本土经济。俄罗斯和乌克兰殖民者占据了大片最肥沃的农业用地，这为建立一个在人种学和经济上可行的自治民族单位进一步造成了障碍。

这些情况解释了为何该地区从白军手中解放后花费了如此长的时间建立自治共和国。为增强领土的政治和经济可行性，1919 年 12 月曾短暂考虑将吉尔吉斯和巴什基尔合并，⁶⁰但这个可能性与建立鞑靼—巴什基尔共和国的设想一同因遭到了巴什基尔人的反对而被放弃。1920 年 1 月初，阿克纠宾斯克举行的吉尔吉斯代表会议投票支持建立自治的吉尔吉斯国家，1 月 27 日，政治局征求米哈伊尔·伏龙芝、突厥斯坦委员会和吉尔吉斯革命委员会的意见，询问是否应将

⁵⁹ 索科尔，第 117—125 页。

⁶⁰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 17，目录号 3，卷宗号 48，第 3 页。

突厥斯坦的吉尔吉斯部分与吉尔吉斯草原合并为一个共和国。⁶¹直到6月25日才就吉尔吉斯共和国的组成做出初步决定,⁶²又过了两个月,经过多次部门间会议才做出有效决定;即便如此,共和国的具体形式及其确切边界仍未确定。⁶³这进一步的延迟可部分归因于地区持续的军事行动,但无疑也与共和国边界的棘手争端密切相关,地区的利益冲突比外高加索以外其他任何的民族领土争端都更激烈。问题部分在于如何将“人种学原则”应用于一个游牧而且人种界定模糊的群体;但在这个例子中,更具争议的是“经济原则”,特别是关于吉尔吉斯草原紧邻的北部地区,俄罗斯苏维埃将其视为西西伯利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吉尔吉斯人坚持认为,如果没有独立的粮食供应和部分工业,他们的共和国就无法作为一个有意义的实体存在。在所有这些会议上,即便是最国际主义的布尔什维克也在维护其特定群体的利益,而非客观考虑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建设的需求。

8月9日,在关于该问题的最后几次部门间会议上,在这样一个民族混杂的地区划定一个“以一定的生活习惯和民族成分为区分”的领土的难度显露无遗。出席此次会议的21人中,18人是地区苏维埃机关的代表;卡缅斯基和苏丹-加利耶夫代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齐卢帕代表农业人民委员部, *Наркомзем*。其中,苏丹-加利耶夫显

⁶¹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17,目录号3,卷宗号59,第2页。

⁶²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1318,目录号1,卷宗号4,第88页。

⁶³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1318,目录号1,卷宗号4,第104页。

然站在吉尔吉斯民族一边，因此只有担任主席的卡缅斯基和齐卢帕可以被认为能够从整体、客观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

来自塞米巴拉金斯克州的叶尔马科夫首先发言，提议成立一个由阿斯特拉罕、乌拉尔斯克、图尔盖、阿克莫林斯克、塞米巴拉金斯克、锡尔河、里海沿岸、撒马尔罕和费尔干纳等州和省组成的吉尔吉斯共和国，也就是包括当时突厥斯坦在内的整个中亚。这个极端提议的依据是每个地区至少四分之三以上的领土被认为由吉尔吉斯人耕种，尽管吉尔吉斯人仅占总人口的近一半。叶尔马科夫承认突厥斯坦的其他突厥-鞑靼人存在问题，但他认为北部地区俄罗斯人占多数是沙皇殖民政策的结果，为维护吉尔吉斯人在人种、文化和经济上的统一性，应包括这些地区。此外，这些边境区域包含该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包括奥伦堡），特别是黑土地产粮区和粮仓，如果要使吉尔吉斯成为一个经济上可行的共和国，它们是必不可少的。

随后的讨论集中在这些北部地区以及应由哪些机关治理吉尔吉斯的问题上。与会者普遍认为突厥斯坦应保持独立，以维护乌兹别克人和萨尔特人的特性，但争议更大的是俄罗斯人占多数的地区。来自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的索科洛夫认为北部地区的经济比其他地区更发达，将其与俄罗斯分割开来会激怒俄罗斯民众并引发民族冲突。不出所料，索科洛夫得到了波利亚科夫（车里雅宾斯克）和其他俄罗斯代表的支持，而吉尔吉斯革命委员会成员库拉科夫、穆尔扎-加利耶夫和贾恩吉林金则支持叶尔马科夫，来自突厥斯坦委员会的萨法罗夫为萨尔特人和乌兹别克人据理力争。卡缅斯基坚定地以自决原则为依

据支持吉尔吉斯人对北部地区的主张，但他提出吉尔吉斯人本身尚未准备好行使自治权，该地区应暂时由吉尔吉斯革命委员会、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和突厥斯坦委员会联合管理，这个提议激怒了苏丹-加利耶夫和吉尔吉斯革命委员会。⁶⁴

这个争端展现了，在双方都能对某些民族混杂地区提出主张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主要人口会随季节变化的地区（争议最激烈的地区之一是奥伦堡附近的库斯塔奈，一年中大部分时间俄罗斯人占 57%，但夏季吉尔吉斯人占多数），纯粹基于人种学划分边界是不可能的。但在这个例子中，争议更多集中在吉尔吉斯与西伯利亚各自的经济统一性和吉尔吉斯机构的治理能力上。尽管召开了进一步的会议，最后一次甚至由列宁亲自主持，但直到 1920 年 8 月 26 日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宣告成立时，仍未达成关于边界和自治范围的最终决定。⁶⁵领土的基础是塞米巴拉金斯克、图尔盖、乌拉尔斯克和阿克莫林斯克州，不含鄂木斯克，以及阿斯特拉罕省的四个乡和一部分里海沿岸州；鄂木斯克和阿斯特拉罕的问题有待最终决定，而奥伦堡未被列入最初的法令，直到 9 月 20 日，全俄中执委才决定将奥伦堡纳入，它在 1925 年前一直是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的首都。

在这些决议中，吉尔吉斯人不仅要求获得涵盖吉尔吉斯-哈萨克人居住和耕种的大部分土地，还要求包括使其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所需的工业和自然资源，这些主张优先于中亚和西伯利亚俄罗斯人口的利

⁶⁴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 1318，目录号 1，卷宗号 4，第 65—73 页。

⁶⁵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 1318，目录号 1，卷宗号 4，第 104 页。

益。将奥伦堡和俄罗斯人占主导的北部地区划入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不仅是民族—领土原则的胜利，也是以下理论的胜利，民族解放以及使“落后”族群为社会主义做好准备，只有通过经济发展与民族自治相结合才能实现。吉尔吉斯对经济重要设施的管理权不断遭到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的质疑，在一系列关于工厂、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附近的一个大型种马场和重要的巴甫洛达尔盐湖的争端中，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都对吉尔吉斯人的能力提出了质疑。在每一个例子中，经过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积极游说，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的干预都被驳回，这些设施被委托给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管理。⁶⁶在巴甫洛达尔盐湖的例子中，苏维埃试图通过将盐湖留在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内，同时授予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对盐湖的广泛开发权，从而在维护吉尔吉斯共和国完整性与满足吉尔吉斯和西伯利亚经济需求之间取得平衡。仅巴甫洛达尔盐湖就多次被苏俄的全俄中执委和俄共（布）组织局与政治局讨论，此类经济/民族问题受到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⁶⁷

⁶⁶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 1318，目录号 1，卷宗号 7，第 88、107 页。

⁶⁷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 17，目录号 3，卷宗号 271，第 1 页；卷宗号 291，第 2、7—8 页。

将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从突厥斯坦分离出来是将中亚人口划分为不同民族群体过程中的第一步。⁶⁸在地区的穆斯林中，直接忠诚通常是部落性的，而激进知识分子大多梦想建立一个泛伊斯兰或泛突厥国家。阿拉什奥尔达是个主要例外，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吉尔吉斯人最先被认可为一个独特群体。显然，布尔什维克当时热衷于在苏维埃共和国的所有族群中培养民族认同和忠诚，而这个做法的逻辑结果是将中亚划分为不同群体，每个群体都将拥有自己的语言、领土和文化。

中亚地区使用的众多方言使通过语言界定民族困难重重，因此必须采用其他标准。这包括结合 1897 年人口普查的结果与“对每个地区的社会经济研究，以发现其语言与文化模式、经济特点及其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关系”。⁶⁹经过所有这些工作，鲁祖塔克于 1924 年 10 月向中央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关于中亚族群的报告。他首先将他们分为两大人种群体：突厥-蒙古人，包括土库曼人、乌兹别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哈萨克人，以及印欧的塔吉克人。在突厥-蒙古部落内，定居的、现在主要从事棉花种植的乌兹别克人与游牧的、以畜牧业为生的吉尔吉斯人和土库曼人之间存在明显差异。⁷⁰鲁祖塔克认为，该地区的复杂性意味着经济考量有时应优先于纯粹的民族考量。这尤其影响到撒

⁶⁸ 尽管 1924—1925 年中亚划界超出了这个论文涵盖的时期，但它与这里讨论的主题直接相关，值得简要提及。更详细叙述见亚历山大·G·帕克，《突厥斯坦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纽约，1957 年），第 88—98 页。

⁶⁹ 帕克，第 93 页。

⁷⁰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 17，目录号 2，卷宗号 153，第 123—124 页。

马尔罕地区。⁷¹但行政划分带来的一些问题可以通过成立中亚经济苏维埃来解决。⁷²

在此基础上，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24年10月24日投票决定解散布哈拉、花刺子模和突厥斯坦共和国，将其重组为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与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和吉尔吉斯自治州，同时将更多领土并入吉尔吉斯并将其更名为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⁷³

埃莱娜·卡雷尔·德恩科斯与其他几位历史学家的观点一致，认为中亚的划界是一种试图将相互关联的民族人为分割开的行为，是在中亚分而治之政策的一部分。⁷⁴她认为布尔什维克的目的是削弱泛伊斯兰和泛突厥诉求，部分原因是担心1916年起义中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展现出的团结。但没有证据证明1916年的起义曾达到超越部落层面的团结，也没有证据证明泛伊斯兰和泛突厥思想在知识界外有任何重大影响。⁷⁵此外，这种解读虽然单独看似可以解释1925年的划界，但忽略了革命后立即展开的语言和文化工作，这些工作同样适用于那些不构成威胁的小民族。尽管在中亚构建民族群体的过程带有一定人为性，但这个工作是以彻底科学的方式推进的。在中亚促进独立民族认同与布尔什维克在其他地区的政策一致，最终目标是改善中

⁷¹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17，目录号2，卷宗号153，第127页。

⁷²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17，目录号2，卷宗号153，第130页。

⁷³ 帕克，第98页。

⁷⁴ 卡雷尔·德恩科斯，《巨大的挑战》，第177—179页。

⁷⁵ 索科尔，同上，各处。

亚穆斯林的处境。当时一位苏维埃作家明确指出：“基于苏维埃原则的民族发展要求将各民族的劳动阶层统一到统一的苏维埃国家中，以加强经济和政治提升与深化民族—文化建设。”⁷⁶

移民与重新安置

在划定行政边界以尽可能创建人种学上同质的行政单位后，布尔什维克仍面对着民族成分极为复杂的地区，“本地”人口在自治州与共和国勉强占多数。即便是在各自地区要么是少数要么仅占微弱多数的巴什基尔人和鞑靼人，基于只有领土自治才能保障少数民族发展的原则，他们仍被赋予自治共和国地位。但总体政策是为非俄罗斯人获取人种上完整的地区。从俄罗斯的地理和人口情况来看，要确保特定民族群体在其自身领土内占主导，唯一的方法就是迁移部分人口。尽管布尔什维克没有采取 20 世纪 30 年代那种大规模驱逐民族群体的做法，但在此期间确实发生了重大人口流动，布尔什维克利用它来改善地区的人种平衡。内战期间及之后，人口迁徙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殖民政策的历史遗留问题，殖民政策将本地人从大量优质土地上赶走，取而代之的是俄罗斯或乌克兰的农民和哥萨克。这种政策的影响在北高加索和中亚尤为明显，直到 1916 年，作为对穆斯林起义的报复，大规模剥夺土地和殖民仍在进行；第二，人们为躲避世界大战和内战的影响而大规模迁移，特别是在亚美尼亚和乌克兰，规模较小的

⁷⁶ F.克谢诺丰托夫，引自帕克，第 90 页。

迁移发生在逃往中国的中亚叛乱分子中；第三，1921—1922年的饥荒促使人们从灾区迁移到受影响较小的地区；最后，少数民族自愿向新建立的民族“家乡”迁移。除了最后一个原因可能是布尔什维克政策的刻意结果外，其他都不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地迅速抓住了人口迁徙的民族特点并借机加强新民族领土的人种基础。这个政策虽然短期内未能明显改变人口分布，但进一步证明了维持纯粹民族认同的意愿。

从一开始，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就认为难民问题主要是民族问题。起初，难民由包括红十字会的志愿组织处理，政治主管权由军事人民委员部行使。1918年4月，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抱怨向难民组织拨款3000万卢布却不受民族人民委员部控制，并提议由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联合委员会处理此事。⁷⁷两周后，部务委员会更进一步要求将难民事务的专属管辖权从军事人民委员部转移到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个委员会。⁷⁸当这个请求被拒绝、转而决定在军事人民委员部下设专门的战俘与难民事务中央委员会时，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仍试图保持一定程度的控制，例如授予民族局在被占领地区签发文件的专属权利，随后在8月指示民族局组织对难民的地方管控、向乘坐私人车队的旅行者发放证明、登记新来者的签证。⁷⁹在民族局为其所属民族的难民组织救济、教育等工作的

⁷⁷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1318，目录号1，卷宗号1，第5页。

⁷⁸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1318，目录号1，卷宗号1，第8页。

⁷⁹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1318，目录号1，卷宗号1，第25、59、65—68页。

同时，⁸⁰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显然还希望按照民族影响难民的迁徙方向。这在以下请求中便可见端倪，1918年5月，人民委员部向战俘难民中央委员会请求开始将难民遣返回乌克兰，尽管当时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处于德国占领之下；⁸¹同年早些时候，拉脱维亚难民被遣返回里加。⁸²随着敌对行动平息，大多数战争难民可以返回原居住地，但成千上万亚美尼亚难民的问题要棘手得多，其中许多人来自边界另一侧的土耳其领土。许多人最终到了乌克兰，由亚美尼亚人民委员部的专门委员会处理，⁸³但直到1923年，苏维埃仍在寻找可建立亚美尼亚“民族中心”的闲置土地。⁸⁴

然而，直到内战结束才有可能对移民政策进行长期计划。这方面最初的试探性举措基于这样一个原则，突厥斯坦的本地人口遭受了沙皇殖民政策的不公对待。1920年6月22日政治局决定：

- (1) 使俄罗斯人、外来人和当地人所占有的土地均等；
- (2) 最坚决地打垮俄罗斯富农，迁走他们，强制他们服从；⁸⁵

⁸⁰ 《民族生活》第5期，1918年12月8日，第7页；第19期，1919年5月25日，第4页。

⁸¹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1318，目录号1，卷宗号1，第21页。

⁸² 《民族生活》第6期，1918年12月15日，第7页。

⁸³ 《民族生活》第21期，1919年4月13日，第4页。

⁸⁴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17，目录号3，卷宗号331，第1页。

⁸⁵ 列宁，第41卷，第153页（译者注：见《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俄共（布）在土耳其斯坦的任务问题的决定草案》，载于《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增订版（北京，2017年），第39卷，第147页）。

这里的重点是恢复平等和进行阶级斗争，但显然其矛头主要是针对俄罗斯定居者的。这些措施加剧了下文将要讨论的突厥斯坦政治危机，但真正推动首次人口迁移浪潮的是 1921 年饥荒造成的短期紧急情况。当务之急是将人们从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迁移到生产力更高的地区，如乌克兰，或是迁移到移民可开垦更多土地的地区，尤其是西伯利亚，这个任务由农业人民委员部（Наркомзем）监督。但 1921 年 8 月，正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代表卡尔克林通过全俄中执委敲定了一项计划，将饥荒地区人口迁移到西伯利亚、突厥斯坦、乌克兰和吉尔吉斯的部分地区。卡尔克林在民族院讨论这个提案时指出，将 200000 穆斯林重新安置到突厥斯坦将使自治共和国的穆斯林成为多数群体。⁸⁶因此，有可能利用饥荒来扭转人口失衡、使“本地人”相对俄罗斯人占优并强化自治共和国的民族认同。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对少数民族移民极为热心：1921 年 4 月，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接到请求，考虑将 150 个卡尔梅克家庭从沙皇时期被强制迁往的奥伦堡省迁回到新成立的卡尔梅克自治州，最终不仅批准了这个迁移，还提供了必要的物资和资金支持；⁸⁷三个月后又批准了另外 1330 名卡尔梅克人从北高加索的基兹利亚尔和莫兹多克迁移到卡尔梅克自治州。⁸⁸

这类自愿迁移对所有相关方都有利，但仅凭这些不足以创建单一民族地区，也无法纠正俄罗斯殖民历史造成的不公。此时布尔什维克

⁸⁶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 1318，目录号 1，卷宗号 5，第 112 页。

⁸⁷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 1318，目录号 1，卷宗号 5，第 64 页。

⁸⁸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 1318，目录号 1，卷宗号 6，第 128 页。

陷入两难：在中亚，许多当地居民因 1916 年起义遭到集体惩罚、失去土地。有人主张更进一步，认为俄罗斯殖民者耕种的所有土地在历史上都是非法掠夺的，应归还给当地民族；但另一方面，如果强行将俄罗斯农民逐出中亚，会削弱该地区大量的共产主义支持者，加剧民族紧张关系，甚至可能引发严重骚乱。

在北高加索曾有 65000 名农民和哥萨克定居者，当地民族已自行采取行动；大多数投奔白军的哥萨克的土地已被夺走，甚至内战结束后，据孙扎区执委的一名代表称，车臣人、印古什人和奥塞梯人一直在有计划地实施杀戮、抢夺牲畜和破坏庄稼，使俄罗斯居民无法生存。

⁸⁹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对俄罗斯人毫无同情；它断然禁止任何被驱逐的哥萨克返回，并坚决否决了在北高加索设立一个包含所有主要俄罗斯村庄、拥有特殊地位的专门孙扎区的提议。⁹⁰因此，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至少默许的支持下，北高加索的民族得以进行自己的人种重组。

但北高加索的民族从早期就足够强大而且组织有序，能够对地区行使政治和军事控制，克里米亚半岛和中亚的情况则相反，只有国家干预才能确保俄罗斯殖民者被驱逐。在克里米亚，1920 年 1 月，政治局曾试图确保将没收的大庄园重新分配给穆斯林人口，⁹¹但这个政

⁸⁹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 1318，目录号 1，卷宗号 7，第 23—25 页。

⁹⁰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 1318，目录号 1，卷宗号 7，第 20 页。

⁹¹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 17，目录号 3，卷宗 55，第 3 页。

策被地方当局阻挠，直到 1921 年底克里米亚实现自治并重组权力机构后才得以推行。⁹²

鉴于克里米亚的经验和中亚俄罗斯人的势力，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行事谨慎。1921 年突厥斯坦发生的政治和农业危机才促使当局决定着手驱逐俄罗斯定居者。1921 年 3 月 21 日，政治局决定“驱逐七河地区三个县（凯斯内斯克、波热瓦尔斯克、皮什涅克斯克）中最遭痛恨的定居点居民，同时整合其他定居点，在 1921 年秋季前腾出运河和水源供吉尔吉斯人使用，前提是届时已完成给被驱逐者分配土地的准备”。⁹³因此，最初仅针对少数麻烦定居点的驱逐行动的目的同时也包括安抚特定民族的不满情绪，并改善当地居民的农业处境。但 1921 年 6 月，对突厥斯坦委员会提出的推翻 1916 年殖民政策的提议，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将这个政策普遍化，原则上批准将俄罗斯富农（Кулаки）从突厥斯坦所有边境地区驱逐出去。⁹⁴与此同时，全俄中执委正组建移民与垦殖联邦委员会。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起初反对这个计划，但在自治单位的某些权利得到保障而且得到“殖民”*不是沙皇时期含义的保证后，很快表示同意。这个委员会负责协调所有与土地政策相关的事务，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通过它既游说推行积极的移民政策，也倡导在中亚发展本地定居农业。⁹⁵但关于全面驱逐俄罗

⁹²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 1318，目录号 1，卷宗号 5，第 61—62 页。

⁹³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 17，目录号 3，卷宗号 140，第 3 页。

⁹⁴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 1318，目录号 1，卷宗号 6，第 103、138 页。

* 译者注：“殖民”与“垦殖”为同一个俄语词的不同意思。

⁹⁵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 1318，目录号 1，卷宗号 6，第 95、102、108 页。

斯殖民者的最完整决议直接来自苏俄人民委员会，它于 1921 年 11 月决定

要求突厥斯坦共和国人民委员会组织近期抵达的欧洲人口迁出旧的或新建立的定居点，这些地方彻底干扰了正常畜牧经济联合的可能性并导致游牧人口的毁灭，还有那些因缺水缺地而导致定居农业人口环境中民族关系恶化的地区……[苏俄]农业人民委员部需在阿尔泰省和西伯利亚为来自突厥斯坦的定居者提供土地储备。⁹⁶

所以，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政治局、人民委员会和突厥斯坦委员会都已原则上批准了将俄罗斯定居者从之前由中亚穆斯林耕种的土地上迁走的主张。这个政策仅在七河地区具体实施，那里的俄罗斯殖民者的土地和设备被没收。⁹⁷然而，1921 年下半年，由于政治和农业方面的困难，这一进程放缓。7 月，一个从吉尔吉斯迁移 5 万户殖民者的计划被搁置，理由是日前将人们从一个未受当前饥荒影响的地区迁走毫无意义。⁹⁸尽管人民委员会关于移民的决定是在七河土地改革之后做出的，但此类措施不再被如此大力推行。当年突厥斯坦的危

⁹⁶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 1318，目录号 1，卷宗号 8，第 80 页。

⁹⁷ 帕克，第 168 页。

⁹⁸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 1318，目录号 1，卷宗号 6，第 154 页。

机让人们意识到这种公然反俄政策存在政治风险。从1922年起，人们谈论的更多是驱逐富农而非俄罗斯人，且进展缓慢。1923年，T. 里斯库洛夫声称，1921—1922年间有7000户家庭被重新安置到突厥斯坦原富农的土地上。⁹⁹尚不清楚这些土地是从真正的富农手中没收的还是从恰好居住在那里的任何俄罗斯人手中没收的，而且涉及的人数相对较少。但这个说法说明，布尔什维克准备按民族划分重新分配土地并影响地区的人口结构。

应当明确的是，这些举措与后来斯大林对小民族实施的大规模驱逐毫无共同之处。尽管强制迁移曾被计划大规模执行而且在七河实施，但它们并不具备斯大林的驱逐的残暴性质。这些迁移不被视为对某个民族的惩罚，而是被视为纠正过去的¹⁰⁰不公、从长远促进民族和平的手段。这些迁移是谨慎进行的，没有公开宣传，而斯大林则极力宣扬其迫害对象的“罪行”。

从突厥斯坦强行征用俄罗斯殖民者的土地是迄今为止解决民族问题的最激进方案，但它有其内在逻辑。列宁民族政策的核心是消除沙皇制大俄罗斯政策造成的不公与分裂，这意味着要将少数民族的利益置于俄罗斯人之上；在所有存在争议的地方，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一贯支持本地机构而非俄罗斯机构，这种态度从机构层面延伸到个人层面就是牺牲俄罗斯定居者的利益而扶持穆斯林农民。这个政策或许也有一定的经济合理性；在新经济政策下，农业举措的条件比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有利得多，将殖民者从肥沃土地上清除会鼓励穆斯林发展

⁹⁹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514页。

更具生产力（也更社会主义）的定居农业形式，同时被重新安置的俄罗斯人可以在西伯利亚开垦处女地。然而，如果环境允许实施全面的移民计划，那么与在自治共和国创建稳定的民族多数的目标相比，这些结果都只是次要的。

根据 1923 年收集并于次年发表在《民族生活》上的数据，大多数自治共和国与州都有占明显多数的名义民族（表 4.1）。尽管部分数据可能存疑，而且巴什基尔的数据因合并巴什基尔人和鞑靼人的人口而失真，但显然，在当时的情况下，众多边界委员会和移民委员会已经做了相当不错的工作，只是由于所有地区都有大量俄罗斯人存在，才使得主体民族无法占绝对主导。

表 4.1 1923 年按民族划分的自治共和国与自治州的人口

自治州与共和国	总数	名义民族		人口			
		数量	百分比	俄罗斯人		其他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	2999599	1552189 ⁱ	51.75	1030366	34.35	417001	13.90
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	458599	233000	51.00	225000	49.00	—	—
哥里自治共和国	306653	195187 ⁱⁱ	63.68	90804	29.61	20662	6.71
达吉斯坦自治共和国	1265000	1227050	97.00	25300	2.00	12650	1.00
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	4068920	2441360	60.00	1627560	40.00	—	—
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	720000	166320 ⁱⁱⁱ	23.10	180000	25.00	363680	51.90
鞑靼自治共和国	2852843	1456664	51.10	1167927	40.90	228242	8.00
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	5221963	4592767 ^{iv}	87.93	536671	10.28	94545	1.79
雅库特自治共和国	276064	242884	88.00	16563	6.00	16617	6.00
卡累利阿劳动公社	204000	86000	42.10	115000	56.10	3000	1.80
德意志劳动公社	509000	343437	67.40	108534	21.30	57579	11.30
阿迪格（切尔克斯）自治州	130000	91000	70.00	39000	30.00	—	—
沃提克自治州	740614	481399	65.00	244402	33.00	14813	2.00
卡尔梅克自治州	206447	137629	66.68	68400	33.14	418	0.18
科米自治州	211112	202707	96.06	8405	3.94	—	—
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州	178123	143539	80.46	23765	13.34	10817	6.30
卡拉恰伊-切尔克斯自治州	150000	105000	70.00	19500	13.00	25500	17.00
马里自治州	638000	440660	70.00	63800	10.00	127600	20.00
鄂温克自治州	130000	84500	65.00	45000	35.00	—	—
楚瓦什自治州	869000	773410	89.00	26070	3.00	69520	8.00
车臣自治州	460000	450000	97.80	10000	2.20	—	—

注释

- i 仅巴什基尔人和鞑靼人
- ii 奥塞梯人和印古什人
- iii 鞑靼人
- iv 所有突厥的和伊朗的族群

来源: 《民族生活》, 第1卷(6), 1924年, 第160—162页。

自治的困难

尽管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长期反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的域外文化自治理念，但他们承认民族领土的政府将对其整个民族的文化事务行使普遍管辖权，而中央机构对那些被视为属于民族—文化领域，如教育、语言和宗教的地区的少数民族采取积极态度。甚至在穆斯林人民委员部和特别是崩得的压力下，域外文化自治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认可。更有争议的是在纯粹的政治和经济事务中的独立程度。尤其棘手的是土地改革问题，由于与俄罗斯殖民者之间的历史冲突，这个问题往往带有民族色彩。但无论自治政府的正式权力如何，最普遍的问题是实际权力的行使。在这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与较新的民族自治原则存在矛盾；第一，1917年的两次革命都将越来越多的权力交到了工农兵苏维埃手中，它们行使地方和中央权力的主权在苏维埃宪法中得到了进一步保障；第二，布尔什维克坚信他们自己的党员无论从上到下都有能力实施、巩固和推进革命。自治意味着将权力交到当地民族代表手中，但大多数少数民族在党和苏维埃中的代表名额都不足。

如果地方苏维埃真正代表居住在边境的民族并且由可靠尽责的共产党人领导，这些矛盾本可以得到解决。但在俄罗斯核心地区之外，情况几乎从未如此。苏维埃的组成很大程度上以俄罗斯人为主，而且常常对当地居民表现出敌意，这敌意只能被描述为直白的种族主义，同时，民族领袖总体上缺乏经验，并通常来自两个极端，保守宗教或

激进民族主义者，这两者都与布尔什维克的期望格格不入。有两种可能解决这些矛盾的直接的行动方案摆在眼前；允许俄罗斯的苏维埃以少数民族的名义统治，由中央监督以确保对民族问题采取正确的处理方式，或者赋予民族领导层高于苏维埃的权力，无论民族主义者自身的政治倾向如何。第一种方式以突厥斯坦为代表，第二种以巴什基尔为代表；两个试验都引发了难以解决的冲突并以失败告终，这促使布尔什维克采取了一种更长期的双管齐下策略，加强中央监督的同时培养民族共产主义干部。

巴什基尔危机 1919—1920

1919年2月，在泽基·瓦利多夫的领导下，巴什基尔革命委员会成立，苏俄政府与巴什基尔军事革命委员会达成协议，授予巴什基尔军事革命委员会“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前的全部权力”。对此的唯一限制是铁路、工厂和矿山将由苏维埃中央当局直接管辖，而且由一个四个团构成的骑兵师和一个三团的步兵旅组成的巴什基尔武装力量，虽然按照民族组建，但由俄罗斯总战争基金提供资金并隶属于红军中央司令部。¹⁰⁰ 尽管工业和军事事务的从属地位严重限制了巴什基尔的主权，但巴什基尔军事革命委员会通过立即组建劳动、司法和教育人民委员部，¹⁰¹ 并通过在村庄组织贫农委员会来解决棘手的土地问题，

¹⁰⁰ 《民族生活》第18期，1919年3月23日，第1页。

¹⁰¹ 《民族生活》第18期，1919年3月23日，第4页。

明确了其行使权力的意图。¹⁰²然而，巴什基尔军事革命委员会从一开始就遭到了抵制。到1919年3月初，它不得不处理红军第一集团军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工厂没收巴什基尔公民财产和逮捕40名巴什基尔民兵的事件。巴什基尔人对这些事件的最初反应较为克制，将这些事件归因于“巴什基尔人与俄罗斯人之间的误会”。他们成立了一个由两名巴什基尔人、两名俄罗斯当局代表和一名中立人士组成的委员会，负责调查这些误解。巴什基尔内务人民委员部还接到指示，在选拔派往俄罗斯村庄和工厂的人员时要极为谨慎，起初只派遣俄罗斯人担任行政和宣传职务，以免引发骚乱。¹⁰³

尽管巴什基尔军事革命委员会采取了安抚态度，但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冲突从纯粹的地方性冲突蔓延到与斯捷尔利塔马克、乌法和奥伦堡的苏维埃与红军当局的对抗。在此期间，巴什基尔军事革命委员会几乎完全忙于处理巴什基尔人与俄罗斯人的冲突，因此无法确立其权威。最终在5月冲突达到顶峰，巴什基尔军事革命委员会成员库瓦托夫和加比杜林在奥伦堡被捕。¹⁰⁴在一系列地方抗议未能产生任何效果后，6月24日，巴什基尔军事革命委员会最终直接向军事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和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上诉，要

¹⁰²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1318，目录号3，卷宗号1，第8页。

¹⁰³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1318，目录号3，卷宗号1，第6、9页。

¹⁰⁴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1318，目录号3，卷宗号1，第29页。

求解除师长沃罗贝夫和旅长泽连科夫的职务，“因为他们对巴什基尔民众一贯的态度”。¹⁰⁵

显然，莫斯科此时才首次充分了解到局势的严重性，但从此时起，党和国家的中央机关开始密切关注巴什基尔事务，这导致 1919 年夏天巴什基尔军事革命委员会与全俄中执委达成了一项更详细的协议，并且中央进行了全面干预以增强巴什基尔人的力量。在这种支持的鼓舞下，但仍对地方苏维埃当局尤其是乌法的不妥协感到沮丧，巴什基尔军事革命委员会在 8 月采取了攻势。8 月 26 日，它发布的第 1 号命令向全体民众公开，赋予巴什基尔军事革命委员会对共和国领土的全部权力，同时向乌法省革命委员会发出最后通牒，威胁要阻止任何不直接服从巴什基尔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机构的工作。一封给中央的电报实际上宣布巴什基尔军事革命委员会已接管地区的所有权力：

根据与俄罗斯政府关于苏维埃自治的协议，巴什基尔军事革命委员会已经开始直接统治巴什基尔苏维埃共和国……巴什基尔领土上的所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包括一切中央、省和县苏维埃，都将移交给巴什基尔军事革命委员会的相应机关，但 1919 年 6 月 12 日最高经委决议第 4 点指示的除外……奥伦堡省执委已同意移交所有机构，除了据我们所知目前正在莫斯科谈话的粮食部门。然而，乌法省执委正在从中作梗——你能否发布一个明确命

¹⁰⁵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 1318，目录号 3，卷宗号 1，第 35 页。

令说明我们的协议是否对所有机关都具有约束力……如果巴什基尔军事革命委员会只是一个宣传机构，那么巴什基尔民众将会退出苏维埃政权……我们准备进行统治，而巴什基尔民众对县和省政权的命令充耳不闻。¹⁰⁶

巴什基尔军事革命委员会对自治的解读，尽管语气带有敌意，却不过是对三月协议第 13 条的实际确认，它已授予巴什基尔军事革命委员会全部权力。巴什基尔军事革命委员会在整个 9 月继续坚持自己的立场，毫不含糊地提醒乌法和斯捷尔利塔马克的当局，巴什基尔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命令优先于其他所有机关的命令，其决定只有苏俄的全俄中执委才能推翻，而且必须征得巴什基尔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同意。不仅如此，巴什基尔军事人民委员部决定在巴什基尔武装力量人数补足之前禁止马匹出口出境，可以说，这超出了其权限，违反了与苏俄在军事事务上的协议条款。¹⁰⁷莫斯科继续支持巴什基尔方面，9 月 21 日，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严厉斥责了乌法领导人叶利钦和普拉夫丁，指责他们不愿承认巴什基尔共和国的存在，同时向巴什基尔人重申布尔什维克的善意。¹⁰⁸

无论中央多么积极的干预，布尔什维克都无法阻止当地俄罗斯共产党人制造冲突。到了秋季，由于对争端可能引发的军事后果的担忧

¹⁰⁶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 1318，目录号 3，卷宗号 1，第 73 页。

¹⁰⁷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 1318，目录号 3，卷宗号 1，第 81、86 页。

¹⁰⁸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 17，目录号 2，卷宗号 23，第 1 页。

日益加剧，于是政治局指派捷尔任斯基亲自主持调查。政治局对其报告的初步回应是进一步安抚巴什基尔人，于10月23日下令将所有巴什基尔民族部队迅速调往巴什基尔。¹⁰⁹但就在一周后，巴什基尔军事革命委员会越界一步，武力占领了斯捷尔利塔马克的监狱和邮局，引发了政治局的斥责；政治局明确否决了巴什基尔军事革命委员会将巴什基尔首都迁至斯捷尔利塔马克的提议，并命令巴什基尔军事革命委员会将占领的建筑归还给斯捷尔利塔马克革命委员会。¹¹⁰

这次挫折之后，巴什基尔军事革命委员会受到了进一步挤压，特别是在俄罗斯人和鞑靼人主导的共产党加强了在该地区的组织并构成一定威胁后，巴什基尔军事革命委员会下令逮捕几名鞑靼共产党人。¹¹¹这个行为本身就足以让莫斯科相信巴什基尔军事革命委员会有可能领导反革命。1920年1月27日，托洛茨基经政治局批准，命令突厥斯坦红军指挥官伏龙芝对潜在的叛乱分子采取强硬措施。托洛茨基在电报中承认“中央苏维埃政权的各种地方代表的草率举措和声明，以及与地方苏维埃机构的实际争端”可能是引发危机的原因，但他总结道，既然事情已发展到实际军事准备阶段，就应解除巴什基尔人的武装并逮捕其领导人，同时重申苏俄政府对巴什基尔自治的持续承诺。¹¹²

¹⁰⁹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17，目录号3，卷宗号32，第2页。

¹¹⁰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17，目录号3，卷宗号34，第1页。

¹¹¹ 派普斯，第164—165页。

¹¹²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17，目录号3，卷宗号59，第2页。

尽管预期的武装叛乱并未发生，但这次行动被证明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当地共产党人开始越来越多从巴什基尔军事革命委员会手中夺取权力。4月初，有关反革命的进一步谣言导致捷尔任斯基再次展开调查，4月20日，政治局决议重组巴什基尔的政权。¹¹³这个立场的依据是斯大林提出的一项提议，它首次真正尝试以具体方式定义自治。总体而言，巴什基尔共和国与苏俄的关系将以当前乌克兰的做法为基础。更具体地说，巴什基尔军事革命委员会所有目标为平衡土地使用的措施对巴什基尔人和俄罗斯人都具有约束力；将成立包含巴什基尔和俄罗斯农民的土地委员会，所有争端首先由巴什基尔农业人民委员部解决，其次由全俄中执委的特别委员会解决；巴什基尔契卡和军事人民委员部将隶属于俄罗斯相应机构。

尽管这些措施意味着中央对巴什基尔事务的控制有所加强，但巴什基尔军事革命委员会在除军事事务外的所有领域仍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另一方面，该地区的共产党员被明确说明他们不得干预；他们被提醒，巴什基尔共和国“不是偶然的临时现象，而是苏俄有机的自治部分”，党组织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干预苏维埃机构的实际工作。巴什基尔的主要任务是将其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作为“伟大共产主义联邦”的一部分，因此当务之急是通过共产主义学校招募巴什基尔穷人加入共产党，让巴什基尔共产党人立即参与县委员会，“即使在政治上未经训练”，并在不久的将来参与州委员会，使他们能充当“州组织领导层与广大群众之间的纽带”。此外，争端中巴什基尔

¹¹³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 17，目录号 3，卷宗号 71，第 2 页。

和俄罗斯双方的一些主要人物，瓦利多夫、尤马古洛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阿尔乔姆和萨莫格列夫，将被召回莫斯科并替换。¹¹⁴

尽管这个决定确认了巴什基尔军事革命委员会在许多领域的持续权力，但重点是扩大共产党员招募和加强中央监督。1920年5月19日，全俄中执委的一个突然法令更正式地限制了自治权，将巴什基尔共和国政府的权限限制在十个人民委员部，内务、司法、教育、卫生、社会福利、农业、粮食、财政、经济和工农检察。所有人民委员都需经苏俄政府批准。¹¹⁵1919年3月成立时，巴什基尔军事革命委员会曾被授予自主组建任何行政机关而不受中央干预的权力，但根据该法令，政府的具体形式及其对中央的从属关系将由俄罗斯的全俄中执委决定。尽管巴什基尔军事革命委员会领导人认为这个决议违背了自治原则并在1920年夏季引发了激烈反抗，但它却成为了后来所有自治州与共和国与苏俄关系的范本。

1920年和1921年早些时候成立的自治共和国享有与巴什基尔几乎相同的权利，仅做了细微调整，而且其政策和人事任命明确从属于苏俄的人民委员部，而自治州除了文化和语言权利得到一般性保障外，所

¹¹⁴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17，目录号3，卷宗号68，第1—6页。

¹¹⁵ 巴塞尔，第142页。

享有的权利并不比苏俄宪法第 61 条赋予俄罗斯地区政府的权利更多。¹¹⁶因此，自治领土的全部经济和政治生活通过层级结构进行调控，地方政府受苏俄的人民委员部的一般指令限制，而且可能被其否决。在这个结构内拥有一定程度的决策权，同时在教育和文化事务上拥有更高层次的独立性，这实际上就是民族自治的含义。

突厥斯坦的冲突 1921

1921 年，突厥斯坦爆发了一个与巴什基尔危机类似但程度较轻的危机，不过这里的主要冲突方是政府内部的俄罗斯人。尽管 1918 年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在内战期间进行了积极干预，但在让穆斯林参与政府方面几乎没有进展，塔什干当局继续推行反穆斯林政策。1919 年 10 月，俄罗斯与突厥斯坦的通讯一恢复，俄罗斯政府就成立了专门的突厥斯坦事务委员会（Турккомиссия）。突厥斯坦委员会抵达塔什干后，对苏维埃机关进行了全面改革，既惹恼了特权受损的俄罗斯人，也让一直希望在莫斯科支持下自行掌权的民族共产党员不满。¹¹⁷然而，突厥斯坦委员会的干预几乎没有产生持久影响。1920 年 9 月，东方各民族巴库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对突厥斯坦穆斯林的待遇表示强烈不满，恳请季诺维也夫、列宁和托洛茨基干预。¹¹⁸

¹¹⁶ 关于自治州与共和国的宪法与法令，见巴塞尔，第 139—178 页。

¹¹⁷ 帕克，第 121 页。

¹¹⁸ 《东方各民族巴库代表大会》（伦敦，1977 年），第 62 页。

在穆斯林抱怨遭受歧视的同时，另一些人则抱怨对穆斯林过于谨慎。1921年3月，在俄罗斯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突厥斯坦委员会的俄罗斯成员格奥尔基·萨法罗夫反对布尔什维克在突厥斯坦穆斯林中淡化阶级斗争原则的政策，呼吁推进阶级分化。¹¹⁹萨法罗夫此前已因在布哈拉的“极端主义”受到中央委员会的斥责，¹²⁰但现在他在突厥斯坦采取了类似的做法。1921年晚些时候，突厥斯坦委员会内部爆发了萨法罗夫与当时在突厥斯坦任职的托姆斯基之间彻底决裂。萨法罗夫认为，在突厥斯坦的条件下，在阶级分化完成前不可能按照新经济政策的要求发展自由市场和征收实物税，而托姆斯基反对建立贫民联盟（*Kouyu*）。¹²¹托姆斯基的立场逐渐被认为是在维护俄罗斯定居者当前的特权地位，而萨法罗夫在穆斯林中获得了更多支持。因此，关于在突厥斯坦实施新经济政策的争议有可能加剧民族紧张关系。

政治局的回应是谴责双方，要求征收实物税、实施新经济政策同时建立穆斯林贫农委员会。¹²²列宁和政治局高度关注争端，并于1921年8月3日派阿道夫·越飞执行特别任务以解决地区的冲突。

政治局给越飞的这个指令反映了其对穆斯林被排除在实权外问题的担忧，同时也承认了疏远俄罗斯人口所带来的危险：“我们应当

¹¹⁹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第189—201页；帕克，第168页。

¹²⁰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17，目录号2，卷宗号56，第3页。

¹²¹ K.哈萨诺夫，《V.I.列宁与俄共（布）中央突厥斯坦局》（塔什干，1969年），第62—64页。

¹²² 列宁，第53卷，第105页。

取得平衡，反对殖民主义，但不破坏我们在共和国的支柱，俄罗斯劳动人民，他们构成了突厥斯坦红色力量的核心……”但尽管出于经济和军事原因有必要将共和国留在苏俄之内，首要任务仍是“让突厥斯坦成为一个模范的穆斯林苏维埃共和国”。共产党人应当“保持决定性影响，但不能将地方苏维埃政权变成一个沉默的工具”，并应专注于“在苏维埃基础上培养[穆斯林]劳动群众的主动性”。越飞的主要任务是在萨法罗夫和托姆斯基之间达成折中并将其提交给政治局。¹²³根据越飞的第一份报告，政治局于9月13日决定让萨法罗夫休假。¹²⁴同一天，列宁在给越飞的信中还指责托姆斯基存在“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并强调在突厥斯坦实施正确的民族政策具有国际重要性。¹²⁵

1921年10月14日，政治局再次讨论突厥斯坦的问题，决定在索科利尼科夫领导下重组突厥斯坦委员会和党的突厥斯坦局（Туркбюро），成员仅包括可靠的俄罗斯人和穆斯林。托姆斯基和萨法罗夫都被撤职。¹²⁶突厥斯坦委员会将直接控制共和国的军事、外交和对外贸易政策，其他事务应由共和国自己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治理。非俄罗斯人擅自夺取土地的行为使局势日益恶化。必须对此采取紧急措施，但同时也必须对当地民众做出让步：被没收的瓦克夫土地（清真寺拥有的土地）应归还给清真寺，应批准地方（即伊斯兰）法庭并对巴斯

¹²³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17，目录号3，卷宗号192，第5—6页。

¹²⁴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17，目录号3，卷宗号201，第2页。

¹²⁵ 列宁，第53卷，第189—190页（译者注：见《致阿·阿·越飞（1921年9月13日）》，载于《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增订版（北京，2017年），第51卷，第316页）。

¹²⁶ 哈萨诺夫，第68页。

马奇运动中的较温和分子实行大赦。¹²⁷12月，斯大林警告政治局突厥斯坦可能会成为“另一个阿尔斯特”。¹²⁸这不仅指宗派暴力，还指当时正在发生的按民族和宗教界限对省份进行的政治分割。突厥斯坦局再次重组，使其成员一半是俄罗斯人，一半是穆斯林，索科利尼科夫被授予广泛权力并被派往突厥斯坦。¹²⁹

在政治局及其特派员越飞和索科利尼科夫的频繁有力干预下，突厥斯坦逐渐恢复了平静。如果说巴什基尔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事例展示了在民族混杂地区将权力委托给一个民族主义群体所涉及的危险，那么突厥斯坦危机则展现了只有最可靠的俄罗斯共产党人才能被信任以足够尊重少数民族愿望的方式统治。在突厥斯坦，人口中的民族分裂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得到了体现。在乌克兰，情况有所不同，两个派别不以民族群体为基础，¹³⁰但效果大致相同——不可调和的态度意味着，短期内莫斯科的共产党领导层及其全权代表必须保持密切警惕和强大权威，长期内必须培养可靠的民族共产主义干部并将民族行政委托给他们。

¹²⁷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17，目录号3，卷宗号215，第2—4页。

¹²⁸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17，目录号3，卷宗号247，第1页。

¹²⁹ 同上。

¹³⁰ 关于乌克兰共产党内部冲突的详细叙述，见尤里·鲍里斯，同上，各处。

人民苏维埃共和国

除自治共和国与州外，俄罗斯还有三个地区在名义上保持独立：远东共和国以及前布哈拉汗国和希瓦汗国。1920年5月成立的远东共和国不过是为对抗日本在该地区的图谋而采取的外交权宜之计，这一点可由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21年1月12日的一个绝密决议证实：“……这一提议确保俄国共产党对远东共和国的控制，同时维持资产阶级民主和非党派的表象……”¹³¹

希瓦和布哈拉的情况更为复杂。两个汗国直到1920年一直抵抗红军的进攻。民众的敌对态度、布尔什维克缺乏群众支持基础，再加上即便是按中亚标准来看也极低的工业化水平，促使布尔什维克通过维持其形式上的独立来推动民族运动中激进派的发展。

1920年2月1日，红军最终攻占希瓦，同日成立了以古老名称花刺子模命名的人民苏维埃共和国（ХПСР）。1920年9月13日，花刺子模苏维埃与苏俄签署了联盟条约和经济协定，两个文件均作为平等国家间的协议签署，没有规定花刺子模苏维埃的国家机构从属于苏俄的对应机构。共和国领土上原属俄罗斯的国家与私人企业的全部财产均无条件移交予共和国政府。边界将由俄罗斯和希瓦代表等额组成的委员会划定，在被俄罗斯吞并的前希瓦领土上举行公民投票，另

¹³¹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17，目录号2，卷宗号55，第27页。

一个类似的联合委员会负责处理灌溉事务。两国的工人阶级和农民公民在对方领土上均享有完整的政治权利。¹³²

涉及军事和经济事务的条款更复杂。两国都承诺“防止在本国领土上形成或存在以对抗另一方或其他苏维埃共和国为目标的政府、组织、团体或个人”，并防止其他国家利用本国领土进行针对另一方的军事准备。¹³³根据条约条款，除了为消除文盲而提供的教育物资援助外，苏俄还将以设备和人员的形式为工业化发展提供大量援助。作为回报，花刺子模苏维埃仅向苏维埃共和国授予工业、采矿、农业、运输等权利，两国间的商品和原材料交换将在国家间以非营利为基础，而非通过私营商人进行。¹³⁴经济协定详细阐述了这些条款，为花刺子模苏维埃进口俄罗斯商品提供优惠条件并在运输成本方面给予优待。苏俄从这个安排中获得的利益体现在一项条款中，花刺子模人民苏维埃共和国需“将超出国内消费需求的所有原材料交由苏俄支配”。¹³⁵

1920年9月2日成立的布哈拉苏维埃共和国享有与花刺子模类似的地位，但1921年3月4日与苏俄签署的协定旨在协调两国的总体经济和贸易政策，同时承诺为布哈拉的经济提供发展提供更多援助。¹³⁶

¹³² 《苏联：联盟六十年 1922—1982 立法法案及其他文献汇编》（莫斯科，1982年），第115—118页。

¹³³ 同上，第119页。

¹³⁴ 同上，第119—120页。

¹³⁵ 同上，第120—123页。

¹³⁶ 同上，第136—139页。

布哈拉共和国宪法保障私有财产权并宣称伊斯兰教的至高地位，这在俄罗斯苏维埃的框架内很难维持。¹³⁷

独立人民共和国的存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虽然经济上无足轻重却十分棘手的地区采取的短期解决方案，而且人们对青年布哈拉和青年希瓦的领导层的发展寄予厚望。但或许是鉴于巴什基尔的经历，莫斯科密切关注着事态发展，同时还意图将其作为向更广泛穆斯林世界树立的榜样。1921年8月3日政治局给伏龙芝的指令说明了该地区的重要性：

布哈拉和希瓦被视为独立国家，整个穆斯林世界都在关注它们。我们在这两个国家的政策要定期由中央制定。一切事务都应通过我们的全权代表办理。党的决议首先应当提交给他裁决……希瓦和布哈拉的独立要得到明确遵守。我们在它们中的决定性影响要以实现民族和解与推动改革为目标，而不是推翻商人苏维埃政府，这些政府都不应被替换。我们需要表明支持尤雷涅夫和比克同志执行这个路线并维护他们的全部权威。¹³⁸

¹³⁷ 埃莱娜·卡雷尔·德恩科斯，《民族共和国丧失独立》，载于理查德·奥尔沃思（编），《中亚——俄国统治的120年》（达勒姆与伦敦，1989年），第254—265页。

¹³⁸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17，目录号3，卷宗号192，第5页。

因此，在保存独立地位的同时，布尔什维克通过一名全权代表施加其“决定性影响”，该代表对当地共产党人的权威的目标是防止巴什基尔灾难重演。

独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1921年4月，斯大林称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的关系将以当前乌克兰的做法为基础，这个说法极大简化了局势。但苏维埃共和国的独立不比在俄罗斯内享有的自治多出多少。当时的巴什基尔和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在行使权力时几乎不受莫斯科干预，但却受到地方苏维埃机关的阻挠。五个独立共和国并不存在完全相同形式的地方冲突，但都受到中央的密切监督。

形式上，五个共和国各自拥有独立的政府结构，仅通过一系列条约与苏俄相连。实际上，苏俄的人民委员部越权向独立共和国发布指令。共产党领导层对其在民族政府中的成员实施密切控制。乌克兰政府首脑克里斯蒂安·拉柯夫斯基是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经常出席其全体会议和莫斯科的政治局的一些会议，乌克兰政府的核心政策就是在这些会议上制定的。在外高加索，三个政府的活动由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领导的高加索局监督。高加索局牢牢掌握着外高加索的权力，但与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相比，受到的莫斯科监督较少。

除了形式上的地位外，独立共和国与自治共和国之间最明显的区别是前者拥有自己的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外交机关。1922年初，当决

定由俄罗斯代表所有六个共和国出席热那亚会议时，这个重要的主权象征受到了削弱。这一对独立地位的侵犯引发了乌克兰人的强烈不满。

西方文献对独立共和国与苏俄的关系已有大量研究，需要分别研究才能全面探讨这个问题。1922年，随着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发生一系列争端，关于苏维埃共和国之间关系的争议达到顶峰，最终形成了将六个共和国联合为一个整体的方案。因此，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将留到第七章。

经济发展

布尔什维克对少数民族态度的核心是他们经济和文化的“落后性”。作为解决这个问题的长期措施之一，苏维埃政权在非俄罗斯地区启动了大规模工业发展计划，包括将整个企业从俄罗斯中部地区迁移过去。因此，根据苏维埃资料，1918—1923年间在中亚采取了以下措施：1918年，为戈洛德内草原的建设工程拨款5000万卢布，为突厥斯坦的棉花产业恢复拨款5.02亿卢布；1922年，将一家文具厂、一家纺织厂、一家皮革厂和一家肥皂厂迁至布哈拉，将一家文具厂和一家纤维素厂迁至突厥斯坦；还将莫斯科地区的两家大工厂，*东方曙光*和*红色东方*也迁至突厥斯坦；1918年塔什干新建了一座苏打厂，1919年又建成了一座金属加工厂、一座机械运输厂和一座铸造厂；布哈拉、恰尔朱等地的旧工厂得到了翻新；1921—1922年间，希尔科夫开始

建设一座水泥厂、费尔干纳建设一座纺织厂、列宁纳巴德建设一座缫丝厂、阿什哈巴德建设一座纺织厂等。作为全俄电气化计划的一部分，1923年费尔干纳的一座发电站投入使用，塔什干附近开始建设一座水电站。¹³⁹这些项目与这一时期苏俄的总体工业投资水平是不相称的。

然而，在苏维埃政权初期，工业发展的总体速度仍然缓慢。1923年，在布尔什维克民族政策发展的关键阶段，工业发展成为党的政策的主要主题之一，工作开始将工厂迁移到俄罗斯中部以外更靠近储量丰富的自然资源的地方。¹⁴⁰

表 4.2 显示了这个政策的效果。这些数据包括“农业经济”中的工人（工资收入者），这往往会夸大当地民族的比例，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过度。尽管除乌克兰外工人总数仍然较少，但革命前几乎在所有地方都占主导的俄罗斯人的比例下降，当地民族比例上升，这是一个明显的成就。

表 4.2 苏联的每个共和国和自治州的工人的民族 1926 年

共和国或州	工人总数	属于该民族的百分比		
		名义的	俄罗斯人	其他
乌克兰苏维埃	1071856	54.64	29.17	16.19
白俄罗斯苏维埃	121913	58.86	13.33	27.81
阿塞拜疆苏维埃	149211	42.58	22.50	34.02
亚美尼亚苏维埃	28295	80.88	1.42	17.70
乌兹别克苏维埃	136921	50.37	17.50	32.13

¹³⁹ 阿米诺夫和巴巴霍贾耶夫，第 138—139 页。

¹⁴⁰ 见下文，第七章。

共和国或州	工人总数	属于该民族的百分比		
		名义的	俄罗斯人	其他
塔吉克斯坦	20350	63.47	1.28	35.28
土库曼苏维埃	25933	26.61	35.06	38.33
巴什基尔	69196	17.77	58.83	23.40
布里亚特-蒙古	10857	16.28	73.11	10.61
达吉斯坦	42180	72.84	17.21	9.93
哈萨克	151987	39.43	34.25	26.32
卡累利阿	23222	34.81	61.53	3.66
吉尔吉斯	16453	26.49	24.88	48.63
克里米亚（鞑靼）	49154	13.26	55.93	31.01
伏尔加德意志	24091	58.24	27.89	13.87
鞑靼	34909	22.65	74.64	2.71
楚瓦什	4748	17.84	75.36	6.80
雅库特	6409	70.92	21.30	7.78

来源：《联共（布）的民族政策》（莫斯科，1930年），第126—128页。

对边境地区的经济投资与对经济一切方面日益加强的中央控制同步进行。然而，根据1921年4月26日人民委员会的两个法令，卡累利阿劳动公社在与苏俄的经济关系中享有特殊地位。卡累利阿公社将成立一个经济苏维埃，负责统计从苏俄收到的和向其提供的产品总值，以求实现两者的平衡。除此之外，卡累利阿的预算在1924年前独立于苏俄，生产盈余将专门用于满足当地需求。卡累利阿被鼓励向国外出口木材并有权保留25%的出口收入用于开展自己的对外贸易。苏俄将通过资助建设一座造纸厂、两座赛璐珞厂、一座木制品工厂和一座发电站，以及资助地区的矿产资源勘探工作，来帮助卡累利阿实现工业化。¹⁴¹1922年，人民委员会确认了这个安排并批准再以分期支

¹⁴¹ 阿法纳西耶娃，第63—65页。

付形式拨款 900 亿卢布。¹⁴²因此，卡累利阿，仅被赋予较次要的“公社”地位的自治单位，却在经济上享有比其他任何自治领土都更大的独立性。共产党领导机关或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中没有任何关于卡累利阿的记载，说明它受到的政治干预也比其他地方少。

卡累利阿之所以享有这种独特地位，是因为它由一批可靠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他们在芬兰遭到镇压后逃亡至此，由芬兰老布尔什维克久林出色地领导。久林在任的时间远超其他任何民族领导人，直到 1935 年他也成为斯大林的清洗的受害者。但在其他边境地区，布尔什维克缺乏这样的干部，于是转而采取一项强化政策，吸引、招募和培训民族知识分子、农民和工人，以此为少数民族提供政治领导。

民族自治究竟包含哪些内容必须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布尔什维克对待民族边界的做法展现了他们确实在认真推动民族建构，但促进民族自治政府的努力却因自治机构与其他以俄罗斯人为主的权力机关之间的冲突而受挫。面对巴什基尔和突厥斯坦的危机，布尔什维克不得不从广泛的民族政治自治中退一步，转而寻找其他促进民族发展的方式。发展经济和培养民族无产阶级是向前迈出的一步，在长期来看至

¹⁴² 同上，第 75 页。

关重要。短期内，主要优先事项是招募和培养非俄罗斯干部加入共产党与苏维埃，同时通过教育系统和语言权利促进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发展。

第5章 “本土化”——民族共产主义领导层

只要地区层面的政治和行政领导权仍然掌握在麻木不仁的俄罗斯人手中，旨在鼓励民族自我意识和促进文化发展的民族领土单位的存在就不可能在没有难以忍受的摩擦的情况下持续下去。在俄罗斯中部外，布尔什维克总体上是软弱的，他们得到的支持主要来自俄罗斯或俄罗斯化的工人和知识分子。苏维埃也以俄罗斯无产阶级为基础，边疆的革命军事力量首先由俄国军队的撤退部队组成。突厥斯坦的事件说明，当巴什基尔军事革命委员会的灾难使人们不可能简单地将权力交到民族主义者手中的时候，将权力交到对本土要求漠不关心的俄罗斯人手中会遇到问题。如第二章所指出，招募“当地人”加入共产党和苏维埃机构的必要性成为布尔什维克关于民族问题的声明中反复出现的主题，特别是1919年后。面对寻找本土干部的迫切需要，布尔什维克将注意力转向了把支持苏维埃政权和土地改革原则与民族主义纲领结合起来的政党和个人。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纲领中的许多民族主义内容远非被视为障碍，而是与布尔什维克和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领导层自己追求的方向相吻合，“民族共产主义者”自己也开始对国家政策施加很大的影响。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犹太人民委员部（*Евком*）和穆斯林人民委员部在让非布尔什维克民族主义者参与边境地区的管理方面采取了很多的主动行动，但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在这

方面给予了他们相当大的支持。犹太社会主义政党首先表示愿意与布尔什维克充分合作并自愿走向完全统一。后来，中央委员会在乌克兰的政党斗争派^{*}中看到了解决他们在该地区遇到的许多问题的可能办法，并积极寻求将他们带入乌克兰苏维埃政府，然后进入共产党。在中亚，那里的穆斯林共产党人短缺最为明显，没有这样一个政党可以轻易转变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民族主义派别，但对干部的需求导致了一种特殊的扎吉德主义者、泛伊斯兰民族主义者的参与，在中央穆斯林人民委员部以及中亚与伏尔加地区的党与苏维埃机关中担任重大职务。

招募民族主义政党和个人加入共产主义充满风险，并导致了許多冲突。长远来看，布尔什维克希望民族领土由新一代的民族主义共产党人统治，并且非领土民族由他们维护，为此布尔什维克采取了积极措施，包括建立共产主义学校和大学以培养年轻的共产党员队伍。

^{*} 译者注：斗争派是乌克兰社会革命党的左派于1918年5月建立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因该党中央机关报《斗争报》而得名。1919年3月，该党采用了乌克兰社会革命共产党（斗争派）这一名称，8月改称为乌克兰共产党（斗争派）。斗争派依靠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并寻求中农的支持。该党领导人有格·费·格林科、瓦·米·布拉基特内、亚·雅·舒姆斯基等。

列宁和共产党对斗争派采取灵活的策略，力求把追随斗争派的一部分劳动农民和斗争派中的优秀分子争取过来，为取消斗争派这一政党创造条件。

斗争派曾申请加入共产国际，并要求承认他们是乌克兰主要的共产党。1920年2月2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一项专门决定，建议斗争派解散自己的党，加入乌克兰共产党（布）。经过斗争派中央肉部的激烈斗争，1920年3月20日全乌克兰斗争派代表会议通过了斗争派自行解散并与乌克兰共产党（布）合并的决议。斗争派成员以个别履行手续的方式被吸收进乌克兰共产党（布）。见《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增订版（北京，2017年），第38卷，注释26，第390页。

犹太社会主义政党

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犹太人提出了与其他少数民族不同的问题。*与苏维埃领土上任何其他拥有大量人数的少数民族不同，俄罗斯共产党中犹太人的比例高于总人口的比例，并且包括许多共产党的领导人物。犹太人不能被归类为完全或主要属于一个社会阶级，而是一个包含了富商、专业人士、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以及更多的熟练工匠、工人和文盲农民的阶层。犹太政党比任何其他少数民族都更加发达和多样化，具有独特的阶级特征。其中最多的成员属于犹太复国主义政党（1917年前有300000人），但在1917年革命后，这些政党被边缘化和镇压。

革命后最重要的是左派的三个主要政党：崩得，1917年12月有33700名成员，在俄国的社会民主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与波兰和奥匈帝国的姊妹政党一起拥护民族文化自治原则。联合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通常被称为“*Farainigte*”（联合），成立于1917年5月，由社会主义—锡安主义领土主义者和犹太社会主义工党合并而成。它将民族文化自治与对犹太家园的矛盾态度相结合，有13000名成员。锡安工人党在1907年有18000名党员，是一个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结合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两种意识形态传统之间

* 尽管不止斯大林一人否认犹太人是一个民族，但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建立犹太人民委员部以及布尔什维克随后对犹太问题的处理，包括试图建立犹太民族领土等措施之中，都将犹太人等同于其他非领土少数民族。因此，我对犹太人是否构成一个民族的问题暂不表态，在苏维埃语境中讨论犹太人时使用“少数民族”一词。对比斯大林，第2卷，第297页。

的紧张关系反映在党内派系的尖锐分化和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态度迅速转变上。¹

虽然犹太人集中在“定居区”^{*}，并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某些地区占人口的大多数，但他们并不像俄罗斯的大多数少数民族那样构成一个领土单位。此外，犹太人比其他民族遭受更严重的民族压迫。除了沙皇俄罗斯化政策强加的普遍阻碍外，犹太人在居住、教育和就业方面还面临特别的限制，并定期遭受半授权的大屠杀。虽然二月革命后对犹太人的法律阻碍被消除，但在乌克兰历代政权的领导下，大屠杀的强度越来越大。据估计，从二月革命到内战结束，“仅在乌克兰就有超过 200000 名犹太人被屠杀，超过 300000 名儿童成为孤儿，超过 700000 人无家可归”。²

因此犹太人在政治和文化上比任何其他少数民族都更加发达，但遭受的压迫和暴力程度更高，而且没有一个犹太苏维埃领土可以让大量的犹太人才发挥作用。所以布尔什维克对犹太人的态度是矛盾的。犹太政治组织的力量对布尔什维克的霸权构成了威胁，当时他们迫切希望在其他少数民族中培养政治传统。1917 年前的犹太布尔什维克是“同化”或“俄罗斯化”的犹太人，他们对具体的犹太事务兴趣不大，但可以用来宣传布尔什维克作为犹太社会主义者天然政党的形象。尽管如此，布尔什维克对犹太人态度的最重要因素是对 1917 年至

¹ 诺拉·莱文，《1917 年以来苏联境内的犹太人 生存的悖论》（伦敦，1990 年），第 1—7 页。

^{*} 译者注：定居区是沙俄时期对犹太人定居区域的限制政策。

² C. 艾布拉姆斯基，《比罗比詹计划》，载于 L. 科汉（编），《1917 年以来苏维埃俄罗斯内的犹太人》（牛津，1978 年），第 66 页。

1920 年间乌克兰犹太人所遭受的苦难的巨大同情，这促使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开设了犹太人民委员部（Евком）作为其最早也是最重要的部门之一，并投入了大量的关注和资源来处理犹太事务和打击反犹太主义。³同样的因素——大屠杀——与犹太人中社会主义传统的力量结合，促使犹太人广泛自发地离开自己的政党，转向布尔什维克。将社会与国家议程结合起来的犹太人的涌入为布尔什维克提供了他们第一次民族共产主义实验，无论他们感兴趣与否。鉴于没有犹太领土，这些犹太人主要受雇于政治化犹太人唯一适合的领域——促进犹太文化和教育。大多数新的犹太共产党人来自崩得，在俄罗斯政党中拥护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域外民族文化原则方面处于领先。意料之中地，这些人在文化领域担任负责任职位有助于布尔什维克制定整体的鼓励民族文化认同的国家政策。同时，他们加入俄罗斯共产党的容易也为布尔什维克在前俄罗斯帝国欠发达地区培养民族共产主义干部的政策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犹太社会主义政党的解体及其最终并入俄罗斯共产党的过程已经由兹维·吉特尔曼详细论述。⁴然而，这部作品完全是从犹太政党的角度写成的，关于布尔什维克对崩得的政策几乎没有任何作品。这种方法导致吉特尔曼和许多其他作家一样，将苏维埃政权初期崩得的历史视为其与共产党犹太部（Евсекции）的冲突之一，在其中崩得被打得不得不屈服。虽然共产党犹太部毫无疑问试图将自己确立为俄罗

³ 见季曼施泰因在《民族生活》第4期，1918年12月1日上的文章，第3页。

⁴ 兹维·Y·吉特尔曼，《犹太民族性与苏联政治》（普林斯顿，1972年）。

斯犹太人的主要政治机关，但它通常主要将攻击集中在更保守的、正统的和锡安主义的犹太机构上，同时对社会主义政党表现出和解态度。与此同时犹太人重新转向共产主义首先是一种自卫反应，因为布尔什维克和红军被证明是抵御大屠杀的唯一有效防御手段，后来随着犹太人争先恐后拿起武器保卫反对白军和波兰人的革命，成为一个更积极的运动。早在崩得正式解散前，成千上万的组织的个别成员有时甚至是整个分支机构都投身于布尔什维克，并受到共产党的热情欢迎。那些留下来的人可能不愿意投靠布尔什维克，但他们脚下的土地被分割出来更多是因为布尔什维克保卫犹太人的举措，而非他们对其他犹太组织的攻击。

从一开始，布尔什维克就展现了他们愿意与非党派犹太人合作。当1918年初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组建犹太人民委员部时，在其由六名成员组成的部务委员会中，只有季曼施泰因是资深布尔什维克，其他人仍然是或者最近刚刚成为崩得或锡安工人党的成员。⁵在第一个共产党犹太部，“Евсекции”，成立后不久，季曼施泰因在共产党犹太部和犹太人民委员部的主持下召开了一次犹太人会议，到会的近一半代表是非布尔什维克，其中大多数是意第绪语教育家。在表示他们愿意与某些非共产主义犹太人合作的同时，在同一次会议上，布尔什维克代表投票决定“采取必要步骤有计划地清算犹太人的所有资产阶级机构”。⁶犹太人民委员部从1918年11月的右翼犹太战士联盟开

⁵ 艾布拉姆斯基，载于科汉（编），同上，第66页。

⁶ 莱文，第55页。

始第一次这样做。⁷1919年3月11日犹太人民委员部的共产主义派系发出了对不受欢迎的犹太组织进行更全面攻击的信号，决议清算犹太公社和莫斯科的所有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并将所有犹太社群置于一个政治委员的控制之下。⁸

然而，这种态度并没有延伸到社会主义犹太政党。崩得和锡安工人党继续公开运作，尽管犹太人民委员部努力在它们威胁到它自身时限制他们的影响力。⁹这种宽容也不意味着意识形态斗争有任何放松。在《民族生活》最早的一期中，季曼施泰因在单独的文章中无情攻击崩得的文化教育自治政策和他们对乌克兰督政府的态度。¹⁰这种宽容的双重政策加上对崩得的批评，在1919年10月和11月俄共政治局的两个决议中得到了最清楚的说明，当时崩得对国家资助的请求得到满足，同时崩得中央委员会被要求公开与某些被视为反革命的崩得领导人断绝关系，并以被驱逐者名单的形式提供他们罪行的证据。¹¹1920年5月，当政治局授权向崩得、联合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和锡安工人党的报纸“以非常温和的措施”供应纸张时，也表现出了类似的矛盾。¹²总的来说，布尔什维克对左翼犹太政党的态度与对俄罗斯社会主义政党和更右翼的犹太政党的态度相比是极其有利于它们的。因此就在

⁷ 《民族生活》，第2期，1918年11月17日，第7页。

⁸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1318，目录号1，卷宗号4，第8页。

⁹ 《民族生活》，第2期，1918年11月17日，第7页。

¹⁰ 《民族生活》，第8期，1918年12月29日，第2—3页。

¹¹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17，目录号3，卷宗号34，第1页；卷宗号37，第2页。

¹²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17，目录号3，卷宗号78，第1页。

崩得与俄罗斯共产党就联合组织谈判的同时，布尔什维克在1920年5月大规模逮捕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代表后，准备宣传攻击犹太复国主义。¹³

与其他政党相比，布尔什维克对崩得的有利态度很大程度上被西方犹太历史学家忽视了，他们专注于乌克兰的大屠杀，将其视为犹太人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态度的决定性因素。¹⁴当然，有足够传闻证据证明犹太社区只有在红军的羽翼下才能找到安全，并且有很多犹太组织动员其成员加入红军队伍的例子，以此作为保卫犹太村庄免受白军侵害的一种方式。¹⁵但这还不足以解释崩得的瓦解和大量犹太人投靠布尔什维克的原因。

从1918年12月布尔什维克重新占领白俄罗斯开始，崩得一共产主义者的小团体就开始在该地区组织起来，1919年1月，这些团体的领导人向白俄罗斯共产党申请允许组织一个犹太共产主义组织。尽管白俄罗斯共产党犹太部反对，他们认为有白俄罗斯共产党犹太部已经足够，但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还是批准了这个请求并于月底宣布成立犹太共产党，并授予其对犹太共产主义报纸《星》的控制权。¹⁶虽然这个党的寿命很短，但它是第一个在非领土民族基础上成立的

¹³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17，目录号3，卷宗号75，第2—3页。

¹⁴ S.W.巴伦，《沙皇与苏维埃下的俄国犹太人》（纽约，1987年），第181—186页；乔纳森·弗兰克尔，《犹太自治主义的困境：乌克兰案例1917—1920》，载于波季奇内伊、阿斯特（编），《乌犹关系》（埃德蒙顿，1980年），第274页；莱文，第43页；吉特尔曼，第161—165页。

¹⁵ 《民族生活》，第24期，1919年5月4日，第4页；第25期，1919年5月11日，第4页；第26期，1919年5月18日，第4页。

¹⁶ 《民族生活》，第12期，1919年2月2日，第6页；吉特尔曼，第177—179页。

共产党，而且主要是在崩得分子自己的倡议下产生的。类似的亲布尔什维克倾向在乌克兰崩得也表现出来。1919年2月20日，基辅崩得会议分裂了城市组织，左派和中间派组成了共产主义崩得或“康崩得”。¹⁷不久之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崩得也发生了类似分裂，3月那里成立了一个犹太共产主义联盟，¹⁸其他当地组织也纷纷效仿。

然而，乌克兰康崩得加入乌克兰共产党被拒绝，其继任者康法班德加入乌克兰共产党也被拒绝，该党于1919年5月由康崩得与联合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左派合并而成。一年后，俄罗斯政治局也明确表示它不准备接受锡安工人党作为整体加入共产党。¹⁹在这个阶段布尔什维克更愿意鼓励个人入党，同时在国家机关内提拔其他犹太政党的左派领导成员。这个政策带来了相当大的风险，因为犹太人民委员部和其他组织的高级任命被授予那些最好情况下在犹太问题上持有非布尔什维克观点、最坏情况下根本无法依赖的个人。伊利亚·多布科夫斯基，一名左社革，在犹太人民委员部成立之初被任命为副犹太事务人民委员，但在1918年3月因在一本关于摩西·赫斯的书中表达的观点以及被指控为沙皇秘密警察担任煽动者而被辞退。²⁰他的继任者布赫宾德任职5个月后，于1919年9月因政治信仰的“民族主义背离”而被解雇。²¹1918年8月犹太人民委员部聘请了著名的犹太文

¹⁷ 吉特尔曼，第172—174页。

¹⁸ 《民族生活》，第17期，1919年3月16日，第4页。

¹⁹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17，目录号3，卷宗号78，第1页。

²⁰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1318，目录号1，卷宗号1，第10页。

²¹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1318，目录号1，卷宗号1，第74页。

学评论家 S. 尼日尔编辑周刊《文化与教育》，但仅出版一期后就被辞退。米哈伊尔·阿古尔斯基后来反思了这一点：“有了像尼日尔这样‘忠诚’的文化工作者，我们永远无法创造革命的无产阶级文化。第一个数字是不可能的。它重新诠释了维尔纳‘犹太世界’的文化思想并带有宗教蒙昧主义的味道。”²²在 1921 年重新登记政党期间，新犹太成员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大概是因为表现出类似的倾向。但这些经历并没有阻止犹太人民委员部中非共产主义犹太人的晋升，当康法班德的成员在 1919 年早些时候被接纳并主导新的犹太部时，这个政策从俄罗斯扩展到乌克兰共产党。

犹太人离开崩得和其他政党转而加入布尔什维克的确切程度还存在一些疑问。1925 年，31200 名共产党犹太成员中有 2799 人承认自己是崩得的前党员，比起 1917 年崩得 33000 的总人数，这些数字是微不足道的。但到了 1925 年，犹太共产党员不愿承认自己是前崩得成员。此外，1921 年，大量以前的崩得成员被驱逐。即便如此，承认自己前崩得成员身份的共产党员占共产党犹太成员的 9%，我们知道相当多的锡安工人党和联合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成员也入了党。²³因此来自其他党派的犹太人开始在共产党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的人数在最高层更占主导。1917 年 4 月当选的崩得中央委员会 15 名成

²² 兹维·哈列维，《沙皇主义和共产主义下的犹太学校》（纽约，1976 年），第 161 页。

²³ 吉特尔曼，第 218—223 页。

员中至少有 7 人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其中两人，莫伊什·拉夫斯和亚历山大·赫梅里，到 1920 年 7 月成为共产党犹太部中央局成员。²⁴

许多主要的崩得成员在加入共产党后，即使不总有着较长的职业生涯，也取得了成功，但仅限于特定的犹太地区。埃斯特·弗鲁姆金是崩得领导人中最不愿意清算她政党的人，在 1930 年前一直是共产党犹太部中央局成员，也是苏共中央政治教育主要管理部门犹太部领导人。她编辑了列宁的意第绪语作品集并于 1925 年成为西方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大学校长。²⁵赫梅里是共产党犹太部的主要成员，并且直到成为大清洗的早期受害者前一直是犹太人农业定殖化的主要倡导者。²⁶拉夫斯在犹太人民委员部和共产党犹太部中颇具影响力，后来在大清洗中去世。兹维·吉特尔曼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没有前崩得主义者和联合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共产党犹太部将完全无法完成它为自己设定的任务。²⁷前崩得成员不仅在犹太组织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弗鲁姆金娜还领导了教育人民委员部少数民族学前教育部门。

在与崩得、联合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和锡安工人党结盟之初，布尔什维克遵循与社会主义政党特别是左社革合作的总体政策。但对犹太社会主义政党的和解态度持续的时间要长得多，部分原因是面对大屠杀需要团结，部分原因是没有愿意为犹太人民委员部和共产党犹太

²⁴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 17，目录号 2，卷宗号 32，第 2 页；吉特尔曼，第 225 页。

²⁵ 《俄国与苏联历史现代百科全书》（美国国际大学出版社，1979 年），第 12 卷，第 37 页。

²⁶ 吉特尔曼，第 513—515 页。

²⁷ 同上，第 230 页。

部工作的犹太布尔什维克党员，但主要是因为犹太社会主义者愿意支持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与犹太社会主义政党的关系似乎并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的结果，但它的成功可能已经鼓舞了布尔什维克与其他左翼民族主义者打交道。由于没有领土可以治理，犹太民族共产党人没有建立任何重要的权力基础。相反，他们参与文化工作和众多犹太组织。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能以更通俗和意第绪语的形式推广犹太文化，因此能为犹太人行使某种形式的文化自主权。在早期的民族共产主义者中，犹太人在重要职位上待的时间最长。大多数新的犹太民族共产党人的背景都是曾在拥护文化自治原则的政党中待过，他们最持久的贡献是将对待民族文化的不同方法带入共产党。

乌克兰斗争派

在 1918 年苏维埃在乌克兰执政的第一个时期，布尔什维克的实力不足以赢得农村的广泛支持，也无法控制红军依靠而又毫无纪律的势力，他们的行为表现出反乌克兰的倾向。²⁸这种弱点不仅仅是规模问题，还在于布尔什维克组织主要集中在俄罗斯或俄罗斯化的工人中，缺乏驻乌克兰并熟悉该国的领导干部，以及乌克兰共产党人之间的严重分裂。随着红军在 1919 年初重新占领乌克兰，乌克兰共产党的弱点因新的和不可靠的成员的涌入而加剧：

²⁸ 派普斯，第 126—127 页。

根本没有足够的苏维埃工人来在军队赢得的领土上组织权力。游击队领导人、前察里津匪帮成员、自封的“共产主义者”、由彼得留拉分子转为布尔什维克的人——都被迫在新政府中担任地方官员。²⁹

此外，资深布尔什维克继续沉迷于派系内斗。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直接反应是采取措施进一步使乌克兰党服从并确保它坚持莫斯科的路线。拉柯夫斯基被带来接替皮达可夫担任苏维埃政府首脑，军事指挥部进行了重组，并委托拉柯夫斯基、契切林、卡缅斯基和曼努伊尔斯基组成的高级别代表团整理乌克兰党。³⁰

拉柯夫斯基新政府的优先事项是实现党内团结、稳定军事局势并推行广泛有效的土地改革，在莫斯科的密切监督下，拉柯夫斯基在这些任务中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是，布尔什维克仍然面临着能够有效管理乌克兰的可靠干部的严重短缺。具体来说，他们拥有的干部仍然不能被信任，无法对乌克兰人的民族感情表现出必要的理解和敏感性，而拉柯夫斯基的团队仍然低估了这一点。犹太组织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努力，这解决了一部分人口的问题，但布尔什维克仍然有着缺乏在乌克兰农村的基础的不利条件。这不仅仅是赢得民众支持的问题

²⁹ 亚当斯，第 115 页。

³⁰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 17，目录号 2，卷宗号 8，第 1 页。

题；随着布尔什维克的民族政策越来越朝鼓励和加强民族自我认同的方向发展，本土干部问题变得越来越紧迫。

到目前为止，乌克兰最重要的左派组织是乌克兰社会革命党，它与乌克兰农民联盟处于一个阵营中，在俄罗斯制宪会议选举中赢得了乌克兰 60%以上的选票。³¹ 尽管组织薄弱，但他们呼吁完全征用大地主和向农民免费分配土地，加上对乌克兰自治的支持，他们赢得了广泛支持。农民日益激进的情绪和对依次接替的政权的幻灭将党进一步推向左派，最终左翼于 1918 年 5 月掌权并以他们的报纸《斗争报》（*Борьба*）为名成立了一个名为斗争派的新政党。内战意味着斗争派在这一年剩下的时间里将大部分注意力都投入到武装斗争上，在其中，他们与哥萨克军事领导人格里戈列夫关系密切。然而，从 1919 年 2 月红军占领基辅开始，斗争派同乌克兰共产党和俄罗斯共产党官方之间的关系在布尔什维克对乌克兰的政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布尔什维克对斗争派的态度随情况和政治力量的平衡而变化，但在 1920 年初，莫斯科领导层坚定地致力于与斗争派结盟以加强他们在乌克兰人中的政治根基。

与乌克兰的许多犹太组织一样，很大一部分斗争派非常乐意支持布尔什维克，他们认识到团结两党而不是分裂两党更有利。因此，1919 年 3 月，基辅斗争派组织决议：

³¹ 鲍里斯，第 80 页。

虽然承认乌克兰社会革命党[斗争派]在纲领和战术问题上存在相当大的分歧，但鉴于党的许多圈子都希望在“乌克兰社会革命党”这个名字上加上“共产党”的头衔……向党警告[这种倾向]在反对派中的单独存在……不可避免地落入反革命的手中。鉴于存在着一个真正的共产党核心，在组织上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联系在一起，奉行正确的政策，同时基辅组织的各部分同志或团体有义务在此基础上以及为了在乌克兰成地传播革命，尽可能支持这些政策，我们决定：要求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向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提出申请，将乌社革与乌共（布）联合起来并积极准备在乌社革第五次全党代表大会上成功实现这一联盟。³²

如决议所说明，斗争派只认为乌克兰共产党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核心”，而他们自己却是一个真正的乌克兰政党。尽管他们主要在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和乌克兰文化的作用上存在重大分歧，但他们在苏维埃政权和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关键问题上完全一致。因此，他们觉得自己能够在共产党内工作，但与许多犹太社会主义者不同的是，他们不准备隐藏他们的分歧，他们对自己的合法性充满信心。正是这些分歧激怒了许多布尔什维克并推迟了斗争派加入乌克兰共产党。

³² 《民族生活》，第17期，1919年3月16日，第4页。

1919年3月早些时候举行的斗争派第五次党代表大会投票决定将党名改为乌克兰社会革命共产党斗争派并与共产党合并。然而，他们的做法遭到了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拒绝，它也反对斗争派参与苏维埃乌克兰政府。³³然而，1919年4月16日，俄罗斯政治局指示拉柯夫斯基与斗争派开启谈判并坚持接纳他们加入政府。³⁴这个指示最重要的结果是亚历山大·舒姆斯基成为教育人民委员。这个任命可能遵循了布尔什维克对待前崩得主义者的相同模式，他们主要被分配了文化和教育工作。但如果这反映了一些乌克兰和俄罗斯共产党人的看法，即教育人民委员部是不太重要的人民委员部之一，那么对于斗争派来说，它为他们提供了推行现有文化政策的最佳机会。

然而，这并没有阻止舒姆斯基利用他的职位影响布尔什维克在乌克兰的政策并增加斗争派的作用。8月7日，他向全乌克兰中央执委会提交了一个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其中他批评乌克兰共产党坚持俄罗斯化政策并强调“以民族形式”提高文化水平，确保乌克兰的真正自治需要。³⁵不可避免地，这个动议被否决。然而，到现在为止，随着邓尼金军队的推进，乌克兰苏维埃政府暂时变得基本上无关紧要，斗争派将他们的斗争转移到第三国际，在那里他们与乌克兰共产党一起申请加入第三国际。在舒姆斯基向第三国际执委会提交的材料中，他重申了斗争派声称自己是“乌克兰共产主义的有组织的核心”，他

³³ 派普斯，第147页。

³⁴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17，目录号3，卷宗号1，第1页。

³⁵ 詹姆斯·E·梅斯，《共产主义与民族解放的困境：苏维埃乌克兰的民族共产主义》（马萨诸塞州剑桥市，1983年），第57—58页。

更进一步地攻击了乌共（布）。他声称后者对乌克兰完全陌生，因为那里的条件与俄罗斯不同。乌克兰的革命必须主要以乌克兰农民为基础，这意味着反对俄罗斯化和保证文化平等的斗争。这些讨论的结果是，乌克兰的革命必须“由那些承认乌克兰文化民族形式的人”领导——即斗争派。³⁶

在申请加入乌共（布）仅几个月后，斗争派现在声称有权取代它成为乌克兰革命的领袖。斗争派不太可能对共产国际或俄罗斯共产党承认这个位置有任何期望，但他们可能希望从莫斯科对乌共（布）内持续的派系斗争的挫败中获利，并且会因政治局在4月份代表他们干预而受到鼓舞。然而，他们拒绝在关键问题上妥协并继续在独立乌克兰军队的问题上毫不留情地同时反对乌克兰共产党和俄罗斯共产党。

10月政治局阻止了斗争派加入共产国际，理由为它“在形式上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共产国际中已经有一个乌克兰政党]并且在政治上为时过早”。³⁷然而，这种拒绝并不意味着对斗争派的敌对态度，同时政治局允许斗争派创办另一份报纸在俄罗斯发行。三周后，他们获得了750000卢布的政治资金并承诺从南线补给中获得武器。³⁸1919年3月以来列宁和斯大林都怀着浓厚的兴趣关注着与斗争派关系的发展。³⁹虽然他们的动机尚不清楚，但可以推测他们担心乌克兰民众

³⁶ 梅斯，第55—57页。

³⁷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17，目录号3，卷宗号29，第1页。

³⁸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17，目录号3，卷宗号34，第1页。

³⁹ 亚当斯，第122页。

支持程度有限以及乌共（布）的分裂和错误。列宁尤其担心乌克兰许多共产党人的大俄罗斯主义态度。但他们对斗争派的同情或许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如我们已经见到的，⁴⁰列宁和斯大林都开始更加重视非俄罗斯人的民族文化，苏俄的民族政策也倾向加强民族自我认同。这些想法在腔调上与斗争派提出的想法越来越相似。斗争派在破坏布尔什维克在乌克兰的权威的可能并没有阻止谈判于11月6日重新开始。尽管斗争派对乌共（布）采取傲慢和敌对的态度并且拒绝停止鼓动实现乌克兰军队独立，而布尔什维克也不可能接受这个要求，但俄罗斯共产党的领导人依然继续看好斗争派。

于是，接纳斗争派加入共产国际“在政治上为时过早”的说法为改变主意留下了道路。1919年11月21日，当这个问题再次出现时，政治局产生分歧，列宁、斯大林和加米涅夫支持接纳，托洛茨基和克列斯廷斯基反对。如何对待斗争派的不确定性反映在政治局不寻常地推迟到征求季诺维也夫的意见后才做出最终决定。⁴¹季诺维也夫赞成接纳斗争派，但一周后，中央委员会全体投票决定不接纳他们加入共产国际，但这次只引用了“正式”反对意见即共产国际已经有一名乌克兰成员。同一次会议上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讨论将斗争派与乌共（布）完全联合起来的可能性。⁴²

⁴⁰ 见上文，第一章。

⁴¹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17，目录号3，卷宗号42，第2页。

⁴²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17，目录号2，卷宗号25，第1页。

斗争派在乌克兰政府中的全部作用在任命一名斗争派进入四人革命委员会中得到了证实，它将在红军击退邓尼金时于乌克兰承担临时权力，一名斗争派也被派去加入第十二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⁴³然而，奇怪的是，几乎在同一时间（12月3日），列宁在俄罗斯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极力否认他赞成与斗争派结为联盟：

有些同志说我建议与斗争派结成联盟，这是误会。我在这次会上把我们应当用来对待斗争派的政策与我们过去[1917年10月]对待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政策作过比较。[……——译者]我当时说：我们完全采纳你们[右社革]的纲领，就是为了利用农民的力量，我们愿意这样做，但我们不愿意同社会革命党人结成联盟。……我的意见正是想说明，我们需要同乌克兰农民结成联盟，而为了实现这一联盟，我们同斗争派的论战，就不应采取他们现在这样的方式。

他继续就他们的军事政策和斗争派领导的教师联合会“论战”。⁴⁴这个声明是在布尔什维克和斗争派之间长期谈判期间发表的，可能是为了向后者施加压力，后者仍然坚持他们分歧最大的政策。但这肯定是误导性的。1917年，布尔什维克在没有与之结盟的情况下套用

⁴³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 1318，目录号 3，卷宗号 44，第 1 页；卷宗号 48，第 3 页。

⁴⁴ 列宁，第 39 卷，第 370—371 页（译者注：见《关于乌克兰苏维埃政权问题的总结发言》，载于《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增订版（北京，2017 年），第 37 卷，第 363 页）。

了右社革的农业纲领，但他们本应将其与左社革比较（然而大概并没有），左社革当时被带入苏维埃政府，就像斗争派被带入乌克兰政府而且现在被邀请加入革命委员会一样。四天前，政治局甚至更进一步，建议如果可能的话与斗争派联合。

列宁在他的讲话中说明与斗争派的联合还不是板上钉钉的，但在月底，他在《为战胜邓尼金告乌克兰工农书》中确认了实际上相当于与斗争派结成的这样一个“联盟”：

斗争派同布尔什维克的差别之一，就在于前者坚持乌克兰无条件独立。布尔什维克不认为这一点是引起分歧和分裂的问题，不认为这一点会妨碍同心协力地进行无产阶级工作。共产党人只要在反对资本压迫和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能够团结一致，就不应当为国界问题，为两国的关系是采取联邦形式还是其他形式的问题而发生分歧。⁴⁵

然而，就在事态似乎朝有利于斗争派的方向发展时，布尔什维克领导层突然转而反对他们。12月26日在列宁的文章发表之前，谈判中断了，1920年1月18日，政治局要求共产国际主席团发表一个尖锐的声明拒绝斗争派加入，这一次共产国际要列出他们的反革命声明。

⁴⁵ 列宁，第40卷，第44—45页（译者注：见《为战胜邓尼金告乌克兰工农书》，载于《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增订版（北京，2017年），第38卷，第48页）。

⁴⁶共产国际准备这样做的同时，⁴⁷2月6日，政治局根据列宁的草案通过了一个决议，分发给党组织：

认为斗争派是一个以鼓吹分散兵力和支持盗匪活动来破坏共产主义基本原则的党派，它的所作所为正符合白卫分子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利益。

他们反对同俄罗斯联邦结成紧密的或最紧密的联盟这一口号，这同样是与无产阶级的利益相矛盾的。

我们始终不渝地执行的全部政策，目标应该是在不久的将来肃清斗争派。为此，对斗争派的任何罪行，都要给予迅速而严厉的惩罚。特别是要收集该党大多数党员非无产阶级的极不可靠的品质方面的材料。

肃清的时机将在短期内由政治局确定，并通知乌克兰革命委员会。⁴⁸

斗争派从盟友和政府成员一夜之间变成了反革命分子并很快被清算。

⁴⁶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 17，目录号 3，卷宗号 55，第 3 页。

⁴⁷ A.V.利霍拉特，《乌克兰民族主义反革命的覆灭 1917—1922》（莫斯科，1954 年），第 609 页。

⁴⁸ 列宁，第 40 卷，第 122 页（译者注：见《关于乌克兰斗争派的决议草案》，载于《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增订版（北京，2017 年），第 38 卷，第 137 页）；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 17，目录号 3，卷宗号 61，第 2 页。

这种突然的逆转还没有得到充分解释。唯一浮出水面的具体事件是1919年12月斗争派在《无产阶级斗争报》上发表的一个被曝光的报告。⁴⁹列宁的决议提到了斗争派关于乌克兰军队独立和与苏俄关系的政策，但这些政策从未改变。一种解释是乌共（布）内部力量平衡的转变。1919年11月下旬，一些以前在乌克兰工作的共产党人在戈梅利非正式会面，这里出现了一个派别，不仅支持与斗争派联合而且还采用了他们纲领的中心要点，乌克兰的军事和政治独立，包括党从莫斯科独立。⁵⁰然而，这个群体只占少数，大多数人的态度仍然非常敌对。在乌克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拉柯夫斯基认为斗争派是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曼努伊尔斯基认为他们都应该被处决。⁵¹布尔什维克可能看到乌克兰党内旧有的分裂以民族主义、亲斗争派主义倾向的幌子重新出现，并决定彻底支持乌克兰的高级党员，特别是现在邓尼金的威胁已经逐渐减弱，妥协的紧迫性已经降低。也许只是因为就斗争派持续的分裂主义的讨论陷入僵局。同样，也有可能出现了一些对反革命活动的严肃指控，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

然而，大约仅仅几周内，立场再次发生逆转，同样突然。2月28日政治局决定接纳斗争派加入乌共（布）。⁵²3月中旬，斗争派举行了全乌克兰代表会议，列宁向会议发送了这样的消息：“衷心感谢你

⁴⁹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17，目录号3，卷宗号50，第3页。

⁵⁰ 亚当斯，第393—394页；奥列斯特·苏布特尔尼，《乌克兰历史》（多伦多，1989年），第391页。

⁵¹ 梅斯，第61页。

⁵²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17，目录号3，卷宗号63，第1页。

们的致敬电。热烈祝愿代表会议各项工作取得成功，特别是祝愿已经开始的同布尔什维克党合并一事取得成功。”⁵³代表会议投票决定合并并在1920年3月20日乌共(布)一次激烈的代表会议上获得批准。如果对前斗争派在乌克兰党中的位置有任何疑问，列宁亲自下令将舒姆斯基纳入临时五人中央委员会以取代在代表会议上选出的中央委员会。⁵⁴5000名斗争派中有4000人加入了乌共(布)，舒姆斯基和布拉基特内随后都成为常任中央委员。⁵⁵

在1920年3月30日的俄罗斯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为斗争派非同寻常的曲折提供了一些线索：

当我们在中央委员会里谈到要向斗争派作最大让步时，有人嘲笑我们，说我们不走直线；然而只有当敌人直着来时，我们才能直着去。既然敌人不是直线前进而是曲折前进，那我们就要跟着敌人，不管敌人怎样曲折前进，都要抓住他们。我们答应斗争派，向他们作最大限度的让步，但要他们一定执行共产主义政策。……由于拉柯夫斯基同志出色地执行了中央委员会的正确路线，斗争派中的一切优秀分子在我们的监督和同意之下加入了我们党，而其余的人则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这个胜利抵得上两个

⁵³ 列宁，第51卷，第162页（译者注：见《给全乌克兰斗争派代表会议主席团的电报》，载于《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增订版（北京，2017年），第49卷，第272页）。

⁵⁴ 同上，第167页。

⁵⁵ 梅斯，第62页；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17，目录号2，卷宗号29，第3页。

漂亮的战役的胜利。⁵⁶

事实上，布尔什维克所经历的曲折并不是由斗争派的路线决定的，而是受布尔什维克自身的矛盾压力支配。一方面，乌克兰共产党软弱且内部分裂，提出分裂主义要求的斗争派的一切影响力增长都将进一步削弱莫斯科在这个关键地区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斗争派接受了布尔什维克纲领中除民族问题外的所有主要内容，只要在政治上能完全依赖他们，他们就可以提供一批宝贵的本土行政人员，他们在农村有着相当多民众支持，并且还能影响关键军事力量的调整（尽管这个因素随着 1919 年 5 月格里戈列夫的叛逃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最后，斗争派在语言和文化领域的纲领越来越多反映在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的国家政策中，并将成为对许多在乌克兰的俄罗斯共产党人态度的宝贵平衡。

乌克兰在非俄罗斯地区是例外的。它不仅含有重要的原材料，而且布尔什维克将其视为一种农村资本主义经济，只有“边境地区”才能形成一个可行的独立国家。这造成了对那里民族问题的特别敏感，也成为共产党内部分裂的基础。领导层对斗争派的“反复无常”反映了他们对乌克兰可能分裂的恐惧，要么是由于民族主义情绪在国家和党机关中变得无法控制，要么是由于实施会引起农民强烈反对的政策。

⁵⁶ 列宁，第 40 卷，第 266 页（译者注：见《关于中央委员会报告的总结发言》，载于《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增订版（北京，2017 年），第 38 卷，第 303、304 页）。

布尔什维克时而拉拢时而谴责斗争派，可能是希望在赋予他们承担重要角色的角色前先迫使他们屈服于自己的民族主义要求。与此同时，乌共（布）各派别之间的斗争必然会对斗争派的态度产生影响。但联邦派在戈梅利的出现标志着乌克兰内部党派政治的新开端。斗争派的民族主义要求开始在资深布尔什维克中获得追随者，他们对乌克兰民族特征得不到认同而导致的疏远感到痛苦。列宁支持这个派系的表示可以看出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正在朝更大程度容忍自治的要求方向发展。尽管斗争派的军事和政治分裂主义一直都是对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反对，但他们关于民族文化和本土化的许多思想与布尔什维克国家政策的方向完全吻合。

在巴什基尔的共产主义—民族主义联盟崩溃后，加强共产主义本地基础的问题成为了最紧迫的问题。巴什基尔军事革命委员会的灾难说明了双重危险，一方面是将政治权威委托给与布尔什维克主义者除了对白军的敌意几乎没有共同点的民族主义者，另一方面是共产党的俄罗斯统治。在乌克兰，布尔什维克面临着这两种危险之间的中间道路——民族共产主义。与斗争派的联盟是中央指导政策的结果，在乌克兰共产党的强烈反对下才结束。尽管大多数斗争派在 1923 年前已经离开了党，许多情况下离开了国家，⁵⁷在一段时间内，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乌克兰政党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尽管斗争派随后声名狼藉，但他们的政策对党和关键人物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尤其是对舒姆斯基的继任者教育人民委员米科拉·斯克里普尼克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在斗

⁵⁷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 572 页。

争派加入后，特别是从 1923 年开始，国家机构的乌克兰化迅速进行，“乌克兰实现了多方面的知识和文化复兴”。⁵⁸与斗争派的协议也为与前俄罗斯帝国其他地方的左翼民族主义者结盟提供了重要范例。

穆斯林民族共产主义者

1919 年和 1920 年，乌克兰的斗争派和犹太社会主义者同布尔什维克是相互接近的，既是由于需要团结亲苏、反白军的力量，也是思想层面上的结果；崩得分子的文化自治概念和斗争派对民族文化和政治自治方面起重要作用的坚持并不被视为双方合作的不可逾越的障碍。这两个组织能够将自己定位为布尔什维克运动的民族主义派别，并且随着苏维埃政府在边境地区的经验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国家政策，他们的思想也开始被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认为对同共产党中日益明显的大俄罗斯主义倾向的斗争有价值，不管这些倾向是表现为老式沙文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在中亚，情况大不相同。后勤和军事形势一方面使非俄罗斯本土居民的支持变得更加紧迫，而另一方面又减弱了莫斯科对俄罗斯人主导的党和苏维埃机关施加有效影响的能力。1917 年和 1918 年期间存在或涌现了许多穆斯林政治组织。然而，这些组织都无法与崩得或斗争派相提并论；伊斯兰教或泛突厥主义的思想渗透到他们所有人中，大多数人对整个俄罗斯人怀有敌意，对苏维埃政权的观念几乎漠不关心。

⁵⁸ 安德鲁·威尔逊，《20 世纪 90 年代的乌克兰民族主义 一种少数派信仰》（剑桥平装版，1997 年），第 16 页。

1918年至1920年间，布尔什维克在中亚的优先事项是军事斗争。浩罕民族主义政府失败后（1918年2月）他们能够与一些民族主义军事单位实现共同事业，这主要归功于白军的大俄罗斯主义野心。其中最重要的是瓦利多夫的巴什基尔军队，但红军也能与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军队缔结一些联盟，尽管他们之间存在政治鸿沟。亚历山大·A·本尼格森和S·恩德斯·温布什提供了这些团体有价值的总结：“Ush-Zhuz”（三部落），一个支持泛伊斯兰教但从1917年起越来越接受布尔什维克思想的哈萨克斯坦组织，其成员于1920年加入共产党；克里米亚激进鞑靼政党“米利·菲尔卡”；“Jengelis”，一个波斯、泛伊斯兰游击运动，1921年参与了与伊朗共产党和俄罗斯红军部队的联合行动，试图推翻德黑兰政府；最不协调的是，1862年在喀山成立的神秘主义苏菲派*兄弟会“Vaisites”，其教义“奇怪地融合了瓦哈比式的清教徒改良主义、托尔斯泰主义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趋势中的）社会主义”。1917年和1918年，这群人与红军并肩作战，甚至对抗喀山鞑靼同胞。⁵⁹

尽管这个联盟很奇怪，但Vaisites的人数很少，并且在他们的领袖伊朗·瓦伊索夫在战斗中阵亡后解体了。更重要和更危险的是布尔什维克与前青年土耳其政府领导人恩维尔·帕夏的合作。恩维尔因其1911年至1912年在非洲对抗意大利人的军事功绩以及他在土耳其的活动而成为穆斯林世界的英雄。在世界大战中与德国有联系以及他著

* 译者注：苏菲派是伊斯兰教的一个流派，主张通过虔修默祷、生活简朴禁欲达到人主合一。

⁵⁹ 亚历山大·A·本尼格森、S·恩德斯·温布什，《苏联内的穆斯林民族共产主义 殖民世界的革命战略》（芝加哥，1979年），第218—223页。

名的建立一个包括俄罗斯中亚大部分地区的泛伊斯兰国家的梦想，致使穆斯林共产党人对他 1920 年出现在俄罗斯深表怀疑。但他与卡尔·拉狄克建立了面对面的联系，并于 1920 年 9 月在巴库举行的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一个激动人心的讲话，他在反帝国主义的基础上坚称声援苏维埃俄国，但没有表明与布尔什维克有任何更深层次的政治共同事业。⁶⁰布尔什维克如此热衷于加强他们在中亚的政治合法性，以至于他的巴库宣言似乎足以说服政治局给予恩维尔资金并允许其于 1921 年 4 月在俄罗斯出版两份土耳其语报纸。⁶¹秋季，他被派往中亚，为反对巴斯马奇运动的斗争献上个人的荣誉。但他的个人野心和伊斯兰民族主义政治被证明远比他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形成的任何短暂依恋要强烈得多，他几乎在抵达布哈拉后立即叛逃到巴斯马奇运动一边，带着一支小型武装部队和许多布哈拉政府领导人。⁶²

恩维尔的叛逃是布尔什维克追求民族主义盟友的最严重挫折，并导致了更加谨慎的政策。但这并没有阻止布尔什维克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追求的积极拉拢穆斯林民族主义者的行动。早在 1917 年 6 月，在突厥斯坦召开的俄社民工党第二次地区代表大会就承认“党在突厥斯坦的穆斯林人口环境中的工作任务是支持穆斯林环境内部的民主反对的倾向，引导反对教士—资产阶级的影响和统治……”⁶³这个决

⁶⁰ 《东方各民族巴库代表大会》，第 76—79、195 页。

⁶¹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 17，目录号 2，卷宗号 154，第 2—3 页。

⁶² 派普斯，第 256—258 页。

⁶³ 阿米诺夫和巴巴霍德扎耶夫，第 121 页。

议说明了对穆斯林政治运动中保守派之间的分歧的认识，一方面是教权力量，另一方面是激进的、更世俗但仍然主要是泛伊斯兰主义团体。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后试图利用这些分裂以及内战过程中出现的反白军情绪努力吸引一批穆斯林民族主义者。

然而，尽管穆斯林政治组织种类繁多，但并没有这样一个接受布尔什维克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苏维埃政权和阶级斗争的基本政策、相当于崩得或斗争派的穆斯林政党。除上述短期军事联盟外，布尔什维克承认的苏维埃领土上唯一一个真正称得上社会主义政党的穆斯林组织是阿塞拜疆的胡梅特，它于 1920 年成为阿塞拜疆共产党的核心。

⁶⁴但是，当强大的自由民族主义哈萨克斯坦政党“阿拉什·奥尔达”于 1918 年 4 月与俄罗斯人民委员会和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接触以期达成和解时，他们被彻底拒绝了。⁶⁵大约同一时间，其他较小的穆斯林组织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命令下被解散：以喀山为基础的

“Harbi Shura”、乌法的穆斯林民族委员会“Milli Idare”和第一次全俄穆斯林代表大会于 1917 年 5 月 1 日设立的协调机构“Milli Shura”。

⁶⁶然而，1919 年底和 1920 年期间，随着其他地方对民族主义者表现出更宽容的态度，许多穆斯林政党成员被接纳加入俄罗斯共产党，包

⁶⁴ 本尼格森、温布什，第 25 页。

⁶⁵ 巴季罗夫，第 623 页。

⁶⁶ 本尼格森、温布什，第 216、220 页。

括阿拉什·奥尔达和米利·菲尔卡的重要领导人，他们将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共和国中发挥领导作用。⁶⁷

中亚仍然不存在任何布尔什维克可以信任作为盟友的大型穆斯林政党。除胡梅特党外，唯一被布尔什维克授予政府职位的穆斯林政党是青年布哈拉派和青年希瓦派，他们在推翻前汗国埃米尔的斗争中与布尔什维克结盟并于 1920 年至 1923 年期间在管理正式独立的人民共和国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青年布哈拉派于 1909 年由一群激进的伊斯兰扎吉德主义者组成。1917 年 12 月他们的事业与布尔什维克达成共同，并于 1918 年 3 月与突厥斯坦苏维埃政府主席科列索夫联手试图推翻埃米尔。在这次尝试失败后，许多青年布哈拉派逃到俄罗斯和突厥斯坦，将布哈拉的地下工作留给新成立的布哈拉共产党。然而，在 1918 年至 1919 年多次失败的起义之后，莫斯科将青年布哈拉派而不是软弱的布哈拉共产党提升为汗国的革命领导力量，当红军在 1920 年夏季成功占领布哈拉时，他们被赋予了政府领导职位。然而，1922 年初，青年布哈拉派与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尤其紧张，以至于突厥斯坦委员会对此进行调查，一年后逮捕了一些青年布哈拉派，并将他们的组织合并为共产党。

1917 年初青年希瓦派曾与俄罗斯主导的苏维埃结盟，但自从俄罗斯军队于 1918 年撤退开始就几乎没有军事力量，还面临朱奈德汗的残酷镇压，许多领导人物被处决。然而，朱奈德政权的压迫导致了对青年希瓦派的支持不断增加，青年希瓦派在 1919 年 11 月发起了叛

⁶⁷ 同上，第 25 页。

乱并在红军支持下取得了成功。1920年2月，为了临时管理希瓦而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由三名青年希瓦派成员、两名土库曼酋长和一位重要宗教领袖组成，但它在1920年4月被一个主要由俄罗斯人组成的政府取代。很快，花刺子模共产党取代了青年希瓦派掌握的权力，青年希瓦派的领导层逃离了该地区。⁶⁸

布哈拉政府和希瓦政府代表了布尔什维克与民族主义势力合作的极端例子。某种程度上，这是对这些地区的后期征服的结果，它们此前由民族主义者控制，红军直到1920年仍无法企及。但是，由于工人阶级的过于弱小、埃米尔摧毁了所有苏维埃组织和当地居民的文化水平非常低，他们被认为完全受到保守的穆斯林神职人员影响，这两个前汗国一直被布尔什维克视为例外。因此，他们甚至没有被赋予苏维埃共和国的地位，而来自激进伊斯兰传统的青年希瓦派和青年布哈拉派被认为是管理尚未准备好接受社会主义的人民的最合适力量。

布尔什维克允许青年布哈拉派和青年希瓦派承担这种责任是重要的，因为他们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一种传统，这传统在整个俄罗斯的穆斯林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扎吉德主义。它起源于19世纪后期鞑靼知识分子改革阿拉伯字母教学的尝试，扎吉德主义试图摆脱伊斯兰教的大部分宗教内容，但将其推广为所有穆斯林共同的一种文化形式。尽管最初专注于教育，但扎吉德主义发展了更广泛的政治推动力，试图在俄罗斯文化自治的框架内促进泛突厥主义。尽管这

⁶⁸ 西摩·贝克尔，《俄国在中亚的保护国：布哈拉与希瓦 1865—1924》（马萨诸塞州剑桥市，1968年），第301—305页。

是一个从未获得群众基础的精英主义运动，扎吉德主义吸引了当时许多主要的穆斯林知识分子，他们希望在公正的社会中推广世俗伊斯兰文化。⁶⁹虽然扎吉德主义者的世俗西方取向、反帝国主义和社会要求与许多布尔什维克信仰不谋而合，而且对文化自治的要求如我们所见不一定是合作的障碍，但他们的泛突厥主义和拒绝阶级斗争而支持民族斗争在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留出了很大的空间。此外，1917年期间，最激进的扎吉德主义者采取了更尖锐的反俄立场。与此同时，许多扎吉德主义者之间发生了一个相反方向的重大运动，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它们被视为社会主义俄罗斯国家内穆斯林革命和自治地位的动力。1917年期间成立了一些穆斯林社会主义委员会。⁷⁰鉴于布尔什维克接受社会主义并且缺乏替代方案，布尔什维克自然而然地应该求助于这些委员会来寻找可以与之合作的穆斯林激进分子。

其中最重要的是1917年4月7日成立的喀山社会主义委员会。该委员会由穆拉努尔·瓦希托夫领导，其副主席不同寻常地是一位女性，E.穆希迪诺娃，到了6月，米尔赛义德·苏丹-加利耶夫加入委员会。它与更广泛的鞑鞑民族主义和扎吉德运动有联系，促进伊斯兰教改革和更加世俗化，但支持布尔什维克的战争，土地和苏维埃政权方针，尽管它也支持将俄罗斯人驱逐出殖民地。它“拥护这样的意识形态，尽管有社会主义的标签，但它是马克思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

⁶⁹ 阿扎德-艾瑟·罗尔利希，《伏尔加鞑鞑人 民族韧性写照》（斯坦福，1986年），第178—179页。

⁷⁰ 本尼格森、温布什，第20—22页。

混合体”。⁷¹喀山社会主义委员会是 1917 年 5 月 1 日和 8 月 2 日举行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全俄穆斯林代表大会背后的推动力量之一。尽管第一次代表大会未能就妇女的作用和领土自治问题达成一致，但它仍然设法提出了穆斯林统一战线并将米利·菲尔卡建立为永久的协调机构。第二次代表大会由于域外自治的反对者离开，由伏尔加鞑靼人主导。虽然这阻止了代表大会声称拥有俄罗斯所有穆斯林的代表权，但它使其能够团结在一个基于扎吉德主义原则的实施文化自治的积极计划周围。⁷²

布尔什维克很早就与喀山社会主义委员会建立了联系，1917 年 11 月 20 日发表的《告俄国和东方全体穆斯林劳动人民书》承认了第二次全俄穆斯林代表大会的要求。早在 1917 年，喀山布尔什维克组织就成功吸引了一些主要穆斯林，包括喀山社会主义委员会副主席穆希迪诺娃。革命后，斯大林立即尽量让其他穆斯林领导人参与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首先与米利·菲尔卡接洽，但没有成功，然后拉拢瓦希托夫、G.伊布拉希莫夫、Sh.马纳托夫和后来的苏丹-加利耶夫来管理新成立的穆斯林人民委员部，并让他们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中有自己的位置。⁷³

本尼格森和温布什详细研究了布尔什维克在吸引穆斯林民族主义者方面的成功，并得出结论“到 1920 年，布尔什维克已经获得了

⁷¹ 罗尔利希，第 126—127 页；本尼格森、温布什，第 22 页。

⁷² 罗尔利希，第 127—130 页。

⁷³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 1318，目录号 1，卷宗号 1，第 1 页。

穆斯林东方大多数激进民族主义精英的支持或中立，这些精英很快成为突厥斯坦共产党的重要人物”。⁷⁴本尼格森和温布什列出了可能吸引穆斯林民族主义者加入布尔什维克的四个因素：

- (1) 白军领导人的无能和俄罗斯沙文主义；
- (2) 斯大林招募本土领导人的决心；
- (3) 穆斯林民族主义者坚信，苏维埃政权的所有反对者都是俄罗斯沙文主义者，而布尔什维克则主张国际主义和民族平等；
- (4) 俄国革命被视为“伊斯兰地区从欧洲和俄国的侵占中解放出来的第一步”。⁷⁵

在这种分析中，穆斯林民族共产主义者的目标在某些领域实际上与布尔什维克的目标的一致程度没有给予足够重视，而在其他领域，布尔什维克直到 1920 年才竭尽全力容纳穆斯林领导人，尽管他们存在分歧。这不仅仅是将少数象征性的穆斯林放在显要位置上；穆斯林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几乎全部是坚定的前扎吉德主义者并被赋予了真正的权力，如我们在第三章中看到的那样，每当穆斯林人民委员部

⁷⁴ 本尼格森、温布什，第 26 页。

⁷⁵ 同上，第 26—29 页。

与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发生冲突时，前者往往会得到布尔什维克领导层支持。除穆斯林人民委员部外，共产主义资历很少的穆斯林也被授予在吉尔吉斯人、高加索山地人、突厥斯坦、卡尔梅克人等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局和部门的领导地位。⁷⁶

除了莫斯科的职位外还努力让当地穆斯林参与苏维埃和地区的党务工作者作。1918年3月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向各地区发出了让当地人参与苏维埃的指示，⁷⁷在4月的塔什干苏维埃选举中，塔什干苏维埃此前将穆斯林排除在外，当选代表中有40%是穆斯林。⁷⁸1917年夏季，许多中亚的苏维埃执委会重组，首次让当地穆斯林有代表权——据苏维埃来源，撒马尔罕执委会的三分之一、拜拉姆-阿里的七分之二、奥利亚廷斯克县的4/17、斯科别列夫县的3/11、乌拉-蒂乌贝的多数、铁米尔的一半。⁷⁹在一些地区，穆斯林党员的比例也急剧上升；到1918年底，当地穆斯林从几乎为零开始发展到在塔什干的2000名成员中占900人、在纳曼甘的600名成员中占400人、在浩罕的750名成员中占250人，⁸⁰在科尔基，穆斯林共产党人的新部门1919年招募了160名当地人。⁸¹这种趋势仍在继续，以至于1922年突厥斯坦共产党的民族构成是49.7%的俄罗斯人、23.3%的哈萨克

⁷⁶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1318，目录号1，卷宗号1，第13、41、69、80页。

⁷⁷ 巴季罗夫，第615页。

⁷⁸ 同上，第624页。

⁷⁹ 同上，第626—627页。

⁸⁰ 同上，第631页。

⁸¹ A.巴巴科夫，《内战与外国武装干涉时期土库曼斯坦东部的布尔什维克组织》，载于Sh.塔什利耶夫编，《中亚的内战与外国武装干涉》（阿什哈巴德，1986年），第212页。

斯坦人与吉尔吉斯斯坦人、10.7%的乌兹别克斯坦人、4.6%的土库曼斯坦人、2.2%的塔吉克斯坦人、9.5%的其他穆斯林。⁸²到1922年，根据当年的党员人口普查，6534名俄罗斯共产党党员将国籍归为鞑靼人，4964人为吉尔吉斯人，2034人为乌兹别克人。⁸³突厥斯坦共产党领导机构多花了一点时间才察觉到当地穆斯林的存在。1922年穆斯林几乎没有代表，但到1924年这种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当时中央委员会及其主要部门的21名成员中有8名是当地穆斯林，在县委一级中，91名委员中令人瞩目地有64名是本地人。截至1924年底，突厥斯坦党中央、州、县级执行政治局成员192人中有128人是当地人。⁸⁴这一时期，该地区涌现出一些主要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仍然具有影响力——包括T.R.雷斯库洛夫、N.霍贾耶夫、A.伊克拉莫夫、F.霍贾耶夫、A.秋里亚库洛夫、D.乌斯塔巴耶夫、N.艾塔科夫、K.阿塔巴耶夫和A.拉希姆巴耶夫。⁸⁵

本尼格森和温布什通过多种因素解释了布尔什维克对穆斯林民族共产党人的宽容：

在布尔什维克政权完全巩固之前避免疏远少数民族的希望；对这种马克思主义变体的力量或民族共产主义活力的低估；俄罗斯中

⁸² 卡雷尔·德恩科斯，《大挑战》，第143页。

⁸³ 派普斯，第278页。

⁸⁴ S.A.纳扎罗夫，《俄共（布）中央对中亚党组织建设的领导》（塔什干，1972年），第288—289页。

⁸⁵ 同上，第275页。

央与边境地区之间正当关系的不确定性；以及缺乏足够强势的人物来通过控制或消灭离心民族主义的代言人以控制离心民族主义，就像斯大林最终做的那样。⁸⁶

但在此期间，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的领导个人和机构的公开声明和内部指令都说明这是一种深思熟虑的长期战略，把政治领导权特别是文化领导权交到当地非俄罗斯人手中，这得到了实际的本土化和种族化政策的支持，这些政策不仅在中亚而且在布尔什维克更强大的西部边境地区实行。在穆斯林地区，那里没有强大的本土社会主义传统，这意味着要与民族主义者达成协议，他们的思想可能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原则相去甚远，并不理想。

然而，就目前来说，弥补马克思主义和激进伊斯兰教两种传统之间存在的鸿沟是可能的。布尔什维克可以接受有限的政治自治，他们积极赞同喀山民族主义者对完全文化自治的中心要求。然而，扎吉德派和泛突厥传统造成的其他后果更令人无法接受并且似乎可能会导致布尔什维克和穆斯林民族主义者之间关系紧张。“无产阶级民族”的概念某种程度上在俄罗斯帝国所有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运动中是共有的，但在米尔赛义德·苏丹-加利耶夫阐述的学说中得到了最尖锐的表达，这些学说被穆斯林民族共产主义者广泛接受。本质上来说，苏丹-加利耶夫提出，虽然发达国家存在尖锐的阶级分裂，但世界上

⁸⁶ 本尼格森、温布什，第 39 页。

最明显的分裂是压迫者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分裂。因此在世界舞台上，被压迫民族占着类似于发达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地位。“所有被殖民的穆斯林人民都是无产阶级人民，由于穆斯林社会中几乎所有阶级都受到殖民主义者的压迫，因此所有阶级都有权被称为‘无产阶级’。”⁸⁷所以民族革命应该先于社会主义革命，被压迫民族内部不可能有阶级斗争。从布尔什维克的角度来看，最严肃的是，苏丹-加利耶夫从这个分析中得出结论，被压迫民族，特别是穆斯林，必须拥有自己独立的政治组织：

如果革命在英国成功，无产阶级会继续压迫殖民地并奉行现有资产阶级政府的政策；因为它对这些殖民地的开发感兴趣。为了防止东方劳苦者受到压迫，我们必须将穆斯林群众团结在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和自治的共产主义运动中。⁸⁸

尽管存在这些差异，苏丹-加利耶夫和他的支持者被允许自由表达他们的想法，苏丹-加利耶夫甚至被授予《民族生活》的编辑地位。但对独立的穆斯林共产主义组织的特别要求是整个 1918 年持续存在摩擦的根源。⁸⁹苏丹-加利耶夫没有出席的 1920 年 9 月东方各民族巴

⁸⁷ 同上，第 42 页。

⁸⁸ 同上，第 43—46 页。

⁸⁹ 同上，第 60—61 页。

库代表大会，标志着对“苏丹加利耶夫主义”态度的转变。在民族和殖民问题的讨论中，所有发言都尖锐地谈到了东西方劳动者团结的必要性，含蓄否定了“无产阶级民族”的斗争概念。⁹⁰从那时起，在官方演讲和共产党媒体上，对民族主义偏离危险的警告变得更加频繁，但布尔什维克和穆斯林民族共产主义者之间的不和谐关系一直持续到1923年。这说明布尔什维克准备不遗余力地迁就穆斯林民族主义者，尽管地区许多下级官员抱怨，但马克思主义和泛伊斯兰教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没有引发更严重的危机，直到苏丹-加利耶夫甚至建立了一个秘密的、阴谋的非党组织并与反苏的巴斯马奇叛乱分子建立了联系。⁹¹

到1920年底，布尔什维克通过拉拢民族主义政党和个人加入共产党，很大程度上成功增强了他们在边境地区的势力。这个政策在阿塞拜疆最为成功，在那里的巴库公社垮台后，布尔什维克组织基本上被摧毁了。1920年红军进入阿塞拜疆时，穆斯林胡梅特党为一个新的共产党提供了直接基础，它将社会主义传统与穆斯林人口有机地联系起来，并为阿塞拜疆苏维埃的大多数领导人提供了机会。⁹²1922年，当格鲁

⁹⁰ 《东方各民族巴库代表大会》，第89—119页。

⁹¹ 见第八章。

⁹² 本尼格森、温布什，第216—217页。

吉亚危机因老布尔什维克的活动而酝酿时，阿塞拜疆的前胡梅特领导层证明自己完全有能力应对造成格鲁吉亚灾难的民族主义压力。

民族主义者在苏维埃共和国中的作用受到限制。崩得、斗争派和胡梅特加入共产党一年后，政治局开始考虑与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达什纳克党进行类似的安排，1921年6月，阿道夫·伊奥菲和亚美尼亚共产党人特-加布里埃利安被派往里加与达什纳克领导人谈判。⁹³伊奥菲在突然被召回并于7月底中断谈判时，甚至与达什纳克签署了一个协议草案。⁹⁴原因很简单：中央委员会收到了奥尔忠尼启则签署的高加索局主席团的电报，要求终止谈判，理由是达什纳克一直被外高加索共产党人诽谤为反革命分子。⁹⁵由于高加索局已经与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倾向发生冲突，他们明确认为谴责达什纳克比在亚美尼亚与他们合作更有利。在奥尔忠尼启则的脑海深处也是1918年达什纳克和布尔什维克在巴库公社结盟的经历，以穆斯林大屠杀和最终城市落入土耳其人手中而告终。

对民族共产主义者影响的最有效制衡是党委和全权代表制度，他们对边境地区的事件负有全权责任。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共产党的高加索局、中亚局和中央委员会由可靠的老布尔什维克组成，通常是俄罗斯人，他们能够直接推翻党的下级机关和间接推翻苏维埃的决定。这些委员会的领导人是奥尔忠尼启则、索柯里尼柯夫和拉柯夫斯基等拥

⁹³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 17，目录号 3，卷宗号 175，第 4 页。

⁹⁴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 17，目录号 3，卷宗号 192，第 3 页。

⁹⁵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 17，目录号 13，卷宗号 384，第 1 页。

有巨大个人权力的人，与他们一起的还有一些中央委员会的全权代表，他们要么常驻要么被派去处理具体问题：伊奥菲在白俄罗斯和突厥斯坦，伏龙芝在中亚和乌克兰，基洛夫和沙赫塔赫廷斯基在阿塞拜疆都曾参与事务处理。在极端情况下，政治局领导人——斯大林、捷尔任斯基、拉狄克、加米涅夫——亲自到边疆解决争端。这样，中央委员会就有了维护自己权威的现成传达机制并有了关于民族主义者活动的可靠信息来源。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人并没有滥用职权并且对民族主义情绪很敏感。这方面的主要例外，奥尔忠尼启则和高加索局，将在第七章中讨论。

共产主义学校和大学

理想情况下，每个民族在地方权力机关中的代表人数应与其总人口的规模成正比。根据俄共（布）中央委员会 1919 年 7 月向突厥斯坦共产党发出的指示，这个相称原则凌驾于其他政治考虑之上：

根据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党纲领，为了在东方实行工农政权，我们需要突厥斯坦本土居民大致按比例参与国家事务，而不需要党员资格——我们对穆斯林工人组织提名的候选人感到满意。⁹⁶

⁹⁶ M.Kh.哈基莫夫，《党与苏维埃民族国家体制 苏共领导中亚及哈萨克各民族苏维埃国家体制的建立与发展》（塔什干，1980年），第121页。

然而，布尔什维克并没有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没有单单依靠与民族主义政党的联盟。他们热衷于培养一支本土的领导队伍，但预见到同前扎吉德主义者遇到的问题，他们主要通过党校和大学的网络培养新一代穆斯林共产党人。1921年10月，政治局为应对阿塞拜疆的政治危机而做出的一个决定强调了党校在培养新一代本土共产党员方面的重要性：

[决定]要求阿塞拜疆领导人特别是巴库党组织，有义务集中注意力，为穆斯林共产党人担任小组书记和其他负责的党员职位做好准备和教育，为此建立特殊学校并每三个月向高加索局和俄共（布）中央报告这方面取得的成功。⁹⁷

1918年突厥斯坦第一所党校开办。1919年7月，俄共（布）区委成立了党与苏维埃工作中央学校，10月，一所新学校设有一个专门的穆斯林部门，在头两个学年中培养了530名党务工作者。1920年区委组织了一个完整的党校网络，到年底有2000人在学校就读，其中600人是当地穆斯林。⁹⁸总的来说，党校入学者中有很大一部分

⁹⁷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1318，目录号3，卷宗号217，第1页。

⁹⁸ 纳扎罗夫，第276—277页。

还不是党员，但被确定为潜在的新党员，⁹⁹特别是在中亚。这些学校被期望为工农提供一定水平的全面教育和政治培训。1922 年建议将县党校为期六个月的课程分为 235 小时的语言、算术、科学、哲学和地理通识教育；125 小时学习关于共产主义运动史和马列主义原则的通识理论课程；60 小时用于学习苏维埃建设。¹⁰⁰在州和共和国学校的较长课程中也采用了类似的学习时间划分。一半以上的课程专门用于通识教育而不是政治教育。其目的是培养不仅政治可靠而且能够完成交给共产党人的行政任务的党务工作者。

跟民族共和国的党校一样，俄罗斯里的少数民族的教育需求也得到了很好的满足。1922 年，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党校培养了 300 名爱沙尼亚学生、260 名拉脱维亚学生和 200 名芬兰人。¹⁰¹欧洲非俄罗斯人在党校接受的培训比俄罗斯人多得多。根据 1927 年的党员普查，所有共产党员中只有 8% 接受过某种形式的党教育，但来自欧洲少数民族的党员中有三分之一到一半完成了课程。其他民族的数字是：亚美尼亚人——14.5%，格鲁吉亚人——14.4%，哈萨克斯坦——11.6%，乌兹别克斯坦——6.4%，吉尔吉斯斯坦——5.4%，土库曼斯坦——4.4%。¹⁰²不需要训练的俄罗斯老布尔什维克人数相对较多，这无法解

⁹⁹ 伦纳德·夏皮罗，《苏联共产党》（伦敦，1970 年），第 347 页。

¹⁰⁰ 纳扎罗夫，第 282 页。

¹⁰¹ 泽夫·卡茨，《苏维埃俄罗斯的党政教育》（未发表博士论文，伦敦大学，1957 年），第 58 页。

¹⁰² 卡茨，第 117—118 页。

释这些数字的差异。显然，他们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外高加索付出了巨大努力培训共产党人，而计划在中亚大部分地区相对失败。

尽管很大一部分非俄罗斯共产党员接受过一些党教育，但对欠发达民族来说，这种培训往往更基础。1927年，在党校学习过的所有人中只有13%的人在政治语法学校上过最短、最初级的课程。相应地，卡尔梅克共产党人为50%，巴什基尔人49%，亚美尼亚人46%。¹⁰³文盲率很高，迫切需要从大部分未受过教育的农民中招募民族共产党人，这意味着首要任务是为这些农民提供基本识字能力，然后才能让他们去工作。在非俄罗斯人中，农民在共产主义大学就读的比例也高得多，特别是穆斯林。在1924年，塔什干共产主义大学的入学人数中有71%是农民，喀山的64%是农民，东方民族大学的占54%。¹⁰⁴

共产主义大学培养了大量的穆斯林干部。1920年8月，工农共产主义大学（1923年6月后，列宁中亚共产主义大学）在塔什干开办。1922年两个多月里有150名穆斯林和76名欧洲毕业生。1921年4月21日，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组织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在莫斯科开学。虽然这是一所国际大学，但大部分名额是为来自中亚的入学者保留的。1921年，据一名入学学生描述，有100名是哈萨克斯坦或吉尔吉斯人、40名是乌兹别克斯坦人、20名是塔吉克斯坦人、15名东干人、25名土库曼人，另外还有50个名额供来自布哈拉和花刺子模。此外，莫斯科的大学还有17个部门的网络为地区主要大学

¹⁰³ 同上，第118页。

¹⁰⁴ 同上，第364页。

的潜在入学者开设预科课程。¹⁰⁵同年，西方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大学在莫斯科开办，不久之后，喀山的鞑靼共产主义大学和梯弗里斯的“以26人民委员命名的外高加索列宁共产主义大学”开办。

到1924年，共产主义大学培养了大量训练有素的非俄罗斯共产党员（表5.1）。共产主义大学就读的6073名学生中，略多于一半（3097人）就读于五所“民族”共产主义大学。这大致相当于非俄罗斯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但1926年俄罗斯人仍然占党员的65%，而穆斯林占其中三所学校学生的大部分，在整个党的代表性甚至比其他民族还要低。¹⁰⁶

表5.1 十所主要的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数 1924年1月17日

共产主义大学	学生数
东方各民族	1015
西方少数民族（莫斯科）	1196
中亚（塔什干）	434
外高加索（梯弗里斯）	289
鞑靼（喀山）	163
斯维尔德洛夫（莫斯科）	1289
季诺维也夫（彼得格勒）	835
社会教育学院	487
乌拉尔-西伯利亚（叶卡捷琳堡）	165
列宁大学（萨拉托夫）	200
总计	6073

来源：泽夫·卡茨，《苏维埃俄罗斯的党政教育》（未发表博士论文，伦敦大学，1957年），第363页。

¹⁰⁵ 纳扎罗夫，第278—280页。

¹⁰⁶ 夏皮罗，第354页。

除了主要的民族大学外，东方大学于 1921 年在俄罗斯各地开设了分校。¹⁰⁷到 1933 年，俄罗斯联邦已经为巴什基尔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德意志人、哈萨克人、北高加索山地人、卡累利阿人、吉尔吉斯人、布里亚特-蒙古人和乌德穆尔特人建立了共产主义大学。这些学校中的共产主义普通大学包括了 14 个民族部门，涵盖了乌克兰人、鞑靼人、莫尔多瓦人、中国人、朝鲜人和北方民族。只有楚瓦什人、卡拉卡尔帕克人、达吉斯坦人和雅库特人没有在共产主义大学被特别供应。¹⁰⁸

民族大学的课程与莫斯科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大学的课程不同，后者更侧重于俄国革命运动的近代历史，因为非俄罗斯人对这些领域的知识相对缺乏。¹⁰⁹与党校一样，培训主要是通识性的或技术性的，而不是政治性的，事实上，相对较少的教职员本身是共产党员。这在喀山共产主义大学最明显，1924 年，那里只有 19.4% 的教师是共产主义者。¹¹⁰

尽管共产主义学校和大学参与政治教育的人数相对于总人口来说很少，但 1927 年的党普查报告能够声称：

¹⁰⁷ 卡茨，第 383 页。

¹⁰⁸ 同上，第 380 页。

¹⁰⁹ 同上，第 384 页。

¹¹⁰ 同上，第 365 页。

尽管民族共和国的政治教育机构数量较少，但民族政治教育却占有突出地位。大多数党积极分子和民族州的领导官员主要在党校和共产主义大学接受教育。由于没有资深的党的民族干部，如果没有这些机构，就不可能接收到那些州的党、苏维埃和其他行政机构本土化不可或缺的训练有素的官员。¹¹¹

党校和大学的一些名额向非党员开放，部分是作为招募工具。但大多数情况下，它们的目标是为党提供部分民族共产党员，既具备领导民族苏维埃行政当局所需的技术和素养，对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的必要理解，又具有足够的国际共产主义观点，以确保社会主义原则在民族共和国顺利实施。布尔什维克并没有真正试图“布尔什维克化”他们从民族主义运动中来的新成员，而是依靠新一代民族共产主义者的长期发展。

尽管 1926 年俄罗斯人在苏联共产党中的代表人数仍然过多，但他们的主导地位远低于 1917 年。表 5.2 展示了苏联共产党中十个民族的党员人数与各民族占苏联整体人口的比例相比。（其他民族没有

¹¹¹ 同上，第 145—147 页。

占党员总数 0.5%以上的。) 在每个民族共和国和州中, 当地民族在共产党员中占很大比例, 如表 5.3 所示。

表 5.2 党员和预备党员同各民族在苏联总人口中占比的对比 1926 年/1927 年

民族	苏共党员	占党员总数的百分比	占总人口的百分比
总数	1061860	100.00	100.00
俄罗斯人	688855	64.91	53.05
乌克兰人	122928	11.58	21.27
犹太人	45342	4.27	1.77
白俄罗斯人	32649	3.08	3.23
亚美尼亚	18088	1.71	1.07
格鲁吉亚人	16136	1.52	1.24
鞑靼人	14711	1.39	1.99
乌兹别克人	13295	1.25	2.66
拉脱维亚人	12198	1.15	不适用
哈萨克人	11950	1.13	2.71
波兰人	11158	1.05	0.53
突厥人	10841	1.02	1.16
其他	63709	5.94	9.32

来源: 编译自: 《联共(布)的民族政策数据》(莫斯科, 1930年), 第 36—37、137 页。

表 5.3 共和国和州内名义上的民族的苏共党员和预备党员的比例 1927 年

共和国或州	名义上的民族的苏共党员百分比
乌克兰	51.9
白俄罗斯	52.3
阿塞拜疆	35.7
亚美尼亚	90.5
格鲁吉亚	55.4
乌兹别克斯坦	42.9
塔吉克斯坦	41.4
土库曼斯坦	34.7
巴什基尔	17.0
达吉斯坦	67.3
卡累利阿	13.5
克里米亚(鞑靼)	9.5
鞑靼	33.9

民族共产主义领导层

共和国或州	名义上的民族的苏共党员百分比
哈萨克斯坦	35.3
吉尔吉斯斯坦	50.6
雅库特	36.2
楚瓦什	61.9
伏尔加德意志	31.8
沃提克	18.6
马里	43.3
卡尔梅克	69.9
科米	87.1
布里亚特-蒙古	25.1
奥伊罗特	16.4
印古什	80.9
卡巴尔达-巴尔卡尔	63.2
卡拉什	52.8
北奥塞梯	85.8
车臣	51.1
切尔克斯	25.3

来源: 《联共(布)的民族政策数据》(莫斯科, 1930年), 第138—143页。

更重要的是苏维埃共和国中最高党和苏维埃机构中的民族比例。虽然提供了多达12个类别的数据, 但表5.4仅提供了两种类型的执委会的数字: 地方执委会(区和乡)和地区(市区和县)执委会。前者与其他类别的数据非常接近。

表5.4 区、乡、市区和县执委会的民族百分比 1927年

共和国	区和乡执委会的民族百分比	市区和县执委会的民族百分比
乌克兰	80.1	59.2
白俄罗斯	79.2	60.5
阿塞拜疆	77.4	77.1
亚美尼亚	80.5	87.1
格鲁吉亚	—	70.0
土库曼斯坦	68.3	52.7
乌兹别克斯坦	76.0	54.6

来源: 《联共(布)的民族政策数据》(莫斯科, 1930年), 第209—212页。

因此，到 1927 年民族（即非俄罗斯）共产党员的数量大幅增加。在民族共和国和州，地方民族在共产党员中占很大比例并在苏维埃所有层级行政机关中占到多数。布尔什维克在拉拢和任用民族共产党人方面取得成功是建立稳定的民族领土单位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尽管一些前民族主义政党成员仍然在共产党中担任要职，但到 20 世纪 20 年代末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来自任何其他政党的背景，而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努力培养民族干部而新聘用的。

总的来说，布尔什维克招募民族共产党人的政策成功创造了一种氛围，使少数民族文化和民族自我认同可以在满足非俄罗斯人大部分意愿的领土和政治制度中蓬勃发展。这意味着要让出比理想情况下更大的影响力给那些思想最终表现为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相悖的分子。但布尔什维克早期准备在多大程度上将权力交给这样的人，值得让我们怀疑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是否僵化。应当指出，虽然苏丹-加利耶夫在 1923 年被指控表现出最严重的民族主义的偏差，但在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这种偏差的其他象征却表现在资深可靠的布尔什维克身上。事实上，民族共产党人对 20 世纪 20 年代国家政策方向的影响的最有力证明是他们的思想多大程度上被许多资深布尔什维克采用，通常会使他们陷入与莫斯科的争端中。布尔什维克招募民族主义者的成果不亚于民族主义者本身的适应能力，这表现在新皈依的民族共产党人在许多领域担任权威地位的时间比在边境地区领导过革命的老布

尔什维克更长，直到他们也在 20 世纪 30 年代几乎被斯大林清洗得只剩他一个人为止。

第6章 “文化自治”——教育、语言和文化

拥有坚实民族人口和自己民族的共产主义领导层的民族领土有效地赋予了少数民族民族认同感。但这些政策的长期目标是“提高非俄罗斯族的文化水平”。正如斯大林在1918年4月所说的那样，

但是在那些居民文化落后的边疆地区，苏维埃政权还没有能够成为这样的人民政权……由于这些边疆地区的生活条件和语言条件，再加上经济落后，使那里的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工作有些复杂了……必须把群众[……——译者]提高到苏维埃政权的水平……¹

虽然这里的“文化”是广义的，包括经济发展，但这项政策的核心是通过教育和艺术来改善狭义的文化。随着国家政策的发展，文化应以民族形式弘扬并开始接受包括宗教在内的传统文化形式。国家教育和文化方法有助于进一步巩固民族认同。在俄罗斯帝国的每个地区，除了少数较小的欧洲少数民族外，少数民族的文盲率甚至比俄罗斯族

¹ 斯大林，第4卷，第75页（译者注：见《当前任务之一》，载于《斯大林全集》（北京，1953年），第4卷，第69—70页）。

更高。²这个事实使促进国民教育变得更加紧迫。已经指出，早期民族共产党人广泛参与教育和文化活动对这个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布尔什维克如今认可的母语教育的首要地位的理念，始终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崩得、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何鞑鞑扎吉德运动思想的核心。而语言的重要性不只局限于教育体系：

只要突厥斯坦的劳苦者在他们的机构里不说他们的母语，我们所有关于苏维埃政权的讨论都是空洞的。苏维埃政权与每一个资产阶级和君主制政权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充分代表了劳动群众的真正日常利益，但这只有在苏维埃机构以母语运作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我们需要尽快用当地居民的母语进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因为这很大程度决定着我们在东方的革命的进一步成功。³

这不仅意味着与俄罗斯官员和定居者的艰难斗争，而且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在中亚等地区，在使用多种基本语言的多种方言的地区，什么才算作“母语”。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制定一项语言计划政策，而该政策本质上是复杂且有争议的。

如果要实现国家的发展，就需要一种易于识别的民族文化，为此，采取了许多措施来促进独特的文化传统。本着大致相同的精神，但也

² 《联共（布）的民族政策》，第 273 页。

³ 哈基莫夫，第 119 页。

为了避免疏远非俄罗斯族，政府通过了重大的让步，对非东正教宗教表现出了极其宽容的态度。

少数民族教育

1917年以前，俄国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教育并不重视，事实上，这种活动是被积极反对的。某些人在某个时候促进教育，并取得了巨大的效果，其中包括列宁的父亲和他的密友 N.I. 伊尔明斯基，⁴但另一方面，总的来说，非俄罗斯族并没有从地方自治局和俄罗斯东正教的教育活动中受益。所以边境地区的学校比例比俄罗斯中部少得多，内战期间学校建筑的毁坏加剧了这种情况。一个更普遍的问题是缺乏训练有素的教师和母语教科书。鉴于任务的规模，到 1927 年，共产党人在本土化学校方面取得的成功确实令人瞩目。

尽管用少数民族的母语教育在布尔什维克中引起了一些争议，但非俄语的支持者占了上风。⁵朝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个切实行动是，1918 年 5 月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和教育人民委员部成立了一个文化和教育事务联合委员会。⁶但直到 1918 年底，关于少数民族教育的倡

⁴ 伊莎贝尔·克兰德勒，《列宁民族政策的一个被忽视的来源》，载于《斯拉夫评论》，第 36 卷，第 1 期，1977 年 3 月，第 86—100 页。

⁵ 有关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对少数民族教育的态度的更多信息，见我关于该主题的文章：《少数民族的教育：早期苏联经验》，《斯拉夫和东欧评论》，第 75 卷，第 2 期，1997 年 4 月，第 281—287 页，这个部分的其余大部分内容基于这篇文章。

⁶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 1318，目录号 1，第 25、27、29 页。

议主要由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民族人民委员部和局负责，每个部和局都有一个专门的文化教育部门。这些部门被指示

改革所有的现有学校，使其对本国民族有意义并引入母语教学；在苏维埃劳动学校的基础上开办新学校；设立人民教育机构委员会；制作母语教科书；开展广泛的学前教育与成人教育以及技术与专业教育。⁷

到年底，《民族生活》报告了许多进展：在伏尔加地区和边境地区开设了多所新学校，⁸在莫斯科和其他地方为白俄罗斯难民建立了学校，⁹在莫斯科开设了一所犹太神学院，¹⁰马里地区开设了教师培训课程等等。¹¹然而，这些努力大部分都集中在莫斯科，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未能建立任何国家机构来处理教育问题。尽管斯大林的声明中暗示了这项任务的紧迫性，但总的来说进展缓慢。

S.M.季曼施泰因 1918 年 12 月发表在《民族生活》上的关于少数民族教育的一系列文章中，可以清楚看出这种延误的两个关键原因。

⁷ 《民族生活》，第 3 期，1918 年 11 月 24 日，第 8 页。

⁸ 《民族生活》，第 6 期，1918 年 12 月 15 日，第 1 页。

⁹ 《民族生活》，第 2 期，1918 年 12 月 22 日，第 7 页；《民族生活》，第 5 期，1918 年 12 月 8 日，第 7 页。

¹⁰ 《民族生活》，第 2 期，1918 年 12 月 22 日，第 7 页。

¹¹ 《民族生活》，第 6 期，1918 年 12 月 15 日，第 7 页。

第一个问题是财务问题；文化教育委员会提交了 1918 年下半年的巨额预算，但政府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只满足了其中的一小部分。¹²

第二个问题是许多官员的态度，他们与列宁和其他人在少数民族问题上所奉行的路线格格不入，以季曼施泰因本人为代表，他不仅是犹太人民委员部的负责人，也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在教育方面的主要发言人。在他的第一篇文章中，他只提到需要消除文盲作为改善少数民族教育的动机。¹³在他的第二篇文章中，分别在《民族生活》杂志的两个期刊上发表，他走得更远。他首先抨击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和崩得主义者提倡民族学校的理论，认为这将鼓励民族主义，而且平等对待富人和穷人将帮助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占据主导。相比之下，他本人是一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虽然这并不与“争取民族语言”相矛盾，但这意味着他反对任何可能促进民族团结而非阶级斗争的举动。革命推翻了一个民族的统治，消除了对俄国人的恐惧，完全消除了对民族保障的需要。因此，“许多教育问题与民族无关，只涉及语言问题”。因此，少数民族的教育大多沦为“翻译问题”。教育的目的是鼓励各民族团结，民族学校的优先事项之一是向每个孩子教授每个地区的主要语言（不一定是俄语）。“每个工人都必须知道在同一工厂与他一起工作的同志的语言”，这在经济上至关重要。因此，季曼施泰因支持将少数民族教育的责任移交给教育人民委员部，因为这

¹² 同上，第 1 页。

¹³ 同上。

将集中资源并确保采取非沙文主义、国际主义的教育方法。¹⁴根据这种方法，语言是少数民族教育中唯一的特殊因素，除非是现实原因导致非俄族儿童无论如何都需要学习第二语言，否则他们将接受与俄罗斯儿童相同的教育，因为民族压迫的消失消除了对任何进一步的保障措施的需求。

但季曼施泰因的这些观点遭到了穆斯林人民委员部和许多其他民族事务人民部以及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地方部门的反对，也与斯大林关于提高民族文化重要性的观点冲突。季曼施泰因认为对大俄罗斯统治的恐惧已经消除，列宁和许多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当然不赞同这一点。然而，国际主义者和民族学校的支持者都支持将责任移交给教育人民委员部；前者是因为教育的集中化会促进国际主义，后者是因为教育人民委员部拥有更多的资源可供使用。然而，在1918年7月同意移交责任时，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对应恰当解决的民族问题表达了关切，强调要妥善处理民族因素，坚持要求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人民委员部和局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委员会中都有代表，并保留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自己开办民族学校的权利与普遍行使主动权和控制权。¹⁵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在移交后继续对国民教育施加相当大的影响力，其提名人巴维尔·马金齐安被任命为教育人民委员部少数民族教育部门的主任。¹⁶

¹⁴ 《民族生活》，第7期，1918年12月22日，第3页；《民族生活》，第8期，1918年12月29日，第3页。

¹⁵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1318，目录号1，卷宗号1，第46—47页。

¹⁶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1318，目录号1，卷宗号1，第86页。

教育人民委员部对民族教育的要求表现出极大的接受度。此时，教育人民委员部正在热衷于推动苏维埃儿童的全面文化发展，自然而然地认为，如果以民族形式来推动它就可以最有效地实现这一点。

因此，将少数民族教育的责任从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转移到教育人民委员部，利用教育人民委员部领导层的巨大热情和人民委员部在财政和物质资源上的优势，这些资源远远超过民族人民委员部可用的资源。1918年10月底，教育人民委员部在《消息报》上发表了关于少数民族学校的提案：

- (1) 居住在苏俄的所有民族都有权在统一工人学校[小学]和联合劳工学校[高中]一级组织以母语授课。
- (2) 只要某地有足够数量的少数民族学生以组织学校，就应开设少数民族学校。每个年龄组的人数要求不少于25名学生。
- (3) 为了文化融合和发展各民族劳动者之间的阶级团结，将在少数民族学校中引入对特定地区[州]最多人口的语言的研究。
- (4) 少数民族学校是公立学校，各方面都受《全俄中执委消息报》第225期中公布的联合劳动学校的规定约束。
- (5) 少数民族学校的所有管理都集中在教育人民委员部，以及州或省教育人民委员部

注1：为了管理少数民族学校，设立一个隶属于教育人民委员

部的特别部门，它的委员会应包括[与教育人民委员部成员]同等数量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代表，这些代表要经过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最终批准。

注2：为管理地区的少数民族学校，州和省的部门应在与中央相同的基础上组织分派[地区内每个少数民族一个]部门。¹⁷

虽然这个法令并没有完全保证每个儿童都能接受母语教育，但每个年龄组 25 名学生的要求意味着相对较小的少数民族社区理论上可以要求单独的的学校。对国际主义的唯一让步是要求教授第二语言，但少数民族教育将在不同学校进行；没有考虑满足同一学校内不同民族群体需求的可能性。

1919 年 2 月，教育人民委员部发布的关于在各地区组织少数民族教育分部的指示中，少数民族教育的独立性更加明显。州、省或县级组织一个这样的分部以涵盖地区的所有少数民族，而不是由各个少数民族群体组织起来；不过他们的委员会主要由当地少数民族的代表组成，但要经地区教育部批准。分部对少数民族的所有文化教育机构和教学机构拥有权力，其职责是：

(1) 开办和组织[教育]机构，将其融入国家网络。

¹⁷ 《全俄中执委消息报》，1918 年 10 月 31 日，第 4 页。

- (2) 编制聘任各单位负责职位的候选人名单。
- (3) 以当地语言为借阅图书馆备书。
- (4) 监督和批准机构的账目。
- (5) 编制少数民族教育状况的统计数据。
- (6) 发布有关文化教育事项的信息和指示——以正确的语言。
- (7) 消除文化教育工作中的有害现象（如民族主义），领导和监督所有教育工作。¹⁸

因此，分部对少数民族教育的人事、经费和内容负有广泛的责任，并对防止民族主义在教育系统中盛行负有政治责任。最后一项规定可能旨在先发制人地压制那些将民族学校视为民族主义温床的敌对分子的反对意见。教育人民委员部意识到可能与俄罗斯族主导的苏维埃机关发生冲突，在指令中又增加了两段以加强对少数民族的帮助；首先，少数民族教育分部与其名义上隶属于的地区教育部之间的任何分歧都应直接提交至莫斯科的教育人民委员部。其次，在分部的最初组织中，地区教育部应与民族的人民委员部的地方部门平等分担责任。

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权力仅延伸到苏俄，但其他苏维埃共和国也采用了类似原则。1919年的苏维埃乌克兰临时政府在其最早的宣言之一中下令“统一工人学校的教学语言将取决于当地工人和农民的意

¹⁸ 《全俄中执委消息报》，1919年2月14日，第2页。

愿”。¹⁹尽管布尔什维克最初对乌克兰民族形式的敌意减少了乌克兰学校的数量,但随着1921年任命舒姆斯基为教育委员,1923年和1924年通过的一系列法律意味着教育领域的乌克兰化得到了推动,

所有儿童的教学都应以乌克兰语进行,因为乌克兰族占主体地位;少数民族组成一个紧密的群体,他们将得到母语教育的保障。乌克兰语和俄语在所有学校都被列为必修课,无论教学语言如何。²⁰

据H.涅亚米哈对白俄罗斯教育的研究,正是白俄罗斯民众的自发活动导致了1919年在最艰难的情况下建立了白俄罗斯学校。²¹除了自己的资源外,苏维埃共和国还从苏俄政府获得了教育特别信贷,1918年至1922年间,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各获得1000万卢布。²²据说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的学校本土化已于1921年完成,阿塞拜疆人、阿布哈兹人和奥塞梯人的学校要到1920年代末。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苏维埃化后不久就采用了母语教育原则。²³

¹⁹ 《民族生活》,第12期,1919年2月2日,第3页。

²⁰ 博赫丹·克劳琴科,《二十世纪乌克兰的社会变革与民族意识》(伦敦,1985年),第88页。

²¹ H.涅亚米哈,《“民族民主主义”被粉碎前的白俄罗斯教育1917—1930》,《白俄罗斯评论》,第1期,1955年,第38页。

²² A.E.伊斯梅洛夫和M.N.科尔马科娃,《苏联民族学校的形成与发展》,载于N.P.库金等人(编),《苏联各民族学校与教育思想史纲要》(莫斯科,1980年),第145页。

²³ 同上,第159—161页。

民族学校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几年迅速传播。在马里地区建造了六个“学城”以满足所有年龄段的需求，并为学生提供住宿。到1923年已有67所马里人学校。到1921年夏天，在巴什基尔，两个城市开设了三年制教学课程。²⁴1920/1921年，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州成立的前一年，卡巴尔德人有23所民族学校，但在第二年有57所，表明自治地位产生了影响；科米自治州在1922/1923年有159所学校。²⁵到1919年年中已经有51所卡尔梅克学校和100多所吉尔吉斯学校，以前只有10所。²⁶到1921年10月，《民族生活》报告说卡尔梅克地区的学校数量已增加到84所一年级学校和2所二年级学校，以及7所寄宿学校和9所“垦殖和外国”学校，招收5565名卡尔梅克儿童和449名俄罗斯儿童。²⁷据苏维埃来源，在整个中亚，本土学校的数量从1914—1915年的345所增长到1920年底的2022所，招收了165122名学生。²⁸仅在鞑靼自治共和国，1921年初就有2457所一年级学校，²⁹而在布里亚特自治州，有303所一年级学校，招收10940名布里亚特儿童，10所二年级学校，有700名学生。³⁰俄罗斯中心地

²⁴ 《民族生活》，第113期，1921年7月30日，第1页。

²⁵ 伊斯梅洛夫和科尔马科娃，第148—149页。

²⁶ 《民族生活》，第23期，1919年4月27日，第3页；《民族生活》，第24期，1919年5月4日，第2页。

²⁷ 《民族生活》，第118期，1921年10月3日，第3页。

²⁸ 阿米诺夫和巴巴霍德扎耶夫，第162—163页。

²⁹ 《民族生活》，第144期，1922年5月5日，第6页。

³⁰ 《民族生活》，第147期，1922年6月15日，第14页。

带的少数民族教育也得到了发展，尽管速度较慢，1921年，有29所学校为下诺夫哥罗德省的140000名鞑靼人提供服务。³¹

高等教育的本土化比学校更困难，这要归因于保守的俄罗斯人几乎垄断了高等教育职位。因此，直到1927—1928年，在总共5000名学生中只有350名本地穆斯林就读于塔什干大学，³²而1922年乌克兰只有19%的学院学生和16%的技术学院学生是乌克兰人。³³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竭尽全力纠正这种情况，在1918年它支持创建一所白俄罗斯大学³⁴并进行了一次旷日持久的斗争，以挽救弗拉季高加索的北高加索民族的理工学院免于1921年底被教育人民委员部关闭。³⁵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还多次干预以保留彼得格勒的拉扎列夫研究所作为亚美尼亚研究中心。³⁶让非俄罗斯人参与高等教育的最重要尝试是1920年主要由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倡议下在莫斯科成立的东方研究所。³⁷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保留了对研究所的控制权并于1922年4月任命苏丹-加利耶夫、易卜拉吉莫夫、马纳托夫、塔纳切夫和阿夫萨拉戈夫为委员会成员，强化了研究所的穆斯林民族主义性质。³⁸

³¹ 《民族生活》，第130期，1922年1月10日，第4页。

³² 卡雷尔·德恩科斯，《大挑战》，第189页。

³³ 克劳琴科，第91页。

³⁴ 《民族生活》，第20期，1918年4月6日，第3页。

³⁵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1318，目录号1，卷宗号8，第22、27、92、97页。

³⁶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1318，目录号1，卷宗号4，第51页；卷宗号8，第27、98、101—102页。

³⁷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1318，目录号1，卷宗号4，第54页。

³⁸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1318，目录号1，卷宗号9，第4页。

母语教育不仅在学校和大学中被设定为目标，而且在学前教育和成人教育中也被设定为目标。在巴什基尔，学前教育的供应高于后期教育阶段——1921年，94所幼儿园和305名教师为4840名儿童提供服务。³⁹1919年夏天举行的第一届全俄学前教育大会讨论了前崩得主义者埃斯特·弗鲁姆金编写的一份关于“民族幼儿园”的特别报告。大会得出的结论是，一般教育原则和民族政策一样，决定了幼儿园教育应该以儿童最能理解的语言进行：

我们必须努力为每个孩子提供快乐、自由和创造性发展的条件，这意味着学前教育必须以他们实际使用的母语[*родном языке*]提供，无论他们属于哪个民族。

大会要求教育当局提供熟悉母语与文化的工作人员和母语教科书。在一份针对强硬国际主义者的声明中，大会决议：

国际主义精神不是通过将无法相互理解的孩子混为一谈来实现的，而是通过用母语介绍世界革命精神来实现的。⁴⁰

³⁹ 《民族生活》，第118期，1921年10月3日，第3页。

⁴⁰ 《民族生活》，第28期，1919年6月1日，第2页。

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及其局还特别关注成年工人和农民的校外教育。在1918年4月26日的一个决议中，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坚持认为非俄罗斯族的校外教育应由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负责。它提议建立扫盲学校、“工人和农民成为识字者”的工人俱乐部、人民大学、教育工作者课程以及巡回剧院、博物馆和展览。⁴¹1919年3月，人民委员部为“十月革命”的文学教学列车配备了犹太人、乌克兰人、波兰人和穆斯林的讲师以及大量文学作品，以在这些地区巡回宣传。⁴²民族的人民委员部和局还将母语教育和宣传工作置于活动中心，成立扫盲俱乐部、举办文化活动并聘请学者翻译文学和历史作品。⁴³1919年4月，马里部门自夸“图书馆、阅览室、文化教育界、无产阶级俱乐部、人民之家正在开放。全国性表演、会议和聚会正在进行”。政府“给了他们[马里人]按照他们民族的过去建立生活的可能性”。⁴⁴这些活动后来在自治州和共和国中得到开展和扩展。

尽管早期有所改善，但对非俄罗斯儿童的教育供应仍然远远低于教育人民委员部在1918年设定的目标。困扰教育本土化的问题在1919年8月举行的全俄非俄语民族教育工作者特别会议上得到了明确的揭示。虽然没有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立陶宛人或外高加索人出席会议，但是17个语言群体有155名代表代表出席。几乎一半(74)

⁴¹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1318，目录号1，卷宗号1，第12页。

⁴²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1318，目录号1，卷宗号1，第97页。

⁴³ 《民族生活》，第3期，1918年11月27日，第8页。

⁴⁴ 《民族生活》，第22期，1919年4月20日，第4页。

是共产主义者，41名共产主义同情者，16名无党派者，12名崩德主义者，6名联合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人，5名锡安党人和1名无政府主义者。111人积极从事教育，因此整个大会广泛代表了同情教育人民委员部在少数民族教育方面的目标的教育工作者。在代表们中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对实现这些目标的进展感到不满。当被问及“您认为目前非俄语人士的教育组织是否令人满意？”只有19人回答是，88人回答不是。在讲台上的关键讲话中，卢那察尔斯基、季曼施泰因和马金西安赞扬了教育人民委员部接管少数民族教育以来取得的进展，同时警告要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学校站稳脚跟的危险作斗争。在场的演讲几乎无法提供比这更鲜明的对比。代表们非但没有担心民族主义影响的侵占，反而哀叹他们工作进展的障碍。主要投诉是针对人员和资源短缺，以及由俄罗斯人主导的当局在地区的阻挠态度。一个接一个的发言者讲述了当地苏维埃和教育人民委员部部门拒绝满足非俄罗斯人民需求的轶事。⁴⁵

大会的决议提出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后来被苏联历史学家誉为少数民族教育的转折点。⁴⁶但执行教育人民委员部的立场显然是艰苦的斗争。会议决定出台各种新的组织措施，并“认真关注省教育人民委员部门和其他苏维埃机关由于对少数民族文化需求了解不足而在少数民族教育工作道路上设置的障碍”。马金西安承认他所在部门的工作存在缺陷并承诺会有所改进。

⁴⁵ 《民族生活》，第40期，1919年8月24日，第2页；《民族生活》，第41期，1919年8月31日，第2页。

⁴⁶ 伊斯梅洛夫和科尔马科娃，第145页。

然而，在短期内，事实证明政府对训练有素的人员短缺和地方当局的阻挠态度无能为力。1920年1月，楚瓦什省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抱怨它没有必要权力来执行提高楚瓦什人经济和教育水平的基本任务。具体来说，地区官员忽视了楚瓦什人特殊的社会条件和语言。他们的工作原则是，由于更活跃的楚瓦什分子早已离开红军，留下了不会说俄语、无法参加苏维埃工作的老一辈人在学校和其他机构中，使用俄语可以打击民族主义。⁴⁷

干部短缺对民族局的工作造成了灾难性影响，尤其是教育，内战需求大大加剧了干部短缺。民族军事单位的建立意味着可靠的民族干部对于红军的政治工作来说非常宝贵。维亚茨克省乌德穆尔特局的一份报告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局从1919年开始只有一名主任，到3月有四名官员，但其中一名很快就被调去前线工作。4月底，局暂时完全关闭，因为其工作人员交由第三集团军政治部使用，5月初，乌德穆尔特人学校开学的准备化为泡影，因为教育人员被召集到前线，学校根本没有开学。在夏天，局只能召集13名学生进行乌德穆尔特人的教育和鼓动的“飞行运动”。⁴⁸卡尔梅克草原的教育部也登记了类似投诉——在一个地区，11名校长中有2人死亡，另外2人前往前线，没有替代者。

来自卡尔梅克地区的同一份报告说明了与内战直接相关的另一个问题。部门抱怨至少有四所学校因军队在学校建筑内驻扎被完全摧

⁴⁷ 《民族生活》，第59期，1920年1月11日，第1页。

⁴⁸ 《民族生活》，第58期，1920年1月4日，第2页。

毁，并威胁说除非军事当局采取行动阻止军队在学校驻扎，否则草原地区的教育可能不得不在 1920 年完全停止。⁴⁹ 鉴于校舍适合临时安置部队，这肯定是前线及其附近地区的普遍问题，严重影响了少数民族的教育工作。文化问题也阻碍了教育工作。1919 年 2 月，《民族生活》报道称“穆斯林中的大众教育经常与宗教狂热和传统习俗发生冲突”，⁵⁰ 在政教正式分离后，赫瓦林斯克的穆斯林农民拒绝送孩子上学。⁵¹

类似问题也影响了乌克兰的教育，尽管在这里，是苏维埃中央政府而非地方当局的态度被证明是一个障碍。尽管有 1919 年 2 月的法令，但根据博赫丹·克劳琴科的说法，他对布尔什维克在这个领域的早期成就总体上持负面看法，

当第一届和第二届布尔什维克政府在乌克兰成立时，国家已经拥有一个规模不大的乌克兰语学校网络。然而，布尔什维克并不信任这些机构，指控他们有乌克兰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并将许多乌克兰化的学校改回俄罗斯学校。尽管 1921 年宣布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在共和国平等，但当地全权代表“当他看到拿着用乌克兰语写的证书的老师或学生时，他经常会愤怒地激动起来，撕毁

⁴⁹ 《民族生活》，第 60 期，1920 年 1 月 18 日，第 3 页。

⁵⁰ 《民族生活》，第 12 期，1919 年 2 月 2 日，第 6 页。

⁵¹ 《民族生活》，第 20 期，1919 年 4 月 6 日，第 3 页。

它并盖章”。这种沙文主义在“两种文化之间的斗争”的表述中得到了理论上的正当性。⁵²

但这种构想很快就被放弃了，对乌克兰语教育更积极的态度得到了采用。从1917年几乎没有乌克兰语教师，到1923年，在100000名教师中，有45000名被认为有必要是乌克兰语教师，从1924年起，乌克兰语教科书的印刷量急剧增加。⁵³

内战后，情况稳步好转，人员从红军转移到新成立的自治州和共和国，特别是从事教育工作，⁵⁴他们的人数不断增加，他们的做法深受民族共产党人的影响。1920年初，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出版部门来监督非俄语的出版物，⁵⁵并于5月与教育人民委员部一起就特别纸张供应谈判以满足少数民族的教育需求。⁵⁶到1924年，苏联出版了25种不同的语言的书籍，次年增加到34种，1927年增至44种。到1922年6月，政治局通过成立一个由每个自治州和共和国的代表组成的联邦教育委员会来提高少数民族教育的地位，它隶属于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但有权直接向全俄中执委或人民委员会

⁵² 克劳琴科，第87页。

⁵³ 同上，第87—88页。

⁵⁴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1318，目录号1，卷宗号6，第82页。

⁵⁵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1318，目录号1，卷宗号4，第3页。

⁵⁶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1318，目录号1，卷宗号4，第40页。

提出请求。⁵⁷1920年代对穆斯林的政教分离也放宽了，允许政治局在1923年10月授权组织穆斯林精神学校，从而帮助克服穆斯林父母对教育系统的抵制。⁵⁸

到这个时候，自治州和共和国比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和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部门拥有更多权力，民族共产党人已经将积极和有经验的国民教育方法带入了共产党和行政部门，中央反对文化民族主义危险的态度已经软化。1923年的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强化了国民教育原则，它在整个1920年代得到了大力推广，特别是在加盟共和国，使用民族语言成为教育和行政的常态。1927年12月进行的一项综合调查说明了苏维埃在非俄罗斯人教育方面取得了多大的进步。表6.1显示，在他们自己的共和国中，儿童的母语教育几乎已全面铺开。

在自治州，情况有些不同，儿童应用本国语言和周边地区的主要语言学习的原则，使得儿童更有可能用两种语言学习，除了主要用俄语学习的卡尔梅克人（表6.2）。这个原则也适用于较小的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和达吉斯坦（表6.1）。

⁵⁷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17，目录号3，卷宗号299，第9页。

⁵⁸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17，目录号3，卷宗号385，第4页；卡雷尔·德恩科斯，《大挑战》，第166—167页。

“文化自治”

表6.1 非俄罗斯儿童在本国的母语教育 1927年12月

共和国	仅用母语教学的百分比
<i>苏维埃共和国</i>	
乌克兰	93.9
白俄罗斯	90.2
格鲁吉亚*	98.1
阿塞拜疆*	95.5
亚美尼亚*	88.3
乌兹别克斯坦	96.9
土库曼斯坦	93.5
<i>自治共和国</i>	
哈萨克斯坦	89.1
吉尔吉斯斯坦	94.9
巴什基尔	50.0
布里亚特-蒙古	45.2
达吉斯坦（戈尔西）	15.4
达吉斯坦（库米斯）	8.9
卡累利阿（芬兰）	42.2
克里米亚（鞑靼）	90.6
伏尔加德意志	98.2
鞑靼	95.7
楚瓦什	92.3

注释

*仅给出外高加索联邦整体中各民族的数字。

来源：《联共（布）的民族政策》（莫斯科，1930年），第278—279页。

表6.2 自治州内有名义的民族儿童的民族语言和混合语言教育 1927年12月

自治州	仅用母语教学的百分比	用两种语言教学的百分比
沃提克	2.7	86.0
卡尔梅克	8.6	—
科米	48.6	49.9
马里	49.8	46.4

来源：《联共（布）的民族政策》，第278—279页。

到 1927 年，对自己的共和国或州以外的少数民族进行的母语教育也已普及。白俄罗斯四年制和七年制学校的数字说明 1927 年民族学校种类繁多（表 6.3 和 6.4）。白俄罗斯的每个少数民族用自己的语言，或者用自己的和另一种语言授课的比例为：俄罗斯人——67%，波兰人——48.2%，犹太人——57.1%。⁵⁹

表 6.3 苏维埃白俄罗斯的四年制学校 1927 年 12 月

语言	学校	教师	学生
白俄罗斯语	4363	6153	296182
意第绪语	146	445	11212
波兰语	129	162	6159
俄罗斯语	118	289	11299
混合俄罗斯语/白俄罗斯语	362	646	29746
其他	45	76	2060
总数	5163	7771	356658

来源：H.涅亚米哈，《“民族民主主义”被粉碎前的白俄罗斯教育 1917—1930》，载于《白俄罗斯评论》，第 1 期，1955 年，第 53 页。

表 6.4 苏维埃白俄罗斯的七年制学校 1927 年 12 月

语言	学校	教师	学生
白俄罗斯语	176	2193	66563
意第绪语	53	733	13778
波兰语	12	145	2627
俄罗斯语	18	305	7910
混合俄罗斯语/白俄罗斯语	40	600	15988
其他	9	180	4078
总数	308	4156	110944

来源：H.涅亚米哈，《“民族民主主义”被粉碎前的白俄罗斯教育 1917—1930》，载于《白俄罗斯评论》，第 1 期，1955 年，第 53 页。

⁵⁹ 《联共（布）的民族政策》，第 278 页。

“文化自治”

表6.5 少数民族儿童的教学语言 1927年12月 (%)

共和国民族	民族语言	母语和第二语言	仅俄语	其它
<i>苏俄</i>				
白俄罗斯人	0.9	7.1	90.5	1.5
乌克兰人	5.5	12.8	81.4	0.3
拉脱维亚人	19.6	15.5	61.8	3.1
波兰人	4.5	1.4	92.5	1.6
德意志人	84.2	5.0	10.5	0.3
犹太人 (意第绪)	8.0	3.1	86.6	2.3
鞑靼人	82.3	8.6	7.5	1.6
哈萨克人	88.6	5.9	4.4	1.1
吉尔吉斯人	90.5	0.2	4.6	4.7
楚瓦什人	77.6	16.7	5.2	0.5
<i>苏维埃乌克兰</i>				
俄罗斯人	67.1	14.1	—	18.8
波兰人	45.7	6.6	3.9	43.8
德意志人	84.6	4.7	3.6	7.1
犹太人 (意第绪)	49.6	3.4	19.6	27.4
摩尔达维亚人	49.0	14.2	6.2	30.6
<i>苏维埃白俄罗斯</i>				
俄罗斯人	44.2	22.8	—	33.0
波兰人	47.4	0.8	2.4	49.4
犹太人 (意第绪)	55.5	1.6	11.5	31.4
<i>苏维埃乌兹别克</i>				
俄罗斯人	94.6	4.8	—	0.6
犹太人 (意第绪)	62.3	0.0	31.9	5.8
鞑靼人	30.4	9.1	25.2	35.3
亚美尼亚人	33.0	6.8	59.1	1.1
土库曼人	33.0	—	—	67.0
哈萨克人	63.7	1.4	1.1	33.8
塔吉克人	74.1	4.7	0.2	21.0
<i>苏维埃土库曼</i>				
俄罗斯人	85.7	14.2	—	0.1
亚美尼亚人	25.6	20.5	49.1	4.8
土耳其人	72.9	9.6	1.7	15.8
乌兹别克人	70.2	7.6	1.6	20.6

共和国民族	民族语言	母语和第二语言	仅俄语	其它
<i>苏维埃塔吉克</i>				
俄罗斯人	97.7	1.7	—	0.6
乌兹别克人	85.5	—	1.7	12.8
乌克兰人	—	—	98.3	1.7
<i>苏维埃克里米亚</i>				
鞑靼人	90.6	7.4	1.9	0.1
俄罗斯人	93.6	4.3	—	2.1
犹太人（意第绪）	10.0	9.7	78.4	1.9
乌克兰人	1.9	—	96.6	1.5
<i>苏维埃鞑靼</i>				
俄罗斯人	96.6	2.8	—	0.6
楚瓦什人	71.7	20.6	6.4	1.3

来源：《联共（布）的民族政策》，第 278—279 页。

然而，苏维埃所有民族的情况并不相同。表 6.5 显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对德国人和穆斯林的母语教育得到了很好的满足。大约一半的波兰和犹太儿童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接受了母语教育，但在苏俄只有一小部分接受了母语教育。同样，苏俄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学校相对较少。这反映了，与苏俄相比，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教育人民委员部受到崩得分子和社会革命党影响，对母语教育的重视程度更高。另一方面，苏俄的德国人、鞑靼人、哈萨克斯坦人和吉尔吉斯人大多生活在紧凑的社区中，在民族或宗教身份方面有明显区别，而生活在苏俄的犹太人、波兰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中的同化程度更高，来自这些民族群体的父母可能认为俄语教育对孩子的进步至关重要。这同样

适用于吉尔吉斯、哈萨克斯坦和克里米亚，那里很少或根本没有乌克兰语教育的规定。

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吉尔吉斯共和国的数字反映了中亚民族的民族分化相对强度，以及不同共和国对少数民族教育的重视。虽然大多数土库曼儿童在苏维埃乌兹别克用乌兹别克语接受教育，但在苏维埃土库曼，接受母语教育的乌兹别克斯坦儿童的数字是相反的，在苏维埃吉尔吉斯，乌兹别克斯坦儿童的数字更明显。塔吉克人和哈萨克人比苏维埃乌兹别克的土库曼人更有可能接受本民族语言教育。

在所有共和国中，少数民族儿童同时以本民族语言和主体民族语言接受教育的人数相对较低。（双语学校仅在俄罗斯联邦的自治州较为普遍——表 6.2）。因此，教育人民委员部概述的双语原则已被放弃。虽然这可能有实际的考虑，但很明显，优先事项已经发生了变化。教育人民委员部支持双语，因为它促进了“文化聚集和阶级团结的发展”。⁶⁰1923 年关于外高加索国家和平的声明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我们必须]加强团结所有民族的农民和工人的工作，使他们了解其他民族工农的历史、文化和斗争，并在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中培养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⁶¹

⁶⁰ 《全俄中执委消息报》，1918 年 10 月 30 日，第 4 页。

⁶¹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 5，目录号 2，卷宗号 31，第 6 页。

这种做法没有得到系统性推行。反而是优先考虑确保每个儿童都以鼓励他或她认同自己的民族的方式接受教育。对于那些在苏联境内没有特定领土的民族也是如此。因此，1928年有150多所拉脱维亚学校在运营。⁶²对于犹太儿童，希伯来语教育于1919年8月被教育人民委员部废除，⁶³但意第绪语学校在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稳步扩张，如表6.6所示。

如前一章所指出，许多布尔什维克可能认为在教育中雇用民族主义者是使这些人远离更重要的政治和经济结构的一种方式。但他们在教育网络中的存在不能不帮助加强总体的本土化政策，特别是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教育人民委员部参与民族问题也许是出乎意料的，也强化了民族的自我认同。尽管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地方部门经常被证明阻碍了少数民族的需要，但委员会总体上思想自由的领导层全力支持母语教育。虽然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没有直接参与少数民族问题的的工作，但她在教育人民委员部领导层中的存在可能比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情况与列宁的思想有更直接的联系。学校的本土化可以被视为布尔什维克国家政策中最重要和最持久的要素之一。1920年代采取的措施确保了民族意识在1930年代的俄罗斯化中幸存下来。

表6.6 白俄罗斯、乌克兰和苏俄意第绪语学校的增长 20世纪20年代

⁶² 伊斯梅洛夫和科尔马科娃，第158页。

⁶³ 哈列维，第132页。

“文化自治”

年份	白俄罗斯		乌克兰		苏俄	
	学校	学生	学校	学生	学校	学生
1922	106	10475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1923	98	12241	不适用	不适用	83	10000
1924	不适用	不适用	268	42000	83	12884
1925	140	19085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1926	175	22535	不适用	58384	118	12193
1927	184	24073	不适用	69000	不适用	6315 ⁱ

注释 i: 不包括戈梅利州，它于 1926 年划归苏维埃白俄罗斯。

来源: 兹维·哈列维, 《沙皇主义和共产主义下的犹太学校》(纽约, 1976 年), 第 176—178 页。

语言计划

与教育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语言问题。几年前, 列宁曾认为俄语将通过自发过程成为俄罗斯帝国的通用语言, 但很快就发现苏维埃的语言政策将基于完全不同的假设和考虑。⁶⁴ 尽管语言计划的当务之急是针对行政部门的, 但从长远来看, 各民族语言的标准化将有助于民族团结和自我意识, 并且需要通过教育系统传播。在俄罗斯帝国, 许多语言群体被分裂成许多方言, 有些彼此接近, 有些更加分化, 许多语言没有书面形式。前政权的俄罗斯化政策意味着官方很少关注其他语言, 但尽管如此, 对帝国不同语言进行了大量学术研究并为早期苏维埃政策提供了许多科学基础。出于实际和政治的因素, 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是必要的; 如果要用儿童的母语接受教育, 那么就需要就一种可能有多种方言的語言的标准版本达成协议, 以制作教科书和其他教材

⁶⁴ 列宁, 《列宁全集》, 第 24 卷, 第 295 页; 史密斯, 《少数民族教育: 苏联早期实践》, 第 283—286 页。

并培训教师。苏维埃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州的行政管理需求也需要标准化的行政语言。

同时，目标为促进民族凝聚力的国家政策要求同一民族群体的成员，无论其定义如何，都使用相同语言。为此，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和教育人民委员部于1920年5月同意成立一个联合委员会负责研究和发​​展语言和文字，特别是针对更“落后”的民族。⁶⁵1921年6月，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成立了一个单独的委员会负责标准化自治共和国与州的语言。⁶⁶同年，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赞助了突厥斯坦、基连人和北高加索的民族志和语言研究。⁶⁷根据西蒙·克里斯普对早期苏维埃语言计划的研究，也是本节大部分内容的基础，

革命后……人们试图将这些语言的科学研究置于更系统的基础上，首先是成立了以杰出学者为首的研究机构，它们从事了许多语言考察来研究语音系统和方言分布。⁶⁸

⁶⁵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1318，目录号1，卷宗号4，第40页。

⁶⁶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1318，目录号1，卷宗号6，第110页。

⁶⁷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1318，目录号1，卷宗号6，第9、51、220、225页。

⁶⁸ 西蒙·克里斯普，《苏联语言计划1917—1953》，载于迈克尔·柯克伍德（编），《苏联的语言计划》（伦敦，1989年），第25页。

沙皇时代的专家，如 E.F.卡尔斯基，在苏维埃政权手下被授予重要职位并继续研究和发展语言。⁶⁹所有这些工作的结果是产生了许多规范化的语言，将用作行政和教育的标准，而以前可能有很多方言。

应该选择哪种方言作为基础往往是有问题的。乌兹别克语就是这种情况，一开始乡村方言受到偏爱，但后来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中心城市地区占主导的方言，特别是塔什干。克里斯普认为，选择这种方言的原因是“方言基础的改变产生了将乌兹别克语与中亚其他突厥语区分开来并强调其独立地位的效果”，⁷⁰在同一卷中，希林·阿基纳将方言辩论视为“民族主义”派系和亲俄派之间的政治斗争，后者通过选择更适合工业化要求且俄罗斯学者更熟悉的城市方言而获胜。⁷¹虽然一般政治考虑可能影响了方言的选择，但很明显，任何形式的乌兹别克语标准化都符合民族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的目的。

一般来说，选择方言的优先顺序与其说是它的口语使用程度，不如说是它在书面语言文学传统中的作用，或者它在以前未成文语言的情况下适应书面形式的适用性。巴什基尔语、吉尔吉斯语、卡拉卡尔帕克语、卡巴尔丁语、巴尔卡尔语、车臣语、印古什语、切尔克斯语、卡拉猜语和两种奥塞梯语言迪戈尔语与伊龙语就是这种情况。⁷²

⁶⁹ E.F.卡尔夫茨基，《苏联境内俄语科学研究概述》（列宁格勒，1926年），第95页。

⁷⁰ 克里斯普，第32页。

⁷¹ 希林·阿金纳，《乌兹别克斯坦：多语言共和国》，载于迈克尔·柯克伍德（编），《苏联的语言计划》，第104页。

⁷² 卡雷尔·德恩科斯，《大挑战》，第178—180页。

从非俄罗斯族和行政需要的大众教育的角度来看，将语言合并为标准书面形式具有完美的实际意义。但从所选择的形式中可以清楚看出，政治和文化考虑往往凌驾于实际权宜之计之上。在卡累利阿，芬兰语被选为卡累利阿三大方言之前的官方语言的原因是其文化和文学联想，也是为了满足芬兰共产党人的偏见，他们认为俄罗斯卡累利阿与芬兰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尽管 1923 年苏维埃卡累利阿只有 101000 多名芬兰人。如保罗·奥斯汀所指出，“如果目标是给卡累利阿土著居民……一种实用的书面语言，从严格的语言角度来看，创造书面卡累利阿语将是最明智的解决方案。”⁷³

克里斯普得出结论

在讨论措施背后……存在着一种对语言关系的态度模式……在苏维埃政权的早期，重点是沙皇政权下或多或少受到压迫的人民的语言传统。为了赢得各民族合作的需要，加上列宁自己对语言平等的看法（无论动机是什么），意味着较大民族能够发展他们现有的语言传统，即便这些语言具有不理想的宗教或文化关联，而较小和人口较弱的民族则被鼓励团结在文化上享有盛誉的邻国的更发达的语言周围。

⁷³ 保罗·M·奥斯汀，《苏维埃卡累利阿语：一门失败的语言》，《斯拉夫评论》第 51 卷，第 1 期（1992 年），第 16—20 页。

这些政策的背后是“致力于将民族语言作为文化和进步的主要载体的氛围”。⁷⁴通过向非当地民族的官员和管理人员提供激励措施，进一步鼓励在行政中使用当地语言，如果他们精通适当的语言，可以获得 10% 的工资奖金。⁷⁵

虽然语言合并加强了民族分化，但国际主义和政治与经济中央集权的压力表明，全苏联人民的共同语言具有实际和政治意义。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和教育人民委员部认真考虑了这个问题。把世界语作为国际语言引入的方案甚至也有其支持者，尽管这种解决方案作为空想被拒绝。⁷⁶最实际的解决方案是普遍使用俄语，但这在政治上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即使列宁在 20 世纪 20 年代去世后，它也很少得到官方支持。20 世纪 20 年代最有影响力的苏联语言学家之一是尼古拉·雅科维利希·马尔，根据克里斯普的说法，他的理论，

在它们的原始形式中，它表明通往社会主义未来的语言之路不在于稳定的双语甚至语言转变，而在于语言交叉的过程，所有语言都将为这个过程做出贡献，并导致直接反映人类政治发展的更高阶段的混合体。⁷⁷

⁷⁴ 克里斯普，第 36—37 页；卡雷尔·德恩科斯认为语言标准化是布尔什维克“分而治之”策略的一部分；卡雷尔·德恩科斯，《大挑战》，第 177—178 页。她的相关观点已在前文讨论，第四章。

⁷⁵ 哈基莫夫，第 119 页。

⁷⁶ 《民族生活》，第 44 期，1919 年 9 月 21 日，第 4 页。

⁷⁷ 西蒙·克里斯普，第 37 页。

马尔的理论认为这样的过程是自发的。列宁本人在 1914 年曾认为学习俄语的意愿会自发产生。⁷⁸既然这些理论被接受，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这个阶段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推广通用语言，尽管印度陆军声称在开发混合印度斯坦语作为指挥语言方面取得了成功（印度斯坦语现在在印度电影中被广泛使用），这支持更积极的政策可能会产生一种可行的*通用语言*。⁷⁹

然而，推广通用字母表的努力走得更远。最初需要为许多未成文语言设计文字，而相对较小的语言群体存在许多单独的文字，这导致了后勤问题。1918 年高加索山地民族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部门抱怨自己没有一台合适的印刷机，⁸⁰尽管在年底专门为其委托了一台印刷机，⁸¹1919 年 4 月，部门意识到它需要为印古什、奥塞梯和列兹金提供单独的印刷机。⁸²1921 年 4 月，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处理不同文字字体的制造和分销。⁸³然而，面对众多不同的字母系统，合理化字母系统的想法很快就占了上风。扎吉德运动从 19 世纪 50 年代中期开始就专注于阿拉伯文字的改革，到 1918 年底，穆斯林人民委员部通过召开穆斯林正字法改革大会来继承这个

⁷⁸ 列宁，《列宁全集》，第 24 卷，第 293—295 页。

⁷⁹ 印度高级专员公署驻伦敦军事顾问 B.S.马利克准将致布赖恩·皮尔斯的信件，1992 年 6 月 24 日。

⁸⁰ 《民族生活》，第 3 期，1918 年 11 月 24 日，第 8 页。

⁸¹ 《民族生活》，第 7 期，1918 年 12 月 22 日，第 7 页。

⁸² 《民族生活》，第 23 期，1919 年 4 月 27 日，第 4 页。

⁸³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 1318，目录号 1，卷宗号 5，第 65 页。

传统。⁸⁴1919年9月发表在《民族生活》上的一篇文章中，M.舒尔曼描述了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少数民族教育部关于为所有语言引入统一拉丁文字的讨论：尽管它引起了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但这种举动“在共同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时刻是自然的”。此举的支持者认为这将有助于将不同民族聚集在一起，因为它将更容易理解另一种语言的著作。计划的反对者指出学习另一种语言比学习另一种文字要困难得多，因此改革在这方面几乎无济于事，并认为它行不通，因为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声音和口音，而且不能在语音上等同。改革将使书籍印刷变得更容易，但另一方面，教成年人新文字会很困难，而孩子们不应该只学习拉丁文字，因为这会限制他们接触自己文化的机会，直到更多作品被用新文字转录。舒尔曼得出的结论是，在新一代取代当前一代之前，使用单一的统一文字才能完全实施，到那时文化水平将如此之高，以至于每个人都会知道几种语言，统一的文字才会变得真正有意义。⁸⁵

马尔的理论假定西里尔字母“与俄罗斯的资本主义过去联系在一起，而通往社会主义未来的唯一道路在于普遍采用拉丁字母”。所有语言的拉丁化对混合通用语言的预期发展至关重要，特别是他为阿布哈兹人设计并于1920年引入的形式（未成功）。⁸⁶阿塞拜疆从19世

⁸⁴ 《民族生活》，第5期，1918年12月8日，第7页。

⁸⁵ 《民族生活》，第44期，1919年9月21日，第4页。

⁸⁶ 西蒙·克里斯普，第31页。

纪中叶开始尝试使用拉丁文字，拉丁化也被视为一种革命举措，因为它有助于将革命输出到东方。⁸⁷

尽管其中许多论点是理想主义的、空想的甚至是奇怪的，但它们构成了苏维埃字母改革的基础。列宁被阿塞拜疆人说服，卢纳察尔斯基宣布赞成俄语拉丁化。⁸⁸1920年3月，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要求自己的所有局和人民委员部提交对提案的意见，启动了整个苏俄的拉丁化进程。⁸⁹

其他建议是现时发生的，包括伊兹梅尔·卡里莫夫提出提供通用的东方文字，但尽管共产主义运动内外持续反对，只有突厥语的拉丁化成为了现实。⁹⁰1922年，阿塞拜疆以法令通过了一种新的拉丁字母表，四年后在巴库举行的第一次全联盟突厥人代表大会以101票对7票、9票弃权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突厥语和相关语言的拉丁字母表。⁹¹有趣的是，大会上反对拉丁化的人是由当时不为人所知的民族主义者，鞑靼正统共产主义者G.伊布拉希莫夫领导的，他认为阿拉伯字母的历史主张是“鞑靼人文化连续性和语言活力的先决条件”。⁹²然而，他的反对意见没有得到重视，表6.7显示了根据1928年底进行的一项调查，字母表正式引入仅两年后在学习新字母表方面取得的进展。

⁸⁷ 同上，第26页。

⁸⁸ 同上，第28页。

⁸⁹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1318，目录号1，卷宗号4，第10页。

⁹⁰ 见《民族生活》，第一册，1924年，第31—44、164—167页的辩论。

⁹¹ 西蒙·克里斯普，第26—27页。

⁹² 罗利希，第151页。

“文化自治”

表6.7 1928/1929年度理解新突厥字母表的突厥-鞑靼语识字者比例

地区	新字母识字率百分比
阿塞拜疆	14.5
乌兹别克斯坦	13
土库曼斯坦	6*
巴什基尔	19
哈萨克斯坦	8
吉尔吉斯斯坦	13
达吉斯坦	10
克里米亚	18
北高加索	23
苏俄里的少数民族	13

注释

*全部人口，包括文盲。

来源：《联共（布）的民族政策》，第273页。

突厥语拉丁化是布尔什维克国家政策总体趋势的一个例外，它的目标是培养和保护文化传统。伊布拉希莫夫在突厥人代表大会上的演讲带有民族主义色彩，但符合中央目前接受的政策。拉丁化的实际论据是教科书和母语文学的强有力的供应从未达到理想水平，从纯粹后勤角度来看，拉丁化会有所帮助。但意识形态考虑是最重要的，这是国际主义似乎战胜了民族文化敏感性的一个领域。列宁对这个进程的支持说明他认为拉丁字母在民族压迫方面是中立的（可以假设他会对任何西里尔化的提议保持保留意见），而改革支持者提出的论点可能点燃了1920年代初盛行的对东方革命的乐观情绪的火花。

民族文化

语言改革不仅是一个纯粹的实际措施，在培育民族文化的任务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除参与教育外，民族的人民委员部和局的文化教育部门还着手推广母语的“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同时也广泛提供文学和历史著作。⁹³除了出版物外，部门还组织、推广和资助剧院、合唱团、音乐会、艺术展览、俱乐部和图书馆。⁹⁴对于像格鲁吉亚这样拥有丰富历史和文化的成熟国家来说，没有必要发明文化。在乌克兰等其他地区，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促进民族传统和文化的民族知识分子自由发挥作用就足够了。在民族认同薄弱的地方，有时可以通过大力推广过去的遗产来建立文化认同。甚至在苏维埃白俄罗斯宣布成立之前，白俄罗斯人民委员会就在特别努力普及白俄罗斯作家。⁹⁵这个政策在吉尔吉斯人中最为成功，他们于1925年就“开始建立建立在丰富的史诗民间传说基础上的文化传统”。⁹⁶

当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与其他艺术和历史运动试图在莫斯科与过去建立明显的决裂时，在非俄罗斯地区，趋势是促进民族的历史根源。人们经常试图在国家历史中定位社会主义思想。许多鞑靼共产党人认为辩证唯物主义首先是由成吉思汗后裔的蒙古人提出的，在乌克兰也

⁹³ 《民族生活》，第3期，1918年11月27日，第8页。

⁹⁴ 例如，见《民族生活》，第27期，1919年5月25日，关于萨拉托夫省和哈尔科夫亚美尼亚人的文化活动报道。其他文化活动案例已在前文提及，第三章。

⁹⁵ 《民族生活》，第8期，1918年12月29日，第7页。

⁹⁶ 卡雷尔·德恩科斯，《大挑战》，第178页。

有类似的在扎波罗热哥萨克的传统中寻找共产主义的尝试。⁹⁷这种民族神话既被用来增加对民族过去的兴趣，也被用来普及共产主义。

总的来说，斯大林希望文化中“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不如利用过去遗产促进现代民族认同的冲动重要。然而，无限制推广非社会主义文化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摩擦。文化自治最强烈的反对者居然是犹太人民委员部和俄共犹太部，他们对希伯来语言和文化以及与犹太复国主义相关的所有事物的反感导致了几次冲突。1919年，犹太人民委员部和俄共犹太部禁止希伯来语教育的尝试成功了。1920年初，斯大林本人授权向莫斯科古典犹太剧院提供补贴；俄共犹太部两次向中央委员会抗议这个决定，但两次都被否决。⁹⁸然而，1920年7月，中央剧院取消了剧院的补贴，⁹⁹取而代之的是国家犹太小型剧院。这个剧院代表了结合“社会主义内容”与“民族形式”的更成功的尝试之一，特别是随着艺术家马克·夏加尔的到来，他后来总结了他的目标：“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用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心理和假胡子推翻旧的犹太剧院，同时保留本质上的犹太形式。”¹⁰⁰夏加尔和其他人激发了一种令人兴奋和大胆的新型犹太戏剧，¹⁰¹但总体而言，这种努力仅限于莫斯科，在重点是推广传统文化的地区几乎没有引起共鸣。

⁹⁷ 本尼格森和温布什，第49页。

⁹⁸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17，目录号2，卷宗号44，第1页；卷宗号46，第3页。

⁹⁹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1318，目录号1，卷宗号4，第61页。

¹⁰⁰ 亚历山大·卡缅斯基，《夏加尔：俄国岁月1907—1922》（伦敦，1989年），第331页。

¹⁰¹ 安德烈·范·吉塞格姆，《苏维埃俄国的戏剧》（伦敦，1943年），第172—177页。

不久之后，这种事态发展开始呼应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文化自治政策。在1918年10月，穆斯林人民委员部宣布支持“穆斯林在文化和教育问题上的自决权的正式声明”。这些问题不能在机械的地理基础上处理，而是需要“给予在历史发展道路上失去政治独立的民族最广泛的文化教育自主权”。在此基础上，穆斯林人民委员部试图推翻人民委员会的几个法令。¹⁰²正是这个声明意图扩大穆斯林人民委员部对所有穆斯林生活的权力，无论他们的领土如何，导致了苏丹-加利耶夫和索瓦-斯捷普尼亚克在第三章提到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的对抗。在非领土基础上要求“文化教育自治”与列宁和斯大林的革命前著作以及1917年后的官方政策直接矛盾。但域外文化自治一直是伏尔加鞑靼人的核心要求，穆斯林人民委员部从伏尔加鞑靼人那里获得了领导权，并且政策已在1917年7月的第二次全俄穆斯林代表大会上宣布。实施这个政策没有受到挑战，如我们所见，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在与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的争端中支持穆斯林人民委员部。

宗教

尽管穆斯林民族共产主义者赞成扎吉德主义者发展的伊斯兰世俗观，但传统伊斯兰教的广泛影响给布尔什维克带来了问题。一方面，文化自治意味着将伊斯兰教的作用问题留给穆斯林自己，另一方面，布尔

¹⁰²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1318，卷宗号1，第79页。

什维克致力于反对宗教和神职人员的影响并认为清真寺的控制是阻碍穆斯林的文化和政治发展的部分原因。尽管人民委员会 1918 年关于政教分离的法令保障了宗教自由，但在内战期间，清真寺被关闭或亵渎以及毛拉被枪杀屡见不鲜。然而，苏丹-加利耶夫主张对伊斯兰教采取谨慎的态度，随着穆斯林人民委员部和自治州与共和国的政府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对伊斯兰制度和习俗的宽容也在增加。1921 年，在契切林的倡议下，中央委员会正式缓和了穆斯林中的反宗教运动，于当年 10 月下令将没收的瓦克夫土地归还清真寺并授权重新开放伊斯兰地方法院。¹⁰³1922 年，穆斯林共产党人与司法人民委员部联合成立了一个伊斯兰教法委员会，负责制定兼容的古兰经和苏维埃法律。这种对伊斯兰教的宽容态度至少一直持续到 1928 年。¹⁰⁴

远东对佛教也表现出类似的宽容，特别是在布里亚特蒙古人中，1922 年，那里有 4000 名学生在佛教学校（*datsans*）接受教育。¹⁰⁵即使是少数民族中的非东正教也比俄罗斯受到更多尊重。1920 年，普遍的粮食和牲畜短缺的时期，民族事务委员部甚至批准马里人和其他民族继续进行动物祭祀仪式。¹⁰⁶有时，甚至似乎积极鼓励非东正教教会，例如乌克兰自治教会，以削弱俄罗斯东正教的影响力。¹⁰⁷

¹⁰³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 17，目录号 3，卷宗号 215，第 3—4 页。

¹⁰⁴ 罗利希，第 148—150 页。

¹⁰⁵ 詹姆斯·福赛思，《西伯利亚民族史：俄罗斯的北亚殖民地 1581—1990》（剑桥，1994 年），第 275—276 页。

¹⁰⁶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 1318，目录号 1，卷宗号 4，第 4、12 页。

¹⁰⁷ 阿尔托·卢卡宁，《无神论的政党：布尔什维克党的宗教政策 1917—1929》（赫尔辛基，1994 年），第 88—89 页。

1922年，当斯大林试图集中化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治和经济结构时，他的一个论点是这将有助于保证“共和国在语言、文化、司法、内务、农业等等领域的真正的内部自治”。¹⁰⁸ 尽管这种自治建立在领土单位之上，但与被布尔什维克如此诋毁的域外文化自治的区别是极其细微的。苏维埃共和国、自治共和国与州负责其民族在其他地区的文化事务，没有特定领土的民族由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局和人民委员部在俄罗斯范围内提供服务。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真正反对的是他们在国家基础上进行域外选举代表的计划而不是文化自治本身。文化自治在苏维埃共和国中日益成为现实，因为它符合布尔什维克鼓励民族自我意识的目标。在许多情况下，这导致了在语言和文化中有意创造民族形式。这些政策对苏联的族群的民族意识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¹⁰⁸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号5，目录号2，卷宗号28，第19页。

第 7 章 格鲁吉亚危机与苏联的形成

内战结束时，各苏维埃共和国的行政组织陷入混乱。布尔什维克 M.F. 弗拉基米尔斯基认为，自 18 世纪 70 年代的普加乔夫起义以来，沙俄的行政区划主要基于在农民起义爆发时能迅速动用武力镇压的需求。这种区划自然是根据需要覆盖的地域面积来划分的，而不是依据人口规模、地区经济结构或现代通讯。¹这些因素，再加上民族原则应成为苏维埃国家基本的组织标准。显然，俄罗斯的行政区划需要彻底改革，但仅在 1920 年就有三个不同的方案在推进：主要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指导下，基于纯粹的民族基础建立自治共和国和州；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ГОЭЛРО）正在起草一份俄罗斯区域化（“经济区域化”）的计划；全俄中执委于 1920 年 2 月成立了一个特别的“行政委员会”，负责制定新的行政区划原则。与其他苏维埃共和国的关系包括边界理论上由条约管辖，并归外交人民委员部管辖。与此同时，各共产党也有着自己的组织结构。虽然俄罗斯共产党能确保国家的政治统一，但在正式政治结构中，民族和经济这两个独立的原则却相互冲突。布尔什维克的民族政策已经朝着在某些领域鼓励地方自治的方向发展，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原则却普遍倾向中央集权化。

¹ M.F.弗拉基米尔斯基，《关于确定行政经济区域边界的基本规定》，载于 G.M.克日扎诺夫斯基（编），《苏联经济区划问题》（莫斯科，1957 年），第 58 页。

然而，在 1920 年至 1922 年间，经济原则与民族原则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未在苏俄的重组中引发严重冲突，只要民族自治体系运作顺畅，妥协精神和对少数民族权利的尊重就占主导。相比之下，与独立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则显得更为棘手，特别是莫斯科与乌克兰和格鲁吉亚之间的一系列纠纷，导致于 1922 年 5 月成立了一个由米哈伊尔·伏龙芝领导的委员会以审查这些关系体系。即便如此，这些纠纷尚未升级为严重冲突，且 1922 年秋季对整个体系进行正式整顿的决定应会带来一个平稳的重组过程。进行这种彻底整顿的理性论据是不可否认的；虽然限制或终结共和国独立性的决定注定会引发分歧，但布尔什维克党对此类争端并不陌生，这本可以在内部解决。然而，格鲁吉亚共产党人的顽固与奥尔忠尼启则领导的高加索局的迟钝起到了同等作用，将实际分歧演变成了重大危机。我们目前掌握的材料表明，争端各方之间的分歧起初可能并不像过去设想的那样激烈，尤其是其中并不存在列宁与斯大林之间彻底的权力斗争；尽管双方显然存在重大分歧，但没有任何确凿证据表明，1922 年 9 月，列宁因斯大林的提议而“感到沮丧和愤怒”（派普斯的观点），²也没有证据表明斯大林将列宁的干预视为“‘老头子’毫无意义的干涉”（莱温的观点）。³

² 派普斯，第 272 页。

³ 莱温，第 51 页。

苏维埃共和国间关系的组织的竞争方案

1920年12月提交给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电气化委员会计划主要涉及苏俄的电气化计划，但也包含了将全国划分为八个经济区的提议。除了其中一个区单独涵盖突厥斯坦外，方案并未考虑到苏俄的民族行政区划。这其实不足为奇，因为在计划起草时，除规模较小的伏尔加德意志公社和巴什基尔共和国外，其他的民族自治领土尚未建立。无论如何，计划在付诸实施前就已被取代，其主要意义在于它提议将经济自治权下放给地区：

在制定国家经济合理计划时，将国家划分为经济独立的单位较为便利——区……本质上，编制区的经济计划应当是区自己的事情，因为这需要对当地情况有广泛了解与民众的积极参与，否则计划的编制和履行都将难以实现。在这些区计划的基础上，将相对容易地构建出目标为实现区间合理协作的总方案并以此制定出国家电气化计划……⁴

主要中央经济机构坚持下放经济计划权指明当时存在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区域自治的趋势，即便经济领域也是如此。这与当时其他国家机关和共产党人日益强化决策中央集权化的倾向形成了对比。这

⁴ 《苏俄电气化计划 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向第八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第二版，莫斯科，1955年），第185页。

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中央计划模式，只要这种态度能够持续下去，就有可能允许民族领土在经济及其他领域拥有一定程度的独立自主。

比电气化委员会计划更具持久影响力的是俄罗斯行政区划委员会的工作，从1920年2月一直工作到1922年年中。在委员会成立不到一个月时，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因担心经济原则会凌驾于民族原则上，便在季曼施泰因的领导下成立了自己的委员会，目标为根据民族原则起草苏俄的行政区划；⁵与此同时，它也在加快建立民族自治领土。不过，这种竞争后来得到了缓和，到1921年年中，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开始与行政区划委员会及国家计划委员会合作制定新的划分。⁶当委员会最终于1922年4月13日向全俄中执委主席团提交方案时，其中包含了保留民族领土完整和自治权的承诺：较小的民族领土将成为“次区”；较大的（突厥斯坦）将单独构成一个经济区；而更大的（乌克兰和吉尔吉斯）将由多个经济区组成。⁷巴什基尔政府早在1921年底就已提出异议，抗议乌克兰、吉尔吉斯和突厥斯坦所受的待遇与巴什基尔、鞑靼和克里米亚共和国不同；巴什基尔方面提议每个共和国都应构成一个独立的区，而自治州则应在较大的区内享有特殊地位。⁸随后，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采纳并细化了这些提议，建议合并巴什基尔，为鞑靼、楚瓦什、马里和沃佳克人创

⁵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1318，目录号1，卷宗号4，第12页。

⁶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1318，目录号1，卷宗号6，第82页；卷宗号7，第75页。

⁷ 《全俄中执委俄罗斯经济区划问题委员会拟定的提纲》，载于克日扎诺夫斯基编，同上，第103—105页。

⁸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1318，目录号3，第53页。

建一个以喀山为中心的特别经济州，将卡尔梅克州并入吉尔吉斯，将乌克兰统一为一个经济区，并将高加索划分为北高加索、中高加索和外高加索三个区。⁹原方案的主要起草者 I.G.亚历山德罗夫教授积极回应了这些修正案，并在此后不久明确表示区域化项目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违背民族原则，甚至承认，为了民族原则“在某些情况下，区域化需要牺牲纯粹的经济原则”，以巴什基尔为例，从纯经济角度看，它本应被分到伏尔加与乌拉尔区，但他现在提议将其统一划归乌拉尔区。¹⁰因此，当时苏俄本身的民族结构似乎并未受到任何威胁。

事实上，到 1922 年时，苏俄内部的民族结构运转得相当良好，大部分关于边界和管辖权的争端已得到解决；在莫斯科全权代表的严密监督下，各共产党的民族干部大体上正在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同时，民族原则也已顺利纳入了国家经济的管理体系之中。此时，仍有一个巨大的问题有待解决——其他苏维埃共和国与苏俄之间在形式上和事实上的关系。形式上独立的共和国的存在一直被视为迈向单一苏维埃共和国的过渡阶段，但对于俄国若实现重新统一后苏维埃国家将采取何种形式，此前却鲜有关注。在缺乏具体理论指导的情况下，鉴于自治化政策在苏俄内部的成功，人们有理由认为创建一个统一国家最简单且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将自治原则推广到五个独立的共和国中。

⁹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号 1318，目录号 1，卷宗号 9，第 43 页。

¹⁰ U.G.亚历山德罗夫，《苏联经济区划的基础》，载于克日扎诺夫斯基编，同上，第 222 页。

“联邦制”、“邦联制”还是“自治”？

在讨论 1922 年关于联邦制与自治化的争论前，有必要回顾一下 1920 年 6 月列宁与斯大林之间关于联邦制作用的一次分歧。由于 1922 年博弈中的许多核心问题在这次争论中已初现端倪，因此厘清两人之间的确切分歧至关重要。分歧的背景是关于列宁为 1920 年 7 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的讨论。关于这次争论，被最广泛接受的版本出自《列宁全集》第五版的一个注释。这段 1963 年出版的描述提到，这次交锋源于斯大林对民族问题的错误理解，它将在 1922 年再次重演。它发表时，苏联史学界的趋势是试图把斯大林与列宁区分开。文中提到了斯大林反对列宁的区分，基于自治的苏维埃共和国与通过联邦纽带联系的独立共和国。唯一的直接引语是：“[两种形式之间]没有区别，或者区别小到可以忽略不计”。¹¹

另外两份资料提供了争论的更详尽且略有不同的版本；第一份是斯大林给列宁的信件全文，载于《列宁全集》第三版（1931）的一个尾注中，第二份是斯大林在 1923 年 4 月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民族问题会议上对克里斯蒂安·拉柯夫斯基的回应，1991 年发表在《苏共中央通报》上。尽管根据《苏共中央通报》编辑的说法，列宁的回信尚未找到，¹²但从斯大林信件的原文和斯大林后来对列宁回

¹¹ 列宁，《列宁全集》第五版，第 41 卷，第 513 页（译者注：见《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增订版（北京，2017 年），第 39 卷，年表，第 689 页）。

¹² 《苏共中央通报》，1991 年，第 4 期，第 175 页。

信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勾勒出他们之间分歧的准确图景。斯大林这封1920年6月12日的信中相关部分，尚未用英文出版过，内容如下：

我指的是你的提纲没有提及作为联合不同民族劳动者的过渡形式之一的邦联制。对于曾属于旧俄国组成的民族，我们可以且应当将我们的（苏维埃）联邦制视为通往国际统一的恰当道路。理由很明确：这些民族此前要么从未享有过国家地位，要么在很久以前就失去了这种地位，正因如此，苏维埃（集中）联邦制适用于他们时不会产生特别的摩擦。

对于不属于旧俄国组成、曾作为独立政体存在、发展过他们自己的国家地位的民族，就不可能一样了，如果它们变为苏维埃，由于事态强迫，会需要与苏维埃俄罗斯建立某种国家关系（纽带）。例如，未来的苏维埃德意志、波兰、匈牙利或芬兰。这些民族拥有他们自己的国家地位、他们自己的军队和他们自己的财政，在变为苏维埃后，很难想象他们会同意像巴什基尔或乌克兰模式那样直接与苏俄建立联邦纽带（你在提纲中区分了巴什基尔和乌克兰模式的联邦纽带，但实际上没有区别，或者区别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他们会将苏维埃模式的联邦视为削弱其国家自主权的形式、对其独立性的侵害。

我毫不怀疑，对于这些民族，最合适的联合形式将是邦联（独立国家的联盟）。在此我甚至还未提及其他民族，像波斯和土耳

其，对于他们，苏维埃式的联邦制甚至一般的联邦制都会更不合适。

基于这些考量，我认为在你提纲中关于联合不同民族劳动者的过渡形式的要点中，有必要（在联邦制外）加入邦联制。这种修正将使你的提纲更灵活，并增加一种联合不同民族劳动者的过渡形式，同时也将使那些此前不属于俄国组成的民族在国家层面与苏维埃俄罗斯的联合更加容易。¹³

在此斯大林将当时已存在于苏俄内部的*联邦制*与他概括为独立国家联盟的*邦联制*区分开，并认为后者更适用于德国这类国家。从原文中可以清楚看出，尽管关于乌克兰与巴什基尔之间差异的分歧在后世看来意义重大，但在当时仅被视为顺带提及的一个次要问题。争论的真正焦点并不是乌克兰与巴什基尔之间的区别，而是乌克兰、巴什基尔与德国、波兰、匈牙利和芬兰之间的区别。

斯大林 1923 年的叙述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当时为了反驳拉柯夫斯基试图宣称其拥护列宁的民族政策，斯大林叙述了如下往事：¹⁴

我想给你们讲一个关于邦联制的故事。当时我正在南线，列宁发

¹³ 《列宁全集》，第三版（莫斯科，1931年），第25卷，第624页。

¹⁴ 见下文，第八章。

给我一份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民族问题提纲草案。他像征求其他人意见一样也征求了我的意见。当时人们都在说我们共产国际会实现各民族和各国家的联邦化。那时我说——这都保存在中央委员会的档案里——那行不通。如果你认为前沙俄的民族会留在联邦化的框架内——这完全可以理解，但如果你认为德国有朝一日会以与乌克兰相同的权利加入你及加入联邦——你错了。如果你认为连波兰，已经具备资产阶级国家所有属性的国家，也会以与乌克兰相同的权利加入联盟——你错了。这就是我当时说的。而列宁同志回了一封长信——那是沙文主义、民族主义，我们需要由单一机构运行的集中的世界经济。¹⁵

斯大林对自己信件内容的叙述是准确的，因此有理由认为他对列宁回信的总结同样是可信的，当时他的听众可能也知道回信。当然，未来苏维埃德意志地位的分歧与列宁提纲本身的内容有更深远的关联。列宁草案中的相关部分如下：

联邦制是各民族劳动者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无论在俄罗斯联邦同其他苏维埃共和国（过去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芬兰苏维埃共和国、拉脱维亚苏维埃共和国，现在的阿塞拜疆苏维埃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的关系中，或在俄罗斯联邦内部同

¹⁵ 《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4期，第171页。

从前既没有成立国家又没有实行自治的各民族（例如，在俄罗斯联邦内，1919年建立的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1920年建立的鞑靼自治共和国）的关系中……共产国际在这方面的任务，是进一步地发展、研究以及通过实际来检验在苏维埃制度和苏维埃运动基础上所产生的这些新的联邦国家。既然承认联邦制是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那就必须力求建立愈来愈密切的联邦制联盟……因为估计到建立统一的、由各国无产阶级按总计划调整的完整的世界经济的趋势……¹⁶

因此，虽然列宁在文中顺带提及了两种类型的共和国，但他绝没有在两者区别上多费笔墨。而全世界都可以统一在一个苏维埃联邦之下的潜台词才是更具争议性的观点，也无疑是列宁在辩护其提纲的“长信”中阐述的主题。这必然是当时争论的核心所在，而两种共和国类型之间的区别仅仅是被附带提及的。

如果斯大林 1923 年的讲话是准确的，那么列宁曾因为斯大林否定德国和波兰可以与乌克兰一视同仁而谴责他犯了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错误。于是，1920 年列宁想要一个所有苏维埃共和国包括尚未建立的国家的联盟，而斯大林不相信这是可能的——列宁是集权派，

¹⁶ 列宁，第 41 卷，第 164 页（译者注：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载于《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增订版（北京，2017 年），第 39 卷，第 165 页）。

斯大林是分离派——这与《列宁全集》的编辑、派普斯、莱温、卡雷尔·德恩科斯、布兰克和所有追随他们的学者的结论完全相反。¹⁷

根据《列宁全集》第三版编辑的说法，在列宁 1920 年提纲的校样中，列宁曾在页边空白处写下“[段落]7.+邦联？（斯大林）”，¹⁸说明他确实对斯大林的意见给予了一定考量。然而，“邦联”一词并未进入最终的提纲，¹⁹也没有对段落的任何修正案被提交到代表大会。²⁰此外，从现有材料中找不到任何证据说明，讨论提纲最终版本的委员会会议上甚至提及过联邦制还是邦联制的问题。²¹

此外，托洛茨基在 1927 年写文章时大谈特谈 1922 年列宁与斯大林之间的争论，却对 1920 年的任何分歧只字未提。²²因此，无论当年的分歧具体内容为何，都没有证据证明事件超出了两封信件往来的范畴。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斯大林完全没有预见列宁会在 1922 年以何种形式批评他的“自治化”方案。如果说有，他以为列宁会维护其他共和国的独立。因此，当斯大林在这一点向列宁让步时，他一定是松了一口气的，心想以此就能让列宁保持安静。当列宁随后为了维护格鲁

¹⁷ 派普斯，第 270 页；布兰克，第 169 页；卡雷尔·德恩科斯，第 128 页。关于这种对列宁—斯大林争论解读的持久影响，例如，见罗伯特·H·麦克尼尔，《斯大林，人与统治者》（伦敦，1988 年），第 70 页；杰弗里·霍斯金，《第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马萨诸塞州剑桥，1990 年），第 117 页。塔克意识到这次争论关乎德国、波兰等国未来的地位，但他仍得出结论“斯大林后来与列宁在民族政策上的冲突在这次交锋中就已显露端倪。”罗伯特·C·塔克，《作为革命者的斯大林》（纽约，1973 年），第 251 页。在派普斯 1954 年的著作前，西方关于列宁与斯大林的史学研究并未提及这次争论。

¹⁸ 列宁，《列宁全集》，第三版，第 25 卷，第 287 页。

¹⁹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速记报告》（彼得格勒，1921 年），第 598 页。

²⁰ 同上，第 121 页。

²¹ 《列宁时期的共产国际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920 年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与文件》（伦敦，1977 年），第 2 卷，第 846—85 页。

²² L.D.托洛茨基，《斯大林的伪造学校》（柏林，1932 年），第 77 页及以后。

吉亚人而向斯大林发难时，斯大林指责列宁是在试图捍卫独立。事实上，自治化对联邦制的问题在两人之间并没有通常认为的那样严重。两人都认同经济和政治的中央集权的一般需要，而且都越来越倾向认为文化和语言保障足以满足非俄罗斯民族的诉求。两人之间严重分歧源于格鲁吉亚问题，因为列宁敏锐地意识到忽视格鲁吉亚人的意愿会在国内外产生负面的宣传影响，他也日益担忧党和国家机关愈演愈烈的官僚化，特别是奥尔忠尼启则和高加索局的独断专行。相比之下，斯大林有理由认为，如果不是因为格鲁吉亚人的抵抗，无论以何种形式建立联盟都是必要而且易于实现的。

厘清 1920 年争议的意义在于，如果不存在那样一场争论，就没有证据证明列宁 1922 年 9 月介入组织局委员会议程除了被视为晴天霹雳外还有什么别的解释。几乎没有迹象显示那时前除了列宁外还有哪位布尔什维克能意识到“联邦制”与“自治化”之间存在实质区别，这两个词经常被混用。1917 年前联邦制被视为一种资产阶级国家形式，自治一词通常等同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但革命后，这两个词在非正式场合被交替使用，用来描述一个享有某些权利但最终受中央控制的民族地区的地位。1921 年，人们在正式描述苏俄与乌克兰的关系时曾坚持省略“联邦”一词，展现出即便这个词也被认为是对民

族主权的过分侵犯。甚至在 1922 年 9 月，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向其派往斯大林委员会的代表下达指示时，在同一个决议中既要求“组建统一的苏维埃联邦”又要求“阿塞拜疆在广泛自治的原则下与俄罗斯统一”。这清晰说明了当时在使用不同术语时是多么缺乏明确性。²³

斯大林的“自治化”方案

1922 年初成立的伏龙芝委员会收效甚微，最终倾向于维持各共和国关系的现状。虽然中央委员会在 1922 年 8 月 10 日决定召开一个新委员会来审查苏维埃共和国间的关系，这可能由某些特定事件触发，例如与乌克兰在外交政策上的争端²⁴或格鲁吉亚的事件，²⁵但或许是必然的，在相对和平的环境恢复后，布尔什维克着手建立苏维埃共和国之间更紧密的统一。此外，苏俄内部民族政策的相对成功也鼓励了他们。虽然似乎事先并未作出任何决定，但政治局决议的措辞，要求委员会“准备好苏俄与独立共和国之间的关系问题，目标为将它们在苏维埃体系内合法化”²⁶让人毫不怀疑其意图就是某种形式的统一。根据莱温和瑟维斯的观点，组织局任命委员会是为了加强斯大林及其盟友的

²³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 5，目录号 2，卷宗号 28，第 11 页；《苏共中央通报》，1989 年，第 9 期，第 195 页。

²⁴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 17，目录号 3，卷宗号 290，第 2 页；I.K.甘布尔格等，《M.V. 伏龙芝 生平与活动》（莫斯科，1962 年），第 292—294 页。

²⁵ 派普斯，第 270 页。

²⁶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 17，目录号 3，卷宗号 306，第 1 页。

权力。²⁷但在代表中央的五名成员中——斯大林、古比雪夫、拉柯夫斯基、奥尔忠尼启则和索科利尼科夫——只有中央委员会书记古比雪夫没有明显的入选理由，但由于他对各共和国军事需求的专业见解和对中亚的了解，加入也是合理的。在其余人中，斯大林仍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拉柯夫斯基、奥尔忠尼启则和索科利尼科夫分别在乌克兰、外高加索和中亚担任过最高职务。尽管古比雪夫和奥尔忠尼启则是斯大林的支持者，但拉柯夫斯基反对任何形式的统一，而索科利尼科夫可以被视为独立人士并已在土耳其斯坦证明了他的公正性。如果斯大林存心操纵共和国代表的人选，他肯定会否决姆季瓦尼，奥尔忠尼启则的死对头。

斯大林委员会的工作进展，包括斯大林提纲的确切内容，已有详尽记载，最著名的是莫舍·莱温在他的著作《列宁的最后斗争》中的记述。然而，鉴于莱温偏向夸大斯大林与列宁分歧的意义，特别是在将早期事件与列宁 1922 年 12 月的笔记联系起来时，而且考虑到自莱温撰稿以来又有许多重要文献得以面世，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其中的若干论点。

委员会的临时论纲，斯大林所谓的“自治化方案”，在委员会开会前便已发往共和国征求意见，并收到了褒贬不一的回应。最强烈的反对意见来自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然而，他们并未在原则上反对这些提议，而只是称其“为时过早”。格鲁吉亚中央的决议还明确表示接受“统一经济力量和总方针”的必要性，但必须保留自治的

²⁷ 莱温，第 47 页；R.瑟维斯，《列宁：政治生活》（伦敦，1995 年），第 3 卷，第 276 页。

所有属性。²⁸白俄罗斯中央也拒绝了该方案，保持类似于乌克兰与苏俄之间的关系，即维持现状，同时他们还借此机会再次提出了扩大白俄罗斯边界的问题。²⁹亚美尼亚无条件接受了这些论纲，³⁰而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表示同意，但也流露出一定程度的不安，请求给予时间来向居民做准备工作。³¹乌克兰中央显然在委员会开会前没有讨论草案，³²但斯大林在9月4日收到了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书记曼努伊尔斯基的热烈回应。³³

9月23日和24日的两次委员会会议上，这些反对论调依然存在。此时，莫洛托夫接替了正在休假的拉柯夫斯基，而古比雪夫没有出席。只有格鲁吉亚代表姆季瓦尼和钦察泽（他在第一场会议上代表姆季瓦尼）公开反对斯大林的提案，但一些条款也引起了某些反对；在保持专门民族军队的提议上，姆季瓦尼得到了阿塞拜疆代表阿加-马利-奥格雷的支持；彼得罗夫斯基（乌克兰）提议保留独立的粮食和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并获得了姆季瓦尼、阿加-马利-奥格雷和切尔维亚科夫（白俄罗斯）的支持。彼得罗夫斯基甚至成功争取到了一项修正案以保留共和国的特赦权，斯大林、莫洛托夫和米亚斯尼科夫（亚美尼亚）投了反对票，尽管这权利随后被奥尔忠尼启则的一项修正案限

²⁸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5，目录号2，卷宗号28，第5页。

²⁹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9期，第197页。

³⁰ 同上。

³¹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5，目录号2，卷宗号28，第11页。

³²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5，目录号2，卷宗号28，第4页。

³³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5，目录号2，卷宗号28，第22页；弗朗齐歇克·西尔尼茨基，《苏共民族政策1917—1922年期间》（慕尼黑，1981年），第268—272页。

制在民事事务内。彼得罗夫斯基还差点成功将这些方案提交给共和国所有省委常委查阅；他赢得了切尔维亚科夫、阿加-马利-奥格雷和姆季瓦尼的支持，霍贾耶夫·法伊祖拉（布哈拉）弃权。³⁴所以虽然只有格鲁吉亚人公开反对方案，但所有其他共和国代表都对改革的速度或方案中会进一步削弱共和国权力的细节表达了担忧。没有任何人在这次会议上提出要修改第一条中关于独立共和国加入苏俄的内容。

在此期间列宁一直因病重而无法积极参与议程。但根据福季耶娃的说法，列宁在某个时刻要求斯大林向他汇报委员会的工作。³⁵9月22日，斯大林致信列宁解释了提案背后的逻辑。无论是派普斯还是莱温都未曾见过这封信，其有趣之处不仅在于信中同志般的语调，这与后来的唇枪舌剑形成了鲜明对比，还在于从建立一套健全政府体系的角度来看，斯大林的论据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因此值得长篇引用：

我们已经陷入这样一种境地，中央与边疆地区之间的现存关系秩序，即秩序的缺失和完全的混乱，已经变得令人无法忍受；当形局面引发冲突、侮辱和摩擦时，所谓的统一联邦国民经济便化为虚幻，阻碍并瘫痪了全俄罗斯范围内的所有经济事务。现在有两种选择：要么是真正的独立。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不得干预，各共和国应拥有他们自己的外交人民委员部、他们自己的外贸、他

³⁴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5，目录号2，卷宗号28，第4—10页。

³⁵ L.A.福季耶娃，《列宁生活片断》（莫斯科，1967年），第270页。

们自己的特许权委员会和他们自己的铁路系统；同时，一般性问题要通过平等的谈判和协议决定，但苏俄的全俄中执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决议对这些独立共和国不具有约束力；要么是将各苏维埃共和国真正统一为一个经济整体。这要求形式上将苏俄的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和全俄中执委的权力拓展到独立共和国的人民委员会、中执委和经济苏维埃之上。也就是说，共和国在语言、文化、司法、内务、农业等等领域从虚幻的独立转变为真正的内部自治。

斯大林描述了当时的实际状况，苏俄的中央机构，更确切地说是共产党的中央机构，不得不更正共和国机构作出的决定，从而引发了针对莫斯科“非法活动”的抗议。他接着写道：

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的干预通常发生在边疆地区的中央机构已经发布法令之后。接着这些法令会被莫斯科的中央机构更改。这导致了经济事务中的繁冗和拖延并在边疆地区引发了非党成员的困惑和共产党员的愤怒。

四年内战期间，考虑到外国武装干预的形势，我们被迫在民族问题上展示莫斯科的自由主义，在违背他们意愿的情况下，我们成功在共产党人中滋养出了一批真正的和潜在的社会独立主义者，他们要求全方位的真正独立，他们将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的介入视为莫斯科方面的虚伪与欺骗。

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发展时期，形式、法律和法律宪法已不容忽视。在边疆地区，年轻一代的共产党人拒绝将独立比赛仅仅视为比赛，他们固执地按字面意思理解有关独立的言论，并顽固地要求我们从实践中履行独立共和国宪法的条文……如果我们现在不努力使中央与边疆之间的形式关系契合实际关系，正是基于这种实际关系，边疆才在各方面都应当从属于中央，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不把这种形式的（虚幻的）独立转变为形式的（与真实的）自治，那么一年之后，要实现苏维埃共和国事实上的统一将会无比艰难。

斯大林接着谈到了对现有的分离主义倾向表现出过度尊重的危险并就党内可能出现的分裂发出了警告。他以格鲁吉亚政府曾允许奥斯曼银行在第比利斯开设分行的决定为例，这个决定威胁到了整个地区的金融稳定，最终不得不由中央委员会出面撤销，在格鲁吉亚引发了一场抗议风暴。³⁶

斯大林的表现相当坦率；他在此正式承认苏维埃政权在内战期间对民族问题采取了虚假的“自由”政策，这无疑会让许多历史学家感

³⁶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 5，目录号 2，卷宗号 28，第 19—21 页。

到满意。³⁷独立在当时始终是一种必要的假象，一场运动，但这种状态持续得越久，它就越容易被按字面意思解读，从而导致党内一系列冲突并干扰经济政策。如果一个共和国机关作出了违背苏俄政策的决定，通常程序是先诉诸党的纪律系统，随后由政府的共产党员出面撤销先前的决定。这导致了繁冗拖延和分歧争吵并留下了糟糕的公众印象。在这方面，他举了格鲁吉亚金融政策的例子，他或许认为这能引起列宁的重视，但他同样可以引用同年早些时候与乌克兰在外交政策上的争端，它两次被提交至政治局及党中央监察委员会。³⁸此外他指出继续维持虚幻的独立反而会导致对共和国真正自治权的侵害；将实际关系正式化反而能保障理应保留自治的领域。

这封信很大程度揭示了斯大林此时的想法；他过去没有，也从来没有对共和国的真正独立感兴趣。当然当时的共产主义运动中也几乎没有个人对此感兴趣，因为无论形式架构如何，共产党都将确保政治的高度统一和正确的社会主义领导。斯大林面临的问题在于共产党内部正在逐渐失控，想必来自当地民族的年轻党员开始认真对待独立。斯大林本人曾积极提拔过这些人，因此他不太可能支持将他们撤职。尽管如此，他提出的方案却带有典型的官僚色彩：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一致可以通过宪法层面的调整克服。相比之下，列宁、拉柯夫斯基等人

³⁷ 理查德·派普斯在新版《苏联的形成》序言中称，他从档案中只找到了这些有价值的片段，而他对布尔什维克民族政策的愤世嫉俗的看法并未改变。理查德·派普斯，《苏联的形成》，第3版（第一版平装本）附新序言（马萨诸塞州剑桥，1997年），第v—viii页。

³⁸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17，目录号3，卷宗号290，第2页；卷宗号291，第1页。

将问题归于大俄罗斯态度与地方民族主义的共同残余并倾向于寻求政治的而非形式的解决方案。

然而斯大林的论点颇具说服力，就形式的解决方案而言，它足以解决在确保统一的同时保留地方决策和民族文化自治的问题，这对斯大林消除落后的目标至关重要。鉴于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始终是为了各苏维埃共和国的长期统一，在必须改变形式的相互关系这一点上很难挑出斯大林方案的错处。但斯大林只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苏维埃共和国完全整合入苏俄。

根据列宁秘书福季耶娃的说法，列宁直到9月25日才收到这封信，此时委员会已经开过会，第二天他就要与斯大林会面，会面中列宁对委员会的提议提出了反对意见（然而信的日期注明为9月22日）。³⁹虽然告知列宁委员会工作的延误可能是偶然的，但同样可以推测：深知列宁行踪而且随时可以与其沟通的斯大林极力想向列宁展现既成事实。然而，事情的发展并未能让他轻易地如愿以偿。据福季耶娃记载，9月26日，两人就这个问题进行了长达两小时四十分钟的谈话。⁴⁰无论这次谈话的具体细节如何，列宁在当天写给加米涅夫的一封信中已经表明了谈话的结果：

斯大林已经同意作一个让步。在第1条中把“加入”俄罗斯社会

³⁹ 福季耶娃，第220页。

⁴⁰ 福季耶娃，第220页。

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改成——

“同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一起正式联合成欧洲和亚洲苏维埃共和国联盟”。

我希望，这一让步的精神是明白易懂的：我们承认自己同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以及其他共和国是平等的，将同他们一起平等地加入新的联盟，新的联邦，即“欧洲和亚洲苏维埃共和国联盟”。⁴¹

这样一个联邦将需要在苏俄全俄中执委之外再设立一个新的联邦中执委。此时在这件事上似乎已赢得列宁信任的加米涅夫立即给列宁回信并附上了一张示意图，阐述了他关于联盟运作方式的更具体方案，基于“最大限度保留”共和国“形式独立”的原则。加米涅夫的方案包含一个细节，他当时认为不值一提，后来却产生了巨大影响：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在保留各自的人民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同时，隶属于联盟内的一个外高加索联邦。⁴²

列宁将斯大林接受国家间的平等联盟视为关键让步，但斯大林在随后给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备忘录中却把这个改变当作无关紧要的事接受了：“关于委员会决议的第一条，我认为我们可以同意列宁的提议……”相反，斯大林挑出了列宁提议中两个看似次要的点。第一，

⁴¹ 列宁，第45卷，第211页（译者注：见《关于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联盟》，载于《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增订版（北京，2017年），第43卷，第217页）。

⁴²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5，目录号2，卷宗号28，第13—14页。

他反对在苏俄中执委外另设全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想法，“其中一个显然将代表‘下议院’，另一个代表‘上议院’，[它们的存在]只会引发冲突和争论”。第二，他反对将财政、粮食、劳动和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合并。在这一点上，他讽刺地指责“列宁同志自己‘操之过急’”，“这种‘急躁’”会为提倡独立、损害列宁同志的民族自由主义提供燃料。⁴³

是什么原因导致斯大林没怎么反对就屈服于列宁的原则性异议，却又在中央委员会其他成员面前指责列宁“民族自由主义”？这种语气与他早先写给列宁的信形成了鲜明差别。根据莱温的观点：

斯大林的全部特点都体现在这封信中。从他的论证方式可见，策略考量对他来说凌驾于其他一切因素之上，以至于他认为没有必要为自己此前提出的如此尖锐的观点辩护超过一天。⁴⁴

但如我们所见，斯大林并不认为联邦制与自治化之间的区别有多么重要。因此，他没有必要为此认真辩护。在回应列宁的提议时，他并没有纠结于那些宏大的层面。相反，他提出的反对意见主要针对可能影响集权政治经济体系平稳运行的变动，毕竟只要不侵犯任何少数民族的权利，这种集权体系终究是大家都希望看到的。他对列宁表现

⁴³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 5，目录号 2，卷宗号 28，第 23—24 页。

⁴⁴ 莱温，第 53 页。

出的明显恼火源于斯大林和其他人为这个工作付出大量精力后，列宁又干预，而且这原本恰恰就是斯大林的专长领域；斯大林完全有理由感到自豪，因为不管各方表达了何种疑虑，他成功让大多数共和国同意了他的提议，同意这样一个激进的方案；当时实际上已经存在一个成功的多民族国家组织架构，既能满足中央集权的要求，又能满足非俄罗斯少数民族的愿望，苏俄内部的自治州和共和国体系；而列宁现在的做法却要威胁打乱整个进程。虽然将列宁视为理想主义者、将斯大林视为务实的行动派这种看法未免过于简单化，但在这次交锋中我们可以看到，列宁显然更关注提议中形式措辞所产生的影响。这不仅与他对非俄罗斯民族情感的敏感有关，也与他一直以来重视苏维埃政权成就的国际影响相关；另一方面，斯大林虽然准备在这些原则问题上顺从列宁的权威，但并不那么情愿修改他如此精心制定的实际措施。

最后一点需要特别强调，莱温称斯大林“全面让步”，⁴⁵派普斯称“斯大林不得不全面屈服”，⁴⁶罗纳德·苏尼称斯大林“很快决定不在这个问题上与对抗列宁，并修改了他的计划以符合列宁的建议”。⁴⁷事实上，在由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米亚斯尼科夫和莫洛托夫签署并于10月6日被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采纳的新版提议中，列宁并没有得到他要求的一切。首先，新联邦的名称被定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而不是列宁提议的“欧洲和亚洲苏维埃共和国

⁴⁵ 莱温，第53页。

⁴⁶ 派普斯，第273页。

⁴⁷ 罗纳德·格里戈尔·苏尼，《格鲁吉亚民族的形成》（伦敦，1989年），第215页。

联盟”。（考虑到提及过的列宁对欧洲先进国家的计划，这个差异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共和国的财政、粮食、经济和劳动人民委员部将“服从联盟相应人民委员部的指令”，正如斯大林最初草案中设想的那样，而不是像列宁建议的那样合并。第三，司法、教育、内务、农业、卫生和社会保障人民委员部仍被“视为独立”，没有设立列宁提议的纯咨询性的联盟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不过另一方面，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联邦人民委员会确实已被纳入了斯大林的计划之中。

总体而言，这第二个草案与加米涅夫 9 月 27 日为列宁勾画的方案完全吻合。无论这是更新提议的源头还是协商妥协的产物，中央委员会接受的这份草案为新国家呈现了一种比列宁提议的更顺畅的架构，同时也比斯大林早先的草案在形式上更多承认了共和国的平等地位。第二个草案中的另一个重大变化也与加米涅夫的提议一致，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要经由外高加索联邦加入苏联。

在给加米涅夫的一封信中谈及新联盟名称问题时，列宁写道“我希望，这一让步的精神是明白易懂的。”他的希望很可能落空了。在列宁介入前，从来没有人对“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称提出过任何异议。尽管乌克兰人像列宁一样对自身主权的丧失感到忧虑，但无论是他们还是其他人都没有为联盟提出替代形式。列宁在这一点上坚持己见的全部意义，只有等到 69 年后加盟共和国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时才能被领会。

然而在当时，列宁和斯大林的不同做法被认为只是细节的分歧，而非深层的原则问题。两人都认为无论国家关系采取何种形式，共产党都将继续提供所需的政治统一。斯大林急于消除让并行的党政机构运作变得繁琐的繁文缛节。当时列宁对此并未提出异议，而在三个月后将格鲁吉亚出现的问题归咎于苏维埃机构中的沙皇残余。他坚持要处分奥尔忠尼启则，说明他认为解决这些问题别无他法，只能依靠党。列宁对斯大林提议的反对基于他对宪法改革可能对国际革命产生的影响的判断。斯大林对这些微妙之处不那么敏感，只要列宁的修正案不干扰国家机器的高效运转，他就没有理由拒绝。但在斯大林眼里，列宁的提议恰恰造成了这种干扰，这正是他感到不满的原因。不过并未涉及重大原则问题，而且正如布尔什维克在这个时期常发生的情况一样，最终结果是两种立场间的妥协。

格鲁吉亚事件

无论党最高层关于自治化与联邦制的争论多么激烈，如果不是因为一群特定的布尔什维克的固执，格鲁吉亚共产党领导层，这个问题很可能被私下解决，苏联的重组也不会在整个社会引起太大波澜。自1921年格鲁吉亚苏维埃化以来，他们与奥尔忠尼启则领导的高加索局之间的分歧就不断给党带来压力，而他们对统一进程的公开抗议最终演变为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集体辞职，这将民族问题推向了公开辩论并最终暴露了党领导核心内部更深层的裂痕。

根据派普斯的观点，“核心问题在于权威：作为俄罗斯中央委员会的机构，高加索局对共和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究竟拥有何种权力？”⁴⁸虽然外高加索的政治斗争主要表现为高加索局与格鲁吉亚中央之间的斗争，但它们之间的分歧实际上源于理论和实践差异，尽管两个机关都承认俄罗斯中央委员会拥有最终权威。而且我们将看到，事实并非如派普斯所暗示的那样，俄罗斯中央总是支持高加索局。如果将冲突视为纯粹的权力斗争，那就忽视了民族政策引发的非常现实的问题，在像高加索这样民族成分复杂的地区，政策本身就存在着巨大的解读空间。

1921年3月2日，在占领格鲁吉亚后不久，列宁写信给奥尔忠尼启则，要求他

必须采取对格鲁吉亚的知识分子和小商人让步的特殊政策……
极其重要的是，寻找适当的妥协办法，同饶尔丹尼亚或象他那样的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结成联盟，因为他们在起义以前并不绝对反对格鲁吉亚在一定条件下实行苏维埃制度的想法。

请记住，现在无论格鲁吉亚所处的国内条件或国际条件都要求格鲁吉亚的共产党员不要硬搬俄国的公式，而要善于灵活地制定以对各种小资产阶级分子采取更大让步为基础的特殊策略。⁴⁹

⁴⁸ 派普斯，第266页。

⁴⁹ 列宁，第42卷，第367页（译者注：见《给格·康·奥尔忠尼启则的信》，载于《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增订版（北京，2017年），第40卷，第381页）。

一个月后列宁写信给外高加索和北高加索的共产党人，详细阐述了这些与俄罗斯模式的差异并得出结论，高加索共和国需要的是比俄罗斯“更加缓慢、更加谨慎、更加有步骤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包括对农民、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做出各种让步。⁵⁰

呼吁对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做出让步，特别是提议与佐达尼亚和在格鲁吉亚执政期间日益民族主义路线的孟什维克结成联盟，⁵¹意味着在前俄罗斯帝国其他地区已经在积极鼓励民族自觉的同时，还要特别给格鲁吉亚民族主义以发展空间。这个特殊政策背后的逻辑很明确：在俄罗斯其他地区，布尔什维克至少在部分工人和士兵中拥有重要的支持基础，其权力还得到地方苏维埃合法化，而格鲁吉亚作为一个独立民族国家存在三年后遭到公然入侵，几乎没有工人阶级，而且向来是布尔什维克活动家难以立足的地方。与孟什维克结盟的提议并未持续太久，事实上到年底时托洛茨基就受政治局指示写了一本小册子，详细揭露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权的罪行。⁵²但对格鲁吉亚民族主义做出让步的总体政策仍然有效，列宁和斯大林都曾反复强调这一点。

后来高加索局指控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将这个本为临时策略的特殊让步政策奉为圭臬，甚至到了自身沾染民族主义并奉行孟什维克

⁵⁰ 列宁，第43卷，第198—200页（译者注：见《致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达吉斯坦、哥里共和国的共产党员同志们》，载于《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增订版（北京，2017年），第41卷，第185页）。

⁵¹ 斯蒂芬·琼斯，《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未发表博士论文，伦敦，1984年），第387—554页。

⁵²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17，目录号3，卷宗号247，第3页；L.D.托洛茨基，《红白之间：革命若干根本问题研究 特别提及格鲁吉亚》（伦敦，1922年）。

传统的地步。格鲁吉亚人反唇相讥，指控奥尔忠尼启则和高加索局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企图未经准备工作或协商就自上而下推行统一，全然不顾这些改革在当地造成的影响。双方都能从实践和理论层面为自己的行为提供充分依据，而且某种程度上都能声称自己遵循列宁的政策。高加索局援引所有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论点，论证更紧密的联合与中央集权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益处，还能引用列宁的观点，即在种族复杂的地区，通过更紧密的团结最能实现民族和平。另一方面，格鲁吉亚人认为高加索局的行为侵犯了自决权，违背了列宁关于在格鲁吉亚推行特殊让步政策的指示。显而易见，这些分歧的根源在于布尔什维克内部在民族问题上的两种不同思想倾向之间的冲突，列宁主义者与卢森堡主义者之间的冲突，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格鲁吉亚方面的主要人物之一马哈拉泽曾公开反对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⁵³

另一个问题是被赋予整个外高加索巨大权力的人物的性格、气质和政治观点，俄罗斯共产党高加索局（Кавбюро）领导人，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在中央建立有效控制前，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在整个苏联境内下放了大量权力，任命了多名拥有广泛权力的常设或紧急全权代表。克里斯蒂安·拉柯夫斯基、米哈伊尔·伏龙芝、瓦列里安·古比雪夫、阿道夫·越飞、格里戈里·索科利尼科夫等人都曾在不同时期以各种身份被派往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中亚，拥有近乎无限的权力。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赋予这些人如此大的权力，与其说是看重他们的个人品质，不如说是坚信体现在资深老布尔什维克身上的马克思主义思

⁵³ 莱温，第45页。

想的力量能确保推行符合特定地区工农利益的正确公正的策略。尽管像拉柯夫斯基和伏龙芝这样的人对当地情感较为敏感，不断征求地区苏维埃与共产党机关莫斯科的意见，并且可以说没有辜负组织对他们的信任，但在其他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全权代表的绝对正确则显得站不住脚。1921年在突厥斯坦，共产党突厥斯坦局的主要成员格奥尔基·萨法罗夫在与当时的突厥斯坦局领导人托姆斯基的争执中采取了毫不妥协的立场，引发了一次重大政治危机。⁵⁴在这起事件中，争执双方都被立即调离该地区。

然而，奥尔忠尼启则仍保留着外高加索的最高职位，尽管无论出于性格还是政治信念，他很少征求高加索局核心圈子外的意见，也没多少时间理会他视为外高加索共和国直接下属的人的感受或观点。奥尔忠尼启则不仅引起了布尔什维克主要领导人特别是托洛茨基的不信任，在当地也不受欢迎，1920年12月，瓦季姆·卢卡舍夫就其处理高加索提交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批评报告。⁵⁵根据A.I.米高扬的回忆录，在1921年3月召开的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奥尔忠尼启则险些丢掉党中央委员会的席位：

来自北高加索的几名军队代表出人意料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反对奥尔忠尼启则成为候选人。这些代表坐在最后一排，他们的

⁵⁴ K.哈萨诺夫，《V.I.列宁与俄共（布）中央突厥斯坦局》（塔什干，1969年），第63—65页。

⁵⁵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17，目录号2，卷宗号42，第1页。

喧哗声传遍了整个大厅。其中一人走上讲台，开始控诉奥尔忠尼启则对所有人都大喊大叫、颐指气使，无视当地党员的意见，因此不应该进入中央委员会。这番煽动性言论影响了代表们的情绪，其中许多人甚至根本不认识奥尔忠尼启则。⁵⁶

这一次，列宁和斯大林的有力干预挽救了奥尔忠尼启则，但显然，早在格鲁吉亚事件爆发前，他在党内部分群体中就已不得人心。

奥尔忠尼启则并不反对在格鲁吉亚推行特殊让步政策。1921年3月3日，他向列宁保证“正尽一切可能促进与格鲁吉亚知识分子的接触和相互理解”，正与前孟什维克政府成员接触而且已对小商贩做出广泛让步。⁵⁷然而，他一心痴迷于外高加索统一在经济和军事方面的理由，并主张随后与苏俄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当时各种马克思主义者都普遍偏好较大的国家规模，但和许多布尔什维克一样，奥尔忠尼启则发现很难将这一点与列宁的民族自决权原则相调和。他辩称“是阶级原则而非民族原则导致边疆地区脱离俄罗斯”——换言之，脱离是为了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与工人和贫农的利益相悖。尽管他也承认有必要接受这种脱离是对沙皇压迫的反应，承诺“我们绝无丝毫侵犯各共和国民族独立的意图”，紧接着却立即违背了这个承诺：

⁵⁶ 转引自奥列格·V·赫列夫纽克，《斯大林的阴影下 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的政治生涯》（纽约阿蒙克，1995年），第14页。

⁵⁷ 《奥尔忠尼启则》，第1卷，第172页。

“我们将与一切阻碍外高加索共和国同俄罗斯紧密联合的民族主义残余进行坚决斗争。”⁵⁸

自格鲁吉亚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初，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之间在做法上就存在根本分歧。用苏尼的话说：

对于马哈拉泽这样的温和派来说，列宁为他们设定的任务是为苏维埃政权争取广泛的支持基础，首先从知识分子入手。这意味着不能攻击格鲁吉亚国家机构，不能武力铲除孟什维克的影响，也不能有任何暗示格鲁吉亚的主权会被苏维埃俄罗斯及其代理人损害的行为……对于奥尔忠尼启则和斯大林这样的共产党人来说，苏维埃政权的任务截然不同。他们最担忧的是经济崩溃和民族本位主义的双重危险……⁵⁹

到年底时，奥尔忠尼启则对民族主义的容忍已彻底消失。1921年11月22日，在梯弗利斯共产党人的一次会议上，他宣称：

在外高加索，我们认为我们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首要、紧迫任务是与可鄙过去的残余进行无情斗争，用斯大林的话说，就是要用烧

⁵⁸ 《奥尔忠尼启则》，第1卷，第183—184页。

⁵⁹ 苏尼，第212页。

红的烙铁把民族主义的残余彻底烧毁。⁶⁰

尽管引用了斯大林的话，但这种态度与当时中央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视为主要敌人的政策截然相反。然而在奥尔忠尼启则看来，格鲁吉亚民族主义与俄罗斯沙文主义同样恶劣，孟什维克政府对待阿布哈兹人和奥塞梯人的方式就证明了这一点：“格鲁吉亚内的格鲁吉亚人——和俄罗斯内的俄罗斯人一样。”⁶¹他对格鲁吉亚的自决权极为不满，以至于在 11 月的同一次会议上，他对民族独立作出了一种全新解读：

我们所理解的这些共和国的独立是指完全独立于反革命，但我们也认为苏维埃共和国彼此之间的独立以及与世界革命相分离的独立是绝对不可能的。⁶²

奥尔忠尼启则主要受其政治信念的驱使，认为外高加索的统一凌驾于其他一切考量之上，并对所有民族主义表现形式深恶痛绝；同时

⁶⁰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 5，目录号 2，卷宗号 32，第 6 页；《奥尔忠尼启则》，第 1 卷，第 216 页。

⁶¹ 《奥尔忠尼启则》，第 1 卷，第 226 页。

⁶² 《奥尔忠尼启则》，第 1 卷，第 214 页。

也受累于其傲慢的性格和暴躁的脾气，这些因素共同助长了格鲁吉亚的危机。

自 1921 年 2 月格鲁吉亚苏维埃化以来，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高加索局之间发生了一连串争端。这些争端大多被提交给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处理。后来，列宁私下成立的一个调查委员会将这些争执列举如下：

- (1) 1921 年，高加索局通过中央指令统一了外高加索铁路，格鲁吉亚人对此表示反对，但徒劳无功，他们认为准备工作尚未开展，统一应以独立共和国的名义进行，但他们的反对无果而终；
- (2) 格鲁吉亚人反对高加索局关于合并各共和国契卡并在格鲁吉亚任命一名全权代表的提议。在这件事上，斯大林做出了有利于格鲁吉亚人的裁决，独立部门得以保留；
- (3) 格鲁吉亚人反对为外高加索设立单一的经济机构，该举措目标为推进地区的经济联合。在此事上，俄罗斯中央委员会拒绝介入，争端最终以妥协告终：设立一个统一的经济机构，但同时保留共和国独立的经济人民委员部；
- (4) 1921 年底和 1922 年初，高加索局未与格鲁吉亚中央协商，就决定并公布了外高加索联邦联合方案。此时格鲁吉亚人在原则上并不反对，但要求给予更多时间准备，他们的这

个主张得到了俄罗斯中央委员会支持；

- (5) 1922 年夏季和秋季，格鲁吉亚人以类似理由反对立即实现外高加索货币统一，认为操之过急，而非原则上反对。俄罗斯中央批准了迈向货币统一的过渡性举措，同时保留共和国独立的财政人民委员部；
- (6) 1921 年和 1922 年间，格鲁吉亚红军的地位是争议问题。最终，在俄罗斯中央支持下，高加索局组建了一支完全隶属于中央指挥体系的格鲁吉亚旅，而非格鲁吉亚人希望的、仅在作战方面隶属于独立高加索集团军的格鲁吉亚红军；
- (7) 1922 年格鲁吉亚人希望将所有格鲁吉亚工会统一归入格鲁吉亚工会委员会下，它将直接与全俄工会中央委员会联系，而高加索局则支持外高加索工会委员会，它希望所有格鲁吉亚工会直接归其管辖。俄罗斯中央支持了高加索局；
- (8) 9 月奥尔忠尼启则根据组织局的指示清洗了格鲁吉亚工会，格鲁吉亚中央认为这个任务理应由他们负责，清洗的结果是将工会运动完全从格鲁吉亚中央的控制下剥离了出去；
- (9) 最后就是 1922 年底格鲁吉亚加入苏联的问题。⁶³

⁶³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 5，目录号 2，卷宗号 32，第 55—57 页。

在所有这些争端中，高加索局都在推动最大限度的统一，而格鲁吉亚人则坚持形式上的独立，不过必须指出的是他们很少在原则上反对这类措施，而是反对这些措施的实施时机和方式。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们对奥尔忠尼启则和高加索局未能让格鲁吉亚人参与到他们有权参与的决策过程中的不满，同时也反映出他们真切担心，格鲁吉亚民众会对已然被广泛视为占领势力的一方进一步采取损害格鲁吉亚主权的行动作何反应。这也解释了为何格鲁吉亚通过外高加索联邦加入苏联这个看似次要的问题会具有如此重大的象征意义。然而，有大量证据证明格鲁吉亚人的动机还包括希望将格鲁吉亚的利益置于各苏维埃共和国的整体需求之上，这个动机也让针对他们的民族主义指控有了一定合理性。

这一点在货币统一之争中最为明显，格鲁吉亚人反对废除稳定的格鲁吉亚货币而代之以与俄罗斯卢布挂钩的外高加索货币，理由是这会使格鲁吉亚相对于其他共和国处于不利地位。与此同时他们吹嘘格鲁吉亚军队的实际工资水平是俄罗斯的两倍，工业的实际工资比俄罗斯高出 50%。格鲁吉亚政府在抑制物价上涨方面取得的成果会因货币统一而立即遭到破坏。⁶⁴这些论点的潜台词是，主要归功于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的努力，格鲁吉亚经济目前比外高加索其他共和国的经济更稳定，更远超苏俄；将其与不太稳定的经济体统一起来从而破坏所有这些良好成果，是不公平的。无论这种论点在一般情况下看起来多么合理，对于一名共产党人来说，采取这种不将革命整体需求置于首

⁶⁴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 17，目录号 2，卷宗号 83，第 9—10 页。

位的立场极易招致民族主义的指控。无论格鲁吉亚人如何辩解他们的反对只是针对货币改革的时机或具体技术问题，高加索局在给他们的回复中得出的结论都是有道理的“实际上格鲁吉亚人的意见应该是直接反对与苏俄实现财政统一的总体提议”。⁶⁵

格鲁吉亚政府在边境设立哨卡并向非公民收取许可进入和居留格鲁吉亚的费用，进一步表明其对国际主义精神的无视。⁶⁶此外，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主要依据族群标准发布了关于格鲁吉亚公民资格的严格规定。⁶⁷这些做法远远超出了对民族情感让步的政策。

反过来，高加索局成员也招致多项“地道俄罗斯性质的滥用”指控，同一委员会列举如下：

(1) 格鲁吉亚武装力量原本佩戴传统的格鲁吉亚头饰，步兵戴“图申基”而骑兵戴“斯瓦基”，突然接到命令改戴红军的“布琼尼帽”。阿吉纳什维利称“这为沙文主义发展提供了有力素材……就算在沙皇统治下，民族旅也被允许穿民族服饰”；

(2) 1921年10月外高加索铁路统一后，大批格鲁吉亚铁路工人被解雇，名义上是为了削减不必要的人员成本。但据格鲁

⁶⁵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 17，目录号 2，卷宗号 83，第 11 页。

⁶⁶ 福季耶娃，第 291 页；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 64，目录号 1，卷宗号 61，第 28 页。

⁶⁷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 64，目录号 1，卷宗号 75，第 251 页。

吉亚人称，到了 11 月，外高加索铁路负责人米罗诺夫却致电罗斯托夫当局，以“情况极为必要”为由要求对方派遣 12000—14000 名（俄罗斯）铁路工人；

- (3) 钦察泽证实外高加索契卡系统性虐待当地格鲁吉亚分子，导致大规模逃走，并指控伊万诺夫斯基从萨马拉招募了 1345 名俄罗斯人，意图取代契卡中的所有格鲁吉亚人；
- (4) 钦察泽还声称统一外高加索人民委员部的所有文书工作都用俄语开展，并且俄语已被定为梯弗利斯的铁路及许多其他机构的官方语言。与此同时，旧沙皇官僚被允许在格鲁吉亚管理事务，理由是格鲁吉亚很快就会重新并入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俄罗斯；
- (5) 格鲁吉亚人提出了一连串投诉，称外高加索机构不断凌驾于主权共和国机关的决定之上，外高加索联邦最高机构的召集与运作完全无视共和国机关，要求所有重大决定在格鲁吉亚以联邦名义而非格鲁吉亚当局名义颁布，发给格鲁吉亚政府的指令缺少法定必要签名等等。⁶⁸

格鲁吉亚人的一些抱怨无疑是微不足道的，但另一些抱怨，例如在政府任职中对格鲁吉亚人蓄意的歧视，若是得到证实，其严重程度足以招致严厉的惩戒措施。

⁶⁸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 5，目录号 2，卷宗号 32，第 61 页。

双方的大多数指控直到1922年11月捷尔任斯基委员会访问格鲁吉亚时才曝光，但它们表明了格鲁吉亚当局与外高加索当局之间早已存在的不良情绪。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21年2月的入侵，当地的格鲁吉亚共产党人认为行动是背着他们进行的而因此缺乏必要的政治准备。一方面是“民族主义偏差”的指控，另一方面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战时共产主义方法”的指责，这些往往可能表现为琐碎争吵，但凸显了重大的政治分歧，这些分歧正是外高加索更严重的主权争端的核心所在。

这些争端中最明显的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三个共和国组成外高加索联邦的问题。早在1921年3月1日，阿塞拜疆官员B.沙赫塔赫廷斯基就曾致信列宁建议将外高加索纳入俄罗斯联邦，称这是解决三国领土争端最切实可行的方案。⁶⁹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同月讨论了沙赫塔赫廷斯基的提案，⁷⁰斯大林于7月访问梯弗利斯以准备建立联邦。⁷¹

1921年11月2日或3日，高加索局正式决定有必要组建外高加索联邦。根据派普斯和莱温的说法，这个举措是在莫斯科的敦促下采取的。⁷²但在11月8日，奥尔忠尼启则致电斯大林通报了外高加索局的决议并询问俄罗斯中央委员会的反应。为防中央提出任何异议，他

⁶⁹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5，目录号1，卷宗号2796，第3页。

⁷⁰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17，目录号2，卷宗号621，第2页。

⁷¹ 斯大林，第5卷，第88页及以后。

⁷² 派普斯，第267页；莱温，第44页。

还补充道“沿着这些路线的运动已经成功展开了。”⁷³中央委员会似乎对这个决定感到意外。11月17日，政治局致电高加索局，要求他们

立即告知我们你们关于组建外高加索联邦的问题具体做出了什么决定；以及你们如何设想外高加索联邦的苏维埃联盟与苏俄之间的关系。中央委员会将在收到这些材料后作出结论。

在同一次会议上，政治局讨论了分别与三个外高加索共和国缔结军事公约的事宜，说明它尚未准备好与新联邦打交道。⁷⁴1921年11月28日，列宁在给斯大林的备忘录中表示他在原则上同意建立联邦，但警告“立刻实行还为时过早”，并呼吁由三个共和国的中央委员会组织一段宣传准备期。⁷⁵第二天政治局通过了一个基调大致相同的决议。⁷⁶然而，26日全部三个共和国代表组成的全权代表会议已经缔结了一个初步的联盟协议，它保障所有三个共和国的独立，但将外高加索的最高权力交给由每个共和国选举产生的同等数量代表组成的全

⁷³ 《奥尔忠尼启则》，第1卷，第208页。

⁷⁴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17，目录号2，卷宗号231，第2页。

⁷⁵ 列宁，第44卷，第255页（译者注：见《对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成立外高加索共和国联邦的决定草案的修改意见》，载于《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增订版（北京，2017年），第42卷，第293页）。

⁷⁶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17，目录号3，卷宗号237，第2页。

权代表会议。⁷⁷因此情况似乎是高加索局在很大程度上凭自身主动性推进联邦的组建，既没有与莫斯科也没有与共和国预先协商。

另一方面，格鲁吉亚人声称高加索局的行动毫无准备而且违反党纪，是不诚实的；⁷⁸至少自1921年3月起，这个想法就已在酝酿之中，而且斯大林本人也曾于7月访问梯弗利斯与格鲁吉亚共产党人讨论这个提议。莱温认为，在关于外高加索联邦的争端中，“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是在对格鲁吉亚共产党人进行私人报复”，⁷⁹但三个共和国之间建立更紧密联系的整个前提深深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争论的对象本应仅限于这种联合的时机与形式。

格鲁吉亚人的反对和中央的犹豫暂时推迟了外高加索联邦的组建。但1922年1月底召开的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否决了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的意见。⁸⁰1922年3月12日，三个共和国的代表签署了成立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的正式条约。条约在形式上保留了三个共和国的独立，但将广泛的权力赋予联邦苏维埃，特别是最高经济委员会，这使三个共和国在经济事务上的独立性低于苏俄的自治共和国与州形式上被赋予的独立性。⁸¹尽管格鲁吉亚党代表大会做出了决定，但格鲁吉亚领导层和一些阿塞拜疆共产党人仍然阻挠联邦，这促使俄罗斯中央委员会干预。4月5日，中央对格鲁吉

⁷⁷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64，目录号1，卷宗号61，第16页。

⁷⁸ 福季耶娃，第289页。

⁷⁹ 莱温，第54页。

⁸⁰ 苏尼，第214—215页；《奥尔忠尼启则》，第1卷，第226页及以后。

⁸¹ 巴塞尔，第401—406页；苏尼，第215页。

亚反对派采取了强硬立场，称其认为格鲁吉亚的斗争“完全基于一些同志的个人动机”，并威胁要根据党关于反对派系斗争的决议开除其党籍，同时将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从 25 人缩减至 15 人。⁸²（此时，高加索局更名为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Заккрайком。）

尽管俄罗斯中央委员会此时已掌握大量证据证明奥尔忠尼启则在处理外高加索事务时我行我素，而且列宁关于审慎处理格鲁吉亚的严厉指示正遭到无视，但他们仍一如既往全力支持外高加索边委，托洛茨基除外，就像 1921 年入侵格鲁吉亚时那样。外高加索争端是出由于“个人动机”的结论或许有一定道理，但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而中央委员会支持外高加索边委的做法实则是将这个指责隐晦指向了马哈拉泽和姆季瓦尼等备受尊敬的布尔什维克。但布尔什维克不能允许关于格鲁吉亚的异议公开化。自布尔什维克入侵以来，格鲁吉亚已成为全欧洲反布尔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的关注焦点，而布尔什维克正发起一场席卷整个大陆的大规模宣传，最终目标是让格鲁吉亚成为五一节庆祝活动的焦点，并广泛翻译和分发柴金与托洛茨基的著作。⁸³此时布尔什维克仍寄望于西方爆发进一步的革命，如果有任何来自格鲁吉亚共产党领导层的暗示表明格鲁吉亚花园里并非一切都像玫瑰般美好，或者暗示国家的命运正在违背其人民意愿的情况下被决定，都会削弱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国际吸引力。当前首要任务是建立统一战线，而眼下主导议程的正是外高加索边委。

⁸²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 64，目录号 1，卷宗号 61，第 9 页。

⁸³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 17，目录号 3，卷宗号 288，第 13 页。

尽管格鲁吉亚人继续对具体的集权措施提出异议，如货币改革，但中央委员会的指令有效平息了对建立外高加索联邦的公开反对，直到1922年10月，当问题作为一种似乎是事后顺带提及的内容出现在苏维埃共和国正式统一的修订的第二个草案中时，它才再次被推向风口浪尖。尽管姆季瓦尼作为来宾出席了批准草案的中央委员会会议，⁸⁴而且显然没有对格鲁吉亚通过外高加索联邦加入苏联提出具体反对，⁸⁵但这在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内部引发了轩然大波，他们此前就已表示反对组建联盟，如今更是将此举视为对格鲁吉亚国家地位的进一步削弱。他们向莫斯科的抗议遭到了斯大林、加米涅夫、布哈林的接连拒绝，最终列宁也于10月21日给格鲁吉亚发去一份严厉的电报，指责抗议者行为不当而且违反了党的程序。⁸⁶

不久之后，外高加索边委发起攻势，试图将一些格鲁吉亚反对派分子调离梯弗利斯。这促使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11名成员中的9人于1922年10月22日集体辞职，他们称“外高加索边委实际上不信任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并且有计划地迫害几乎所有中央委员”。⁸⁷尽管外高加索边委迅速接受了他们的辞职并任命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但莫斯科无法忽视事态的发展。当年前格鲁吉亚中央委员M.奥库贾瓦给列宁写信，详细陈述了奥尔忠尼启则对格鲁吉亚共产党人的威胁和

⁸⁴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17，目录号2，卷宗号84，第1页。

⁸⁵ 福季耶娃，第290页。

⁸⁶ 列宁，第44卷，第299—300页；派普斯，第274页。

⁸⁷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5，目录号2，卷宗号32，第57页；福季耶娃，第290页。

辱骂，让事态进一步升级。⁸⁸据奥库贾瓦后来的说法，奥尔忠尼启则曾向他挥舞大理石镇纸和刀子并威胁要枪毙他。⁸⁹尽管奥尔忠尼启则否认了这个指控，但这促使俄罗斯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于11月24日派遣了一个由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带头的三人委员会前往梯弗利斯调查此事。其他委员会成员是米茨凯维奇-卡普苏卡斯和曼努伊尔斯基，他们绝无可能同情反对中央集权的抱怨，据说季诺维也夫声称委员会甚至在离开莫斯科之前就已得出了主要结论。⁹⁰此时，中央委员会已经习惯了支持外高加索边委并将格鲁吉亚人视为麻烦制造者，大体上或许认为委员会的调查只是走个形式。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叶努基泽后来报告列宁本人曾急切地询问委员会的人员组成，⁹¹并且他在政治局确认委员会组成的投票中弃权。⁹²不久之后，由于不信任捷尔任斯基的公正性，列宁还派李可夫前往梯弗利斯关注事态。

此时，又一起事件进一步扩大了对奥尔忠尼启则的指控。根据李可夫自己的说法，他安排与西伯利亚流放时的前战友，也是格鲁吉亚反对派的支持者阿卡基·卡巴希泽会面，会面地点就在奥尔忠尼启则位于梯弗利斯的寓所，当时李可夫为执行列宁的任务正在此借宿。在这次纯粹的社交聚会上，话题不可避免转到了格鲁吉亚政治上。卡巴希泽抱怨共产党领导人正在享受巨大的物质特权，并特别提到奥尔忠

⁸⁸ 派普斯，第281页。

⁸⁹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5，目录号2，卷宗号32，第49—50页。

⁹⁰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5，目录号2，卷宗号32，第54页。

⁹¹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590页。

⁹² 福季耶娃，第290页。

尼启则一直在炫耀一匹用公款喂养的良种马。随即爆发了激烈争吵，其间奥尔忠尼启则动手打了卡巴希泽，李可夫和他的妻子不得不介入将两人拉开。⁹³

虽然这个在党圈子中被称为“事件”的风波其实不过是一场失控的争吵，而且很可能是在酒精影响下发生的，但它印证了许多关于奥尔忠尼启则专横手段的指控，并且给列宁留下了特别的印象。这也并非完全孤立的事件。除了奥库贾瓦的指控外，还有一次，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中支持奥尔忠尼启则的 A.A.格格奇科里殴打了两名与格鲁吉亚反对派有关联的党员干部。⁹⁴1922 年 11 月，一个名叫卡卡巴泽的人进一步指控，奥尔忠尼启则曾找到他要求他组织一次恶意的诽谤宣传让“姆季瓦尼在群众眼中名誉扫地”。⁹⁵尽管奥尔忠尼启则断然否认了奥库贾瓦和卡卡巴泽的指控，⁹⁶并将卡巴希泽事件斥为个人争吵而且与格格奇科里的殴打事件无关，但种种迹象足以表明这里确实燃着一把明显非布尔什维克式的火焰。虽然布尔什维克在对付政治对手时手段往往很残酷，但对党的同志使用诽谤和人身攻击则是严重的过失。

捷尔任斯基委员会后来提交给政治局的书面结论完全为奥尔忠尼启则和外高加索边委开脱责任；外高加索边委始终遵循俄罗斯中央

⁹³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 5，目录号 2，卷宗号 32，第 42—43 页。

⁹⁴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 5，目录号 2，卷宗号 32，第 60 页。

⁹⁵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 5，目录号 2，卷宗号 32，第 50 页。

⁹⁶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 5，目录号 2，卷宗号 32，第 59—60 页。

委员会的路线，包括向群众和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绪让步。然而，格鲁吉亚共产党人在推行这个政策时自身却屈从于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压力，并把让步奉为偶像；与外高加索边委的冲突完全应归咎于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外高加索边委始终遵循正确的党内程序并为其所有决定开展了恰当宣传；有关外高加索边委存在大俄罗斯倾向的指控被驳回，格鲁吉亚反对派被指控犯有一系列过错，包括蓄意阻挠其已正式批准的政策、执行包括土地改革的重要任务时存在违规、在党和苏维埃机构中任人唯亲和对孟什维克疏于防范。⁹⁷ 尽管这些结论中有许多明显与事实相悖，但委员会还选择不去处理许多重要指控，包括涉及奥尔忠尼启则个人行为的指控。委员会全力支持外高加索边委和新的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继续工作，并建议将反对派主要领导人马哈拉泽、卡夫塔拉泽、姆季瓦尼和钦察泽调往俄罗斯工作。

在 10 月 21 日他斥责格鲁吉亚人到 12 月底之间的某个时刻，列宁对格鲁吉亚事务的态度，更宽泛地说对他曾发挥主导作用建立起来的苏维埃制度的整个进程及其实际领导人，态度都发生了转变。这种 180 度大转弯的确切原因尚不清楚。艾萨克·多伊彻认为“这种变化很可能不是由单一事件引起的，而是诸多事件综合作用的结果”，特别是与格鲁吉亚事务相关的事件，同时也因为他日益意识到自己周围日益增长的官僚主义。⁹⁸ 派普斯将列宁态度的转变归因于他从李可夫

⁹⁷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 5，目录号 2，卷宗号 30，第 1—2 页。

⁹⁸ 艾萨克·多伊彻，《斯大林政治传记》（鹅鹕，1986 年），第 249—250 页。

和捷尔任斯基分别于12月9日和12日返回莫斯科后获得的信息，⁹⁹这个说法得到了福季耶娃的支持。¹⁰⁰然而，就在列宁准备采取行动时，他的健康状况在12月15日至16日夜间急剧恶化，此后便被限制只能在住所内活动。尽管如此，他还是设法口授了自己的“遗嘱”，并在12月30日和31日口授了《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

这些笔记说明列宁被卡巴希泽事件深深触动，而它本身就足以让他质疑自己一直称之为“自治化”的整个进程。¹⁰¹列宁虽然接受苏维埃共和国需要建立更紧密联盟的必要性，但他回到了关于俄罗斯作为压迫民族的地位的老主题上，并特别注重“而这种机关……是我们从沙皇制度那里接收过来的，不过稍微涂了一点苏维埃色彩罢了”。抽象地处理民族问题是不可能的，尤其是这个“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大杂烩”的机构，使得在建立原本可取的联盟时必须保持谨慎。因此，必须在非俄罗斯共和国严格执行关于使用民族语言的规定，而且布尔什维克甚至应准备在必要时“在下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译者]退回去，也就是说，只在军事和外交方面保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而在其他方面恢复各个人民委员部的完全独立”。奥尔忠尼启则因格鲁吉亚的冲突受到特别指责。捷尔任斯基在为奥尔忠尼启则开脱罪责时也“突出表现了他的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他和斯大林对格鲁吉亚的事件负有政治责任，“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

⁹⁹ 派普斯，第281—282页。

¹⁰⁰ 福季耶娃，第291—292页。

¹⁰¹ 斯大林早已放弃了他关于独立苏维埃共和国应作为自治单位并入俄罗斯的提议。

措施以及他对有名的‘社会民族主义’的愤恨，在这件事情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¹⁰²

派普斯将列宁态度的转变视为他民族纲领彻底失败的证据：“最终，列宁的民族纲领沦为一个关乎个人行为的问题：解决一个多民族帝国的复杂问题要依靠共产党官员的长袖善舞和善意。”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派普斯进而认为“列宁的期望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列宁的民族政策遭到了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反对，而且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俄罗斯共产党的组成成分绝大多数都是俄罗斯人。虽然列宁谴责了奥尔忠尼启则和捷尔任斯基在这个事件中表现出的大俄罗斯态度，但他认为问题根源不在于个别共产党人的行为，而在于沙皇的、资产阶级的、大俄罗斯官僚主义的残余影响。然而，对派普斯而言：

一方面力求无产阶级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又要求这个主要由俄罗斯人组成的无产阶级在少数民族相关事务上处于道德守势，这在心理和行政上都是矛盾的。¹⁰³

¹⁰² 列宁，第45卷，第356—362页（译者注：见《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及其续，载于《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增订版（北京，2017年），第43卷，第353—359页）。

¹⁰³ 派普斯，第276—281页。

这无疑是个一直存在的问题，曾在巴什基尔、突厥斯坦和其他地区引发危机。但在那些事件下，有三个因素制约了俄罗斯人的滥用：第一，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会和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积极介入支持少数民族；第二，派普斯的“个人行为”，受委托解决民族争端的布尔什维克全权代表的“长袖善舞和善意”；第三，对民族主义领导人的吸收大体上是成功的，他们对赋予非俄罗斯人的自治权利感到满意。这些因素确保了布尔什维克的民族政策在苏俄取得相对成功。然而在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并未像最初计划的那样被吸纳，他们的位置被格鲁吉亚的老布尔什维克替代，这些老布尔什维克的民族主义立场竟比许多先是民族主义者、后是共产主义者的领导更顽固。另一方面，奥尔忠尼启则和外高加索边委的行为与伏龙芝、越飞和突厥斯坦局的穆斯林共产党人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

比外高加索边委和格鲁吉亚共产党人的行为更令人费解的是俄罗斯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多数成员的行为。人们本可以指望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站在格鲁吉亚人一边，但它在苏俄外的事务中没有任何作用。不过截至 1922 年底，中央委员会在支持少数民族包括格鲁吉亚人方面也有着良好记录。然而现在，除列宁外，所有政治局委员都追随捷尔任斯基的路线。因此 1923 年 1 月 25 日，政治局完全认可了捷尔任斯基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包括将四名格鲁吉亚共产党领导调离格鲁吉亚。虽然没有反对这个决定的记录，但拉柯夫斯基出席了此次会议，说明至少一定进行过一些辩论。托洛茨基也出席了会议，但没有

证据证明他在任何时候支持过格鲁吉亚人的事业，他更关心的是同一会议上讨论的外高加索军事事务。¹⁰⁴

此前很大程度上临时推行的偏向少数民族的民族政策如今正转向相反的方向。列宁的解决方案是提供比以往更具体的保障，特别是在语言领域；并对他认为要为事态新转向负政治责任的人采取惩戒措施：奥尔忠尼启则、捷尔任斯基和斯大林。派普斯认为这些补救措施完全不够而且证明列宁“对整个民族问题存在根本误解”。¹⁰⁵这种看法低估了列宁对深层问题的判断：此时他的著作中，不仅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稿中，而且在他的“遗嘱”和关于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的声明中，都弥漫着对国家官僚机构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不信任。列宁认为这种危险主要源于沙皇制度的残余与国家机关中缺乏无产者。但他同时也日益意识到格鲁吉亚冲突背后还有一个更深层、更迫切的维度。这不仅仅是国家机关内部的沙皇残余和机会主义分子在维护自身利益，也是共产党最高领导层态度转变的表现。

这个过程的关键人物无疑是斯大林。整个 1922 年他在公开场合对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的斥责越来越多，而此前一直强调的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危险。他当前对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形式上的中央集权的执念或许基于合理的原则，¹⁰⁶但如今却压倒了他先前对非俄罗斯民族的支持态度。他无疑希望将自己的心血之作展示为顺应独立共和

¹⁰⁴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 17，目录号 3，卷宗号 331，第 1 页。

¹⁰⁵ 派普斯，第 287 页。

¹⁰⁶ 见斯大林 1922 年 9 月 22 日致列宁的信，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 5，目录号 2，卷宗号 28，第 19—21 页。

国愿望的成果，但现在项目正受到格鲁吉亚人的威胁。1922年9月他就已对列宁的干预表示不满，而现在在与加米涅夫的换文中，他甚至指责列宁受到了格鲁吉亚孟什维克的影响。¹⁰⁷他还竭力阻挠列宁的调查委员会的工作（下文讨论）。鉴于列宁日益淡出政治生活，斯大林此时不仅试图重组苏维埃国家，还要巩固其在党内的地位。体现在遗嘱中以及关于斯大林对待克鲁普斯卡娅的争执中的列宁与斯大林之间日益加剧的敌意反映出斯大林态度的转变，这在他处理民族问题的方式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莫舍·莱温将党内围绕建立苏联问题的冲突视为两种类型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之间的冲突：

第一类是知识分子和理想主义者，他们对教义要求很敏感并深深执着于他们的社会主义愿景……第二类主要是行政官员、行动者、革命的实践者，他们更关注日常现实。¹⁰⁸

在前者中，他列举了拉柯夫斯基、克列斯廷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马哈拉泽和托洛茨基；后者包括奥尔忠尼启则、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古比雪夫和斯大林。这种区分也被艾萨

¹⁰⁷ 福季耶娃，第302页；《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9期，第208—209页；莱温，第51—52页。福季耶娃将这些笔记的日期定为1923年2月1日，但《苏共中央通报》和莱温将其定为1922年9月底。我未能找到文件，但笔记的整体内容似乎支持福季耶娃的日期。

¹⁰⁸ 莱温，第59页。

克·多伊彻沿用，¹⁰⁹太简单化了。“行动者”有一套驱使其行动的理论纲领，而且还得到了党内一些主要理论家的支持，如布哈林和皮达可夫；而“知识分子”中，托洛茨基在内战中因对所受军事任务的残酷执行而声名鹊起；米哈伊尔·伏龙芝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功务实型领袖，他身上有着强烈的理想主义特质。事态的发展以及布尔什维克因持续处于全球孤立而陷入的意识形态混乱，迫使他们从1921年初开始就公开承认自己眼下的首要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保住权力，这种压力对奥尔忠尼启则和斯大林等人的信念及个人野心都产生了影响。但这种压力可能产生双重影响，与此同时，马哈拉泽正朝着同样非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迈进，即彻底的民族主义。莱温的著作《列宁的最后斗争》正如其名，主要目标为揭示列宁对苏联国家发展方向的深切忧虑并将其生命最后时光投入到对抗这些倾向的斗争中，而这些倾向在斯大林身上尤为凸显。这种研究视角导致莱温以非黑即白的眼光看待当时的主要人物，将他们分为好人或坏人，从而忽略了其中涉及的一些复杂性和事态发展有时具有的偶然性。

1923年1月24日，列宁要求福季耶娃连同他的其他秘书格利亚谢尔和哥尔布诺夫一起，收集捷尔任斯基委员会的所有材料并撰写他们自己的报告。他给秘书们列出的问题清单展现了他最关注此事的哪些方面：

¹⁰⁹ 艾萨克·多伊彻，《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牛津，1970年），第73页。

- (1) 为什么指控格鲁吉亚共产党原中央委员会犯了倾向主义？
- (2) 指控它犯了破坏党纪的错误，是指什么？
- (3) 外高加索边委还指控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犯有其他什么过错？
- (4) 肉体上的压制办法；
- (5) 列宁不在时和列宁在时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的路线；
- (6) 委员会的态度。它只审查对格共中央的指控，还是也审查对外高加索边委的指控？
- (7) 现状。¹¹⁰

从这个清单可以清楚看出，列宁此时开始怀疑的不仅在格鲁吉亚问题上存在政治错误，还怀疑捷尔任斯基委员会有蓄意掩盖的部分，甚至怀疑中央委员会阴谋在其对民族问题的态度上误导他。列宁不断催促他的秘书们推进这个工作，表明他急切地想要弄清此事背后的真相。¹¹¹

1923年3月3日，福季耶娃向列宁提交了完成的报告。报告在结论中明确支持格鲁吉亚人并逐条驳斥了捷尔任斯基委员会的结论。

¹¹²尽管秘书们在批评奥尔忠尼启则和捷尔任斯基时毫不留情，但最值得注意的是报告中对斯大林只字未提。列宁在向秘书提出的问题中并

¹¹⁰ 福季耶娃，第303页（译者注：本书提供原文与《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增订版提供的不同，后者内容为：“（1）为什么指控格鲁吉亚共产党原中央委员会犯了倾向主义。（2）指控它犯了破坏党纪的错误，是指什么。（3）为什么指控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压制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4）肉体上的压制办法（‘生物力学’）。（5）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在时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时中央的路线。（6）委员会的态度。它只审查对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的指控，还是也审查对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的指控？它是否审查了生物力学事件？（7）现状（选举运动、孟什维克、压制、民族纠纷）。”见《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增订版（北京，2017年），第43卷，注释319，第593页）。

¹¹¹ 同上，第304—307页。

¹¹²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5，目录号2，卷宗号32，第69—73页。

未要求提供任何关于斯大林角色的信息，而且他在遗嘱中对斯大林的批评针对的是他不适合担任总书记一职，而非他在民族事务上的处理方式。他在12月关于民族问题的笔记中谈到了斯大林的政治责任，但这并不足以说明列宁认为斯大林深度参与支持奥尔忠尼启则。那种认为斯大林是列宁在格鲁吉亚事务上主要攻击目标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基于将奥尔忠尼启则描述为斯大林的“爪牙”或“跟班”。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奥尔忠尼启则远未将自己视为斯大林的傀儡，事实上，1923年奥尔忠尼启则曾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联手试图削弱斯大林的权力。¹¹³ 尽管列宁怀疑中央委员会在处理格鲁吉亚事务时存在欺骗，这必然牵涉到斯大林，但在此时，他似乎并非列宁怒火的目标。斯大林也因列宁委托编写这个报告的秘书对他怀有极大的尊重与敬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保护。¹¹⁴

然而，列宁与斯大林因后者对列宁妻子克鲁普斯卡娅的无礼态度而发生的著名决裂显然强化了他日益坚定的信念，中央委员会正密谋在格鲁吉亚问题上误导他，而斯大林深度参与其中。2月14日，列宁指示福季耶娃告知中央书记索尔茨*，他认为中央对民族问题的总体处理方式是错误的，表明他已准备与中央委员会对抗。¹¹⁵ 3月6日，他致信姆季瓦尼和马哈拉泽：“我专心致志地关注着你们的事。我对

¹¹³ 赫列夫纽克，第17—20页。

¹¹⁴ 罗伯特·瑟维斯，《列宁：政治生活 第3卷 铁环》（伦敦，1995年），第290、305页。

* 译者注：根据《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增订版，亚·亚·索尔茨自1921年起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而不为中央书记。见《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增订版（北京，2017年），第43卷，注释323，第594页；人名索引，第636页）。

¹¹⁵ 福季耶娃，第313页。

奥尔忠尼启则的粗暴，对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纵容感到愤慨。我正为你们准备信件和发言稿。”¹¹⁶但列宁病得太重，无法为格鲁吉亚人辩护，于是他转向托洛茨基，觉得托洛茨基是政治局中唯一可以信任的人而且有望支持他的立场。3月5日，列宁致信托洛茨基：

我请您务必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那件事进行辩护。此事现在正由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进行“调查”，而我不能指望他们会不偏不倚。甚至会完全相反。¹¹⁷

然而，托洛茨基在当天给列宁秘书沃洛季切娃的电话中表示，他病得很重，无法承担这样的责任，就连能否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做经济报告都无法确定。况且在与马哈拉泽、姆季瓦尼和奥尔忠尼启则交谈后，他确信奥尔忠尼启则的任何失当都只是孤立的错误。¹¹⁸对托洛茨基来说，格鲁吉亚事务显然不是什么大事，肯定不足以把自己置于政治局其他成员的对立面。

无论如何，政治局和外高加索边委一直在做出和解姿态，试图平息格鲁吉亚的事态，避免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发生破坏性争吵。

¹¹⁶ 托洛茨基，同上，第81页（译者注：见《致波·古·姆季瓦尼、菲·耶·马哈拉泽等同志》，载于《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增订版（北京，2017年），第52卷，第535页）。

¹¹⁷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5，目录号2，卷宗号34，第15页（译者注：见《致列·达·托洛茨基》，载于同上，第52卷，第533页）。

¹¹⁸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5，目录号2，卷宗号34，第3页；沃洛季切娃对托洛茨基答复的摘要此前未公开，因此莱温和多伊彻都推测托洛茨基一定同意了列宁的请求。莱温，第155—156页。

1月25日政治局关于将姆季瓦尼等人调离格鲁吉亚的决定标志着奥尔忠尼启则及其支持者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就在同一天，另一个事件导致斯大林的书记处采取了更公正的态度。显然，一些高度机密的文件，包括列宁和斯大林的电报以及马哈拉泽的一个秘密报告，落入了梯弗利斯的孟什维克手中。保密不力和向孟什维克泄密一直是外高加索边委对原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的主要指控之一，如今斯大林迅速采取行动，将责任归咎于新格鲁吉亚中央书记萨巴什维利，后者随即被解职。¹¹⁹或许这个尴尬事件推动了在格鲁吉亚的和解举措，但政治局想必也急于了结此事，因为它不仅在撕裂格鲁吉亚的党组织，还在全党范围内引发了不健康的关注。以至于1月5日中央委员会不得不向共产党的所有省委和州委发出一个特别通告解释格鲁吉亚的事件。尽管通告完全在为外高加索边委开脱，但对格鲁吉亚人的指责并未像预期那样严厉。¹²⁰

然而，促成和解的直接原因是列宁写给格鲁吉亚人的支持信。3月7日，斯大林致信奥尔忠尼启则，就这封信的内容向他发出警告并建议他与反对派达成妥协。¹²¹1923年3月，加米涅夫和古比雪夫前往格鲁吉亚参加党代表大会，3月14日，姆季瓦尼、马哈拉泽、奥库贾瓦、加米涅夫、古比雪夫、埃利亚瓦（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领导人）、奥尔忠尼启则和米亚斯尼科夫正式签署了一个秘密的党协议。根据协

¹¹⁹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5，目录号2，卷宗号31，第1页。

¹²⁰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5，目录号2，卷宗号32，第5—17页。

¹²¹ 《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9期，第151—152页。

议，格鲁吉亚人同意有必要建立外高加索联邦，作为回报，共产党承诺对国家机关中的任何大俄罗斯倾向进行“坚决且系统的斗争”，对民族感情保持敏感，特别是在格鲁吉亚，并采取文化和教育措施以消除民族仇恨。¹²²作为签署协议并服从党纪的交换，反对派将被允许在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中获得一些席位形成一个少数派。¹²³然而，马哈拉泽、姆季瓦尼和奥库贾瓦另行签署了一个声明，明确表示他们认为只有将在格鲁吉亚中央里成为少数派的他们自己才真正有能力推行这些政策，他们签署协议只是出于对俄罗斯共产党团结的考虑，尤其为了避免给病重的列宁增添更多困扰。¹²⁴奥尔忠尼启则还向斯大林报告，姆季瓦尼要求改组外高加索边委并将奥尔忠尼启则调离高加索，但随后同意将外高加索边委的问题推迟处理。¹²⁵3月19日，奥尔忠尼启则向格鲁吉亚党代表大会提交了一个由加米涅夫和古比雪夫拟定的新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成员名单。然而，局势对格鲁吉亚反对派已如此不利，以至于这个名单被否决，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排除了姆季瓦尼和钦察泽但在25个席位中包含以马哈拉泽为首的8名“偏差分子”的名单。¹²⁶

尽管托洛茨基对列宁做出了否定答复，但他确实采取了一些措施帮助格鲁吉亚人。3月6日，他致信政治局建议对斯大林为第十二次

¹²²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5，目录号2，卷宗号31，第6—7页。

¹²³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5，目录号2，卷宗号31，第5页。

¹²⁴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5，目录号2，卷宗号31，第8页。

¹²⁵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5，目录号2，卷宗号31，第11页。

¹²⁶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5，目录号2，卷宗号31，第9页。

党代表大会准备的民族问题提纲进行一些修改，强调大国沙文主义的危险并且几乎用列宁文章中的原话论证未来可能有必要拆分一些统一的人民委员部。¹²⁷此时斯大林似乎还不知道列宁的那些文章，但他还是接受了托洛茨基的建议。3月23日，托洛茨基试图说服政治局解除奥尔忠尼启则的职务，并取消给格鲁吉亚反对派贴上的“偏差分子”标签，但他只争取到一票支持（可能是布哈林）。随后，他在3月31日将同样的提议提交给中央委员会全体，但仍只获得一票支持。¹²⁸遭到彻底失败后，他似乎放弃了斗争。姆季瓦尼等人此时已无力回天，不过奥尔忠尼启则的行为似乎也有所收敛。政治局得到了它想要的结果，即毫无阻碍地朝建立统一的苏维埃国家迈进。

当时政治局主要人物更关心的是列宁去世后会发生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公开继续就格鲁吉亚问题争吵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斯大林策划了外高加索的妥协方案，他从中获益最大。如果能在党代表大会上毫无争议地展现他自己的心血之作，创立苏维埃联盟，那将极大提升他在党内的声望。现在只有病入膏肓的列宁可能阻碍他。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十二月笔记的命运颇为有趣。1923年3月5日，托洛茨基收到了一个笔记副本和列宁秘书的报告。除了列宁最亲近的圈子和加米涅夫外，没有人知道这些笔记的存在，直到4月16日，俄罗斯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前夕，福季耶娃致信加米涅夫询问该如何处理这些笔记，因为列宁曾表示希望发表这些笔记，但未留

¹²⁷ 《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5期，第154页。

¹²⁸ 《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9期，第152—154页。

下最终指示。¹²⁹加米涅夫随即将此事提交中央委员会，并表明自己支持发表。¹³⁰斯大林接手了此事，同一天内双方往来传递了数封便条。福季耶娃告知斯大林列宁明确表示希望将来某个时候发表这些笔记，她个人认为笔记内容极为重要，应该让全党知晓。¹³¹然而之后她向斯大林报告列宁的妹妹玛丽亚·伊里奇娜反对发表，理由是列宁未留下明确指示，福季耶娃还补充说列宁认为文章尚未完成。¹³²托洛茨基再次尽力回避此事。他致信斯大林解释说尽管他看过这些笔记，但他认为此前如何使用这些笔记应由列宁决定。既然现在列宁已无法参与，托洛茨基觉得有责任将这些笔记作为对民族问题有价值的贡献加以报告。但如果中央委员会没有其他人提及此事，他会将此视为默认决定，“这使我在党代表大会上无需对这篇文章承担个人责任”。¹³³

然而，掌握最终话语权的是斯大林。同一天，他致信中央委员：

我感到万分震惊的是列宁这些无疑具有原则性重要意义的文章，托洛茨基早在3月5日就已收到，却将它们束之高阁一个多月……关于这些文章的谣言和神话正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代表中传播，与中央委员会无关的人都知道它们的存在；中央

¹²⁹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5，目录号2，卷宗号34，第16页。

¹³⁰ 同上。

¹³¹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5，目录号2，卷宗号34，第20—21页。

¹³²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5，目录号2，卷宗号34，第18页。

¹³³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5，目录号2，卷宗号34，第6页。

委员们自己必然助长了这些谣言和神话，而中央委员会理应最先了解文章内容。我认为列宁的文章应当公开发表。但从福季耶娃的信中可知，这些文章显然无法发表，因为列宁尚未对其进行校订，对此我只能表示遗憾。¹³⁴

斯大林本应因列宁的文章而感到威胁，但这封信中流露出的厚脸皮与傲慢表明他认为自己掌控着局面并且能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轻松过关。

¹³⁴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 5，目录号 2，卷宗号 34，第 19 页。

第 8 章 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与苏丹-加利耶夫事件

1923 年对布尔什维克民族政策的发展至关重要。格鲁吉亚事件和列宁文章的相关问题必须得到处理。在米尔赛义德·苏丹-加利耶夫事情中，民族的偏差已经发展成有组织的反党活动。最终，苏联宪法规定了民族共和国与中央的关系。这些辩论的结果是加强对共和国领导层的政治控制，同时强化民族招募政策以及少数民族的文化、语言和教育权利。此外，对非俄罗斯地区的工业发展给予了新的重视。

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召开前夕的披露不可避免地影响了辩论的进程。尽管曾决定不发表这些文章，但大会主席团还是决定于 4 月 18 日向代表透露文章内容¹受列宁立场的鼓舞，姆季瓦尼选择违背在格鲁吉亚党代会上达成的协议，并于大会一次早期会议上对奥尔忠尼启则和中央委员会处理格鲁吉亚事件的方式提出强烈抗议。²所以战线甚至在大会听取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之前就已划定。尽管格鲁吉亚事件主导了整个大会的讨论，但这不应

¹ 《苏共中央通报》，第 9 期，1990 年，第 162 页。

²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 164—166 页。

掩盖同样被关注的重要问题，涉及党的总体国家政策和新的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确切形式。为讨论斯大林议题的具体修正案而与代表大会分开举行的分组会议的讨论完全忽略了格鲁吉亚问题。相反，斯大林因大纲和提议的联盟宪法条款含糊不清而受到猛烈批评，并被抱怨在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方面存在缺陷。因此，几项重要修正案被纳入议题，通过牺牲中央来赋予联邦共和国更多权利。这与理查德·派普斯“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斯大林的彻底胜利告终。行政层面上自治与中央集权的问题最终以支持后者告终”的观点相去甚远。³

斯大林在4月23日上午召开了关于民族问题的会议。他在报告开头谈到了民族问题的国际意义，认为这对于将革命传播到东方殖民地人民中至关重要。在国内，进步的主要障碍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双重危险，而且重点在于前者。⁴自1918年以来，这些一直是布尔什维克关于民族问题声明中的标准论调，所以并不令人意外。他对党内大俄罗斯态度的担忧甚至延伸到中央委员身上，他指责这些成员发表“与共产主义不符的[……——译者]——违背国际主义的”演讲。⁵无疑，他希望在为格鲁吉亚政策辩护之前明确表明自己完全理解列宁的疑虑。

谈到联盟时，斯大林强调了协议的自愿性质以及共和国根据长期坚持的自决政策享有脱离联盟的权利。他现在引入了一个更新的

³ 派普斯，第293页。

⁴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479—481页。

⁵ 同上，第484页（译者注：见《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载于《斯大林全集》（北京，1953年），第5卷，第198页）。

概念，即区分联盟条款保障的“法律平等”，以及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实现的“实际平等”。要实现“实际平等”，不仅要推行理所当然的学校和语言等民族政策，还要通过在非俄罗斯地区建设工业来保障其发展，包括将工厂从俄罗斯腹地迁出。斯大林重申，这些新工业中心将通过俄罗斯无产阶级的努力来建设。⁶这种对工业发展的强调是新颖的，却是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思想的逻辑结论。⁷如果斯大林的目标是提高落后民族的文化水平，那么从长远来看，这只能通过提高他们的经济水平来实现。然而，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表述带来了一个结果，即俄罗斯无产阶级现在处于非俄罗斯人的开明施惠者地位。这与列宁的解释明显不同，列宁认为俄罗斯人民，特别是俄罗斯苏维埃政府，应对沙皇时期的民族压迫政策负有集体责任，因此倾向于限制俄罗斯人的权利以支持少数民族。相比之下，在斯大林对新联盟的设想中，非俄罗斯民族需要牺牲部分主权以换取俄罗斯的慷慨援助。这一点在大会上未被提及，但鉴于后续发展，它具有重要意义。

在强调了他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不满以及对少数民族福祉的承诺之后，斯大林接着开始抨击地方民族主义。尽管他竭力将来自阿塞拜疆、布哈拉和花刺子模的共产党员归入这个范畴，但他的目标显然是格鲁吉亚人。在为外高加索联邦辩护，称其对民族和平至关重要后，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格鲁吉亚人如此反对外高加索联邦，却声称完全支持与俄罗斯的联邦关系。他声称答案在于他们无需畏惧

⁶ 同上，第 486 页。

⁷ 见第二章，上文。

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但格鲁吉亚在外高加索享有特权地位，这主要得益于其控制着铁路枢纽第比利斯和地区的主要港口，巴统。这使得格鲁吉亚能够对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发号施令，而如果外高加索联邦成立，这种有利地位将丧失。捷尔任斯基委员会揭露的民族主义罪行清单中又新增了一项指控——格鲁吉亚政府颁布了一项调控第比利斯人口的法令，目标为减少亚美尼亚人的比例并增加首都中格鲁吉亚人的数量。斯大林认为，这种牺牲一个民族利益来扶持另一个民族的政策，与奥匈帝国帝国主义政府和英国在印度推行的政策如出一辙。⁸

总之，斯大林总结道，首先，有必要通过采取措施保障非俄罗斯人的民族生活，让苏维埃政权在共和国中受到拥护；其次，“至少使主要民族”应在联盟人民委员部中拥有代表席位；第三，“必须在我们的中央最高机关中设立一个能够反映所有的共和国和民族的需要和要求的机关”。⁹值得一提的是斯大林在1922年9月与列宁的争论中曾反对设立第二院。现在他提议设立两个权利平等的院，其中一个反映全体劳动人民的阶级利益，另一个单纯处理民族问题。后者将由每个民族共和国和地区的代表平等组成，并作为民族需求的“晴雨表”。¹⁰尽管斯大林赋予了第二院平等的权利，但他将其描述为晴雨表，使它听起来更像是一个咨询机构。此外，斯大林提议的每个自治共和国与州无论规模大小都享有平等代表权，意味着联邦共和国对该机关的

⁸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487—492页。

⁹ 同上，第492页（译者注：同上，第209页）。

¹⁰ 同上，第492—493页（译者注：同上，第210页）。

影响力将微乎其微。我们将会看到，斯大林在这一点上受到了特别的批评。

接下来发言的姆季瓦尼几乎没有为斯大林针对他的指控辩护。对于格鲁吉亚沙文主义的指控，他只是提到了格鲁吉亚政府对待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阿扎尔和奥塞梯少数民族的政策。关于总体民族政策，他宣称“民族政策当然不仅仅是语言和文化问题，而遗憾的是，许多权威同志在很大程度上常常这样理解。对于苏联政权、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首先是经济活动，经济活动就是一切，并且决定着一切。”所以在格鲁吉亚争端中处于最核心的自治、语言和文化问题并不十分重要。经济才是一切，而在经济方面，姆季瓦尼和其他人一样都是中央集权主义者。他非常愿意接受将处理国防、外交和经济的联盟人民委员部统一。¹¹

至于外高加索联邦，在联盟成立后，根据外高加索边委和外高加索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外高加索联邦将仅保留两个人民委员部——“这种统一形式多少有些尴尬”。至于认为联邦制对防止民族摩擦是必要的这一论点，迄今为止苏维埃政权的政策，特别是在北高加索，一直是按民族划分领土以缓解紧张局势，这与当下提议的方案恰恰相反。¹²

因此，姆季瓦尼的策略是聚焦于外高加索联邦相关的实际问题并淡化格鲁吉亚争端中其他至关紧要问题的重要性，同时证明他本人是

¹¹ 同上，第 495—500 页。

¹² 同上，第 500—501 页。

中央集权的支持者。但他并未成功。多位发言人提醒大会，外高加索边委与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之间的第一个冲突点正是围绕外高加索铁路统一问题产生的分歧，而这似乎反驳了姆季瓦尼自称支持经济集权化的说法。

格鲁吉亚人斯图鲁阿对格鲁吉亚反对派最为严厉。他最初曾是姆季瓦尼和马哈拉泽的支持者，并曾参与试图诋毁奥尔忠尼启则和斯大林的秘密会议，甚至讨论过让格鲁吉亚共产党退出俄罗斯共产党并向共产国际申请独立成员资格的举措。他认为如果不是格鲁吉亚领导人彻头彻尾的民族主义，民族问题在外高加索本不会成为一个问题，因此整个事件应完全归咎于他们。¹³阿塞拜疆人阿洪德夫在抨击格鲁吉亚反对派时言辞同样严厉。¹⁴

然而，总的来说，辩论并未带有如此强烈的个人敌意。季诺维也夫在抨击格鲁吉亚人的同时也刻意与斯图鲁阿的言论保持距离。¹⁵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新任主席埃利亚瓦强调了与反对派观点的一致之处，称他们的分歧在于联邦关系的具体形式和变革的节奏。¹⁶叶努基泽为外高加索边委的作为辩护，并嘲讽姆季瓦尼和马哈拉泽只抱怨个人待遇问题，却无法指出在外高加索执行的民族政策存在任何根本性

¹³ 同上，第 505—508 页。

¹⁴ 同上，第 608—611 页。

¹⁵ 同上，第 602 页。

¹⁶ 同上，第 574—576 页。

错误。¹⁷奥尔忠尼启则在发言时尤为克制。考虑到列宁的文章，他列举了一系列例子来证明外高加索边委在处理格鲁吉亚问题时并未表现出任何大俄罗斯主义态度。¹⁸

对于格鲁吉亚反对派，钦察泽开场便确认“从讨论中可以明确我们在对民族问题的理解上并无分歧”。分歧只在于时机和呈现方式。外高加索铁路统一的推进方式存在的问题是，它给人一种对格鲁吉亚采取殖民式的大俄罗斯主义态度的观感。格鲁吉亚人并不反对政治与经济统一——他们支持全联盟层面的政治统一和外高加索层面的经济统一。正是实现这种统一的看起来像是强权的做法疏远了格鲁吉亚人民。¹⁹马哈拉泽谈到了一些简单的误解并主要抱怨外高加索边委在行事时与格鲁吉亚共产党缺乏协商。²⁰

几乎所有这些发言者都强调格鲁吉亚争端中的双方在原则上并无重大分歧。只有两位主要演说家，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将冲突置于理论背景下。季诺维也夫的论点基于列宁对属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员和属于被压迫民族的共产党员的立场的区分。没错，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是民族问题中的主要危险，而俄罗斯共产党的职责就是与这种沙文主义的一切表现形式斗争并增进少数民族的权利。但格鲁吉亚

¹⁷ 同上，第 585—590 页。

¹⁸ 同上，第 591—594 页。

¹⁹ 同上，第 582—585 页。

²⁰ 同上，第 515—518 页。

共产党人首要的职责是与格鲁吉亚民族主义斗争。²¹尽管这个论点在形式上是正确的，但它并未解决格鲁吉亚人在遭遇大俄罗斯主义态度时应如何应对的问题。然而，在这个辩论的背景下，季诺维也夫战胜了格鲁吉亚一方，因为他们一直回避证实对奥尔忠尼启则和外高加索边委的大俄罗斯主义指控。

布哈林发表了一篇被伊萨克·多伊彻描述为“一场伟大而激动人心的演讲，[它]将是布哈林这位左派共产主义领袖的绝唱”。²²他认为季诺维也夫低估了民族主义的重要性，这可以从乌克兰、中亚和雅库特持续不断的反抗中得到证明。民族问题不容忽视，因为当苏维埃国家的措施，如土地改革、税收等，在非俄罗斯地区实施时，都会成为民族问题。共产党内部缺乏民族干部，这意味着列宁的特殊让步政策需要得到加强。最后，作为国际革命的旗手，苏维埃国家必须对少数民族格外敏感。乌兹别克沙文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无足轻重，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却意义重大，因此党将大部分注意力投向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做法是正确的。²³

布哈林成功地将每位代表口头上的对国际局势和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优先考虑转化为对格鲁吉亚人的辩护。然而，他拒绝批评斯大林的理论，称其为“卓越的”，并试图按照中央委员会先前的决定将格鲁吉亚问题搁置为一个单独的决议。负责结束会议的拉狄克试

²¹ 同上，第 601—608 页。

²² 多伊彻，同上，第 98 页。

²³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 611—615 页。

图在双方之间取得平衡。他对全党缺乏对民族纲领的理解表示极大担忧，但同时批评布哈林和姆季瓦尼为地方民族主义开了“空白支票”。至于其他问题，比如外高加索联邦，他认为有必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并仔细权衡利弊。²⁴

关于格鲁吉亚问题的讨论没有得出任何具体结论。只有布哈林准备认真地辩论是否存在任何普遍的理论考量，否则始终没有明确究竟涉及哪些问题。捷尔任斯基委员会至少得出结论，冲突根源在于对让步政策的不同解读，但这一点在大会上几乎未被提及。至关重要的是，格鲁吉亚人没有信心去尝试证实奥尔忠尼启则等人滥用大俄罗斯主义的指控，而是将他们的论据建立在列宁的权威以及他们作为国际主义者和中央集权主义者的资历之上。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他们的失败。他们的反对者很容易将他们描绘成微不足道的麻烦制造者，这些人关心的无非是维护自身的权威。

尽管大多数发言者都提到了格鲁吉亚问题，但人们普遍对此感到厌倦，因为它似乎在一个月前就已经最终解决了。倘若不是列宁的文章突然被发现，这个问题很可能不会受到如此多的关注。关于格鲁吉亚的辩论未能澄清任何问题，反而成功掩盖了代表大会面临的更紧迫的议题。毕竟，这是党讨论建立联邦制联盟的主要契机，围绕它存在诸多关切。此外还有布尔什维克在苏俄内部的民族政策迄今的实施情况问题。像巴什基尔和突厥斯坦这样的地区可以说比格鲁吉亚有更多的理由提出抱怨。

²⁴ 同上，第615—619页。

代表大会会场还提出了其他问题。克里斯蒂安·拉柯夫斯基发出严厉警告，称如果民族问题处理不当，可能会引发内战。他试图阐述列宁对苏维埃机关性质的担忧，认为它正在共产党人自身内部滋生官僚主义作风。这正是“我们的党、我们的纲领与我们的国家机关之间日益形成且不断扩大的根本分歧”的根源。虽然他赞成建立联盟，但他对中央机关的态度感到不安，它们自认为如今对所有独立共和国都拥有完全的权力。尽管中央委员会已决定国家结构目前应保持不变，但这种迹象已经有足够的证据。没有规定确保非俄罗斯民族在中央机关中的存在，这些机关在明显遭受“部门心理”影响的同时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权力。最后他总结道，“我们需要从联盟人民委员部中剥夺十分之九的权利并将它们移交给民族共和国”。²⁵

拉柯夫斯基得到了乌克兰人格林科、斯克里普尼克和在乌克兰工作过的雅科夫列夫的支持。格林科强调共和国需要享有更广泛的预算权力并恳请党更重视民族文化。²⁶斯克雷普尼克特别关注乌克兰教育的落后状况和乌克兰人在乌克兰境外作为少数民族受到的不尊重，这都是共产党人低估民族因素重要性的产物。他还将红军描述为俄罗斯化的工具并哀叹党未能培养民族干部，特别是未能留住那些大多已经离开的乌克兰社会革命党成员。²⁷雅科夫列夫也聚焦于文化和干部政

²⁵ 同上，第 576—582 页。

²⁶ 同上，第 502—505 页。

²⁷ 同上，第 570—573 页。

策的缺陷，并进一步批评斯大林的第二院是一种表面文章、徒劳无功的举措。²⁸

对党的最猛烈批评来自两位民族代表，来自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的赛德-加利耶夫以及代表吉尔吉斯党妇女部的乌拉兹巴耶娃。两人都抱怨许多共产党人忽视了民族纲领，而他们的行为有可能引发民族主义反抗。乌拉兹巴耶娃是少数直接批评斯大林理论的代表之一，她指出，斯大林的理论忽视了对民族贫困人口的工作这个未被重视的领域。²⁹

这些批评直指党在少数民族中面临的实际问题的核心。尽管一系列关于语言、文化和政治权利、关于民族干部和国家建构的政策已经出台，但这些政策仍持续受到苏维埃与党官员的阻挠态度以及物质资源和人员匮乏的制约。部分由于这个原因，边疆地区积聚了足够的反俄情绪，如果联盟的建立处理不当，就有可能引发反抗。然而，讨论一次又一次地回到格鲁吉亚事件，绕开了对这些关键问题的讨论。格鲁吉亚事件的干扰不仅误导了代表们，也影响了历史学家们，他们将格鲁吉亚人的辩论胜利误认为是斯大林和中央集权主义的彻底胜利。

在之后的一次会议上，这些其他担忧得到了适当关注。通常情况下，有一个委员会负责讨论决议的详细修正案，然后提交给全体大会进行最终投票。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委员会在2月就决定举行一次关

²⁸ 同上，第595—598页。

²⁹ 同上，第508—510、567—569页。

于民族问题的特别分组会议，并为此目的特别邀请了大约 20 个“民族”参加代表大会。³⁰该分组会议于 4 月 25 日召开，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结束关于民族问题辩论的次日。此次会议的速记报告直到 1991 年才被公布，报告显示斯大林未能如愿以偿，而且几个重要修正案被通过。

拉柯夫斯基在会议开场时重申了他对将过多权力赋予大俄罗斯机关的担忧。在国防、国内经济政策和贸易领域推行统一政策是必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要采取如今提议的这般重大举措。他现在指责中央机关企图掠夺共和国的财富为俄罗斯谋取利益。在此他道出了乌克兰人的真切担忧，他们即将丧失对本国自然财富的所有控制权。他再次恳请削减全联盟人民委员部的权力。³¹

接下来姆季瓦尼获得了发言机会，他选择回避格鲁吉亚问题的具体细节。相反他提出了自己关于联盟的方案。这与斯大林的方案有三点明显不同：第一，不应区分自治和独立共和国，所有共和国都应在平等的基础上加入联盟；第二，联盟级的人民委员部数量应限制在六个，其中财政人民委员部仅扮演“指导”角色，其他人民委员部保持每个共和国的独立性；第三，无需设立专门的第二院，反正它也不会拥有实际权力。简单的比例代表制并未让他感到困扰，因为

³⁰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 17，目录号 2，卷宗号 88，第 1 页。

³¹ 《苏共中央通报》，第 3 期，1991 年，第 170—172 页。

大俄罗斯人在那个中央机构中会占多数，我对此表示欢迎，因为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大俄罗斯人作为最有文化的民族应当发挥领导作用；更何况，共产党人在所有中央机构中都将占绝大多数，并不会出现特别严重的摩擦。³²

这种安排也将消除对外高加索联邦的任何需求。姆季瓦尼努力避免争议并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但他未能引起代表们的共鸣。只有苏丹-加利耶夫在自治共和国问题上对他表示了支持，没有人对废除第二院感兴趣，而乌克兰人则更详细地讨论了各个人民委员部的地位问题。

由于未能切实与对手交锋，姆季瓦尼错失了一次机会，这只能归因于他误判了代表们的态度。在随后的会场发言中，一位又一位发言人批评斯大林的论点以及共产党和苏维埃在民族州落实正确政策的失败。来自突厥斯坦的霍贾诺夫指出，这些论点没有提及城乡关系，而这在实践中正是民族问题的核心。新经济政策和苏维埃化的推行机械生硬，无视地方实际情况，这种方式令人想起旧沙皇体制。³³同样来自突厥斯坦的穆萨耶夫痛斥莫斯科派往突厥斯坦的几位代表、全权代表和特别委员会：

³² 同上，第 172—173 页。

³³ 同上，第 176 页。

他们把自己装扮成东方人，甚至穿上卡拉特[一种东方长袍]，把自己装扮成当地的毛拉。一个月后，他们脱下卡拉特，三个月后，他们不再以毛拉、巴依或负责在地方执行民族政策的党务工作者身份示人，而是以独裁者的面目出现，不是所处共和国的独裁者，而是派遣他们来的那个机构的独裁者。³⁴

阿夫季耶夫谈到了吉尔吉斯“合格党务工作者”的短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影响、吉尔吉斯语宣传文献的完全匮乏和招募吉尔吉斯人工作的低效。³⁵在克里米亚和巴什基尔两地都很活跃的 Sh.N.伊布拉吉莫夫再次抨击了格鲁吉亚反对派，但也指责党未能落实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关于文化发展、土地改革和干部招募的决议。正是这些失误助长了地方民族主义的抬头。³⁶

苏丹-加利耶夫提出自治共和国的权利不断受到侵犯，它们应该被提升到完整的共和国地位并拥有比目前提案更明确的宪法地位。像巴什基尔这样的地区的重要职位完全由俄罗斯人担任，他指责这些人是高尔察克的旧部。当将“与地方民族主义作斗争”的口号交给这些人时，实际上是给了他们充分的自由来宣泄他们的大俄罗斯偏见：“他们会以巴什基尔民族主义为借口来打击巴什基尔共产党人。”这些地

³⁴ 同上，第 177 页。

³⁵ 《苏共中央通报》，第 4 期，1991 年，第 164 页。

³⁶ 同上，第 164—165 页。

区的党组织处于混乱状态并无法承担与地方民族主义斗争的任务。³⁷ 苏丹-加利耶夫本人不久后就将成为“民族主义偏差”指控的受害者，并且他对地方民族主义的辩护也反映出他已经严重偏离了党的路线。但他在会议上的这些评论与当时的环境并非格格不入，并且得到了大多数非俄罗斯人发言者的响应。

米哈伊尔·伏龙芝此时已是乌克兰政府的高层，他对斯大林的论点提出了最严厉的批评。具体而言，这些论点需要纳入关于地区工业发展的具体条款。强调非俄罗斯人的工业发展是会议上许多发言者的核心议题。斯大林在开场报告中谈到了这一点，但并未将其纳入论点。伏龙芝还要求在声明当中更加强调“为发展民族文化而进行的决定性斗争”。但他主要批评斯大林论点的是在当时最根本的问题上缺乏清晰表述——联盟内部的国家关系问题。尽管他不像拉柯夫斯基那样主张削减中央权力，但他认为中央集权的行政方法已被证明是灾难。对伏龙芝来说“团结是强化联盟成员经济和行政部门权利的正确途径”。因此，共和国的权力应得到加强，特别是在财政方面，而且共和国的形式平等需在实践中得到保障。而当前的宪法提案完全未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它们规定联盟机关应从苏俄的机关中组建。这至少需要赋予第二院与第一院同等的权力（即它必须批准所有新法律，而不仅仅是斯大林暗示的那些针对民族问题的法律）以确保这种平等。³⁸

³⁷ 同上，第 163 页。

³⁸ 同上，第 178—180 页。

除了表达具体的不满，许多发言者还提及斯大林论点中的疏漏、不够明确或过于抽象之处。显然人们普遍担心，无论是在新的宪法安排还是更一般性的民族纲领方面，无论纸面协议如何，非俄罗斯地区在实践中仍将受制于大俄罗斯的行政手段，民族的需求仍被忽视。这种担忧源于过去几年的经验，尽管一个令人满意的民族政策已经形成，但它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以克服阻碍并提供所需资源。

在这场不满的风暴中，只有外高加索边委官员米高扬对斯大林给予了毫无保留的支持。³⁹但斯大林的主要安慰来自列夫·托洛茨基，他在这个辩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托洛茨基在格鲁吉亚争端和列宁文章中的作用已在上一章讨论过，而他出现在这次会议上可能与他跟斯大林达成的一个协议有关，根据协议，他现在将在民族问题上提供他的道德权威。不过他的出现还有另外两个目的，详细阐述关于非俄罗斯地区工业发展的提案，并让人们看到他履行了列宁在3月5日的信中要求他对格鲁吉亚人承担的义务，这信如今已在代表中广为人知。他首次发言中的大部分内容都围绕两个拟议修正案展开，一个是将工业企业迁至靠近原材料产地的地方，另一个是处理红军中的大俄罗斯态度问题。⁴⁰他强调斯大林已同意这些修正案，但同时也表明自己赞同伏龙芝的观点，而且没有试图认真回应迄今为止提出的批评。接下来他转向了格鲁吉亚问题。

³⁹ 同上，第158—161页。

⁴⁰ 同上，第166—168页。

列宁在3月5日给我寄来了一封信，意图是希望我应该根据这封信，在党代表大会上对这种偏差发起坚决的斗争。而现在我将在我的演讲中完成这个任务，这是我对列宁承担的义务。

托洛茨基为格鲁吉亚人辩护是列宁交给他的任务，主要是指出边境警戒线在俄国内战期间曾被频繁采用，而他不能仅仅因为格鲁吉亚人设立了警戒线就指控他们奉行民族主义。⁴¹

这个“辩护”显然不过是托洛茨基希望用以保全颜面的象征性举动。在了解更多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当时交往的细节前，我们无法确切知道他如此软弱的动机是什么，但这种敷衍的态度让人想起他先前对列宁3月5日信件的回应，说明他并未将格鲁吉亚事件看得太严重。然而，在本场会议的这次及后续发言中，他确实强烈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并提出具体措施以纠正党在执行民族政策过程中的缺陷。这种做法与斯大林的大相径庭，虽然两人没有公开对立，但如果有任何统一战线在起作用，那显然是没有经过精心协调的。

尽管有托洛茨基的支持，但在面对这一连串的批评和几乎孤立无援的情况，斯大林招架不住了。他抱怨，发言者批评他遗漏了已被第八次和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涵盖的要点，是不公允的。反正他本就不想作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他曾两次试图辞去这项职责，均遭拒绝，而现在他只是在遵从中央委员会的指示。第二院是按中央委员会指示

⁴¹ 同上，第168—169页。

设立的，⁴²而斯大林只能以美国和瑞士的制度为参考。斯大林无法或不愿直接为自己的理论辩护，转而求助于列宁；拉柯夫斯基提议的实际上是一个邦联制，而列宁在1920年反对邦联制。针对姆季瓦尼的提案，斯大林指责他过于草率并承诺在两年后重新审视全联盟人民委员部的权力——这与列宁最后的文章遥相呼应。在为自己抨击地方民族主义的立场辩护时，斯大林援引了列宁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并重复了季诺维也夫在前一天大会上提出的论点。⁴³

斯大林的表现并不出色。这次不满的浪潮似乎让他感到意外。1922年夏季他着手提出改革苏维埃共和国关系的建议时，曾自信地认为苏俄在解决民族问题上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然而先是列宁提出了令人不快的反对意见，接着格鲁吉亚人引发了轩然大波，而现在他又发现自己面临着所有民族共产党员的不满。斯大林对自己和苏维埃国家的长远计划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但如果他的目标是巩固自己对党机关的个人控制并进一步集中政治和经济结构，那么他绝不会冒在党内因民族问题而爆发反抗的风险，尤其是在列宁支持非俄罗斯人事业的情况下。他曾亲自负责制定党在民族文化和民族共产党员方面的政策，但现在发现这些政策的执行程度不能令代表们满意。因此他立即就一系列问题做出了让步。

斯大林回应后，会议继续详细辩论具体修正案。这场讨论的细节不如最终通过的修正案重要。根据伏龙芝的提议，新增段落谴责了认

⁴² 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17，目录号2，卷宗号88，第1页。

⁴³ 《苏共中央通报》，第4期，1991年，第169—173页。

为俄罗斯文化天生优于欠发达民族文化的言论，称这种言论“无非是企图强化大俄罗斯民族的霸权”。⁴⁴由伏龙芝提出并由托洛茨基阐述的另一个修正案规定要建立新的工业中心，并通过分配更多土地来改善非俄罗斯人的社会地位。最初，托洛茨基和斯大林都反对就工业问题做出具体承诺。托洛茨基希望将这些措施纳入他关于工业的总体报告中，而非在民族问题上做出具体承诺。然而，在会议的压力下，他做出让步并最终接受了这个修正案。⁴⁵

乌克兰人及其他民族对联盟人民委员部集权本能的担忧反映在接下来被通过的修正案中：

我们必须把一些苏俄政府部门企图将自治共和国的独立人民委员部置于其管辖之下并为取消后者作准备的努力看作是一种类似过去的遗产。⁴⁶

在托洛茨基和赛德-加利耶夫之间的一番辩论之后，又有一句直接针对民族共和国是短暂现象的态度的话肯定了它们的永久性。⁴⁷乌克兰人波洛兹提出的一个修正案将苏维埃联盟描述为迈向建立世界

⁴⁴ 《苏共中央通报》，第5期，1991年，第159页；《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653—654页。

⁴⁵ 《苏共中央通报》，第5期，1991年，第161—162页；《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654页。

⁴⁶ 《苏共中央通报》，第5期，1991年，第163页；《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654页。

⁴⁷ 《苏共中央通报》，第5期，1991年，第165—166页；《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654页。

苏维埃劳动共和国的第一步。⁴⁸尽管斯大林刚刚承认自己在1920年曾反对这类构想，但他如今并未表示异议。

此时季诺维也夫出席会议并提出一个修正案，强调中央委员会在选拔派往边疆地区工作的党务工作者时要格外谨慎。经一番讨论后被通过。⁴⁹伏龙芝的另外两个提案也获得通过，第一个确保联邦共和国在中央机关中享有平等地位，第二个赋予共和国广泛的预算和财政权力。⁵⁰博宾斯基提议通过专门法律以保障民族语言在所有机构中的使用——“这些法律将以一切革命的严厉手段起诉和惩处所有侵犯民族权利，特别是少数民族权利的违法者”。⁵¹根据托洛茨基的早先提议，后来又增加了一个修正案，内容是红军中的教育工作应以消除民族竞争为目标，并应采取措施组建民族军事单位。⁵²

斯大林可以宣称自己取得了一项重大胜利。会议在关于第二院的问题上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乌克兰人希望第二院仅代表联邦共和国而非每个民族，因为后者会让苏俄的自治单位拥有过多投票权。多项旨在限制苏俄在该机构中代表权的提案均遭否决。拉柯夫斯基获准向全体大会提出这个修正案，但再次被否决。⁵³然而，在决议的最终版

⁴⁸ 《苏共中央通报》，第5期，1991年，第163—164页；《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654页。

⁴⁹ 《苏共中央通报》，第5期，1991年，第166页；《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660页。

⁵⁰ 《苏共中央通报》，第5期，1991年，第168、171页；《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654、655页。

⁵¹ 《苏共中央通报》，第5期，1991年，第171页；《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655页。

⁵²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655页。

⁵³ 《苏共中央通报》，第5期，1991年，第166—171页；《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657—660页。

本和苏联宪法中，重点在于赋予第二院否决所有新法律的权利，而非仅仅像斯大林最初提议的那样只参与具有特定民族性质的立法。⁵⁴姆季瓦尼的替代提案以及一些不太重要的修正案被全盘否决。⁵⁵

在向全体大会提交的报告中，斯大林表示自己完全赞成所有这些修正案。⁵⁶然而，应当明确的是，现在这个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与斯大林最初的提纲有了明显不同的偏向。⁵⁷民族共和国的宪法地位和权力得到了极大提升。如今决议中纳入了几个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具体措施，而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提及仍模糊笼统。各民族的语言和教育权利将受到法律的严格保障。并且共和国将逐步建立自己的民族国防力量。此外，过去的错误和不足也得到了隐晦的承认。

尽管代表大会上辩论激烈，但所有参与者都达成了一个广泛共识：需要建立某种形式的联盟，在其内，主要的地域性民族群体将享有某些关于政治地位的特殊权利；教育和行政应尽可能以民族语言开展；需要招募和培养民族共产党员干部；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斗争必须继续进行。这些本质上是过去五年中逐渐形成的民族政策，如今在共产党的最高层已鲜受质疑。

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各民族在代表大会后变得比之前更强大。尽管可以辩称真正的道义之战已经在格鲁吉亚事件上打响并

⁵⁴ 《苏共中央通报》，第5期，1991年，第156—158页。

⁵⁵ 同上，第173—176页。

⁵⁶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653页。

⁵⁷ 决议的最终版本见《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691—697页。斯大林的原始提纲载于《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81—194页。

以失败告终，但后续的发展说明非俄罗斯人在分组会议上采取的立场对政策产生了更持久的影响。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短期影响可以从突厥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23 年 7 月底通过的决议《关于执行俄罗斯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的措施》中衡量。这个决议在文化工作方面的要点如下是（1）开办非党文化俱乐部；

（2）扩大民族语言学校的网络；批准人民委员会关于开办工人学校的提议；在每个地区为每个民族组织寄宿学校，以确保偏远地区的儿童能够接受母语教育；（3）“在学校中雇佣或多或少忠诚的本地人民教师”；（4）成立扫盲协会；（5）增加当地语言报纸和书籍的出版；（6）以及组织“红色大篷车”来开展政治教育工作。⁵⁸

从这个决议中可以清楚看到旧的民族政策得到了加强，而非削弱。此外，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出席 6 月举行的民族问题特别会议的“国际主义”代表们显然将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视为自己的失败。在代表大会与苏联宪法最终批准之间又做出了进一步让步。特别地，第二院的结构被调整以赋予完全的共和国更多代表权。大约同一时期也找到了资源来实施建设民族学校的计划。1925 年，当两个中亚民族被提升到完全的共和国地位时，姆季瓦尼和苏丹-加利耶夫的要求得到了部分满足。虽然政治和经济结构的中央集权不断强化，但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少数民族的权利和地位仍保持稳固。

⁵⁸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 62，目录号 3，卷宗号 9，第 134 页。

苏丹-加利耶夫事件

虽然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展现出布尔什维克仍认为有必要针对非俄罗斯人实施一系列特殊政策，但对民族主义态度的容忍是有限度的。格鲁吉亚事件已经表明民族诉求必须遵守一个公认的框架，不能挑战党的权威也不能干涉苏维埃国家的管理。鞑靼民族共产主义者米尔赛义德·苏丹-加利耶夫的案例表现了那些超出公认的理论辩论范畴、以有组织的方式反对党的政策的民族共产主义者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

苏丹-加利耶夫应中央委员会的邀请出席了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尽管只有顾问投票权，但他全程参与了会议进程。尽管他的“民族主义偏差”观点众所周知，而且自1920年以来一直是争论的焦点，但他并未受到任何像对格鲁吉亚人那样的攻击。然而，在大会闭幕后不到两周，1923年5月4日，苏丹-加利耶夫被捕，被开除党籍并关押在卢比扬卡监狱的一个牢房里。

如前所述，苏丹-加利耶夫的观点过去曾被容忍，中央委员会多次为他干预。然而，他关于建立一个独立的穆斯林共产主义组织的核心计划却一直受到阻挠，他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党的民族政策的控诉变得愈发尖锐，而他的反对行动也采取了有组织、有密谋的形式。根据后来的说法，早在1920年，他就已经和其他几位著名的穆斯林共产党员一起，组建了一个名为“联合与进步”（Иттихад ве Теракки）的秘密组织。⁵⁹1922年至1923年间，出于对他活动的担忧，曾

⁵⁹ 本尼格森与温布什，第87页。

两次试图将苏丹-加利耶夫调离莫斯科，但均未成功。其中一次尝试是由当时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实际负责人布罗伊多领导的。⁶⁰这种担忧最早出现在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当时苏丹-加利耶夫曾试图组建一个穆斯林代表的统一战线，但没有成功。1923年初，国家政治保卫局传阅或截获的信件揭示了一个有组织团体的存在，其成员不仅包括来自俄罗斯的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还包括来自土耳其和其他地区的共产党员。这些信件还说明苏丹-加利耶夫曾与瓦利多夫和巴斯马奇取得联系。

这些信件被递交给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它于5月4日传唤了苏丹-加利耶夫并作出决议：

将苏丹-加利耶夫作为反党、反苏分子开除出党。解除他在党内和苏维埃的所有职务。鉴于部分材料尚未查明，将对此事进行调查并将其本人移交至国家政治保卫局。⁶¹

这个决议很快得到了党的组织局和政治局的确认，他们还在5月底决定于6月6日召开一次由来自民族共和国与州的负责党工作人员参加的特别会议。尽管苏丹-加利耶夫事件是代表会议的主要议题，但它也将讨论斯大林准备的一个关于总体民族政策的报告并审查苏

⁶⁰ 《俄共中央民族政策的秘密……》，第17页。

⁶¹ 同上，第18页。

联宪法的问题。⁶²五十八名来自民族共和国的代表参会，其中只有十名是俄罗斯人，此外俄罗斯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以及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布罗伊多也参加了会议。在穆斯林代表中，既有苏丹-加利耶夫的反对者，也有其支持者，包括阿迪加莫夫、恩巴耶夫和费尔代夫斯等人，他们都不同程度牵涉进了苏丹-加利耶夫的阴谋。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在会议开场时详细陈述了针对苏丹-加利耶夫的证据，主要来自三封秘密信件。第一封信是写给一位波斯共产党员的，偶然落入了国家政治保卫局手中，古比雪夫称这封信证实存在一个由俄罗斯、土耳其和波斯穆斯林、既有党员也有非党员组成的组织，其目的是“在民族问题领域推行独立于共产国际和苏维埃政权的政治路线”。⁶³第二封信，是写给巴什基尔人阿迪加莫夫的，实际上并未被找到，但是被一位巴什基尔共产党员向国家政治保卫局报告，信中包含了有关阴谋组织更多的证据。斯大林得知了这封信，并在某个时候给苏丹-加利耶夫传了一张纸条以警告他信中含有近乎反革命的意味。⁶⁴

关于在乌法发现的第三封信，古比雪夫讲述的经过堪比间谍小说，包含公共浴室的一次偶遇、神秘信封、漫长的火车旅程和密码破译。古比雪夫宣读了这封原本打算寄给阿迪加莫夫的信全文：

⁶²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号 17，目录号 3，卷宗号 358，第 2 页。

⁶³ 《俄共中央民族政策的秘密……》，第 15 页。

⁶⁴ 同上，第 15—16 页。

你在仅自己阅读此信后烧掉它。斯大林告知我显然他拿到了一封我写给巴什基尔党务工作者的“阴谋”信件，从中可以清楚发现莫斯科存在一个泽基·瓦利多夫式的非法组织正在与党进行斗争。斯大林决定不提议逮捕我。现在他们在密切监视我。立即告诉我我写给你和哈利科夫的信是否已被销毁。查清楚这封信（或者可能只是一个副本）是如何被找到的。我需要知道这是原件还是副本。如果你收到的原信已被销毁，那就立即按安排给鞑靼代表发电报“我不反对将尤马津任调至鞑靼代表”。我向斯大林指出我确实给哈利科夫写过一封信，但信中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查清楚那里是谁在背叛我们。务必小心、警惕、坚定，他们也会监视你。斯大林承诺将信的副本送往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道别时，他说我今后要多加小心。你可以把一切都告诉穆尔扎布拉托夫和比克巴沃夫。

这会不会是哈利科夫干的？

米尔赛义德

附：苏维埃代表大会后我会见了萨利米亚诺夫、特廖别尔金、图

阿尔巴耶夫、苏尔坦诺夫和穆尔塔津。图赫巴图林推荐了前三位。我们能信任这些人吗？在突厥斯坦和布哈拉，巴斯马奇正变得愈发强大。有传言说他们打算在春季以更有组织的形式出现。正因如此，中央在民族问题上做出了巨大的让步。与泽基·瓦利多夫建立联系，只是我们需要格外小心——无论是私下接触还是用密码联系。不要为我担心——我会坚定到底。⁶⁵

被捕后，苏丹-加利耶夫最终承认了这些信件是他所写，并承认存在一个包含非党员的阴谋组织。尽管他起初辩称信中提及与巴斯马奇领导人瓦利多夫建立联系是为了尝试将瓦利多夫争取回苏维埃阵营，但据古比雪夫称，从信件的上下文来看，苏丹-加利耶夫显然是在寻求与巴斯马奇分子联手，而这个解读在会议上并未受到质疑。

因此苏丹-加利耶夫的案件证据确凿。这已远非民族主义偏差或违反 1921 年党内派系禁令那么简单；他领导着一个秘密的、非党的、意图对抗俄罗斯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政策的组织，而且他还与中亚仍在进行的内战中的敌人有牵连。这显然是一起叛国案。古比雪夫的陈述提出了两个要点；首先，这个阴谋的发现纯属偶然，而非如后来有人声称的那样是意图诋毁民族共产党员的有计划监视行动的结果；既然如此，将此案放在政治会议而非革命法庭上讨论是否合适便成了疑

⁶⁵ 同上，第 17 页。

问。其次，斯大林早就得知了这个阴谋，却仅仅是警告了苏丹-加利耶夫。

这两个要点在会议期间被反复提出，引发了民族共产党员内部两个派别之间的激烈辩论，在这次会议中被定为“左派”和“右派”。两个派别之间的分歧最早出现在东方各民族巴库代表大会上，他们的分歧在1921年达到了近乎暴力的激烈程度，当时在争夺鞑靼共和国领导权的斗争中，“左派”的赛德-加利耶夫被“右派”的穆赫塔罗夫所取代。总体而言，右派对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持更宽容的态度，而且更接近扎吉德主义的传统，而左派则是国际主义者，支持更强的中央集权。这并不是说左派完全反对自治和特殊民族权利，许多俄罗斯国际主义者也是如此；举个例子，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被视为左派领袖的赛德-加利耶夫就曾抱怨大俄罗斯主义态度和俄罗斯共产党员对民族问题缺乏兴趣。然而，两派的界限在此次会议上划分得更为清晰。其中一个原因是苏丹-加利耶夫被视为右派领袖，以至于许多代表担心自己的地位会因为直接或间接卷入苏丹-加利耶夫事件而受到威胁。另一方面，左派将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视为自己的一次失败，并认为当下的案件是惩戒右派并夺回一些阵地的机会。这一点在马努伊尔斯基的发言中得到了最明确的体现，他直接指责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释放了民族主义因素”。⁶⁶

讨论的大部分内容因此都是攻击对立派或进行个人辩护。更重要的是在两个基本问题上的分歧：苏丹-加利耶夫阴谋的性质和规模是

⁶⁶ 同上，第57页。

什么？其根本政治原因又是什么？正是在这些问题的背景下，苏丹-加利耶夫事件的司法性质和斯大林与苏丹-加利耶夫的关系等问题变得至关重要。右派主张苏丹-加利耶夫是一个孤立的案例，其非法和反革命活动绝不能归咎于他与右派的关联，而且如果断言苏丹-加利耶夫事件是右派民族共产主义者中更广泛问题的一种表现，那将是错误的。这个论点以多种形式被提出。里斯库洛夫将苏丹-加利耶夫的错误归咎于他的鞑靼人背景以及他对中亚局势的误解，这意味着不能将他与整个右派联系起来。⁶⁷克里米亚鞑靼人费尔代夫斯同样详述了苏丹-加利耶夫的背景，即他一直与瓦利多夫关系密切，但苏丹-加利耶夫与瓦利多夫的这种关联绝不能与他同其他穆斯林共产党员的关联相提并论，他的行为也不能归咎于党的民族政策。⁶⁸巴什基尔人哈利科夫也将右派与苏丹-加利耶夫这种更极端的案例区分开，“绝不能将任何捍卫一个或另一个共和国民众的民族利益的东方共产党员归入民族主义者的行列”。在与苏丹-加利耶夫划清界限的同时，哈利科夫还将事件的部分责任归咎于中央派来的党代表所持有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与中央委员会禁止巴什基尔右派向他们提出任何进一步的申诉，从而迫使反对派转入地下。⁶⁹

其他人进一步发展了这个论点。马里代表彼得罗夫主张，尽管可以镇压苏丹-加利耶夫，但除非党纠正民族问题上的错误执行方式，

⁶⁷ 同上，第24页。

⁶⁸ 同上，第48—49页。

⁶⁹ 同上，第46—47页。

否则“苏丹-加利耶夫主义”只会卷土重来。⁷⁰ 斯克里普尼克将苏丹-加利耶夫事件归咎于“强权偏差”；如果民族主义偏差如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认可的那样是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回应，那么消除后者也将摧毁民族主义偏差及其扭曲的表现形式，苏丹-加利耶夫主义。⁷¹ 鞑靼政府首脑穆赫塔罗夫和巴什基尔人阿迪加莫夫是与苏丹-加利耶夫牵连最深的人，他最接近于为他的前同事辩护。苏丹-加利耶夫不是无可救药的民族主义者，而且在他的著作中找不到任何反革命意向的证据。但他无法应对事态的压力，特别是对民族问题的虚无主义态度，因此误入歧途至深。⁷²

左派试图将苏丹-加利耶夫描绘成党内更广泛问题的一种表现，并呼吁大规模清洗右派，民族共产党员。赛德-加利耶夫认为，苏丹-加利耶夫这样的人是“天生的”民族主义者，已无可救药。⁷³ Sh.N.伊布拉吉莫夫的论点更为缜密，他指出穆斯林间历史上缺乏社会主义传统，导致党不得不依赖像苏丹-加利耶夫这样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⁷⁴ 伊克拉莫夫也把苏丹-加利耶夫主义归咎于穆斯林地区缺乏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但他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中央委员会和

⁷⁰ 同上，第 67 页。

⁷¹ 同上，第 63—64 页。

⁷² 同上，第 59 页。

⁷³ 同上，第 26—27 页。

⁷⁴ 同上，第 32—33 页。

政府的政策，他们忽视了吸纳真正的无产阶级分子的可能性并且忽略了党的教育工作。⁷⁵

伏龙芝虽然总体上同情右派，但试图在争论中居中调停。这类偏差并非仅限于穆斯林群体，在乌克兰和格鲁吉亚也同样明显。问题的根源有三点，第一，是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防御性反应，第二，是俄罗斯民族与非俄罗斯民族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第三，是某些共产党员中存在的民族传统和民族主义气质。主要斗争仍需针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但“只不过是披着共产主义旗帜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表现形式”的苏丹-加利耶夫主义追随者应被大批赶走。然而，长期的解决方案是从青年群体中培养新一代共产主义者。⁷⁶

托洛茨基试图清晰界定会议面临的问题：苏丹-加利耶夫究竟只是一个叛徒，还是党内民族主义倾向发生扭曲的一个例子？如果是前者，那么就没有理由召开这次会议。但显然他并不仅仅是土耳其或其他某个势力的代理人。“苏丹-加利耶夫代表着民族主义偏差的危险”。尽管托洛茨基并未指责右派持有如此极端的民族主义，但他指责他们因缺乏警惕而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片面关注使他们对民族主义的危险视而不见。⁷⁷

托洛茨基的批评并不仅针对右派。左派也曾负有将民众驱离苏维埃政权的责任，1919年巴什基尔的局势便是如此。左派的态度使得

⁷⁵ 同上，第40—41页。

⁷⁶ 同上，第52—54页。

⁷⁷ 同上，第73—75页。

吸纳新共产党员变得困难。他们需要展现出更多耐心与灵活性并做好让步的准备。至于党领导层，他们必须接受现实情况并努力在左派与右派之间把握方向，时而借助这一倾向，时而借助那一倾向，以避免在任何一个方向上偏离过远。⁷⁸

斯大林再次陷入守势。但这一次他主要受到来自左派的攻击。首先，他必须为自己过去对苏丹-加利耶夫的态度辩护。斯大林辩称，考虑到布尔什维克缺少受过教育而且有能力的穆斯林人才，即便苏丹-加利耶夫等人存在不足，支持他们也是正确的。他甚至曾为瓦利多夫辩护，结果使得后者叛逃的时间推迟了一年并减轻了危害。至于古比雪夫提及的第一封信，苏丹-加利耶夫曾向斯大林保证信的内容完全是清白的，因此，依据他当时所掌握的信息，斯大林支持他仍是正确的。但一旦苏丹-加利耶夫越过可接受的界限寻求与巴斯马奇分子接触，斯大林便彻底与他划清了界限。⁷⁹

斯大林并不打算放弃布尔什维克对民族共产主义者的宽容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是一个面子问题。斯大林个人一直与这种宽容密切相关。苏丹-加利耶夫在民族问题上的非正统思想尽管有误，却十分无害。他如今的背叛完全是另一回事。但斯大林关于人才短缺使得这种宽容成为必要的辩解也应得到认真对待。如果没有这种态度就不可能培养出任何民族领导层，进而会导致除了诉诸直接镇压之外的治理少数民族变得极为困难。

⁷⁸ 同上，第76—80页。

⁷⁹ 同上，第81页。

在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之后，斯大林接着批评了某些发言并随后对两种倾向展开了总体批判。右派，未能严肃地与地方民族主义作斗争，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干部的培养。民族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障碍，而非通往马克思主义的途径。他将这与党的历史上同孟什维克主义斗争的时期进行比较，它磨砺了党的政治路线并吸引了更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加入党的队伍。同样地，只有与民族主义展开尖锐的意识形态斗争才能吸引真正的年轻共产主义干部。如果是右派让吸引共产主义者变得愈发困难，那么左派的行为则正在疏远更广泛的民众。他们需要展现出更多灵活性，并将所有的“至少忠诚的民族因素”的，主要指知识分子的人吸纳到苏维埃工作中。在对两种倾向的最后判断中，斯大林明确指出左派带来的危险更大。⁸⁰

最后，斯大林谈及了苏丹-加利耶夫本人的命运。在会场的强烈抗议声中，他表示应选择释放苏丹-加利耶夫并将其安排到另一地区从事苏维埃工作。⁸¹

尽管面临这种局面，斯大林并不打算向左派让步。他甚至不准备让他们处决苏丹-加利耶夫。在本次会议上，左派表现得比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时自信得多。但古比雪夫提出并被代表会议通过的提议，以及伏龙芝、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重要发言，都强调需要“在民族共和国与州的地方党务工作者中培养真正的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干部”。

⁸⁰ 同上，第83—85页。

⁸¹ 同上，第85—86页。

⁸²尽管重点是国际主义，但实际上这意味着以略微调整的形式延续本土化政策，而在左派看来，正是它首先导致了苏丹-加利耶夫事件的发生。

代表会议的第二部分从总体上讨论了民族问题，主题与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讨论的基本相同，包括来自地区的申诉以及由乌克兰人牵头的对苏联宪法原则的异议。⁸³会议决议提出具体措施以促进民族共产党员的招募并使党与国家机构更具民族特质。此外还将开展对民族主义者的清洗，主要针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但也包括其他民族主义者。除此之外，决议只是以更具体的形式充实了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⁸⁴

尽管国际主义分子在此次会议上比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时更为自信，但他们并未取得彻底胜利。民族偏差的危险得到了承认，而且未来民族共产党员的活动将受到更严格的审查。不过少数民族的权利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危害也同样得到了强调。

⁸² 同上，第 281 页。

⁸³ 同上，第 99—274 页。

⁸⁴ 同上，第 282—286 页。

特别代表会议的意义是它以具体形式阐明了党中央在民族共和国与州工作的优先事项。首要任务是在党与国家机关中培养民族成分，这意味着在一定限度内容忍非正统立场。显然，这些立场的意识形态内涵没那么重要；只有当反对意见形成有组织的形式时才会触及底线。苏丹-加利耶夫事件没有发生大规模清洗曾让本尼格森和温布什感到困惑。⁸⁵但这样一次清洗会使布尔什维克在过去几年里推行的许多政策付诸东流。

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已有迹象表明布尔什维克民族政策的许多部分正在被逆转。格鲁吉亚反对派已经溃败，以及乌克兰人对苏维埃联盟意味着终结民族特权的担忧也未能得到安慰。大会初期对格鲁吉亚人的初步重创似乎预示着总体上民族主义者的失利，但这并未成为现实。即便发现了苏丹-加利耶夫的反叛，也仅仅导致对民族共产主义者活动的监管变得更严密，并未引发其他后果。

那些将 1923 年视为少数民族权利受挫之年的人，以及如今仍持此观点的历史学家，混淆了两件事：宪法结构与布尔什维克的民族政策。前者正是斯大林所描述的“独立比赛”，格鲁吉亚人和乌克兰人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比赛；无论形式结构如何，党的纪律都会确保政治统一，而格鲁吉亚人与苏丹-加利耶夫的反叛均违反了党的纪律，后者还被指控犯有反革命活动。格鲁吉亚人错误地认为这些形式层面的问题是针对他们的——事实上，这些问题主要是为了向国际社会展示。前几章概述的民族政策并未受到影响，尽管如果一些针对外高加

⁸⁵ 本尼格森和温布什，第 86 页。

索边委俄罗斯化政策的指控属实，这些政策可能已经被其违反。无论如何，奥尔忠尼启则在代表大会上就外高加索边委在语言权利方面的记录进行了辩护，而格鲁吉亚人的无纪律或许让他得以摆脱困境。列宁曾抓住奥尔忠尼启则的行为不放，但列宁主要关注的国内问题是官僚主义的影响日益增长，也正是在与官僚主义的斗争中，他向托洛茨基求助以请求他为格鲁吉亚人辩护。

1924年初生效的苏联宪法延续了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秉持的精神。新安排在形式上赋予中央对民族共和国活动更多的政治控制权，同时在中央给予了非俄罗斯人更广泛的代表权。此外，少数民族的民族权利得到强化，还制定了一个工业和文化发展的长期战略，目的是将非俄罗斯人提升到为社会主义做好准备的水平。

第9章 结论

1926年11月，苏联中执委主席米哈伊尔·加里宁就成立犹太人特别领土的提议发表讲话时，说：

对我来说，这个趋势似乎是民族自我保护的形式之一。作为对威胁着所有被剥夺了民族演变机会的弱小民族的同化和民族侵蚀的反应，犹太民族已经发展出了自卫的本能、为捍卫其民族认同而斗争的本能。……犹太民族现在面临着维系自身民族性的伟大使命。为此相当一部分犹太民众必须转变为紧密的农业群体，人数至少要达到几十万。¹

因此，布尔什维克的民族政策已发展到这样一种地步，保全犹太民族比他们的同化或“民族侵蚀”更可取，而在1913年斯大林曾明确否认其作为一个民族的存在。斯大林早期思想的影响在加里宁的设想中显而易见，即犹太人只有在领土基础上才能作为一个民族生存下去。正是这种坚持，使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以及若干革命前的民族运动政策始终区别开。也正是这个原则不仅启发了针对犹太人的比罗比詹计划，还启发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

¹ 引自艾布拉姆斯基，第69页。

结论

结构，以及在俄罗斯和外高加索发展起来的自治州与共和国制度的维护和发展。但苏联的形式结构显然背离了列宁和斯大林早先的设想，即民族特殊性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迅速消亡。这甚至与他们在民族问题上的对手，罗莎·卢森堡的支持者们所持的马克思主义教条相去甚远，这些支持者对不同民族之间，至少是不同民族的工人之间，存在任何有意义区别的观念都抱有毫不妥协的敌意。

一种自然的平等主义和支持弱者的本能与其他考量一同确保了对各民族普遍抱有积极态度。对列宁来说，对少数民族的宽容是应对他们对俄罗斯国家不信任的必要补救措施，这种不信任由长年的民族压迫以及革命后依然存在的轻蔑态度滋生，这种轻蔑态度不仅存在于旧沙皇官僚阶层之中，也存在于像奥尔忠尼启则这样忠诚可靠的布尔什维克的头脑中。然而，对斯大林来说，民族问题有更深远的意义；长期来看，民族认同和民族特性可以被塑造以促进帝国中较落后地区的物质和文化条件达到社会主义发展所需的水平。短期来看，这种“民族工程”将使布尔什维克能借助民族忠诚来巩固其统治与影响力，民族忠诚充当了对社会主义接受度的替代物。在苏维埃早期统治下民族和领土的融合说明控制因素与文化发展因素同样重要。碰巧的是，列宁和斯大林两人的观点与那些从一开始就发挥主导作用的民族领袖的愿望不谋而合。

情况曾一度岌岌可危。所有迹象都说明，在此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包括许多地方上的重要人物，都反对斯大林和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推行的宽容政策。倘若 1919 年列宁未在俄罗

斯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与布哈林达成关键的战术妥协，那么民族自决权很可能已被完全从布尔什维克纲领中剔除，少数民族群体及其盟友也会因此遭到大幅削弱。更重要的是，如果列宁在 1922 年秋天没有坚持使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而是“俄罗斯联邦”的名称，地区民族关系的未来或许会截然不同。

但布尔什维克本可以成功采纳其他任何一套政策吗？根据俄国内战史研究者埃文·莫兹利的观点，布尔什维克的民族政策结合中央集权的政党和军队，“恰恰是正确的——可能是唯一的——将多民族的‘俄罗斯’维系在一起的方案”。²这一定程度上是推测。但可以说，布尔什维克本可以通过与民族主义运动建立一系列战术联盟来赢得内战，之后再抛弃他们转而推行更具国际主义的立场。³或者，他们本可以将民族问题与领土问题脱钩，推行更直接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文化自治政策。这足以让大多数民族主义者满意，尽管其他地方的证据证明这种做法会加速同化进程，民族文化最终将被归入博物馆、图书馆和少数狂热分子的活动范畴。或者，他们也可以严格遵守民族自决原则，在不同民族居住的地区举行全民公投，尽管结果难以预料。

事实上，布尔什维克的民族政策基于模糊而且时常矛盾的理论，既非预见也非计划。相反，它是为应对特定局势而随意演变的。而且

² 埃文·莫兹利，《俄国内战》（伦敦，1987年），第282页（强调为原文所加）。

³ 有些历史学家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坚称，他们完全就是这么做的；对比布兰克，《巫师当学徒……》各处。

结论

它的发展遵循着一个模式。第一阶段，1917—1920年，民族自决权在俄罗斯外落实，同时布尔什维克与民族主义运动建立联盟，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负责满足俄罗斯内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需求。最初的领土自治实验也在此阶段进行。下一阶段，1920—1922年，在整个苏维埃俄罗斯内创建民族自治领土的活动最为活跃，目标是为每个主要民族群体提供自身发展的焦点。来自俄罗斯本地共产党员和官员的反对，特别是巴什基尔事件，促使布尔什维克开始重视民族共产党员干部的招募与培养，这些干部也从1920年起反过来对民族政策产生影响。最后，为了给构成民族自治领土基础的民族认同提供支柱，在20世纪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民族教育的扩张与民族文化的推广始终是优先事项。

尽管这些时期相互重叠，但一种政策如何引发另一种政策的脉络清晰可见。这些发展背后的共识是民族差异不仅会长期存在，还可被利用来进一步巩固苏维埃政权在非俄罗斯地区的统治。通过下放政府某些领域的权力，中央将更容易推行核心政治和经济目标并促进文化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工程虽然主要是实现意识形态目标的手段，但也关乎权力。

20世纪20年代形成的诸多正式体制要素甚至延续到了后苏联时期，但20世纪30年代这些要素的许多内容被剥夺了。由于缺乏早期苏维埃时期对文化、语言和政治发展的坚定承诺，联邦与自治体系丧失了大部分意义，以俄罗斯为核心的苏维埃身份同化进程也随之加快。尽管如此，20世纪20年代政策的残余影响仍足以确保在1991—1992

年危机缠身的苏联会沿着近 70 年前首次划定的联邦边界解体，而车臣与鞑靼斯坦的自治领土则会给叶利钦的总统任期带来最严峻的挑战。这一意义可从如下事实中窥见：如今东欧和中亚的诸多新兴民族国家，其边界、语言和名称都要归功于 20 世纪 20 年代。事实上，例如，如果布尔什维克当初未曾以他们的方式推动白俄罗斯民族的发展，白俄罗斯是否会以任何形式作为受认可的政治实体存在，更遑论作为民族国家存在，都是值得怀疑的。

布尔什维克在 1917—1923 年期间对民族问题的政策是一个在操控与培养忠诚度与身份认同、构建民族认同内涵同时化解民族冲突方面的独特试验。这些政策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名推行，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这种意识形态会推动民族特殊性的消亡，而非将其置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期结构与价值体系的核心。然而，这些政策的发展存在某种逻辑，却并非如预先设想的那般。最终形成的做法在短期内相对成功地促进了民族和谐，并在长期确保了若干民族认同的存续。希望这段发展历程的故事至少能为理解前苏联的民族问题状况和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性质与运作方式提供一些洞见。